

馬克思主义史

下

[南]普·弗兰尼茨基著

(供内部参考)



2 025 5567 1

馬克思主义史

下

[南]普·弗兰尼茨基著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参加本书译校工作的有徐致敬、杨达洲、李一、张瑞祥、尤开元、胡文建、江文若、林南庆、陈长源、李鑫南、钟韻娟、张森、李黛军、吴仕康、李光谟、乔增锐、韩宗翔等同志，全部译文最后由黄良平、李嘉恩、毛少英等同志分别作了校订。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Naprijed. Zagreb. 1961

根据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前进出版社1961年版译出

馬克思主义史

(南)普·弗兰尼茨基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門大街320号

1963年2月第1版

1964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02·357 定价(上下册)(七)3.00元

下 册 目 录

第五篇 第三国际时期的馬克思主义

第一个时期

第一章 馬克思主义者的爭論——乔治·卢卡奇	345
第二章 馬克思主义在德国	370
卡尔·柯尔什	371
亨利希·格罗斯曼	381
麦克斯·拉法伊尔	387
《社会研究杂志》集团	395
第三章 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和法国	402
安东尼奥·葛兰西	402
战前法国的馬克思主义思想	415
第四章 馬克思主义在苏联	419
尼古拉·伊·布哈林	419
“机械論者”和“辯证論者”的斗争	431
列甫·达·勃朗施坦·托洛茨基	440

第二个时期 理論上和实践上的斯大林主义

約瑟夫·維·朱加施維里·斯大林

第一章 列宁主义問題	462
第二章 理論和实践的后果	472
第三章 哲学和理論問題	485

第六篇 現今时期的馬克思主义

(一) “社会主义陣营”中的馬克思主义

第一章	安·日丹諾夫和約·維·斯大林在理論上的干涉 …	499
第二章	其他国家的馬克思主义問題和关于黑格尔的討論 …	515
第三章	恩斯特·布洛赫	527
第四章	最新时期的理論和实践	538
第五章	中国和馬克思主义	557

(二) “社会主义陣营”外的馬克思主义

第一章	馬克思主义在法国	576
	昂利·勒弗夫尔	578
	让·保罗·薩特	589
	其他理論活动	602
第二章	馬克思主义在其他国家	608

第七篇 馬克思主义和南斯拉夫革命

第一章	革命前时期	615
第二章	革命后时期	628
	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問題	630
	其他理論問題	650
結論	665

附 录

参考书目	675
人名索引	716

第五篇

第三国际时期的馬克思主义

第一个时期

第一章 馬克思主义者的爭論—— 乔治·卢卡奇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列宁的實踐和理論活动，馬克思主义的第二国际时期結束了，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这同样是一个急剧变化和充滿各种預見不到的轉变的时期。第二国际由于它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第一次大冲突的态度而遭到的政治上的破产，也是它在理論上的破产，至少是在一系列的观点方面的破产，而以前已經众所周知，这些观点实质上离开了綜合的和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正軌。在列宁的丰富的理論活动中，正如我們能够看到的，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基本原則是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論尖銳地对立的，在階級斗爭、革命、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哲学等問題上都是如此。这一切問題有一个时期似乎已經十分清楚和得到了解决，可是現在又重新成了需要进一步探討的問題和任务。

全部事件，尤其是俄国的十月革命，第三国际的成立(1919年)和欧洲大多数主要国家(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的革命事件，不仅引起了社会主义运动內部进一步的政治分化(分化

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而且在理論方面必然开始一个高漲、重新探索、冲突和徘徊的时期,于是这一切同时就使得这个重要时代的第一个时期带有相当积极的特征。

这里,各种观念、想法和利益发生了冲突。尽管第二国际过去的大部分领导人(卡·考茨基、爱·伯恩施坦、麦·阿德勒、奥·鮑威尔、卡·倫納等人)在理論上仍然是活跃的,但是馬克思主义理論的这种新的高漲,不仅意味着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形式和正統形式的馬克思主义的对立,而且从第三国际存在的最初时起就导致了第三国际本身的内部和共产主义理論家队伍中間的剧烈分化。

这不是什么新的、特殊的現象。情况同第二国际的理論和实践发展是完全相类似的。然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事实,使这个时期带有一种特殊的性质。由于这个事实,全部理論問題便同政权本身的問題,也就是显然政治性的問題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俄国無論在理論上或者政治上的这种发展的性质又必然給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理論思想的发展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和影响,因为这个时期的第三国际的领导必然处于俄国共产党人的直接影响和操纵之下。由此也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在这个时期的俄国馬克思主义中間占統治地位的政治和理論观点,必然对其他国家的馬克思主义产生了起支配作用的影响。

当然,这种对于馬克思主义說来是毫不必要的統治地位,在新的国际的发展的初期,并没有这样地表現出来。原因也在于偉大的列宁的杰出表現,因为列宁从来不想以官僚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立場强加于人,更不想对理論思想实行壟断,他很清楚地知道,在理論思想方面面临着許多困难的任务。另一方面,俄国馬克思主义者本身之間还存在許多分歧,而且常常是极重要的理論、政治問題和具体实际問題的分歧。当列宁在世时,所有这些分歧是允許存在的,它們甚至能够造成一种为发展任何思想、包括馬克思主

義思想所必需的創造性氣氛。在一定的意義上來說，列寧對於所有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是一種保證，即保證他們能從任何迷途上最終找到正確的出路，而列寧本人就是唯一能在革命的和建設的環境中應付自如的一位如此突出的和天才的人物。

第一個時期大約延續到三十年代初，這的確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一個豐富多采的、創造性的發展時期，而常常也是趨於極端的發展時期，但是唯一的動向是要克服前一時期的許多閉塞的和不正確的東西，是要開始進一步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基本問題和努力在理論上站到現代的水平上。後面所說的這一點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生氣勃勃地存在的前提，而且一般是任何科學、任何科學研究和哲學研究的前提。在這方面作了最主要的概括的，當然是列寧，但是這個時期也使許多其他的思想家登上理論舞台，他們很快就表明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對於最好的資產階級思想也具有優越性，同時也表明了：當馬克思主義理論有着發展的自由，當它沒有被任何教條主義的和國家主義的利益和公式所束縛的時候，它就具有一切廣闊的發展可能。

歐洲的革命形勢一直持續到二十年代初。德國波羅的海艦隊的起義已經把革命的蘇維埃提到了首位，由於以布爾什維克的偉大的歷史性行動為榜樣，革命的蘇維埃成了這個時期革命群眾的基本思想和目的。儘管斯巴達克派在柏林失敗了，1919年初仍然建立了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在這裡實現了共產黨人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黨團的聯合。在奧地利，蘇維埃、特別是工人蘇維埃也得到了發展，1918年底在那裡宣布成立了共和國。奧地利的蘇維埃是非常強大的，然而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不成熟而胆怯的政策和改良主義的幻想（鮑威爾、倫納）阻礙了蘇維埃的革命鞏固和發展，從而使它們在聯合政府期間必然地削弱下去，雖然在1919年3月的選舉中社會民主黨人獲得了多數。在同一時間內，在匈牙利也成立了以共產黨人和貝拉·庫恩為首的第一個蘇維埃政

权，这个政权也开始实行过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措施。

巴伐利亚苏維埃共和国由于艾伯特、謝德曼、諾斯克的武装干涉而瓦解了，匈牙利革命在外国资产阶级的压力下也失败了，在奥地利，整个发展被議會政策削弱了，由于这种政策，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终于失败了，——尽管如此，但这个时期的历史正是把**苏維埃問題**提到了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和实践的首位。

从理論上說，这意味着对社会民主党关于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观点的尖銳批評，特別是在列宁、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反对考茨基、鮑威尔、倫納等人的論战中，这种批評表現得最为明显。这样便以明确的和革命的方式提出了新的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国家和国家发展道路的問題。在列宁、布哈林的評論和欧洲共产主义者的其他許多評論中，工人委员会所体现的工业民主的問題占有一个中心地位。当时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家极清楚地看到，在这个問題上包含着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革命过渡的实质，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实质。对国家和国家资本主义問題、过渡时期及其各个方面的問題所作的馬克思主义的分析，从理論上指明了这种研究的必要方向，沒有这点，为社会主义进行正确的、成功的斗争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家也正确地觉察到，生动的馬克思主义思想的若干方面在第二国际时期是完全被忽視的或停滞的，因此作出了一系列的尝试，想使馬克思主义理論在这些方面也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且恢复过去在某些方面停顿下来的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这里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哲学問題，无论如何，哲学問題同政治和社会学問題都是第二国际的馬克思主义者在理論钻研中最薄弱的方面。而卢卡奇关于历史和阶级意識的书尽管有其缺点，却正是在这方面指出了，在分析現代的人的实质問題上，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极大的可能。

乔治·卢卡奇 1885 年生于布达佩斯，他以研究現代戏剧发展

的著作和《靈魂和形式》一書開始了自己的有成果的理論和文化歷史研究活動。盧卡奇在海德堡學習時，就在歐洲哲學和文化歷史思想的最優秀的傳統的基础上，首先在德國古典作家、特別是黑格爾的思想的基礎上，並且也在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新康德主義者和德國維貝爾社會學學派的觀念的基礎上，樹立了自己的理論觀念。

由於上述情況的湊合，盧卡奇經過黑格爾和費爾巴哈而走到了馬克思的立場，他參加了工人運動，贊同了馬克思主義對資產階級世界進行的批評，並在1919年匈牙利革命事件中成為匈牙利蘇維埃政府的教育委員。

匈牙利革命失敗後，他僑居於維也納，為共產國際的機關刊《共產主義者》撰稿，1929年赴莫斯科，在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以後在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工作，一直到戰爭末期他重新回到匈牙利時為止。

在1919年到1923年期間，他寫有若干文章，這些文章於1923年以《歷史和階級意識》為書名出版^①。

在盧卡奇看來，正如他在該書的前言中所特別強調的，中心問題是馬克思的辯證方法的問題，而馬克思主義者過去對馬克思的辯證方法不僅沒有研究，而且沒有理解。盧卡奇認為，羅·盧森堡是唯一懂得也從方法和經濟的意義上進一步發展馬克思的事業的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堅持這樣的意見：為了繼續發展這種方法，就應當從對她的著作進行批評性的闡述和討論出發。而對於這條

^① 在這本表明盧卡奇思想的深奧和光輝的論文集集中收集有：《什麼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1919年），《馬克思主義者羅莎·盧森堡》（1921年），《階級意識》（1920年），《物化和無產階級的意識，歷史唯物主義的職能的改變》（1920年），《合法性和秘密性》（1920年），《對羅莎·盧森堡所著〈對俄國革命的批評〉一文的批評意見》（1922年），《關於組織問題的方法》（1922年）。收集有上述論文的這本書於1923年初在柏林由馬立克出版社出版，書名是《歷史和階級意識（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研究）》（《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Studien über Marxistische Dialectique》）。

道路來說，“列宁的著作和讲演在方法上是具有决定意义的”^①。

卢卡奇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正确地理解馬克思的思想，而不加任何修正。这同时也包括“真正从內容上掌握对待現代的迫切問題的立場，因为根据对馬克思主义方法的这种理解，这个方法的主要目的在于認識現代”^②。

卢卡奇认为，最近的革命年代的經驗证实了以正統的观点（也就是以共产主义的观点）理解的馬克思主义的全部要点，他同时认为，正是为了研究这种“具体的和历史的辯证法”問題，就必须从研究它的奠基人黑格尔着手^③。

正如在 1922 年写的前言中所明确地提到的，卢卡奇的意图不在于完整性和系統性，而是要“使辯证方法的問題——作为活生生的和迫切的問題——成为辯論的对象”^④。

卢卡奇在自己的研究中把基本重点放在这个方法論方面。他以諷刺的态度看待修正主义对事实的崇拜，同时完全正确地指明，战斗的經驗主义根本看不到，事实之所以成其为事实，只是由于在方法上进行的加工，这种加工有它特殊的認識的目的。經驗主义者

① 卢卡奇：《历史和階級意識》，1923 年柏林德文版，第 6 頁。

② 同上书，第 7 頁。

③ 当时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这种傾向要求把对馬克思的研究同对黑格尔的辯证法的研究密切地联系起来。列宁也曾很肯定地支持这一傾向。他在《論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1922 年）中写道：“根据馬克思怎样运用他唯物地理解了的黑格尔辯证法的例子，我們能够而且應該从各方面来闡明这个辯证法，在杂志上登載黑格尔主要著作的摘要，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加以解釋，引用馬克思运用辯证法的实例，以及引用經濟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的、为近代史尤其是現代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提供得非常多的辯证法的实例来加以評注。依我看，《在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一些編輯和撰稿人應該形成一个独特的‘黑格尔辯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論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04—205 頁）除了卢卡奇以外，致力于实现这种傾向的特別有柯尔什、布洛赫和德波林。这种傾向后来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受到了尖銳的譴責，虽然它在我們所研究的第一个时期中就已經有了自己的激烈的論敵了。

④ 卢卡奇：《历史和階級意識》，第 11 頁。

认为(而非辯证的修正主义者則随声附和),任何数目、任何原始的事实都是經濟的事实,他們在这里沒有看到,“最一般地列举、排列‘事实’而不加任何評論,就已經是‘解釋’了”^①,也沒有看到,事实在这里恰恰是在一种理論和方法的基础上,从某个生活結構的整体中提出来而又被包括到某种理論中去的。

另一方面,盧卡奇在恩格斯的著作中看到一些对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見,同时提出一个指責,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这个指責在一定的意义上說来是正确的,但也是片面的。盧卡奇在确定辯证法的哪些方面經過恩格斯研究的同时,他根据自己的辯证法观念指出:“但是根本的相互作用即**主体和客体在历史**过程中的**辯证关系**一次也沒有被提到,更不用說被提作方法論研究的中心(这种关系應該是中心)。而如果不肯定这一点,辯证方法——尽管完全保留‘現今的’及其他的概念,因为这种做法当然最終还是靠不住的——就将不再成为革命的方法”^②。

盧卡奇坚持克服一般的直观的唯物主义,以及对现实作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解釋(把现实解釋为某种仅仅受自己的規律支配的客观性)的一切宿命論,他把馬克思的理論和实践統一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費尔巴哈的提綱)看作解决人的历史問題的答案。所以他首先強調主体和客体在历史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并把方法仅限于历史现实方面。这一个論点,尤其是对自然辯证法問題的看法,盧卡奇在他的一个注解中說得最簡明不过了,他說:“把方法仅限于社会历史现实方面,这是很重要的。那些从恩格斯对辯证法的分析中产生的誤解,其根本依据在于,恩格斯——依照黑格尔的錯誤的先例——把辯证方法也推广于認識自然界,但是在这方面,辯证法的具有决定性的定义(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論和实践的統一,范疇的基质的历史性变化是它們在思想方面的变化的基

① 盧卡奇:《历史和階級意識》,第18頁。

② 同上书,第15—16頁。

础等等)并不存在于对自然界的認識中。遺憾的是,这里不存在詳尽地研究这些問題的任何可能”^①。

这段話在当时反对卢卡奇的論战中受到极尖銳的攻击,此外,由于我們将在后面研究的其他若干方面,他的整个著作遭到譴責或者甚至被打入冷宮。的确,卢卡奇在拋棄自然辯证法的时候走得太远了(他以后否定了自己的这种观点)。然而同样确实的是,卢卡奇比他所有的批評家更正确,他发现了我們时代的問題和把馬克思的辯证法深刻地、綜合地运用于历史領域的必要,因为这个历史領域过去在很多方面开始从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認識下漏过去了。卢卡奇在这个意义上有理由指責恩格斯本人,因为他发现了,停留在一般的、本体論的辯证法观念上,就会輕視历史过程的辯证法,而历史过程因此很容易开始得到某些机械論的說明,在这些說明中,人实际上消失不見了,而和任何其他自然生物一样仅仅成为这种发展的一般的要素而已。

按照我的看法,卢卡奇虽然努力避免这一点,但无論如何是走得太远了。但是另一方面,他完全正确地发现了現代关于人的問題的实质,由于他把辯证法仅限于社会历史现实,所以对这个綜合的和矛盾的过程作出了一定的分析,这些分析超过了在列宁之后的当时一切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論著作^②。

卢卡奇真正領会了馬克思在关于費尔巴哈的提綱中提出的关

① 卢卡奇:《历史和階級意識》,第17頁。这实际上是卢卡奇对自然辯证法的观念采取否定态度的唯一的一段話,而且这还是在注解中說的,虽然这个論点是从他的这些文章的看法中合乎邏輯地得出的。

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的意义上說,在現代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中出現了类似的过程。斯大林主义的本体論忽視特殊的历史辯证法和人到了这种程度,結果重新出現了对这种本体論的反动(布洛赫、勒弗夫尔、薩特)以及把辯证法仅限于历史现实的做法(薩特以及其他某些馬克思主义者)。在他們看来,自然辯证法或者是某种未經证实的东西,或者是和現代人的历史的、革命的實踐不相干的东西。这样一来,我认为,就不必要地和不正确地縮小了哲学分析的領域。

于人的天才的觀念，即應當把感性、客體、事物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這樣他就把存在的實質理解為社會過程，並把存在本身理解為人的活動的產物。因此，無論如何，存在的本體論的差距被縮小為只是歷史的存在，但是歷史的存在本身被正確地理解為人的革命實踐的產物，而人也正確地理解為社會歷史過程的主體和客體。

從對這個綜合的歷史過程所作的分析着眼，盧卡奇認為**總體範疇**是決定性的範疇。具體的總體就是第一個現實範疇。如果不清楚地察看這個範疇的涵義，就沒有任何可能把歷史的過程理解為統一的过程。當然，總體範疇並不使它的要素在某個抽象的統一体中消失不見，而只有理解“某個對象，看到它在它所發生作用的一定的總體中的職能，才使這種辯證的總體觀點——也只會使它——能夠把**現實理解為社會過程**”^①。

因此，在盧卡奇看來，使馬克思主義根本區別於資產階級科學的東西，不是經濟動機在解釋歷史方面所占的統治地位，“而是總體觀點”^②。總體範疇對盧卡奇來說是如此具有決定性的範疇，以致於這在他眼中甚至就是科學中的革命原則的承擔者^③。

總體觀點不僅決定對象，而且還決定認識的主體。資產階級的世界觀總是從個人的觀點來看社會現象，而從這種觀點出發，只能看到局部的方面和沒有內在聯繫的事實，或者只能看到抽象的特殊規律。而那種總體只有當主體本身也是總體時才能被提出

① 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第 27 頁。

② 同上書，第 39 頁。

③ 盧卡奇當然認為，同樣性質的因素以及整個研究部門的隔離是必要的。唯一重要的是：這種隔離是認識整體的手段還是目的本身？因為“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最終並不存在任何獨立的法的科學、民族經濟學、歷史學等等，只存在一個單一的、統一的科學——關於作為整體的社會的發展的歷史辯證法科學”（同上書，第 39 頁）。對於盧卡奇的思想說來，重要的是，他當時還不知道馬克思的 1844 年的《手稿》，但在此以及後來的分析中却得出了幾乎與之相同的結論。

来。在现代社会中，只有各阶级才代表这种总体观点。如果古典经济学是从个别的资本家出发的，马克思则同这种方法作了根本的决裂，因为他把生产的主体本身也理解为总体、阶级。

经济上的宿命论和标榜伦理来建立社会主义的做法，是密切联系着的。伯恩斯坦、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或奥·鲍威尔的观念，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后果。如果仅仅从个人的观点出发，那末周围的世界对他便是冷漠无情和命由前定而格格不入的，因而他的能动性仅仅在于认识和利用这个世界的规律，或者在于从伦理上改变人，以此作为改变这个世界的前提。

一种观点导致对人的机械论的观念，另一种观点则导致假设纯粹的“要求”，而两者在一起从总体观点来看就意味着考察问题的方式中的割裂，这同时也意味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的割裂。“然而现实只能作为总体来理解和察看，并且只有一个本身也是总体的主体才能够这样察看。”^①这种主体就是阶级本身。“只有阶级能够在进行活动的同时看到社会的现实并在它的总体中加以运用。”^②正因为如此，作为思维主体的无产阶级才一举而解决了一筹莫展的选择：纯粹规律的宿命论和纯粹意向的伦理的选择。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式和“代表者，它的历史使命的良心”^③便是政党。

卢卡奇既不是把阶级意识理解为这个阶级的单个的人们所思考或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把它理解为这种东西的平均数。“但是，作为总体的阶级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作用最终决定于这种意识，而不是决定于单个的人们的思想等等，并且只能从这种意识中被认识。”^④正因为如此，对他来说，在这种阶级意识和经验事

①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 51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 53 页。

④ 同上书，第 62 页。

實以及這個階級的個別成員的個人意識之間是存在差距的。由此便產生這樣的問題：這種差距在不同的階級身上是否不同？這種差別有多大？針對現有的上述不協調情況，這種階級意識的職能是什麼？

在這種解釋中，盧卡奇的階級意識的觀念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想化的，類似某種在過程本身中起統治作用的無個性的因素。同時，這種觀念和列寧關於從外部向階級（在無產階級那里）灌輸意識的觀念是對立的，並且僅僅強調這種意識是從歷史生活總體中有機地產生出來的。無論如何，歷史經驗在某種情況下是和這種說法相矛盾的。

然而，這使得盧卡奇能夠在其他某些要點方面得出結論，這些要點對於這個過程看來無論如何是非常重要的。他首先說明在過去的社会形态中的階級意識和社会結構的關係，指出資產階級不能夠充分意識到自己的地位，因為認識這一點就意味着肯定它的暫時性，同時他首先得出結論說：在這裡，矛盾“表現為**思想體系和經濟基礎的不可克服的對立**。這種階級意識的辯證法以（資本主義的）個人之間不可克服的對立為基礎，以個人之間按照個別資本家和‘自然而合乎規律的’必然發展（這種發展在原則上不是借助意識所能制止的）的公式所形成的不可克服的對立為基礎；因此，它使理論和實踐產生不可克服的對立”^①。

另一方面，他正確地指責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說它忽視了意識的這種作用，把偉大的原則性鬥爭歸結為“現實的政治”，而在這種政治中資產階級總是比較強大的，因為它擁有更廣泛得多的手段和可能。尤其是，“從這種地位產生的階級意識，必然表現出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同樣的內部結構”^②。

正因為如此，革命的命運在經濟的和政治的危機來臨的時候，

^① 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第76—77頁。

^② 同上書，第81頁。

“决定于无产阶级的思想的成熟程度，决定于它的阶级意识”^①。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的“思想体系”既不是什么打来进行斗争的旗帜，也不是掩盖真正目的的帷幕，而是这种斗争的目的本身和武器。无产阶级的非原则性的策略会“把历史唯物主义降低为一般的‘思想体系’，并把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斗争方法强加给无产阶级”^②。

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不是个人的心理意识，也不是个人总和的群众心理意识，“而是被意识到的阶级的历史地位的意义”^③。如果我们把他的这个思想理解为阶级意识的最好的定义，那末先前引述的关于革命本身的命运的结论基本上也是正确的。这种结论在各个方面以相当发展的无产阶级为前提，但是也以无产阶级对它的斗争的历史作用、任务和目的的意识为前提。

卢卡奇知道，无产阶级的生存形式，它的生活环境，它所身受的非人的和异化的遭遇，必然在它的生活和意识中留下深刻的痕迹。由于那些原因而经常陷于粗鄙的经验主义或空想主义，这是丝毫也不奇怪的。因此，在阶级意识的结构及其实现的可能性方面，不应当抱有任何幻想，但也不应当忽视现存的力量。

每个无产阶级革命都把工人委员会当作自己的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推到历史舞台上，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顺利地克服它的领导（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标志。“革命的工人委员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为机会主义对它作的讽刺画所代替，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自己产生的时候起就为之不倦地进行斗争的形式之一。它的存在、它的不断发展表明，无产阶级已经处于临近它自己的意识的时刻，从而也处于临近胜利的时刻，因为工人委员会在政治上、经济上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物

①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82页。

② 同上书，第83页。

③ 同上书，第86页。

化。”^①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为爭取新的、无階級的社会而进行的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这种斗争的一个阶段），“不仅是同外在的敌人、同资产阶级所作的斗争，而且同时也是无产阶级同**自己本身**、即同资本主义制度对它的阶级意识的破坏性和屈辱性影响所作的斗争。只有当无产阶级克服本身所受的这种影响时，它才会获得真正的胜利……无产阶级不应该害怕任何自我批评，因为只有真理才能引导它走向胜利，所以自我批评应当是它的切身需要的东西”^②。

在这些研究中，卢卡奇关于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的著作占有特殊的地位^③。卢卡奇对这个现象所特别感到兴趣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商品关系、分工、物化和商品拜物教对社会的外部 and 内部生活发生怎样的影响？他和马克思的看法一致，肯定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不存在作为统一劳动过程对象的统一的产品，生产是局部化的，生产的客体和主体因而也趋于分离；同时他强调指出，工人本身也成为机械体系的一个机械化的部分，丧失自己的能动性，并且多半对那种作为闭塞的体系、不依他的意志为转移而进行的机械规律的过程采取默然不语的态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机械化的生产过程使工人们成为许多孤立的抽象的原子。

①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 93 页。卢卡奇对这个“物化”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这个研究实际上是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文集的核心，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到这点。

② 同上书，第 93 页。

③ 物化（德文是 Verdinglichung）概念是卢卡奇从马克思的著作和他在《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取来的。商品生产的基本现象表现在，一种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关系采取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形式，而这种物与物之间和物对物的关系成为察看生活的唯一的水平线。这种基本现象就是拜物教和物化现象。卢卡奇后来的种种分析和结论，都是从马克思过去对商品拜物教所作的真正天才的分析中得出的，然而我们看到，马克思的这些分析在他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关于异化的分析中早已得到了说明，在卢卡奇写这部著作的时候，这些手稿还未为人所熟悉。

事实上这种孤立化和原子化的现象是明显的,但也是必然的。当生产的历史发展造成了意识到自己是劳动力所有者的自由的工人的时候,尤其会产生这种情况。“他的特殊地位在于,这种劳动力是他的唯一所有。从他的命运来看,对整个社会的建设具有典型性的是,这种自我客体化、人的一种职能成为商品的现象,最明确地表明了那种不人道的而且产生不人道影响的商品关系的性质。”^①

这种关系也遮盖了一切东西的物化:从私人占有制、土地、资本,直到技艺精巧的专家,这些专家出卖自己的才能,并对他自己的、客体化和物化了的才能的发挥抱着一种木然的态度。

人所需要的一切物体成为商品的这种情况,决定着人的意识的特殊的结构:“他的特性和能力不再联结成为个性的有机的统一体,而是表现为‘物’,而这些物也像外在世界的各种物体那样被人所‘占有’和‘转让’”^②。

整个这种分工、专业的物化和发展的过程,使得整体的图画消失不见了。如果哲学也将“以专业的眼光”对待这一切问题,不看整体,那末对它说来,这种异化的和物化的世界最终也将是在人面前存在的唯一可能和唯一可以理解的世界。

卢卡奇认为,现代的批判哲学也是从这种物化了的意识结构中产生的^③。

①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103—104页。

② 同上书,第112页。

③ 同上书,第122—140页。在解释现代哲学的唯理论、现代哲学对现实的直观的态度以至于幻想(以为这种现实本身乃是理性的、思想的产物)的时候,卢卡奇批评了恩格斯对康德的“自在之物”的解释和批评。卢卡奇认为,“自在”和“为我”对于黑格尔来说不是对立的,而是必要的相互关联之物(第145—146页)。然而,他的这个意见没有注意到,恩格斯采用“自在”的概念是从康德的意思上,而不是从黑格尔的意思上说的,而批评本身则是根据黑格尔在分析现象和本质时对康德的不可知论所作的正确批评进行的。

同样,他反对恩格斯把实践表述为实验和工业的批评意见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他把实验仅仅理解为思辨的关系,然而这个批评意见又是正确的,因为这些范畴并不能

盧卡奇發現了資產階級社會的人和資產階級哲學的一個普遍的現象：主體和客體的对立、人和社会的对立、哲學意識和某種独立的異己的基質的对立，他遵循馬克思關於克服這種理論的和實踐的局限性的基本思想，正確地發現了解決主體和客體問題的唯一可能性。

一方面，“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從他本身（作為階級）來看——是和‘被創造的’現實相對立的，如同對待一個和他格格不入的‘自然界’一樣，他無能為力地受這個自然界的‘規律’擺布，他的活動只能是為了自己的（自私的）利益來利用個別規律的強制性的過程。然而就是在这个‘活動’中——按照事情本身的實質來看——他仍然是事件的客體，而不是事件的主体”④。

他的活動範圍僅僅是內在的：這個範圍一方面是關於這些規律的意識，另一方面是關於他對事件過程的內在反應的意識。

哲學的差異性和主體與客體的關係的基本哲學問題，僅僅是人的這種差異性的表現。而且，只有當“真實的東西不僅被理解為實體，而且被理解為‘主體’，當主體（意識、思維）同時是辯證過程的生產者和產品，當主體因而同時在一個由它自己創造、由它在意識上表現的世界中運動，而且這個世界又以完全的客觀性而和它對立着，只有在這種情況下，辯證法問題以及與之有關的關於消除主體和客體、思維和存在、自由和必然性的對立等等問題才能認為是解決了”⑤。

只有通過這種理解，對理論和實踐以及自由和必然性的關係的解釋才發生變化。由我們所創造的現實因而就沒有虛構的性質了。我們“自己創造我們的歷史，並且如果我們可以把整個現實看

完全說明歷史實踐的問題（第146—147頁）。那時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還沒有出版，從這本書中可以看到，恩格斯對實踐問題的理解更加廣泛和深刻得多了。

④ 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第149頁。

⑤ 同上書，第157頁。

成历史(也就是看成**我們**的历史,因为別的历史是不存在的)的話,那末实际上我們就提高到了可以把现实理解为我們的‘事业’的那种观点。當我們**的事业**只有在我們的意識作用中才能被認識,當我們自己所創造的历史的世界和历史过程的产物被理解为一种以陌生的規律對我們起作用的现实,这时唯物主义者的選擇就失掉了它的意义,因为它表現为唯理論的局限性,表現为形式上的明智的教条主义。”^①

实际上这些分析最后理解到,历史不是指某些不以人为轉移的严格的規律,而應該說,历史是人的事业,因此它受那些表現人的能动性的趋势的支配。卢卡奇作出这些分析,从而超过了大多数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已經根深蒂固的机械論和本體論,他們片面地和教条式地把历史和人相对立,犹如哲学家們把主体和客体相对立一样^②。然而,恰好在这里也产生了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大問題**:卢卡奇加以过分主体化的历史运动的这种內在趋势,有多少是真正的規律—趋势,而不是抽象的規律?它們“容許”历史的个人把握的自由有多大?从各个历史时期来看,这种自由把握整个历史进程的可能性存在怎样的差別?

卢卡奇的功劳在于,他尖銳地——至少按照傾向(而不是按照每个意思和句子)來說,在真正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表述了这个問題;这就真正地超过了那种批判实在論的、非馬克思主义的反映观点,这种观点把自然界看作現成的客体、把主体看作現成的主体,认为它仅仅从理論認識和思想批判的角度事先造成这个自然界现实的外在影响。“相反,正如在那些著作中几次強調的那樣,

① 卢卡奇:《历史和階級意識》,第160—161頁。

② 卢卡奇是在这种意义上理解历史趋势和階級的能动性的关系的:“遵循无产階級的階級目的,同时就是有意識地實現社会的——客观的——发展的目的,而这些目的如果没有无产階級的有意識的参加,就必定会停留为抽象的可能性、客观的界限。”(同上书,第165頁)

自然界是社會範疇。這就是說：在某個既定的發展階段上自然界意味着什麼，這個自然界對人的關係怎樣，人對自然界的打算是以怎樣的形式的進行的，總之，從形式和內容、範圍和對象來看，自然界意味着什麼——這永遠是社會所制約的。”^①

盧卡奇從這個觀點對反映論作了很尖銳的批評，在他看來，反映論和柏拉圖的感覺論一樣也是一種神話理論。

這種論點受到批評是有道理的。然而這不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精神進行的批評，不是保留了盧卡奇在努力研究這個問題時在那種批評意見中比自己的批評者認識得更清楚的地方。不應該從素樸的或批判的現實主義的觀點來攻擊盧卡奇和維護馬克思主義。換句話說，盧卡奇力圖克服一成不變的和對立的客體要素的對立的局限性，他的這種傾向是基本的，而且也是正確的。德國古典哲學的這種二元性，它的棘手的問題和困難，這種無法把兩種不同的因素（費希特關於絕對主體的觀念和黑格爾的天才的同一論）聯繫起來的二元性被克服了，不過是用把客體理想化的辦法克服的。

由於把這個理想的同一性重新唯物地區分為兩個不同的因素，並在它們之間確定反映關係，這樣就使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客體和主體仍然是兩個不同的因素，而它們相互關聯的可能性的問題仍然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

也就是說，人及其意識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因此，我們碰到的不是嚴峻的現實的經驗事實，而是許多過程。“對於反映論來說，這意味着，思維、意識一定要真正面向現實，真理的標準在於同現實的適應。然而這種現實同經驗事實的存在是毫不相同的。這個現實並不存在，它是產生出來的。”^② 沒有我們的思維的活動，它不會產生出來。正因為如此，“說思維和存在是同一的，並不是說它

① 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第240頁。

② 同上書，第222頁。

們彼此‘适应’，彼此‘反映’，并不是說它們一个同一个‘平行发展’或者‘吻合’（所有这些說法仅仅是固执的二元性的隱蔽形式），而是說，它們的同一性在于，它們是某个同样的现实历史的辯证过程的因素。无产阶级的意識所‘反映’的东西，就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辯证矛盾中产生的那种积极的和新的东西”①。

卢卡奇这样就重新把实践的因素提到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注意中心和要領的地位，同时，他和很少数的馬克思主义者一样，发现了官方对于作为客观反映的認識問題的解釋具有非辯证的性质。虽然卢卡奇在这个批評中走得太远了，沒有断定实践也是以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为前提的（尽管在这种情形下客体被主体化，而主体被客体化），但是他通过自己的这种分析开始回到馬克思的根本的和真正的問題上来。

可能有人会指責他过高估計了“阶级意識”这个因素和把某些范疇黑格尔主义化了，但在实质上，从这些分析来看，卢卡奇仍然是一个創造性的馬克思主义者。他說明了当时除了列宁以外很少有人如此尖銳地強調过的东西：人的意識、阶级意識即特殊的人类因素在历史运动总体中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人的活动，历史运动就不成其为什么运动。他沒有片面地把这种活动仅仅理解为意識的活动，其证明就是他的关于实践的基本原理以及这样一个論点：任何时候都不應該忘記，“只有那种成为实践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識，才具有这种改造的职能”②。这种改造只能是“无产阶级本身的自由事业”③。

①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識》，第 223—224 頁。

② 同上书，第 224 頁。

③ 同上书，第 228 頁。在后来关于合法性和秘密性、关于罗·卢森堡和她对俄国革命的批評的文章中，卢卡奇基本上根据列宁主义的精神解釋了这些問題：他不否认革命斗争的任何一种形式，捍卫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可能性的原理，同意列宁的在革命和反革命时刻解决农民問題的方式以及列宁关于党的組織問題的观点，批判地对待特别表现在罗·卢森堡身上的关于自发性的观点。卢卡奇一般是

圍繞盧卡奇的這部著作以及後來發表的柯爾什的著作，當時無論社會民主主義者或者共產主義者都立刻展開了極尖銳的論戰。考茨基指責他回到年輕的、而不是成熟的馬克思那里去了，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家季諾維也夫、德波林、斯騰等人則尖銳地指出了這種離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的行為所包含的“危險”。德波林提出警告，認為不應當低估這條路線，因為支持它的還有卡·柯爾什、貝·福加臘西、伊·列瓦伊等人；斯騰則在共產國際的機關刊《國際新聞通訊》第5年度第34期上指責盧卡奇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作了唯心主義的歪曲，說這種歪曲在很多論點方面陷入了老年黑格爾派的唯心主義。作為共產國際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季諾維也夫本人也激動起來，在共產國際的代表大會（1924年6月19日）上宣稱，共產國際將不會泰然容忍這種理論上的修正主義。

從政党和政治的观点来看，这里已經開始出現了第三國際后一个时期所特有的那种精神：整个活动（也就是包括思想活动、理論活动、艺术活动）完全服从于政党和政治領導，政治領導变成为也支配历史生活的这样一些領域和現象的裁決者，在这些方面，这种領導中心無論从历史上或者从理論上来看，都不負有成为裁決者的使命。強調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正是因為可以看出，斯大林主義的心理和观念在历史上一般并不是仅仅从斯大林的个性中产生出来的。

另一方面，盧卡奇以他關於意識、思想体系和社会結構的关系的杰出分析同馬克思一樣對資產階級哲學和科學的一個部門、對所謂的知識社會產起了重大的影响。从关于实际思維是“同存在

以非常积极的态度对待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及其整个进程的。

相反，在自由問題方面，盧卡奇身上表現出某种空想主義，他認為在未來的無階級的社会里，不僅階級、國家等等會消亡，而且經濟規律性本身也會消亡。對社会生產力的自覺的管理（這也就是完全處於人們監督之下的社会），會使經濟規律的統治也趨于消亡（第316頁）。

联系着的”(Seinsverbundenheit des faktischen Denkens), 也就是关于在思维的形成中也存在某些并非次要的超理论的因素的原理中, 某些资产阶级理论家、特别是在后来的发展中麦·谢勒、卡·曼海姆等人懂得了利用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析和卢卡奇的上述观点, 以发展一种从资产阶级观点看来是详细的和在某些论点同马克思主义相接近的对意识和思想体系问题的研究^①。

尽管有许多观点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严肃批评的对象, 其中某些最重要的观点我们在上面也已经提到了, 但是卢卡奇的伟大功绩在于, 他发扬了马克思的某些基本的思想成就。特别是在分析异化、物化以及现代社会的这种基本结构现象对阶级意识和个人意识的作用方面(当然, 这个分析仍然没有完成), 他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之一, 同时也抓住了现代的世界和人的实质性的问题之一。他抓住了这样一个问题, 对它如果不加以解决, 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在实际上都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

完全可以理解, 特别是在俄国和整个第三国际以后的形势发展的进程中, 卢卡奇的这一切光辉的努力由于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权威性的评价”而告结束, 并且像在许多其他问题上那样被众所周知的沉默所遮盖了, 因为在那种形势下, 不是逐渐克服物化、异化的现象, 而是重新恢复了以国家主义的社会组织、心理和思想体系为形式的异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部分“被遗忘了”, 仿佛它没有存在过似的。

卢卡奇在后来的时期中特别致力于研究文学史和文学理论问题以及美学的一般理论问题。他的关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德国文学、关于哥德时代、关于这个时期的美学等等的著作属于世界文学最有价值的创作之列, 由于这一切, 卢卡奇成为国际范围内最

^① 这里首先应当提到曼海姆的著作《思想体系和空想》(«Ideologije und Utopie»)(1929年)。

出色的馬克思主義文學家和理論家^①。

我們還會有機會在分析馬克思主義的現代發展時談到盧卡奇的某些論點，這裡將仅限于從他的有關藝術問題的著作中談談當時某些理論上的嘗試。盧卡奇在他關於馬克思和思想衰退問題的論文中，重新有根據地回到有關現代人的異化及其在藝術和理論方面的後果的思想上來。“這樣，對於正常的公民來說，他的使命就像是在一部大機器中做一個小齒輪，他自己對機器的整個運動不可能有某種概念。而如果現在片面地否定個人作用中的這種聯繫、這種必然的社會性，那末今後也只會阻礙同某些非常消極的偽哲學的論據決裂。在這兩種情況下，社會表現為某種不可理解的、神祕的力量，它的命由天定的客觀性毫無人性地威脅着個人並且不可理解地同個人相對立。”^②

在理論上，這種不可克服的矛盾表現為近幾百年來的世界觀的矛盾，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矛盾。在盧卡奇看來，理性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客觀要求面前不戰而降的表現，而非理性主義則是一種無力的反抗。“也就是說，非理性主義作為世界觀記下了那種把人類靈魂的全部內容閹割掉的情況，並且尖銳地特別提出它來同實際上如此神祕化了的毀滅理性世界的現象對立。這樣，

① 在比較重要的著作中可以提到：《德國文學中的進步和反動》（1947年），《歌德及其時代》（1947年），關於弗·梅林（1933年）、尼采和維舍（1943年）、席勒（1935年）的美學的論文，這些論文同後來關於黑格爾（1950年）和車爾尼雪夫斯基（1952年）的美學的文章一起以《論美學史》（《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Aesthetik》）（1954年）為名出版。以後，盧卡奇研究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文學和藝術的觀點，並試圖在後來用《現實主義問題》（《Probleme des Realismus》）（1955年）為名出版的某些論文中解決關於藝術反映和現實主義的若干理論問題。此外，盧卡奇寫了許多評論現代最知名的作家如巴爾扎克、海涅、司丹達爾、俄國現實主義作家的論文，這就表明，盧卡奇屬於以拉法格、普列漢諾夫、梅林、羅·盧森堡和列寧為最光輝的代表的、文化上有廣泛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的最全面的繼承人之列。

② 盧卡奇：《馬克思和思想衰退的問題》，《現實主義問題》，1957年薩拉熱窩塞文版，第103頁。

非理性主义不仅是哲学上的表现，而且同时是使人类感性生活愈来愈缺少文化的推动者。随着资本主义的衰落，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在尖锐的危机时期，它愈来愈多地诉诸于人身上的最坏的本能，诉诸于因为资本主义的压迫而必然在人身上突出起来的兽性。如果说，法西斯主义的蛊惑人心的‘血和土地’的口号能够如此迅速地在受欺骗的小市民群众中传播开来，那末，这是因为激起读者身上这些本能的颓废的哲学和文学在客观上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其事，因为它们事实上帮助培植了这种情绪，——当然它们往往不会预先感觉到这种被利用的事，甚至往往会痛苦地拒绝带来这种后果的结论。”^①

卢卡奇认为，文学的特别的社会力量正是在于，它能够把斗争的矛盾、社会生活的冲突描绘得如同它们在真实的人的生活中所表现的那样，同时他指出，资产阶级颓废时代不要求艺术描绘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真实的生活，而要求它描绘人们的生活的假象。“这个时代要求作家把这种假象描绘为唯一可能的和真实的人的生活。”^②

任何一个时期的重要的现实主义者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善于表现人类生活的假象和实质的这种现实的辩证法，而这必然会导致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发生矛盾。

也就是说，艺术对现实的反映不是由宿命论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是在一般反映论的界限之内研究艺术反映的特殊性。卢卡奇是这样表述艺术的第一个特点的：“任何伟大的艺术都抱有这种目的：出现现实的情景，其中现象和本质、个别情况和规律、感性和概念等等之间的矛盾是被这样分解的，以致在艺术作品提供的直接印象中，两种因素融合成为一个自然的统一体，对于接受艺术作品的人来说，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一般表现为

① 卢卡奇：《马克思和思想衰退的问题》。《现实主义问题》，第104页。

② 同上书，第123页。

个别和特殊的特点，在現象中可以发现和感受到本质，規律是作为特殊出現的个别情况的特殊动机表現出来的。恩格斯非常明确地說明了艺术表現的这种本质，他在談到小說中的人物的特点时說：‘每个人物都是一个典型，但同时也是一个一定的个人，一个像老黑格尔說的“这样的”，并且一定要这样的东西’。”^①

对现实的科学反映和艺术反映之間的第二个重要差別在于，个别的科学的認識（規律等等）不是彼此独立地存在的，而是构成有联系的体系。“然而，每个艺术作品必須是仅仅为了自己而存在。当然，存在着艺术的进化；当然，这种进化客观上同它所有的規律是有联系的和可以区別的。然而，作为整个社会进化的一部分的艺术进化的这种客观联系，并不抹煞这个事实，即艺术作品只有当它具有这种內在性、这种仅仅为自己起作用的力量时，它才成其为艺术作品。”^②

盧卡奇在他的关于历史和階級意識的著作中談到的人类历史过程总体的那个思想，在这里重新有根据地出現了。更正确的不是把握局部，而是把握普遍的联系、关系、矛盾的这种总体、总和——这是艺术反映的更大的价值。个别情景只有当它是客观现实的总过程的真实反映的必要因素时，才会是对生活的真实反映。“相反，像照相般符合于生活的、表現細節的艺术上的真情实景，完全是偶然的、任意的和主观的。因为，如果作为必要的因素的局部不能直接从相互联系中变得明显起来，那末它作为艺术作品的因素也是偶然的，正如任意地和主观地选择的局部一样。因此，这样一种情况是絕對可能的：一个作品是由对外在世界的照相般真实的反映本身‘組成’的，然而整个說来，它仍然是对现实的不真实地、任意地表現的主观反映。因为，串連成千个偶然事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从中提出某种必然性来。为了使偶然性同必然性发生

① 盧卡奇：《艺术和客观真理》。《现实主义問題》，第152頁。

② 同上书，第155頁。

真正的联系，必然性一定要处于偶然性本身之中，也就是說，必然性在細节本身中已經在发生作用。細节在一开始也必定是这样选择和形成的，以便同整体的这种联系在它本身中发生作用。”^①

因此，卢卡奇在受到二十年代中期对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的尖銳批評之后，放棄了他的关于自然辯证法和反映論的观点，而接受了作为解釋艺术作品的基础的反映立場。他贊同了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虽然从来都不同意文化領域中的官僚壟断（这种壟断早在三十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点的統治地位的确立就已經开始了），不同意把浪漫主义因素看作是革命的因素，也不同意把黑格尔看作是反动的哲学家的想法，不同意把斯大林的著作看作是馬克思主义理論思想的最高成就。無論如何，像卢卡奇那样一位具有广博文化知識的光輝的人物，一定是十分沉重地感到这种理論庸才的压力的。虽然在快到三十年代的时候，由于解散了宗派主义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发表了列宁的哲学筆記和馬克思的1844年的手稿，使得理論界的眼光比較开闊些了，但是这种清新的空气不过是曇花一現的喘息时机而已。官僚主义对馬克思主义的自由辯論的反击有了愈来愈大的規模，而卢卡奇和其他許多人当时还不清楚根由和来源何在。

但是，这种錯觉是不会长期保持下去的。而認識这种官僚主义压力的来源这件事本身，实际上只会更加使創造性的思想活动陷于停頓。卢卡奇后来在1957年写的《自傳补遺》中說明了社会主义的这种矛盾的和几乎难以置信的情况，并且解釋說，問題在于这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和侵略成性的法西斯主义的强化和野心，正因为这样，他自願地使个人自己的任何一个論点都服从于时势的必然性。“然而，这决不是意味着，我向在这場斗争进程中形成、宣傳和最終傳播开来的一切思想傾向投降了。同时，我毫不怀

^① 卢卡奇：《艺术和客观眞理》。《现实主义問題》，第159—160頁。

疑，不僅任何反對派當時在肉體上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它會很容易地成為對於以毀滅整個文明相威脅的死敵在精神和道義上的支援。

為此，我曾不得不為自己的學術思想進行一種游擊戰，也就是說，不得不連篇累牘地援引斯大林的言論等等，以使自己的著作能夠出版，並在這個時代有時留給我們的那種‘喘息時機’所允許的限度內，根據一切必要的考慮來表達自己不同的思想。有時我也不得不沉默下來。例如，當戰爭期間決定把黑格爾評定為反對法國革命的封建反動勢力的思想家時，我自然不可能發表自己關於青年黑格爾的書。顯然，我認為，即使不求助於諸如此類沒有任何科學根據的蠢辦法，也會取得戰爭的勝利，然而當反希特勒的宣傳採取了這種觀點的時候，那時爭取戰爭的勝利要比進行關於黑格爾的真正的觀念的辯論更加要緊。”^①

社會主義發展中的所有這些奇怪的事實，實際上表明了極大的無能、不成熟性和概念的模糊，這就促成了，為了某些更高的利益和直接的危險，而把那些使得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大成問題的形式和觀念強加於社會主義運動和馬克思主義。

^① 盧卡奇：《自傳補遺》。《論美學史》，1959年貝爾格萊德塞文版，第366頁。

第二章 馬克思主义在德国

与卢卡奇在維也納写作他的哲学論文的同一时期，卡·柯尔什在德国发表了若干著作，这些著作在許多方面同卢卡奇的理論意图是一致的，虽然在深度和綜合概括方面不如卢卡奇的著作。

德国在二十年代的初期经历过革命危机和反革命。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和資产階級在扼杀斯巴达克运动中的联合，在受到大資产階級和德国軍国主义支持的极右的卡普軍事叛乱(1920年)以后迅速瓦解了。工人階級的总罢工(官員們也参加了这次罢工)制止了这种企图。在这个时期之后，共产党人的影响日益增加，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把共产党人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联合起来的意图，打击了克里斯平、狄特曼、希法亭等领导人的观点和活动。

1921年强大的革命运动席卷了德国，但共产党对这个运动却没有足够的准备。在不断革命进攻的口号下并未获得重大的成就，这引起了领导中間的尖銳的分歧，其中保·列維及其拥护者批評了这种政策，称它为冒險主义的政策。列維受到领导上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尖銳批評，并被开除出党。但是列宁也不同意那些宣傳不惜任何代价进行革命进攻的极左派的策略。

1923年1月法国和比利时的軍隊占領了魯尔区，以后发生了物价上漲和生活条件恶化的情况，开始了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时期，最后发展为起义。在薩斯克和图林根建立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政府。但是，以布兰德勒为首的不成熟的领导，不善于彻底利用这种革命的形势和动員群众以爭取全面的支持。因此1923年反革命便

得以結束这个革命时期。

在这个尖銳的階級冲突的时期，正如我們已經提过的 1905 年俄国革命的日子那样，无产階級的实践产生了工人、士兵和农民委员会这个含有人类解放和觉醒的新阶段意义的历史性的新东西。

卡尔·柯尔什

在力图从理論上超越历史上已被超过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論和实践，从理論上概括这个历史实践的某些成果，并且提出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新問題和解决办法方面，卡尔·柯尔什在德国的这个时期內占有重要的地位。

柯尔什关于工人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的权利的著作中表明，他是了解社会主义运动的真正的实质和新社会关系的性质的极少数人中的一个。柯尔什尖銳地強調了作为階級权利的权利的性质，发现了資本主义随之带来的进一步的自由的程度，同时他激烈反对維伯夫妇的費边主义观点和“庸俗馬克思主义的大法官”考茨基，反对他們认为不摧毁資本主义制度就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观点。柯尔什正确地解釋道，他們強調工人参加生产組織的权利，強調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所特別強調的这种权利，这是一种看不见这种現象的真正界限的立場。“但是在資本主义的階級社会和資產階級的国家里，所有这种参加的权利（Mitwirkungsrechte）是有其不可逾越的界限的；这些权利任何时候都不会发展到超过資本家階級贏利的利益所能容許的程度。这就是說，如果工人把这些权利理解为某种比取得据点以准备决战更多的东西，那末这一切所謂参加的权利实际上仅仅是一块帷幕，它可以如此长期地掩盖資本家对‘劳动集体’的专政，一直到最后資本家因为客观的关系，不得不拋棄这块帷幕而公开地实行自己的階級专政的时候为止。”^①

^① 卡尔·柯尔什：《工厂委员会的工作权利》，1922年柏林德文版，第37頁。

对于工人参加出售产品、协作等等，一直到委员会的最新形式的出现（这里指的是参加对生产本身的管理）的问题的发展，柯尔什在这本书中也提出了有意思的具有历史观点的分析。他同样也尖锐地批评了玩弄这种革命的权利、玩弄这种成就的行为和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手腕，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在战后时期使全部革命事业朝着从战前时期社会改良主义旧货摊上取来的温和的方向发展^①。

柯尔什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历史意义。这就是说，“工厂委员会不再仅仅是工会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内部，为保持‘佣工’的生活状况进行斗争的‘辅助机关’，而是工会在工厂中，进而在工业部门中扎根的一个‘前哨’，这些工厂和部门今天还掌握在阶级敌人的手里，必须通过革命斗争从这个阶级敌人那里把它们夺过来，交给经济上和政治上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监督并彻底地进行统一的管理”^②。

柯尔什强调指出，委员会制度只是在无产阶级的俄国宣布出来，尽管还没有达到在俄国的“劳动法典”中所规定的那种程度。他认为在俄国，至少是对在实践中实现真正的苏维埃制度进行了相当多的尝试，并且认为，当世界革命的发展容许俄国无产阶级彻底完成自己已开始了的事业时，这种制度才将完全实现。

在所有其他的国家里，整个革命潮流重新纳入最普通的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因此，对工人阶级本身来说，就是要夺取政权，清除自己队伍中的改良主义者和意识到自己的作用和委员会制度的意义。在“具有‘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特点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内，在整个经济、一切经济部门和每个单独的车间进行的长期的、艰苦而持久的斗争中，将会实现建立在巩固的‘工业民主’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的劳动联合，从而也将逐步实现使国家政权替自己服务

① 柯尔什：《工厂委员会的工作权利》，第63—64页。

② 同上书，第69页。

的无产阶级的真正的委员会制度。”^①

工人委员会以及整个委员会制度作为无产阶级社会组织的新形式的問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是那个时期的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論和实践問題之一。因此，列宁对俄国革命經驗进行的理論概括和分析以及对苏維埃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強調，不是孤立的偶然事件。

每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相当明确和深刻的理論眼光提出社会主义的問題，不仅把它作为一个新阶级的政权問題，不仅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而且也作为社会关系改造的时期，他就必然会得出列宁早已明确強調过的，卢卡奇、柯尔什及其他許多人所维护的那些結論。

除了这部著作以外，柯尔什还发表了某些篇幅較小的哲学著作和論文，在这里他和卢卡奇一样，也坚持克服第二国际时期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严重的停滞。

柯尔什的努力同样缺乏完整性，但却作了較多的研究、推測和設想，研究应当怎样来对待馬克思主义的整个問題特别是哲学的問題。在这种努力中，柯尔什自己也沒有得出明确的答案。一方面，他看到馬克思主义是一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經济学、社会和思想体系的很好的批判的观点。由此就产生了关于馬克思主义的目的的某些动摇。柯尔什在一段話里面认为，资产阶级理論家和半社会主义的理論家以为馬克思主义要建立新哲学以代替旧哲学，建立新的馬克思主义的历史編纂学以代替旧的历史編纂学，同样还要建立馬克思主义关于法、国家、社会学等等的新学說，他們的这些推測是完全錯誤的。“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很少要求这一点，正如它所表現的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很少主張提出新的‘国家’和新的‘国家制度’来代替目前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及其所

^① 柯尔什：《工厂委员会的工作权利》，第104頁。

有的各个成员一样。卡尔·馬克思不是这样做，而是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哲学，‘批判’資產階級历史編纂学，‘批判’各种資產階級的‘精神科学’，总之，提出‘批判’整个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态作为目的，而且他正是像以无产階級的观点来批判‘資產階級經济学’那样来对資產階級‘意識形态’进行这种批判。”①

尽管柯尔什清楚地看到，关于哲学和科学“不偏不倚”的理論根本是一种幻想，尽管认为馬克思主义在其最初阶段必然以批判的方式表現出来（正如人类思想意識的发展中的每一个根本轉变一样）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仅仅停留在批判上，这在現代的发展中必然意味着落后。

他在自己的这篇文章中也維護一种根本的論点，认为应当把馬克思主义理解为統一的批判整体，因此，那种以为馬克思主义的政治經济学是由詳尽研究的“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科学或社会学”所“补充”的看法，是錯誤的和虛妄的。“馬克思主义的体系不需要这种补充，同样也不需要某种特殊的馬克思主义的‘語文学’或‘数学’。”②

因此，他实际上常常把哲学論題归結为历史唯物主义和整个历史辯证法的綜合的論題，这种做法类似于卢卡奇的主張③。

柯尔什认为，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的、本质的特征，是在解釋人及其历史方面最終和彻底貫徹“此岸性”的原則，他正是在这个“此岸性”原則中看到了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唯物主义的

① 柯尔什：《唯物史观的观点》，1922年。《馬克思主义和哲学》文集，1930年萊比錫德文版，第121頁。

② 同上书，第125—126頁。

③ 例如，在同沃尔特曼关于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論战时，柯尔什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說明，“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即对‘社会历史’生活的唯物主义的理解，有别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当作‘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那种唯物主义”（同上书，第141頁）。在反对卢卡奇的論战中，人們也攻击柯尔什否定自然辯证法，但是，柯尔什并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

征，因为这个原則絕對排斥对历史的任何“彼岸性的”、非历史的、超人类的等等解釋，即使指的是諸如有机体、地理因素等等唯物主义原則。

因此，柯尔什也如同卢卡奇一样，接触到了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实践的問題①。

为了懂得唯物史观，必須認識到，我們在其中活动的现实世界的一切現象首先分为两大类：一方面，我們同我們周圍的一切屬於一个我們称之为“自然界”的自然世界，屬於一个不以我們的意識、願望等等为轉移的“非人的”世界。另一方面，我們是作为思想、希望和活动着的人們而存在于我們实际上对它起作用的世界中的，因此我們应当把这个世界看成是我們的产物，并且把我們看成是它的产物。“这两个世界，一方面是自然世界，另一方面是社会历史实践的世界，但不是两个分割的世界，而是一个相同的世界：它們的統一在于这两个世界都是在人們的积极的和消极的生活过程中造成的，人們在自己劳动的相互作用中和思維中再生产和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整个现实。但是这两个被如此看待的世界的联系，正是在經濟方面，更确切地說是在‘物质生产’中，而不可能在任何別的地方。”②

在这些問題上，柯尔什和卢卡奇的思想是接近的。尤其是在强

① 柯尔什在考虑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問題时，正确地指出，不仅資產階級哲学史編纂学，而且馬克思主义者自己都几乎絲毫沒有注意这些問題。有意思的是，在資產階級哲学史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宇伯威希、朗格、文德尔班、庫·費舍、布雷叶等人看来，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作为哲学起作用的。資產階級哲学家在这些問題上的无知，确实是令人吃惊的。只要从著名的文德尔班的哲学史讀本中引出一段話来就够了，“当費尔巴哈的从黑格尔的辯证法中翻轉过来的唯物主义还在盛行的时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創立了一种把黑格尔和孔德的基本論点以特种方式混杂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他們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找到了历史的真諦。这种集体的生活确实在本质上含有經濟的性质……因此，所有这些不同的文化活动仅仅是經濟生活的分枝，而全部历史也因而應該是經濟的历史。”（《哲学史讀本》，1935年杜宾根德文版，第554頁）

② 柯尔什：《唯物史观的观点》。《馬克思主义和哲学》文集，第137頁。

調意識、思想体系和哲学是人类实践的本质要素方面。正因为如此，柯尔什在他的关于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主要著作中，正是把大量的篇幅用来批判尤其在第二国际时期广为流行的一切庸俗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按照这些观点看来，思想体系、而特别是哲学，仅仅是社会关系的反射，甚至是一般思想上的、空洞的思辨的幻觉。

“庸俗社会主义的基本的重大缺点，按照馬克思主义的說法，在于完全‘不科学地’坚持一种素朴的实在論，而所謂人的健全的理智，那种‘最坏的形而上学者’以及市民社会的一般的、实证的科学都根据这种实在論实行区分意識及其对象的激烈的路綫。他們絲毫沒有感觉到，在批判哲学的先驗观点看来不再完全存在的这种矛盾，对于辯证的观点来說是完全被揚棄了的。”^①

因此，不能停留在提出某个客体和完全不从屬於它的主体、意識的素朴实在論的观点上。無論科学以前的意識或科学的意識都不是某种同自然和社会历史世界对立的独立的东西，“而是作为这个自然和社会历史世界的一个实在的、真正的部分，‘尽管是精神上理想的’部分在这个世界中产生的”^②。

因而柯尔什看到，不應該停留在以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观点分割主体和客体，也不應該仅仅停留在綜合的历史过程的一个因素、即經濟因素上，因此也不應該停留在对实践作片面的說明，而这在后来斯大林主义对这个問題的解釋中是那样习以为常的。

柯尔什批判对馬克思論費尔巴哈的第二条提綱、即論实践的提綱的常見的片面解釋，同时他有根据地从第八条提綱中援引了馬克思的立場：“凡是把理論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因此，新的唯物辯证法的立場和方法的原則是：“理論上的批評和实践上的变革，这两个行动被理解为

① 柯尔什：《馬克思主义和哲学》。《馬克思主义和哲学》文集，第106—107頁。

② 同上书，第113頁。

不可分割地依从着的行动，这两个行动并不是任何抽象的意义上的行动，而是具体现实的市民社会世界的具体的、现实的变革。”^①

因此，思想、意識、思想体系等等并不是无所事事的个人的一般的精神活动，也不仅是对一定社会状况的思想辯护，而是如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強調指出的，是統一的历史过程的非常现实的和有利的杠杆。

柯尔什試圖把这种关系本身理解为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而不是对象和反映的关系。“經濟观念对于市民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的现实來說，表面上看来不过是图画和被描繪的对象的关系，而事实上是某个整体的一个特定的部分对这个整体的其他部分的关系。”^②

虽然仅仅以抽象形式来理解的反映概念本身，对于解釋一个时代的意識的全部总和是不明确和不够的，但柯尔什在部分和整体的观点方面也絲毫沒有深入这个問題。問題仍然是：作为部分和整体的这个关系的基本特征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意識要求只是作为某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的一部分，那末意識和社会现实的差別怎么是可能的呢？

柯尔什沒有解釋这些問題。尽管正确地指出了不要低估思想体系的形式意义，尽管正确地強調了革命的科学批判作为工人階級的經濟和政治斗争的組成部分所具有的作用，柯尔什实际上也就同时在縮小哲学的范围和意义。

把社会运动看成是統一的过程，其中不存在孤立的法律史、哲学史、宗教史、艺术史等等，这是完全正确的。最一般地說，只存在一門科学——关于人的历史运动的科学。青年时代的馬克思以及后来尚未了解到馬克思的这个观点的卢卡奇都已經确认了这一点。然而同样正确的是，这种历史运动、人的物化的历史过程是綜

① 柯尔什：《馬克思主义和哲学》。《馬克思主义和哲学》文集，第 115 頁。

② 同上书，第 116 頁。

合的不同的过程，是人的实践和理論活动的特殊組成因素的合成系列。正因为如此，其中的每个組成因素都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而这种历史只有在它具有自己特殊的对象和我們把它理解为整个过程的一部分时，才是现实的历史。

因此，这些思想体系的形式意义不應該仅仅从对其他同样形式的革命批判关系的意义上来理解，如柯尔什认为的那样；因此，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和任务不仅在于以哲学批判的精神駁倒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哲学，一直到最終消灭和超越整个过去的社会。

在我們已經提到的有关卢卡奇的辯論中，柯尔什也是受到攻击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和卢卡奇的意見一致，虽然他們的立場在很多方面并不相同。說柯尔什拋棄了自然辯证法，說他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晚期的观点看作是对他們早期的观点的庸俗化，这种指責都是根本不符合柯尔什的主張的。

他的基本目的是：根据馬克思的精神把社会运动理解为一个实在的整体，其中哲学和其他思想体系的形式并不仅仅是偶然現象，而是过程本身的組成部分，同时也根据这种精神来理解以革命的理論活动为必要补充的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正由于历史是人所創造的历史，所以不應該把自然历史的对象理解为事先提出的和独立的对象，同样也不應該把意識本身理解为某种自我的、独立自主的整体。柯尔什看到，过去从抽象的反映論的意义上对認識所作的解釋，由于这些原因而不可能是站得住脚的，因此他企图以部分和整体的关系的观点来克服那种解釋。

他和卢卡奇一样正确地看到，过去对反映的种种解釋以及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中所作的解釋，实际上都是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但是，柯尔什从正确的看法中並沒有得出正确的解答。

由于这些原因，柯尔什后来在他論述馬克思主义和哲学問題

的現狀的文章中，对上述批評以及对列宁的上述著作中被奉为經典的关于反映的論点已經有所变动的情况；反应相当强烈。柯尔什在这一时期(1930年)的看法最后形成如下的立場：“然而，整个‘列宁主义’理論对于**国际无产阶级階級斗争的現今发展阶段的实践需要**來說，不是足够的理論上的表現，而作为这种列宁主义理論的思想基础的、**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由于这种原因也不是符合現今发展阶段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哲学**。”^①

柯尔什认为，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間的整个辯論轉移到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已經超越的发展程度上^②，他批評列宁的反映观念是对存在和思維的关系的非辯证的理解，是把存在和思維的关系仅仅归結为抽象的認識論观点，而没有像馬克思在《宣言》中所写的那样，从社会历史意識的各种形式中寻找認識，把它作为思想“上层建筑”，或者作为一定的階級斗争的現實关系的一般表現^③。当时，列宁的哲学筆記实际上已經发表了，但柯尔什沒有足够地了解列宁自己对他的哲学活动初期的哲学成就所采取的批判态度。

至于談到另一个更重要的問題、即整个列宁主义理論时，只有把这个理論和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解釋等同起来，柯尔什才可能是正确的。可是，这二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柯尔什的評價也就是錯誤的了。

柯尔什有理由觉得反感的事情是，不动脑筋地停留在列宁事实上已經超越了的某些論点上和建立令人不能容忍的思想上的专政，这种专政为了某些观点而企图实行壟断并把严格的理論活动

^① 柯尔什：《“馬克思主义和哲学”問題的現狀》。《馬克思主义和哲学》文集，第34頁。柯尔什在这篇文章中看到，列宁关于經驗批判主义一书的意義不在于哲学上的論据，而在于“最后的結論，他实际上是以此来否定当时的各种哲学傾向，认为那是錯誤的党派性的思想体系，并打算把这样一些傾向加以摧毀”（同上书，第29頁）。

^② 同上书，第35頁。

^③ 同上书，第36—38頁。

界限强加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①。

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結束以后，在馬克思主义者和馬克思主义的敌人之間又繼續进行被战争打断了关于“資本主义崩潰”的辯論。

战前的大多数馬克思主义者在第二国际时期从这样一种意义上解釋馬克思的观点，即认为他沒有預言資本主义在經濟上崩潰的必然性，因此他們把社会主义解釋为倫理上的理想和要求（伯恩施坦、杜岡-巴拉諾夫斯基、鮑威尔等），当时只有罗·卢森堡在她的关于資本积累的理論中維護了关于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无止境地進行扩大再生产这一激进的論点^②。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理論家如卡·迪耳、格·西姆科維奇企图证明，馬克思关于崩潰的理論同他的价值論沒有任何联系，而是从唯物史观产生出来的。資產階級的辯護士威·桑巴特（他曾經相当接近于社会主义）以尖銳的形式維護同样的思想，认为这种理論是在《宣言》中提出的，并且确实是和整个資本主义发展相矛盾的^③。

① 柯尔什和許多馬克思主义者一样，后来不久就不得不出国侨居了。1938年，他在倫敦出版了《卡尔·馬克思》一书。不过，我无法确定柯尔什的出生年代，因为我能够找到的任何一部百科全書中都沒有他的名字。我只知道，他現在还活着并患着重病。

② 弗里茨·施特恩堡在他的《帝国主义》一书（1926年）中也維護罗·卢森堡的理論。

③ 桑巴特在《无产階級的社会主义》一书（1924年）中提出了这点，在《現代資本主义》这一巨著中并明确提出了当时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領袖（考茨基、希法亭及其他奧地利馬克思主义者）或者接近、或者已經拥护的一个論点：“我們将会逐漸习惯于这种思想，即在稳定的、受調节的資本主义和一个技术化的、合理的社会主义之間的差別不是那么大，由此对于人类及其文化的命运來說，經濟是資本主义式地还是社会主义式地发展，几乎是一样的。这里指的是：在两种情况下劳动方式是相同的，……我們的問題是，大型的合作社商店同資本主义的商店、共产主义的高炉同資本主义的高炉、城市的電車同資本主义的電車区别何在。我們不会找到什么本质的差別。也許工人的‘意識’在这里和那里不相同。然而劳动条件在这里和那里是相同的。”（桑巴特：《現代資本主义》，1927年德文版，第1016頁。轉引自格罗斯曼《資本主义制度积累和崩潰的規律》，1956年貝尔格萊德塞文版，第403頁）

亨利希·格罗斯曼(1881—1950)

当时亨利希·格罗斯曼以他的《资本主义制度积累和崩溃的规律》一书(1929年)对这场辩论提出了极有价值的意见。格罗斯曼虽然出身于工业家的富裕家庭,但他很早就接近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二十年代末他在法兰克福大学取得教授资格,在法西斯主义时期他侨居外国,战后返回莱比锡任当地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

除了关于经济问题和经济思想史的许多评论和短篇著作以外,上述著作不仅是格罗斯曼的最重要的著作,而且是当时最严肃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

这部著作是根据大量的历史材料和对当时的整个问题的认识写成的,格罗斯曼在书中强烈反对那些抛弃资本主义崩溃论的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者。后来赞同这种修正主义观点的还有考茨基、希法亭、库诺夫,而特别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理论家,这些人企图把马克思的观念说成是同他的价值论没有任何联系的、“思想上的”观念^①。

格罗斯曼的基本意见是,从这一切说法中看出,他们不知道和不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制定的经济学观念,这个观念毫不含糊地表明,马克思关于崩溃的理论是同积累的理论,因而也是同利

^① 格罗斯曼同样尖锐地反对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经济著作不过是未完成的作品,再生产的公式仅仅同《资本论》第二卷最后一章有关。他就这个问题对《资本论》的结构和方法进行了有意思的研究,这里他批判了罗·卢森堡的和后来卢卡奇的关于《资本论》的不完整性的看法。格罗斯曼表明,马克思由于自己的表达方法的缘故,对于同一问题在不同地方是按照总问题的各个要素来解决的。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这不意味着什么别的,而是意味着,应当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我们所继承的经济学方面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不完整的’,不是‘未完成的作品’,而是在实质上完成了的和没有空白点的体系”(《马克思〈资本论〉写作的最初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资本主义制度积累和崩溃的规律》,第438页)。

潤率下降和危机的規律的問題密切联系着的。

格罗斯曼表明，崩潰的理論实际上就是馬克思关于危机的理論的基础和前提，因为任何危机实际上就是由于各种反作用而一时中断的崩潰的趋势。“这样，崩潰的趋势作为資本主义制度的自然的‘基本趋势’，被分为一系列表面上独立的周期，这时崩潰的趋势永远只是**周期性**地重新出現，犹如羊毛生长的自然过程随同每次剪毛而中断，然后又重新开始一样。因此，馬克思的崩潰理論是他的危机理論的必要的基础和前提，因为按照**馬克思**的說法，这样的危机不过是沒有充分发展的、一时中断的崩潰趋势，也就是暂时离开資本主义的‘傾向一路綫’的現象。”^①

格罗斯曼不仅詳細分析了馬克思、馬克思主义者和反馬克思主义者对崩潰問題的看法，而且在該书的第三章中詳尽分析了变形的反趋势。格罗斯曼注意到这一切情况，并在自己的結論部分分析了馬克思的工資的理論，它是理解貧困化問題的基础，而貧困化問題又是理解資本主义崩潰本身的基础。

格罗斯曼表明，馬克思主义者本身如何不确切地解釋馬克思的这个理論。例如，考茨基和罗·卢森堡看到构成馬克思的工資理論的組成部分的两个直接对立的趋势，即工人階級貧困化的趋势和实际工資提高的趋势。考茨基和罗·卢森堡把貧困化的趋势推向过去，布哈林則认为发达国家的工人階級生活状况的改善是由于牺牲不发达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利益，这样，如果我們从資本主义的整体来看，应当說是**絕對的**貧困化。“說大陆工人階級状况的改善是靠資本主义对殖民地国家的帝国主义剝削的一部分来实现的，这是可以容許的。但**布哈林**对**馬克思**的工資理論的解釋毕竟是錯誤的，因为他把这个理論仅仅理解为貧困化的理論，而否定在

^① 格罗斯曼：《資本主义制度积累和崩潰的規律》，1956年貝尔格萊德塞文版，第98—100頁。

馬克思的工資規律的基礎上改善整個工人階級狀況的可能性。同樣，考茨基和羅·盧森堡的解釋的企圖也是錯誤的，他們只是從競爭中，從工會組織影響下勞動市場的有利狀況中，也就是從勞動力價格的上漲中來推論工人階級狀況的改善。”^①

格羅斯曼根據馬克思的分析表明，“**實際工資增長的趨勢**（如果我們把周期性的行情波動抽象化和只注意平均數）是一種本身可以理解的現象，它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機構中產生的，因此對於它的解釋不需要涉及其他因素，因為它是作為馬克思的工資規律的推論而被提出來的，並且如果勞動力商品要求經常按它的完全的价值支付，而雇工的需要又是經常性的話，這種現象就會產生。”^②

因此，從馬克思的理論中一方面可以看出實際工資增長的趨勢的必然性，但是，馬克思在他對資本積累的分析中，同樣肯定了存在工人階級狀況惡化的趨勢。格羅斯曼提出這樣的問題：這是相互排斥的矛盾，還是用同樣意義解釋的對立的趨勢？

過去格羅斯曼在他的分析中只注意增加的勞動強度和日益增長的勞動生產力因素，而沒有也去注意資本積累的持久作用。格羅斯曼正是根據奧·鮑威爾的再生產公式表明，同鮑威爾本人僅僅按他的四年公式來分析發展情況的意見相反，實際工資的增長和資本增殖的整個過程，就是依照這個公式來看，也有三十五年的限度，因此他得出結論說，根據馬克思的再生產和資本積累的理論，這種再生產的可能性在資本主義制度中是有限度的。“在一定的點以後實際工資將不再提高，並且在暫時的停滯之後，將開始急劇下降。但是，由於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過程中勞動強度的增加，僅僅對於勞動力的再生產，就需要有**數量愈來愈多**的生活資料，而停止增加（尤其是降低）工資便意味着把工資降到**低於**勞動

① 格羅斯曼：《資本主義制度積累和崩潰的規律》，第392—393頁。

② 同上書，第395頁。

力的价值，因此也就意味着不可能使劳动力充分地再生产。而这种情况无異于使工人阶级的状况恶化，不仅使工人阶级的社会状况更加恶化，而且使它的体力更加减弱。因此，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决不是仅仅属于工人运动的过去的现象，如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解释馬克思的工資理論那样。贫困化不仅出现在工人的組織(工会)尚不存在的资本主义的那个时期。相反，它可以而且必定是資本积累的后一个阶段的结果。

这是资本主义积累所不可避免地趋向的、必然的发展終点。无论工会采取怎样强大的反抗活动，都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阻止这种发展。这里就是工会活动的既定的客观限度。到了一定的积累点，现有的剩余价值就不足以在当时的工資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了。或者是应当把过去的工資数额减到低于它过去的水平，或者是应当停止积累，也就是摧毁资本主义的机构。这样，发展的过程必然导致資本和劳动之間内在的对抗的发展和加剧，只有通过它們彼此之間的斗争才能达到解决。”^①

因此，格罗斯曼根据资本主义发展中利潤率下降的問題(这个問題は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的基石)、危机問題以及资本主义不能在自己的基础上解决社会問題的情况，比所有其他的人正确得多地发现了問題的意义以及解决問題的途径。“资本主义崩潰”的問題无论如何同資本积累問題、扩大再生产、工資、危机和危机的后果是联系最多的。

十分清楚，这种发展不是按照某种公式直綫进行的，无论这种公式是馬克思的、鮑威尔的，还是其他某些人的。馬克思和格罗斯曼都很清楚地了解这一点。然而，为了說明某种制度的职能，首先必須发现它的内在的規律性，尽管在这个发展中会有各种反趋势。所以格罗斯曼也就用了整整的一章来分析这些对立的趋势，从而

^① 格罗斯曼：《资本主义制度积累和崩潰的規律》，第 398—399 頁。

表明,不能按照公式来理解事物^①。

对格罗斯曼的批評,特别是叶·瓦尔加对他的批評(說他公式化地理解整个問題,以宿命論观点理解資本主义的崩潰,因而对进步力量的斗争起着消极影响),根本是沒有道理的。格罗斯曼认为,資本主义不可能彻底解决它的基本問題,即不可能經常不变地实现再生产、实现資本的积累,这方面有它的固定的界限,这种看法是一回事;他在何种程度上看到了各种对立趋势的作用和阶级斗争对于战胜資本主义的意义,則是另一回事。对此最好是援引格罗斯曼的結論來說明:“同这种理解相反,从我們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資本主义的崩潰虽然在既定的前提下是客观上必然的,并且在它发生的时刻方面是可以精确地計算得到的,但它不会‘自在地’、自动地在預期的时刻发生并因此只要消极地等待它。相反地,两个引人注意的阶级的自觉的活动,可以在一定的限度內影响它的发生。也就是說,如果应当期待它在其中发生的前提本身有了变化,那末,資本积累的过程及其終点当然也要变化。如果由于資本积累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我們已經知道的資本增殖不足的情况,那末資本对工人阶级的压力就会加强。如果現在資本能做到降低工資并从而提高剩余价值率(对工資的这种压力只是在一定的、狹隘的範圍內才是可能的,这一点我們在前面已經說明了,見同上书第 131 頁),那末資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便能够靠牺牲

^① 例如,通过分析利潤率提高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資本周轉时间的縮短、具有較低的資本有机构成的新生产部門的出現等等,格罗斯曼表明,危机和战争都是資本主义用来緩和崩潰趋势的安全閥。“如果考茨基有过‘世界战争的灾难必定导致資本主义崩潰’的想法,如果他因为沒有发生这种情况,因为資本主义‘經受了战争的考驗’,就否定崩潰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唯物史观》一书第二卷),那末这种想法便是錯誤的。因为,从我們在这里叙述过的馬克思的积累理論中可以引伸出这样一点,即战争以及同战争有关的資本的贬值在削弱崩潰的趋势,会給予而且也給予了資本的积累以新的刺激。罗·卢森堡认为,純粹从經濟上来看,‘軍国主义对于資本來說表现为实现剩余价值的头等的手段,也就是表现为积累的領域’(《資本积累論》一书),这种观点同样是錯誤的。”(同上书,第 249 頁)

工人階級的利益而繼續維持下去，崩潰的趨勢的加強便會緩慢下來，因而制度的終點也被推向更遠的未來。因此，對勞動的剝削程度的加強，是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增殖的一個暫時的安全閥。反之，也就是說，如果工人階級能爭取到提高工資，工人階級的反壓力就可以抵消企業家階級的壓力，或者甚至抵消而有余。結果必定會開始剩餘價值率的下降並因而發生制度的加速崩潰……这样就表明了，關於因為客觀原因而必然發生的崩潰的思想，決不是和階級鬥爭相矛盾的，相反地，儘管崩潰是一種客觀上既定的必然性，但是兩個鬥爭着的階級的活生生的力量仍然能夠影響崩潰，而崩潰則給這些階級的能動作用留下了一定的活動場所。”^①

格羅斯曼在他對這個基本問題的詳細分析中，沒有注意研究在資本主義發展中已經相當明顯表現出來的國家的作用，國家開始自己採取了古典的資本主義已經不能實行的某些解決辦法。雖然這種國家主義的傾向是在大危機以後，也就是在他那部著作發表以後才特別表現出來的，但格羅斯曼在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的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的論戰中就已經了解了這個問題。

例如，他在許多地方批判了希法亭不了解價值和貨幣的理論（這在希法亭的主要著作中已經表現出來了），因此也就必然拋棄馬克思的積累和崩潰的理論。格羅斯曼拋棄了希法亭的（也是考茨基、鮑威爾、倫納等人的）關於通過某種“總卡特爾”建立有調節的資本主義的觀點。“由於同樣的原因，希法亭也必然不理解他的總卡特爾存在的根本條件，他也必定會產生關於可以進行‘調節’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念。因為，可能的只是二者之一：或者指的是某種‘有調節的’經濟，那末就不再是資本主義的經濟。而如果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那末就不可能是‘有調節的’經濟！因為邏輯上的矛盾、形容語和被形容語之間的矛盾是無法解決的，如果希法

^① 格羅斯曼：《資本主義制度積累和崩潰的規律》，第400—401頁。

享設想完全取消交換，这仍然談的是‘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①

考虑到資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現代的过程，这种研究一般說来是很重要的。一种由国家本身通过“总卡特尔”来领导的完全有調节的、有計劃的經濟，当然会取消商品生产、交換和銷售。格罗斯曼立刻作出結論說，这意味着也要取消雇佣劳动，因此，这不再是一种資本主义生产的景象了。

从任何方面来看，这种把全部調节作用集中在一个机关身上的最終后果，也意味着取消古典的資本主义，因此也就是取消資本家即資本的占有者本身。这将不再是其中平行地存在着私人資本和国家对經濟和政治生活的干涉的国家資本主义。

但是这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經濟关系，如果工人階級完全被剝夺了自己的劳动产品的話。按照格罗斯曼的意見，代替这种被超越了的資本主义生产而可能出現的，或者是“像中世紀的露骨的統治关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經濟。无论如何，它不再是建立在自由的雇佣劳动、为市場工作的生产方式之上的**資本主义的經濟**，也就是說，不再是商品生产”^②。

这是我們在馬克思主义理論、馬克思主义对現代运动的分析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遇到和必須加以討論的問題。

麦克斯·拉法伊尔(1889—1952)

当时麦克斯·拉法伊尔作了值得注意的嘗試，想比較广泛地理解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③。拉法伊尔的基本目的在于，不把精神

① 格罗斯曼：《資本主义制度积累和崩潰的規律》，第406頁。

② 同上。

③ 麦克斯·拉法伊尔的理論兴趣是非常广泛的。他研究过艺术史、哲学，还研究过自然科学。他写了一些艺术方面的著作。在希特勒独裁时期，他住在法国，以后又住在美国。在法国他发表了艺术社会学著作《蒲魯东、馬克思、毕加索（关于艺术社会学的三篇論文）》（1933年），1934年又发表了他的理論著作《具体辯证法的認識論》，后来他把这部著作加以扩充和修訂，起了《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精神創造論》的书名，我們現在就是根据这本书引证的。

創造仅仅理解为合理的或不合理的,而是把它理解为綜合的,即理解为人的各种力量的无所不包的状态,人的各种力量虽然是特殊的,但是都受普遍的規律支配。“馬克思主义的精神創造論——拉法伊尔在他的理論著作中这样开头——不只是包括人的智力在概念中同世界发生关系的那种狹隘范围的理論;無論体力活动、感性知觉,或者智慧,都属于它的范围。人的精神的各种力量的这种联系,只有当进行活动的过程基本上相同时才是可能的。事实上也是如此! 尽管当人对外在的事物或自己身体内部的行动起作用时会产生各种差别,同样的方法的規律性仍然是适用的;当涉及富有表达力的艺术或道德領域、科学概念或神学的思辨时,它都是适用的。”^①

尽管人类精神的各种力量具有不同的职能,某种特殊領域的理論不过是适用于一切种类的人类精神相互作用的一般方法的具体形式,但是拉法伊尔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探求这种普遍的、辯证的方法。他基本上掌握了馬克思主义辯证法的一切原則,而尤其是利用了列宁在《哲学筆記》中的研究、思想和提示^②。

拉法伊尔的活动中具有理論价值的东西,首先是对共同构成精神創造的人的各种能力和力量以及对創造过程本身进行分析的尝试。“从馬克思主义的方向对精神創造所进行的分析,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从某种能力在同世界发生关系时获得的現成的結果出发,例如不应该从感觉或概念出发,而只应该从形成感觉或概念的过程出发。”^③

另一方面,拉法伊尔完全用馬克思主义的精神把实践的因素、肉体对象的行动理解为整个过程的基础和出发点^④。因此,他首先

① 拉法伊尔:《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精神創造論》,1960年薩拉热窝塞文版,第17頁。

② 同上书,第23—50頁。

③ 同上书,第51頁。

④ 因此,拉法伊尔在他第三部著作的开头援引了列宁說的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維并从抽象的思維到实践(《哲学筆記》)的原則,并从这个原則出发,是完全正确

注意分析肉体对象的行动，同时表明，尽管肉体的意識在今天不起重大作用，但是这个因素在最抽象的思維結果中也仍然保留着深刻的痕迹^⑤。拉法伊尔还根据原始时代艺术的发展來說明肉体对象的行动的意义，同时也說明，由于愈来愈多的需要，肉体对象的行动通过制造工具而增加力量。

下一步分析的是感受；知觉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接受，加工和普遍表現**。在拉法伊尔看来，問題不在于某个自在的世界同感覺的認識相对立，因为这个“自在的世界”已經为人类的实践所改变。因此，在感受的內容方面不存在任何‘一成不变的’‘自在的世界’，而只存在为肉体的行动所准备起来的历史的世界。而通过某种其他的（認識創造的）过程，还要求使这个世界脫去感性活动赋予它以意識的形式，以便感性認識能够建立历史世界的新形态”^⑥。

参加感受的接受过程的有两个很不相同的因素：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統一体和被赋予某种特殊职能的个别感觉，“加工的任务是形成具体的結果，在这里面，統一体和个别的、不定的和一定的、整体和部分将在它們尽量加强渗透的基础上，显露出它們之間的联系的更大的必要性”^⑦。

也就是說，加工的过程，按照自己的結構来看，是一个辯证的过程；每个具体的因素否定整体的不定性，而整体則又否定每个

的，但是也作了一个不小的校正，“在‘生动的直观’之前，我們——根据馬克思在关于費尔巴哈的提綱中的要求——提出了肉体对象的行动，它不仅是抽象思維結果的实践，而且是——从历史和認識論方面来看——它的实质性前提之一。”（同上书，第209頁）

⑤ “例如，对于抽象的、精神的实体，德語的意义是：肉体方面理解‘从事干什么’的概念；再例如，在希伯萊語中，‘認識’和‘爱上某个女人’是同样的意思，而法語中‘理解’（saisir）和‘观念’（conception）这样的詞既具有肉体的意义，也具有精神的意义，而肉体的意义是更加原始的意义。”（同上书，第58—59頁）

⑥ 同上书，第82頁。

⑦ 同上书，第84頁。

部分的具体性，同时否定它的还有某些其他的具体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讲，加工的辩证法是主体和客体的综合。主体和客体是变种的统一体，²尽管它们都参加形成感觉的过程，但是它们每一个都同作为感觉的感觉不相同。这个过程不是客体和主体的变种和统一体之间的普通吻合，而是相互的渗透。只有在这种渗透以后，形式的质才成为感觉的质的内容的“形态”。

拉法伊尔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在感受范围本身的内部实现的，至少在最初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帮助。因此，“仅仅是一个客体的认识论，或者仅仅是一个主体的认识论，都不能解决范畴问题，因为两者暗中赞同了范畴是静止的固定的形式这一前提。但是实际上，第一，范畴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讲，它的出现对于个别的认识行动确实是相对固定的，然而它只是作为客体和主体的抽象的形态才是如此）。第二，范畴干预个别的认识行动，并且作为这样的结果而带有完全的具体性。具体的范畴（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只可能存在这样的范畴）是彼此容纳的两种过程即社会历史过程和个别创造活动的过程的结果。在第一个过程中，到处具体地产生出来的范畴总是重新分裂为自己的不同因素，而具有‘先验’的假象的固定和抽象的因素是同下一个创造活动对立的。这种因素永远在改造着固定的和变化的因素的综合，并从而证明范畴的历史后天性。在这个过程中，范畴根据内容并同内容一起发展，内容也根据范畴并同范畴一起发展。”^①

^① 拉法伊尔：《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精神创造论》，第87—88页。在同范畴问题有关的另一个地方，拉法伊尔看到先验论和一般相对的后天论的不可能，他对恩格斯关于范畴作为客观的（在物的方面）和主观的（人的意识中的反映）范畴的意见作了一些有意思的注解。“第一，人的意识本身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形成确实受其他客体制约的范畴，而在它们能够采取的表现形式方面则只能以特殊的意识为基础；

第二，‘描述’在主体中进行，并且不仅在一种而是在几种认识力量中进行的。这些‘描述’中的每一个是否都是一个主体的范畴？或者一个范畴仅仅是所有这些主观不同

最后，表現是这个过程的第三个因素，感受过程需要它，是为了通过有表达力的运动的某种原动力的行动，把一些新东西加給意識之外的范围。

精神力量下一阶段的分析，是针对理性思維即肉体行动和感受的綜合，拉法伊尔也把这个过程和感受一样分为三个阶段：接受，加工和表現。

他表明过程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感觉和肉体进行的，同时指出了，理性的結構在同外在世界的斗争中历史地发展，并逐漸获得了某种相对的固定性，“这种固定性在今天对个别的認識活动說来使得先驗賦予的假象活跃起来了。但是理性思維的历史发展过程——正如現代自然科学史所确实表明的——实际上还不完全是最后的过程；因为它还在大力摆脱感觉和智慧”^②。

他把加工阶段分析为三个因素：对象活动范围的划分（区别的行動），存在和理性思維相互渗透的方法，以及理論和活动范围的积分。

与唯心主义相反，拉法伊尔表明，活动范围的划分不完全是可以先驗地演繹的形式上的体系，同时他指出，活动范围（科学体系）的历史发展总是受經濟制約的，因为經營和肉体的行动、經濟史和肉体行动史实质上是相同的。其次，活动范围划分的历史发展，是

的描述的交叉点？換句話說，是否局部的描述必然只是客观范畴的某个不完整的描述？是否客观范畴的最大的近似只是由所有主观描述的总体来保证的？”（同上书，第220—221頁）

拉法伊尔用空間和時間作例子，它們是“一切力量的范畴（因為它們是意义很广的客观范畴），虽然每一个別力量产生完全不同的范畴的表現方式，譬如，肉体空間、感觉空間和思想空間同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但仍然向同一的基质方向发展。其次，某个既定范畴的意义对于各个力量可能是不相同的，或者換句話說，由于用其他方式‘描述’对象，范畴的次序对于各个力量可能是不同的。因此，首要任务在于描写从一种力量向另一种力量过渡时每个个别范畴的内容的变化情况”（同上书，第115—116頁）。

② 同上书，第114—115頁。

由物质的辯证法、理性思維的辯证法和相互联系中的微分和积分之間的对立所决定的。在第二阶段，他研究了各門科学的方法問題和确定方法的阶段（理想对象的树立，規律的归納，某种理論和理論的演繹中的描述）。最后，关于第三个阶段即积分阶段，拉法伊尔认为，“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強調和解釋每一制度形成的历史性质。从今天的形势中产生的任务，是消除在資本主义統治下过分突出的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对立，也就是历史科学和关于存在的科学之間的对立；其次，第二个任务是在同一活动範圍內确立方法的二元論的辯证統一”^①。

最后，是表現过程（技术、实验、工业），这个过程表明思維和存在的統一，亦即表明，人的努力方向是按照自己的意图創造肉体，并且证明这样的肉体不仅能够发挥作用，而且能够改变世界。

可見，只有这一切認識力量的总合，才能保证存在和思維尽可能的接近。“这三种認識力量即肉体、感觉和理智的力量形成辯证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在历史上处于外在世界压力之下而这样产生的：各种力量一个从另一个里面发展起来并不断地互相向一个更高的統一体活动，以借助各种手段来完成同一任务；从理論上把握和从实际上管理外在世界。”^②

对于拉法伊尔來說，最后的認識力量，即智慧，会涉及到未被掌握的世界总体，并且能够从一个唯一的来源来发展有关这个世界的理論，从原始的魔术起，一直到現代的哲学主張。

拉法伊尔的意图是有广泛根据的，也就是說，这些意图不仅主張只是通过不同的認識方式来分析認識过程，而且要描述某种整个精神創造論的範圍，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情景”問題，对某些解釋的机械論，对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关系提出了敏銳的看法，最后，并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性质提出了若干卓越的意見，以

① 拉法伊尔：《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精神創造論》，第145頁。

② 同上书，第154頁。

避免在这些解釋上的通常的唯社会学的观点。

拉法伊尔认为这些因素包括在“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論”概論的問題內，这个問題应当成为一个广泛的范围，只有在这里面，認識論才能获得真正的地位。他在这个問題上強調以下几点：

“(1)各个文化部門是由分工而产生的，也就是說，它們是人們自己創造的具体历史內部的各种精神过程。作为这样的部門，它們拥有自己相对的价值，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它們包含着自己的历史的部門的条件，而这个历史是取决于物质生产的。經濟自己不直接創造任何东西，而只是在个别部門規定的条件內部来改变和进一步形成事物。

(2)物质生产是精神产品的首要的但不是最后的基础。我們不應該把这种关系片面地理解为原因和后果，而應該仅仅理解为相互的作用，因为物质生产的任何新的发展水平一般都包含着以往的使人向后的精神影响，并且制約着这种影响。

(3)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間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譬如，根据馬克思的說法，希腊的艺术同自己的基础不是直接地，而只是通过希腊神話相联系的。

(4)中間环节的数量愈多，精神生产的自由程度就愈高，但是精神生产并不因此而成为独立的。或者換句話說，各种意識形态和經濟的联系，不是同样密切的。

(5)各种意識形态处在彼此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因此形成只有通过迂迴曲折的漫长道路才能回到它們的原始物质基础的情况，結果从这里产生的根本不是解釋，而是荒謬的东西（恩格斯語）。

(6)在同一时代的經濟和某种一定的意識形态之間可能存在不相称的情况。例如，很不发达的經濟同极发达的、拥有不朽的杰作的艺术联系在一起是可能的（馬克思語）。

(7)意識形态在受經濟制約的范围內，能够發揮相对独立的

历史作用。这种作用不是必然朝着經濟发展的方向进行，至少有时是与此相反。意識形态往后的影响可以强于原始的經濟影响。”^①

尽管拉法伊尔的分析基本上帶有不完整的和不肯定的抽象的性质，尽管这种做法本身（割裂地分析各种力量，而这些力量总是在統一体中具体地存在的）必然会造成片面性，但是他的主張仍然具有自己的独创性，指出了馬克思主义在理論上还没有涉及的若干問題。

他表明了馬克思主义对認識論（这同时也是精神創造論）的解釋的优越性，并且在广义的概念中把这种理論也推广到文化理論本身，而一些最著名的馬克思主义者仅仅提出了文化理論的要点。拉法伊尔看到，必須对艺术家在提炼自己的美学感觉时所依据的感觉和心理（时代、等級和階級的感觉和心理）进行分析，因而他对埃及史前的岩洞繪画和史前的陶器及文明进行了饶有兴趣的分析，以了解那个遙远时代的精神气氛^②。

除了这些理論活动以外，我們还要提到几个具有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物，他們在那个时期和后来都通过自己的著作进行活动，但是他們的著作不像我們上面提过的著作那样具有独创性。

首先應該提到的是：卡·阿·維特福格尔在《市民社会的科学》（1922年）和《市民社会的历史》（1924年）两书中主張剖視整个市民社会及其矛盾；奥·塔尔海麦由于发表通俗性的著作《辯证唯物主义导論》（1928年）而出名，这本书是由他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所作的讲演編成的；尤·博尔夏特发表了通俗讀物《历史唯物

① 拉法伊尔：《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精神創造論》，第266—267頁。

② 《史前的岩洞繪画》，1945年紐約英文版。《埃及史前的陶器和文明》，1947年紐約英文版。除了这些已发表的书籍外，拉法伊尔还以手稿的形式留下了若干关于应当如何看待艺术作品；关于希腊艺术中的古典人物；关于旧石器时代的猎人文化；关于神庙牆壁裝飾艺术的肖像学等等的著作。

主义》一书；庫·薩烏尔兰德在篇幅巨大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第一卷(1932年)中已經表現了許多对馬克思主义抱教条主义态度的观点和对待以往的馬克思主义者的虚无主义态度。在这个时期也出現了恩·布洛赫，我們将在后面研究他，因为他的主要著作和意义属于馬克思主义发展的現代阶段。在历史編纂学方面應該提到麦·貝尔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斗争通史》(1924年)和阿·罗森堡的《从馬克思到列宁的布尔什維主义史》(1932年)^①。

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发展，由于法西斯主义上台执政而被粗暴地中断了。无论是社会民主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不懂得克服他們的过去的分歧并在共同的野蛮的敌人面前团结自己的社会主义的队伍。这种情况再一次证明，社会民主党的实用主义的、目光短淺的政策把議會制摆在专政之上，而第三国际的同样的政策則把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談。

《社会研究杂志》集团

三十年代，在法兰克福，圍繞着社会研究学院聚集了一群科学工作者和理論家，他們开始基本上是一些資產階級学者，后来逐渐超越了資產階級的理論水平并试图从馬克思主义的立場来解决唯心主义的哲学和理論无法解决的問題。

^① 从罗森堡的书中援引几点批評性的意見是很有意思的。虽然他寻找种种論据来为俄国发展的某些情况辯解，但他仍然尖銳地批判了各国共产党对“苏維埃神話”的完全服从。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看法是：“为了使苏維埃俄国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应当至少实现三个前提：工业必須采用大型动力并在生产者的自由自治下組織起来。农业也必須这样組織起来。而生产应当按照需要，而不是按照市場和商品的利益来加以管理。目前在苏維埃俄国，这三个前提一个都不具备。”（《布尔什維主义史》，1932年柏林德文版，第227頁）因此，“苏維埃俄国現在仍然属于类似1921年的国家和社会类型。它是工人和农民的国家資本主义国家，而且占統治地位的官僚同时掌握着社会上这两个基本階級”（同上书，第228頁）。应当指出，罗森堡的意見是，国家資本主义对于俄国說来是一种十分現代的統治，它实行了許多进步的措施，如限制教会，实行新的教学法，保护母亲和儿童等等。

他們对整个世界有关历史和人的問題的文献所作的大大小小的研究和內容丰富的評論，都发表在从1932年起在萊比錫开始出版的《社会研究杂志》上，而在法西斯主义上台后不久，几乎所有的撰稿人都成了侨民，而該杂志在巴黎繼續出版。現代野蛮人的再次入侵，使这一切极有成果的工作終結了。

这个集团的主要的和最活跃的人物是麦克斯·霍尔克海麦，而在多少成功地从馬克思主义立場出发来闡明多方面的历史問題的比較重要的成員中間，我們應該提到：赫·馬尔庫斯，特·阿多尔諾，亨·格罗斯曼，弗·波洛克，埃·弗罗姆，普·兰茲堡，卡·阿·維特福格尔，格哈德·迈耶尔。

这些活动的主要角色的突出特点，是以坦率的态度对待資產階級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和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切科学問題。这使他們能够不受最高的权威約束，而在各个領域內自由地漫步，这些領域在固步自封的斯大林主义的馬克思主义中曾是真正的禁区。这个集团的主要特点之一和重要的积极之处，是不陷于抽象地否定一切不是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恰恰是試圖認識各种观念的片面性或不完整性的原因，利用这些观点的积极成果来构成对世界和人的更加深刻的、馬克思主义的图画。

由于他們看到了社会理論中新唯物主义的主要特征^①，因此他們在自己的著作中（尤其是麦·霍尔克海麦）努力首先使自己的馬克思主义的观点^②同現代唯心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庸俗馬

① 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不同，因为“社会理論构成現代唯物主义的内容”（麦·霍尔克海麦：《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社会研究杂志》第2卷，1933年，第14頁）。

② 他們都不得不仍在某种程度上以伊索寓言式的語言來說話。因此他們把自己的观点称为：唯物主义，批判的理論，批判的社会理論。馬尔庫斯在一段話中解釋說：“我們所理解的批判的理論在这里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理論，即在这个杂志的重要論文中根据辯证的哲学和政治經济学批判所表述的那种理論。”（赫·馬尔庫斯：《享乐主义批判》，《社会研究杂志》第7卷，1938年，第73頁）

克思主义划清界限。

只有从对社会及其矛盾的分析中，才能理解理論的动态和科学的現代危机。“对科学危机的理解取决于关于现代社会形势的正确的理論，因为科学作为一种社会职能，在現时的情况中反映着社会的矛盾。”^①

由于这些矛盾，現代新实证主义者也就陷入了邏輯学和邏輯語法的局部性問題。因而他們不能掌握真正的科学，而是作为某种哲学流派活动，“这种流派在某一既定的、固步自封的世界观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无論如何，这种世界观和大多数宗教一样，能使自己的信徒以各种各样的态度对待社会問題”^②。正因为如此，霍尔克海麦认为現今的形而上学者要对現代的事件負責，同样他也指責科学家完全忘記了人。

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間的現代的爭論中，唯物主义不可能站在任何一方面，因为理性主义是市民在兴盛的阶段，在相信智慧、目的和前景的阶段上的典型表現，而非理性主义則是从市民的危机中产生出来，因此也就是由于不相信意图的合理实现而产生出来的。所以，馬尔庫斯正是从現代存在主义中看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破灭。因为，“过去某个时候它的主要成就在科学的社会理論和政治經济学批判中保全下来了。今天工人运动的命运（这种哲学的遗产在工人运动中已被超越）是处于莫知究竟的状况中。”^③

由于試图在市民哲学中建立新的哲学人类学，霍尔克海麦专

① 霍尔克海麦：《关于科学和危机的意見》，《社会研究杂志》第1卷，1932年，第7頁。

② 霍尔克海麦：《对形而上学的最新抨击》，《社会研究杂志》第6卷，1937年，第49頁。

③ 馬尔庫斯：《总体論国家观中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社会研究杂志》第3卷，1934年，第194頁。在这篇文章中馬尔庫斯表明，总体論对自由主义的批評不过是对次要因素如对国家的批評，而自由主义的基础、資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則依然如故。

門写了一篇文章来阐述这个问题。他表明，人的品质、特性由于各种影响而不断地变化着，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謝勒打算从人类存在的基本结构中发展一切属于人类的东西（语言、工具、思想、法律、宗教等等）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能一劳永逸地决定个人、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的某种公式是不存在的。然而，尽管决不应该把历史看作是一种唯一的人的实质的发展，但是如果认为事物的过程是由某种不依赖于人的必然性所决定的，这种从相反的方面提出来的宿命论的公式也是幼稚的。”^①

从这些问题看来，埃·弗罗姆关于分析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和任务的文章是值得注意的。在这篇文章中，他主张利用心理分析的成果来唯物地解释人和历史。弗罗姆认为，心理分析能够在认识某个一般说来是社会过程中的决定性的因素方面，也就是通过对人的结构、人的“本性”的分析来丰富历史唯物主义^②。“应该把社会心理现象理解为本能机构积极和消极地适应社会经济状况的过程。本能机构自身——在一定的基础上——是由生物学的特点确定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要发生变化；最初形成的因素的作用属于经济条件之列。家庭是经济状况借以对个人心理起到其形成影响的最本质的媒介物。社会心理学要求根据经济条件对热烈的渴望的作用来解释共同的（社会有关的）内心的状况和思想（尤其是它们的非意识的根源）。”^③

^① 霍尔克海麦：《关于哲学人类学的意见》，《社会研究杂志》第4卷，1935年，第3页。马尔库斯在他后来写的《理性和革命》一书（1941年纽约—伦敦英文版）中，就异化问题研究了宿命论的决定论和人的实践的这个问题。

^② 这个时期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对心理分析的评价相当不一致。例如，勃·比霍夫斯基、阿·卢利叶等人以及威·莱希（在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心理分析》一书中）批判地、然而肯定地对待了心理分析的现实成果，而符·恩·沃洛申诺夫在他的《弗洛伊德主义》一书中则把心理分析称为现代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因素之一。庸俗社会学的公式在他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这种公式成了当时苏联的思想意识的特征。

^③ 埃利希·弗罗姆：《论分析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和任务》，《社会研究杂志》第1卷，1932年，第39—40页。

弗罗姆根据分析得出結論說，在历史唯物主义里面，分析心理学有它一定的地位。分析心理学研究人的因素——本能世界，研究它在社会过程内部所起的积极的和消极的作用。“因此它同时研究一种在經濟基础和思想現象之間的决定性的中介因素。分析社会心理学因而有助于充分理解在社会和自然界之間发展的过程的思想上层建筑。”^①

在前面我已經指出，这个集团的主要代表者对市民的（以及現代的）文化和哲学持有批判的、但不是虛无主义的态度。其所以这样，是由于正确地理解到，哲学不是社会經濟事件的片面反映，不是真正的思想体系。“既然哲学高于思想体系，任何这样的企图（把哲学完全归結为社会的東西。——作者注）必定会失敗。批判的理論在它同哲学发生关系时注意的是哲学概念和問題的真实內容：它要求这些概念和問題之中包含真理。相反，知識社会学的事情永远只是涉及以往的哲学的謊言，而不是涉及它的真理。”^②

但是他們的批判的理論即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同样认为，沒有任何可能来彻底研究完哲学的对象，否則哲学最終就会平靜下来。“因此，那种认为在自我身上、在任何一个真理身上能找到平靜的哲学，同批判的理論毫无共同之点。”^③

馬尔庫斯在他关于批判享乐主义的文章中研究了某些倫理問題。馬尔庫斯表明，享乐主义是如何从絕對的和本身有价值的利益和需要出发的，同时他指出，享乐主义却看不到，在这些利益和需要中已經呈現出階級社会的謊言和偏袒。

他把个人的行为同社会宣布的某些普遍准則的冲突看作是不

① 弗罗姆：《論分析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和任务》，《社会研究杂志》第1卷，1932年，第54頁。

② 馬尔庫斯：《哲学和批判的理論》，《社会研究杂志》第6卷，1937年，第640頁。

③ 霍尔克海麦：《哲学和批判的理論》，《社会研究杂志》第6卷，1937年，第633頁。

道德的問題，而不是主張用某种其他的東西來替換這種普遍准則。“不道德的人錯誤地反對某一普遍准則的公正性，這種普遍准則即使具有不好的形式，但它保證維持社會生活；而不道德的人是不会有某种更好的、真正的普遍准則的，因为他处于預先确定的、‘敗坏了的’本能和需要的結構中。道德是特殊利益和一般利益之間的對抗的反映。它是普遍准則為了維持本身而迫切必需的那些要求的法典……普遍准則与孤立的个人相反，它維護历史的權利。它要求排除任何破坏主要的社會戒律的享受。它禁止滿足那些必然会動搖現存制度的基礎的要求。”^①

在有关真正的和虛偽的利益的問題上，馬爾庫斯表明，在對抗性的和复杂的社會过程中，在各种社會因素、階級因素和思想因素等等的影響之下，个人要看到自己的真正的利益常常是很困难的。可見，在對抗性的劳动过程中成长起來的人們，“不可能是自己的幸福的主宰。他們受到蒙蔽，无法認清自己的真正的利益。因此才会发生这样的事，他們說自己的狀況是幸福的，并且不用外在的压力就承認那壓迫着他們的制度。現代人民表決的結果證明，不明真相的人們是会走到投票反對自己的地步的”^②。

馬爾庫斯認為，个人的真正的利益不應該是自身的偏愛、自身的衰退和墮落，也不應該是希望別人如此。因此，對現代的人來說，个人的真正的利益是自由的利益。但這并不是某种理想的倫理原則的任何抽象的要求，而是現代历史发展的表現。“个人的真正的利益是自由的利益，真正的个人自由是和真正的普遍自由融合在一起的，一般地說也只有和它在一起才是可能的，而且幸福最終也在于自由——这一切不是討論人的本性的哲學人类学的任何表示，而是对人类本身在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中爭取到的一种历史

^① 馬爾庫斯：《享樂主義批判》。《社會研究雜誌》第8期，1938年，第69頁。

^② 同上，第80—81頁。

状况的描述。”^①

对馬尔庫斯來說，幸福的真实性就是自由的真实性，即解放了的人类在它向自然界进行的共同斗争中的自决的真实性。霍尔克海麦联系着社会科学中的預見問題也对这个问题作了补充說明。他不同意那种认为在社会科学中比在其他科学中更难于預見的看法，同时指出，社会科学的对象愈是从属于人的自由，預見便愈容易。因为人的真正的自由既不同于无条件服从的状态，也不同于通常的任意妄行，而在于“通过合理的决定在我們中間和我們之外掌握自然界。使这种状况成为社会所特有的，这不仅是社会学家的任务，而且是人类的一切进步力量的任务。社会学家认为达到正确的爱好，在政治上追求实现一个合理的主張，就是这样实现的”^②。

对霍尔克海麦來說，科学是历史过程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只有在抽象的意义上才能同历史实践分开。只有在历史实践中才可能提供对社会問題的解决办法，而“理論和实践的分离也只是一种历史現象”^③。

这就是法兰克福集团的主要理論家的某些基本思想，这个集团是德国在那个时期的重要的思想代表。由于这个馬克思主义科学工作者团体对科学問題的看法眼光开闊，这使他們比那个时期的其他团体高出一头。粗鄙的法西斯主义在这里正如在其他許多方面一样，也表現了它在历史上的低能的思想和文化面貌。

① 馬尔庫斯：《享乐主义批判》。《社会研究杂志》第8卷，1938年，第81頁。

② 霍尔克海麦：《社会科学中的預見問題》。《社会研究杂志》第2卷，1933年，第412頁。

③ 霍尔克海麦：《关于科学和危机的意見》。《社会研究杂志》第1卷，1932年，第2頁。

第三章 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和法国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

意大利的馬克思主义在类似的情况下也产生了一位值得注意的和光輝的人物——**安东尼奥·葛兰西**。

像欧洲其他許多国家一样，意大利在战后的形势也是革命的形势。經濟上最发达的意大利北部，在1917年已經成为工人階級和政权当局尖銳冲突的場所(如都灵发生的冲突)。而到了1920年前后的期間，就已經有占領工厂和土地的事情发生了，并且建立了第一批工人委员会。

然而，意大利社会党在組織上和政治上都沒有准备，所以不能把这种革命的热潮和已經出現的直接行动引导到合乎邏輯的結局^①。当时意大利工人运动中力量最强大的一派——最高綱領派沒有能超出革命的辞句而更进一步。更不用說那些在比索拉蒂、屠拉梯等人領導下的改良主义者了。

在这种形势下，安·葛兰西和帕·陶里亚蒂、姆·特拉齐尼、路·隆哥等人于1919年在都灵創辦了《新秩序报》，并圍繞該报开展了与該报同名的运动，这个运动提出了建立工人委员会的倡議。1921年1月，当統一和革新社会主义运动的嘗試失敗后，《新秩序报》派与波尔迪加派和最高綱領派左翼一起建立了独立的共产党。

但是与此同时，意大利資產階級也在准备进行反革命活动，它

^① “社会党突然面临着夺取政权的問題，但它沒有解决战略、策略和革命組織的任何一个問題。”(伊·西朗內：《法西斯主义》，1935年薩格勒布塞文版，第43頁)在利·瓦利安尼《二十世紀社会主义史》一书中，关于这种形势也有相同的看法。

认为墨索里尼及其雇佣暴徒是摧毁工人运动的合适的人物。葛兰西在1922年間是意大利共产党駐第三国际的代表，他于1924年回到了意大利，因为当选了議員。这时法西斯主义已經开始政治上的暴行了(杀害社会党議員馬特奧蒂)。1925年法西斯主义頒布法令取消了出版和結社的自由，1926年又頒布了一些專門的法令，这些法令已經意味着完全的法西斯化了。同年葛兰西和其他許多人一起被捕，并在監獄中結束了他那短促的，但却是丰富而充滿生氣的生命。

葛兰西的理論观点主要产生于最后这个时期，当时他在監獄中拟定了一个进行科学和理論研究的广泛計劃，其中包括从哲学、文学、历史到天主教、知識分子等等一系列問題。虽然他所有的筆記是在法西斯主义垮台后才开始整理和出版的，但是从一定的意义上來說，这些筆記在思想上正是属于馬克思主义时代中我們現在所探討的阶段^①。

葛兰西思想的重要特点是：观点广泛和帶有批評性，对待任何問題、甚至党的活动中最困難的問題，都敢于不帶偏見，采取灵活的态度，并且所考虑的，不是狹隘宗派斗争的前景，而是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国际主义使命的前景。

葛兰西明白，为了實現如此艰巨和錯綜复杂的任务，亦即为了實現新的、現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和馬克思主义的思想領導，必須培养真正能胜任这个任务的知識分子干部，因为如果不全面地利用全部文化的成果，完成这个任务是不可想像的。“然而理論和实践統一的概念的深化还处在实践哲学（即馬克思主义。——作者注）的最新发展的始初阶段：还保留着机械論的殘余，因为还把理論說成是实践的‘附屬品’、‘无足輕重之物’，把理論說成是实践的

^① 众所周知，这些札記沒有一篇是完整的和有系統的著作，所以我們在援引在一部馬克思主义通史中值得注意和提到的各个思想时，根据的是多半在后来加上的各种篇名和书名。

僕从。看来应当用历史的观点提出这个问题，即把它当作一种有关知识分子的政治问题来提出。对自己本身的批判的认识，从历史上和政治上来说就是造就知识分子的优秀人物；如果不组织起来（从广义上说），人群就‘没有区别’，就不会成为独立‘自主的’，而且没有知识分子，即没有组织者和领导者，也就没有组织，换言之，如果从理论和实践联系的理论角度来看，确实要分出一个‘专门从事’思想和哲学活动的特殊人物阶层。”^①

葛兰西看到，培养知识分子的道路是漫长而艰巨的，其中充满着矛盾、前进与倒退等等。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在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划出一道通常的鸿沟，因为没有一种人的活动可以完全摆脱智力的参与。因此“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

当我们把人分成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时，我们实际上只是说到职业知识分子的直接的社会职能，也就是说，我们只是注意到特殊职业活动——无论是从事智力的创造，还是从事筋肉、神经的活动——负担最重的方面。这意味着，如果说知识分子的话，却不能说非知识分子，因为这种人是不存在的。但是，智力、脑力创造的活动和筋肉、神经的活动之间的关系本身并不总是同样的；因此就存在特殊智力活动的不同的阶段。”^②

这就是说，造就新的知识分子阶层的问题在于，朝着新的平衡的方向改变两种活动的这种关系，使“那种作为不断更新着物质世界和社会的一般实践活动因素的筋肉、神经活动，成为新的和完整的世界观的基础”^③。

因此，葛兰西关于新知识分子的观念，并不是要使知识分子在

^① 葛兰西：《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导论》。《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哲学》，1958年萨格勒布塞文版，第29页。

^② 《知识分子和文化组织》。《葛兰西选集》，1959年贝尔格莱德塞文版，第312页。

^③ 同上书，第313页。

狹隘的、脫離生活的理論活動中自命不凡，相反地，是要知識分子作為建設者、組織者參加實際生活，要他從“勞動技術而進到技術科學，進到歷史的人道主義的觀念，如果沒有這種觀念，人只會停留為‘專家’，而不會成為‘領導者’（專家＋政治家）”^①。

從政治家的這個方面來看，對於某些社會集團說來，黨僅僅是直接的政治和哲學領域中培養本組織的知識分子的特殊方式，因為對於所有各個集團說來，政黨正是一個機體，它在社會領域中所執行的職能，同國家在政治領域中在更廣泛的範圍內所執行的職能是一樣的。“應當把政黨的所有成員看成是知識分子，這種說法可能被看作是笑話和諷刺；然而，如果我們想一想，這種說法是再正確不過的。區別不同的程度是必要的，因為某個政黨可以擁有程度高低不等的或大或小的結構，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領導者和組織者的職能，因為這是教育的職能，即智力的職能。”^②

由此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如果說社會主義過程的實質在於對人的生活的一切領域實行社會的（獨立的、不要中介人的）管理，那末社會主義的人的智力、性格和專業知識的問題就是具有決定性的問題之一。

葛蘭西也不怕說政治上的“優秀人物，他們的包含於人的能動性中的世界觀在一定的程度上已成為相應的和系統的真正的意識，成為明確而堅決的意志”^③，而且只有這些優秀人物才能够不按照陳舊的公式，而是通過向群眾灌輸他們本身還不能創造的新東西來領導群眾。完全可以理解，葛蘭西指的不是帕勒托說的或謝勒理解的優秀人物，他指的始終是分工及其後果對於從事智力活動和掌握一定的文化領域的可能性來說所引起的必然結果。他

① 《知識分子和文化組織》。《葛蘭西選集》，第 312 頁。

② 同上書，第 319 頁。

③ 葛蘭西：《哲學和歷史唯物主義研究導論》。《歷史唯物主義和貝奈戴托·克羅齊的哲學》，第 31 頁。

所指的是这样一种优秀人物，他們的任务不是通过自己的活动来保持与群众之間的永久的距离，而是以自己的历史性活动和对社会的革命改造，与群众一起彻底消除这种差别。

因此，党脱离群众的問題和不負責任的問題，是葛兰西所特別尖銳地指出和警告过的。“官僚是最危險的、守旧的保守势力；如果它能形成一个自以为不受群众約束的、特殊結合起来的团体，党就会变成为不合时宜的組織，而在尖銳的危机时刻，就会丧失自己的社会內容，成为一座空中楼阁。”^①

这样，也就提出了使馬克思主义成为这些新的知識分子的新思想观念的問題。葛兰西在这里也不仅表現了他所固有的广闊的眼光，而且也表明他超越了实用主义、斯大林主义对这个工作的理解。首先，在他对布哈林論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所作的极其尖銳的指責中，他似乎是預先批評了一种比布哈林的思想狹隘和肤淺得多的思想^②。这首先是指对过去的哲学所采取的不动脑筋的和傲慢的态度。“把整个哲学上过去的时代估价為梦囈和丧失理智，这不仅是反历史主义的錯誤（因为这包含着一种时代錯誤的奢望，企图使过去的人也像在今天这样思想），而且还是形而上学的直接的残余，认为某种教条的思想对一切時間和一切国家都是有用的，并

^① 《論馬基雅弗利、論政治和論現代国家》。《葛兰西选集》，第 237 頁。正因为如此，葛兰西以最尖銳的方式提出了責任問題。

“鉴于就是在同一个集团中也存在着管理者和服从者的划分，因此必須肯定一些不可动摇的原則，不仅如此，而且上述情况正是引起最严重的‘錯誤’，即产生最严重罪过的、而且最难改正的无能的基础。因为确立了同一集团的原則，于是就认为服从必定是自动的，不用证明‘必要性’和合理性，它也必然会出现；而且不仅如此，同样还认为它是无可爭辯的。”（同上书，第 201 頁）

^② 葛兰西关于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以及与这些問題相联系的其他問題的全部观点是和斯大林主义的观点激烈对抗的，尽管他在当时还没有能够激烈地和現代社会主义发展中的这种現象发生冲突，因为这种現象刚刚开始越出苏联的国界，也因为葛兰西在獄中和实际生活的許多現象隔絕了。这样，他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和光輝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家和实际活动家的意义就更重要了。

用这种思想的尺度去衡量整个过去的时代。方法上的反历史主义无非就是形而上学。某些哲学体系被超越的事实，并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即这些体系在历史过程中可能曾是有用的，它們可能曾执行并完成了提出的任务；所以应当从整个历史发展和从现实的辩证法出发来看待它們的暂时性；它們必然归于消失的事实，并不是对于从某种‘客观的’观点表现的思想所作的道义上的谴责或清洗，而是辩证的和历史的裁决。”^①

其次，沒有广泛的討論自由，这种新的思想观念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說，問題在于必須确定自由討論和宣傳的界限；对于自由，不应当从行政的和警察的意义上理解，而应当从自我限制的意义上理解，因为管理者給自己本身的活动，或者——从本来的意义上說——为了明确文化政策的方向而規定界限。換句話說，誰將規定‘科学的权利’和科学研究的范围，并且願意能够恰如其分地規定这些权利和界限呢？看来，在努力寻找新的和更好的真理，寻求真理本身的更彻底和更明确的表述的过程中，必須發揮各个学者的自由的主动精神，虽然他們也在不断地重新提出一些显然具有最重大的意义的原則来討論。然而，当这种討論的主动精神产生于自私的动机，而不是产生于科学性质的动机时，也将是不难解釋的。”^②

从对馬克思主义的說明和理解来看，葛兰西是沿着一条在一定的程度上与我們已經指出过的某些观点相吻合的路綫进行研究的。这就是說，例如他与布哈林把馬克思主义划分为哲学和社会学

① 葛兰西：《对一种通俗說明社会学的嘗試的批評性札記》。《历史唯物主义和貝奈戴托·克罗齐的哲学》，第176頁。在上面的引文中指出了一种理性的馬克思主义所必須具备的、作为分析和估价过去的哲学和文化的方法論基础的一切重要之点。这比后来斯大林和日丹諾夫的教条不知道要出色多少，那种教条把馬克思主义以前的所有东西都宣布为不科学的。

② 葛兰西：《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导論》。《历史唯物主义和貝奈戴托·克罗齐的哲学》，第36—37頁。

的观点是格格不入的，他并且（虽然是以一种不明确的形式）坚持从某种有机的和综合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因此，他认为布哈林的错误的根源在于主张“把实践哲学分为两个部分：‘社会学’和系统的哲学。与理论和政治分离的哲学只可能是形而上学，而实践哲学所表现的现代思想史的伟大成就则正是在于哲学的具体历史化和哲学与历史的同一化”^①。

实际上，也必须综合地理解人的历史生活的总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也只能被解释为一个统一的思想整体，而不能被解释为别的。但是，在对个别部门进行专门的研究时，马克思主义也遍布于各个领域，犹如哲学本身虽然具有统一性，但它在自身中却包含着各个学科一样。

葛兰西的思想的最高表现不仅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为一种“自我满足之物”，而且在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同时包含着“形成一种普遍的和无所不包的世界观，一种关于自然科学的普遍的哲学和理论的全部基本因素。不仅如此，它还包含着促使一个无所不包的、实际的社会组织活跃起来的全部基本因素，也就是说，它（实践哲学。——作者注）成为一种普遍的和无所不包的文明”^②。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仅和整个马克思主义有关，而且特别和哲学有关而不断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不断出现，其原因在于，综合地掌握自然界、而特别是人及其历史的根本问题和从局部的、专门的角度研究这门或那门哲学或社会学学科的个别问题，这两者之间有着一定的差别。

葛兰西有根据地强调指出，应当把哲学理解为某个社会的表现，因此它也就必然会对这个社会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它所产生的影响的程度，正是衡量它的历史意义和肯定这不是某个

^① 葛兰西：《对一种通俗说明社会学的尝试的批评性札记》。《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哲学》，第163页。

^② 同上书，第189页。

个人的‘学术活动’，而是‘历史事实’的尺度。”^①

因为人的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所以葛兰西也涉及了这个问题，同时提出了一些精辟的意见。在最近三十年来的哲学发展中，人类学问题成了重要的哲学命题。和许多规定个人的某种永恒的结构唯心主义企图相反，也和打算把人主要理解为范畴的规定性中的个人的想法相反，葛兰西指出：“就是说，应当把人理解为一系列积极的关系（过程），其中个人虽然是最重要的，但并不是必须考虑到的独一无二的因素。在任何个人身上得到反映的人类是由不同的因素构成的：（1）个人，（2）其他的人们，（3）自然界。而第二个和第三个因素并不像表现的那么简单”^②。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从心理的和思辨的意义上说明人，因为这样对我们来说，进步和变化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如果我们把人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那末人们之间的任何暂时的比较也是不可能的。“应当把人理解为历史的整体，这个整体是由纯粹个人的和主观的因素，以及由个人与之发生能动关系的那些集体的和客观的因素构成的。改变外在的世界、普遍的关系就是意味着：自己加强自己，自己进一步发展自己。如果把伦理上的‘改善’看成纯粹是个人的事情，那便是一种幻想和错觉：任何个人的构成因素的总合确实是‘个人的’，然而如果没有某种外在的能动性，它是不会实现和发展的。这种外在的能动性改变着外在的关系：从对自然界的关系到，以及对属于不同等级和不同社会阶层的其他人们的关系，一直到包括整个人类的最高的关系。因此，可以说，人就其实质来说是‘政治家’，因为他以自己

^① 葛兰西：《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导论》。《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哲学》，第42页。

^② 同上书，第47页。葛兰西的下述思想也具有同样的意思：“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当我们提出什么是人这个问题时，我们是想说：人能成为什么？即人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他能不能‘创造’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人是一个过程，而且这正是自己的行动的过程。”（同上书，第46页）

的自觉地改变和管理其他人们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人性’和自己的‘人的本质’。”^①

正应当在这些范围内来观察葛兰西以及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活动，因为除了在革命的实践中以外，不可能用其他方式实现哲学。因此，在葛兰西看来，社会主义问题基本上也就是群众的解放问题，是把群众本身变为自治的积极因素的问题。所以，葛兰西是在意大利第一个不仅接受了，而且懂得了对人的革命改造的全部深刻意义的人，这种改造是通过积极地把群众吸引到他们自己的生产过程和社会过程中而实现的。自然，工人委员会的想法是这个过程中的基本环节。“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体现在一种特别发挥生产者（而不是雇佣工人、资本的奴隶）本身的积极性的组织中。工厂委员会是这种组织的第一个细胞。由于在委员会中各个劳动部门（根据各行业和各劳动部门在工厂为社会生产的产品制造过程中所作的贡献）派有代表，所以这个制度具有阶级性、社会性。这个制度存在的原因在于劳动、工业生产，即在于一个经常的事实，而不再在于工资、阶级的划分，即不在于一个正是我们所要克服的暂时的事实。

因此，委员会实现着工人阶级的统一，给群众提供一种与他们在一一般的社会组织中所采取的联合和形式具有同样性质的联合和形式。

工厂委员会是无产阶级国家的模型。所有与组织无产阶级国家有关的问题，都是与组织委员会有关的。无论在工厂委员会中或在无产阶级国家中，公民的概念都会消失，代替它的是同志的概念；为了更好和更有利地生产而进行的合作，发展着团结，加强着亲密的和兄弟般的联系。”^②

^① 葛兰西：《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导论》。《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哲学》，第55页。

^② 《工会和委员会》，《新秩序报》1919年10月11日。《葛兰西选集》，第164—165页。

正因为如此，葛兰西才如此激烈地反对了工团主义，因为工团主义主張把工人階級的斗争仅仅归结为工会斗争。同时，葛兰西卓越地看到了一个在工人階級的整个现代工会运动中完全得到证实的过程和现象：“工会的正常发展以群众的革命精神不断低落为其特点；物质力量增大，进取的精神便减弱或完全消失，生活的热情便衰退，英勇的不妥协精神便被机会主义的实践、‘面包与黄油’的实践所代替。量的增长决定着质的贫乏和轻易顺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态度，决定着一种卑鄙的、狭隘的工人心理，中小资产阶级心理的滋长”^①。

由此可见，革命的道路是不应该用工会斗争来代替的。共产主义革命实现“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生产者自治”^②。葛兰西事实上遵循着列宁的基本思想，同时也清楚地看到，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动只有在成为发展新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条件的职能时，才具有历史的价值。“由于这个原因，共产主义的政治委员会在历史上只有在工厂委员会的发展和初步调整之后才能建立。工厂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制度首先检验和开辟工人階級在生产领域中拥有的新阵地，使工人階級意识到自己当前的价值，意识到自己的实际职能、责任和未来。”^③

工人自治(用我们现代的术语来说)是实现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前提。在这个运动中，“党和工会不应当成为监护人，也不应当成为这种新制度的已经形成的上层建筑”^④，而必须成为

^① 《工团主义和委员会》，《新秩序报》1919年11月8日。《葛兰西选集》，第167—168页。

^② 《劳动手段》，《新秩序报》1920年2月14日。《葛兰西选集》，第171页。

^③ 同上书，第171—172页。葛兰西甚至认为，工人委员会“是一个应当在共产国际中达到顶点的历史过程中的第一个细胞，共产国际将不再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而是改组世界经济的组织，是改组整个人类在民族的和世界的范围内的共同生活的组织”（《工厂委员会》，《新秩序报》1920年6月5日。《葛兰西选集》，第180页）。

^④ 《工厂委员会》，《新秩序报》1920年6月5日。《葛兰西选集》，第180页。

加速这个过程的推动力量。

葛兰西对所有的现象采取批判的态度，他也清楚地看到了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教条化的倾向。他根本反对（特别是在对布哈林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批评性意见中）那种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坏的意义上的思想体系，即成为绝对的和永恒的真理的教条主义体系”^①的倾向。他同样也反对把历史方面的科学与自然方面的科学等同起来的观点。在自然方面，自然科学能使我们预见到自然过程的发展。因此，这种观点认为只有能抽象地预见社会的未来的历史方法才是科学的。“事实上，事先只能‘科学地’预见到斗争，但不能预见到斗争的具体情况，因为具体情况不能不是那些处在不断运动中的力量矛盾的结果，而且任何时候也不能把这些力量归结为一定的量，因为在它们之中量不断地转化为质。‘预见’实际上只能达到力所能及的程度，也就是经过某种自觉的努力、从而对实现‘预见的结果’作出了具体的贡献后所达到的那种程度。”^②

虽然在这方面葛兰西有理由驳斥机械论的社会发展观，因为这种观点把社会也看作一个机械因素的合乎规律的组合（这也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解释者的特点），但是另一方面事实也表明，社会的规律一趋势使人们有可能看到某种比“斗争”本身更高的东西，也就是看到从一定的矛盾中产生的那种趋势。

但是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即在社会发展中的具体情况的全貌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被看到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本身包含有如此多的偏差和矛盾，资本主义包含有既不能从理论上设想、也不能预见到的因素，这都最明显地表明这一点。

葛兰西关于文化，特别是关于艺术的思想，同样也是光辉的。

① 葛兰西：《实践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哲学》，第121页。

② 葛兰西：《对一种通俗说明社会学的尝试的批评性札记》，《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哲学》，第165页。

在他对于这些問題的考虑中，看来他是反对整个斯大林主义时期的不动脑筋的和宗派主义的、同时又是傲慢的态度的，这种态度把这个时期內所产生的一切都宣布为最高的成就。仿佛社会主义文化能够自动地壟断思想性、进步性和創造性。这就是說，仿佛只要某人自命为社会主义者，某个国家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就能够使所有的文化現象成为現代的最高成就。“如果抱着一种‘唯一的’前进运动路綫的观点，认为在这个运动中任何一个新的成就都将积累起来并成为新的成就的前提，那便是一个严重的錯誤。不仅存在多种多样的路綫，而且就是在‘最先进的’路綫上也有倒退的情况发生。”^①

因此，一种认为必須創造新艺术和培养新艺术家的想法，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就应运而生。在这方面也是一种官僚主义心理占了統治地位，这种心理认为，一切都可以通过行政和政治中心的指令和決議来进行創造。写作复制品的专家是能够随心所欲地造就和培养出来的；需要的只是一个从事这种工作的相应的組織。但是，不能够像用机器生产干肉商品那样，按照願望和指令来培养作家，因为文化創作需要一定的文化气氛。“为新的艺术而斗争就会是意味着为造就新的有个性的艺术家而斗争，但这是荒謬的，因为艺术家是不能够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应当說，为新的文化而斗争，即为新的道德生活而斗争，新的道德生活不能不和对生活的新的理解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一直到它成为一种感觉和观察现实的新方式，从而世界也同‘可能的艺术家’和‘可能的艺术作品’密切地溶合起来了。”^②

① 《艺术和民族生活》。《葛兰西选集》，第 357 頁。

② 同上书，第 353 頁。从这个意义上說，葛兰西关于政治家和艺术家之間总是要存在一定的分歧的想法也是值得注意的。“对于政治家說来，任何‘固定的情景’都是先驗地反动的，政治家从运动的发生中来观察整个运动。艺术家則相反，他必須具有以最終的形态表現出来的‘固定的’情景。政治家所設想的人是現有的这样的人，同

他认为，尽管其他的文化也有其价值、意义和成就，唯有欧洲文化从历史的和具体的角度来看是无所不包的。同时他认为，欧洲文化在黑格尔身上和在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中，也就是说，首先在马克思主义中达到了顶点。他从这个意义上认为，特别是对意大利人说来，克罗齐的哲学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继续，因而应当批判地加以克服^③。因此他也就如此关心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和历史发展的现阶段的文化发生的冲突中，面临着的任务是很不轻的——它要继续真正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关于世界和生活的观念。

在这方面，葛兰西关于我们上面提到了的那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以及关于当时文化生活中的许多著名人物，如关于克罗齐、金蒂雷、普列汉诺夫、索列尔、德曼、布哈林等人的许多看法和批评性意见，由于许多原因而都是有价值的。其所以有价值，既是由于理论上的原因，也是由于，这些笔记以及葛兰西的整个革命道路最好不过地刻划出一个光辉的和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的形象。这是一个和任何挑剔别人“过

时也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应该成为的那样的人，他的工作正是在于引导人们行动起来，让他们走出他们自己的目前生活的圈子，以便使他们集体成为有能力达到既定目的，即‘适应’于目的的人。艺术家则必须以现实主义的眼光表现在一定的时刻‘存在的东西’，表现个别地、不一致地存在的东西等。因此，从政治的观点来看，政治家任何时候都是不会对艺术家感到满意，而且也不可能感到满意的：在他看来，艺术家总是落后于时代，总是对时代认识不足，而经常被不断发展的运动所超越。”（同上书，第356—357页）

③ 葛兰西的许多篇笔记都是说明克罗齐的哲学的，他在写这些笔记的时候认为，一本《反克罗齐论》也许会具有当年《反杜林论》所具有的意义和重要性。因为“不仅应当清理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而且应当让它重新回到生活中来，因此也应当清算克罗齐的哲学。这就是说，对我们意大利人说来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的话，那末我们也是克罗齐的哲学的继承者，克罗齐的哲学目前已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世界因素”（《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哲学》，第230页）。

去的錯誤”的做法格格不入的人物的形象^①，這個形象尋求與最理智的人，而不是與庸人進行討論，他把馬克思主義理解為現代歷史上的一个新的文藝復興運動，這個運動只有通過自由的創造性的發展，而不是以經院的習氣把馬克思主義的某些一般的和基本的原則奉為不可移易的規範，它才可能是正確的運動。

戰前法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思想，除了蘇聯在某種程度上有所表現以外，在其他國家中沒有比較顯著的表現。唯有法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發展表明了某些有必要提到的特點。

早在1920年12月底，社會主義運動就在都爾發生了分裂，當時社會黨人參加了維也納國際，維也納國際在1922年又和重新恢復的第二國際合併了，而共產黨人則成立了獨立的黨^②。

在理論方面，就戰後初期法國馬克思主義說來，對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著作還研究得不够，更不用說對於作為充分了解馬克思的思想的必要因素的其他前提——例如黑格爾的哲學——的研究了。無論薩特、納維勒或者勒弗夫爾^③基本上都同意，當在學校中講授馬克思主義僅僅是為了駁斥它的時候，如果沒有黑格爾的傳

① 在上面引過的書中有一段話寫道：“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從某人過去的活動中尋找曾經犯過的所有錯誤，以便為了目前爭論的目的而貶低他的聲譽，這難道是正直的嗎？難道人不會犯錯誤？甚至可以說，現在的科學人物難道不是經過錯誤才形成起來的？難道在大多數情況下，每個人的經歷不就是一場反對過去和克服過去的鬥爭嗎？”（《關於經濟學的札記》。《歷史唯物主義和貝奈戴托·克羅齊的哲學》，第319頁）。

② 關於法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更詳細的資料，見保爾·路易《法國社會主義史》，1946年巴黎法文版，1950年第5版。

③ 專門涉及了這一時期的著作有：昂·勒弗夫爾的《存在主義》（1946年）和《總數和余數》（1959年），皮·納維勒的《心理學、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一書（1946年）和論若·波利澤爾的文章，薩特的最新著作《辯證理性批判》（1960年，其中收有1957年的《方法問題》一文，這篇文章也談到了這個時期）。

統，沒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沒有思想的工具，這一代人是絕不能夠了解馬克思主義的。

後來的所有最有名望的理論家是通過各種不同的道路達到馬克思主義的。一部分知識分子（若·波利澤爾、普·莫昂熱、恩·古特曼、昂·勒弗夫爾）在反抗過去和非人道化現象的鬥爭中，從唯心主義和主觀主義的自由觀中找到了出路，薩特則通過現象學和存在主義找到了出路，等等。

但是，到三十年代初期形勢已經起了重大的變化。由於共產黨的活動，由於世界上發生了以大危機震動全人類的事件，由於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熱烈的追求，一部分法國知識分子從馬克思主義中找到了一種不僅用來解釋歷史，而且也用來解釋自己本身的科學領域的最恰當的思想工具。有才能的心理學家若·波利澤爾寫出了反對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哲學派別的著名的批評性著作^①，勒弗夫爾出版了馬克思選集，其中包括了當時還不知道的一些言論摘錄^②。

阿·科惹弗在1931—1939年間的講演，對詳細地了解黑格爾的哲學作了特殊的貢獻。當時聽了這些講演的有薩特、弗里德曼、梅勞—龐蒂、費薩德、伊波利特等人。除了發表馬克思和黑格爾的手稿以及列寧論黑格爾的筆記以外，阿·科惹弗的活動在澄清黑格爾和馬克思之間的本質的關係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總之，三十年代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已經在法國廣泛傳播和鞏固下來的時期。法國的特点是，大量最優秀的法國知識分子以極其深刻的理論信念公開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在當時

① 若·波利澤爾：《一次哲學表演的終結：柏格森主義》（1929年）。

② 昂·勒弗夫爾編《馬克思著作摘錄》（1934年）。勒弗夫爾和古特曼後來出版了《黑格爾著作摘錄》（1938年）和《列寧關於黑格爾辯證法的筆記》（1938年）。在這個時期內，勒弗夫爾開始了卓有成效的政論和理論活動，特別是寫了《辯證唯物主義》一書（1939年），關於這本書我們將在討論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現代時期的一篇中談到。

的形勢下，法國的批評思想已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表現出堅持不受思想的或政治的見解或利益的支配。

在這方面，法國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屬於這樣一些很少數的人之列，他們值得提到的事情是在1933—1934年間和1935—1936年間在“新俄國俱樂部”中舉行了科學討論和講座，此後並出版了兩本文集^①。所有這些活動也具有向公眾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問題的性質，但首先在於把馬克思主義應用於科學研究的不同領域。雖然所有這些人都願意以自己的工作來幫助年輕的蘇聯馬克思主義科學，宣傳蘇聯的科學成就，但是他們批判地對待蘇聯的觀點，否認科學中的任何政治裁決者，否定使科學服從於實際的或思想的目的的任何做法。只要讀一讀索瓦熱奧特對馬爾的印歐語言學理論的批評或瓦龍的序言就夠了，在這篇序言中明確地指出：“蘇聯科學中最使我們反感的就是，它斷言必須使自己的研究服從一種既是物質實現的領域，同樣又是智力思辨的領域的計劃。然而，我們認為：科學可以為自己本身而發展；不應該使科學服從實際需要和利益的要求，因為這些要求會禁止它去廣泛研究那些可能以後對整個物質進步時期起決定性影響的問題；同樣，也不應該使科學服從思想上的命令的要求，因為這些要求會限制科學的理論研究的範圍。我們希望科學完全不注重自己的目的，希望它在選擇自己的假設時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②。

作為這種強烈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高潮的結果，好幾本有關專門科學的重要的著作問世了，這些著作試圖從馬克思主義的立

①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問題》第一卷於1935年出版，第二卷於1937年出版。第一卷包括了日·巴比、姆·科昂、若·弗里德曼、普·拉伯倫納、日·郎之萬、爾·馬烏伯朗士、昂·米尼耶、希·帕蘭、馬·普雷南、阿·索瓦熱奧特、昂·瓦龍的文章，第二卷包括了奧·科爾努、阿·庫維利埃、普·拉伯倫納、耳·普雷南的文章和昂·瓦龍的序言。

②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問題》第1卷，1935年巴黎法文版，第11—12頁。

場來說明專門科學的問題^①。从 1939 年起在保·朗之万、弗·約里奧-居里、昂·瓦龙、日·泰西埃爾和日·克瓦紐的領導下开始出版的理論刊物《思想》，也是法国馬克思主义的重大成果。

这一整个也和斯大林主义的观念发生了冲突的运动，被法西斯的占領粗暴地打断了。苏德条約本身已經給了法国共产党的威信以严重的打击。共产党被俄国的实用主义政策弄得莫知所从，而不能克服从形式上把民族的問題和国际的問題等量齐观的看法，它的代表們則不懂得在議會中应当向本国的在反法西斯的战綫上牺牲的战士致敬，也不懂得法西斯主义是他們的共同的民族敌人。

然而，这只是社会主义和馬克思主义在国际存在的第二个时期和它被解散后的时期内的特殊发展中的一个插曲。

^① 特別應該提到的著作有：馬·普雷南的《生物学和馬克思主义》（1935 年）；昂·瓦龙的《对思維的作用》（1942 年）；布洛克的接近于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研究等等。

第四章 馬克思主义在苏联

尼古拉·伊·布哈林(1888—1938)

除了标志着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特殊阶段的列宁以外，俄国的革命时代还产生了几个人物，他们在理論方面也具有国际意义的人物。首先指的是**尼古拉·伊·布哈林**，他是除了列宁以外布尔什維克的最出色的理論家，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从来没有掌握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哲学观点，但是由于自己的理論活动，很快就成了“全党所喜欢的人物”(列宁語)。

当他还是一个年輕的大学生时，就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党，而且参加的是它的布尔什維克派。他被监禁过，1913年侨居国外时，写了一本对伯姆—巴韦克的經濟观点以及司徒卢威、杜岡—巴拉諾夫斯基和奥本海的观点进行馬克思主义批判的极好的著作^①。在战争期間，他写了論世界經濟和帝国主义的著作，与此同时，論帝国主义国家的著作也問世了^②。

1917年他被选为布尔什維克中央委员会委員，《真理报》的編輯，后来在国际中工作。在这个时期內，他还写了一些使他在国际範圍內成为最著名人物的著作：《共产主义者綱領》(1918年)，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的ABC》(1918年)，《过渡时期

① 布哈林：《食利者的政治經濟学》，1913年德文版。

② 布哈林：《帝国主义和世界經濟》，1918年德文版；《帝国主义国家理論》(全书到1925年才出版，其中不同意列宁的某些观点)。在現代资产阶级的比較詳細地介紹布哈林的經濟思想的著作中，我們可以提到彼得·克尼尔施的《尼古拉·伊·布哈林的經濟观点》，1959年柏林德文版。

的經濟》(1920年)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論》(1921年)。

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論》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基本的哲学和历史观点，他把这本书称为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通俗讀本。布哈林屬於最初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部分（虽然这也是某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的人之列。“工人階級有自己本身的无产階級的社会学，它的名称是‘历史唯物主义’。”^①布哈林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关于社会及其規律的一般理論，同时也是各种專門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理論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規律的一般科学，即社会学。第二，它（历史唯物主义理論）是历史的方法这个情况無論如何也不能取消它作为社会学理論的意义。一門比較抽象的科学常常会向較不抽象的科学提供观点（即方法）”^②。

在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問題方面，在布哈林身上，在他的整个理論观念中，关于无階級社会的性质和职能的想法的机械論和空想主义的强烈因素占着統治地位。一方面，布哈林认为，無論在自然界或社会中都存在着“現象的客观因果規律性”^③，这种規律性在“沒有組織的社会”中和在“有組織的”、即共产主义的社会中的表現是不一样的。在前一种社会中，在布哈林看来，社会現象只是由于个人的意志、感觉和行动的交錯而产生的，而在有組織的社会中，这个过程“不是自发地，而是在关键性的問題上有組織地进行的”^④。在前一种社会中，社会現象不反映个别人的意志，而且通常是与他們相矛盾并主宰着他們的，在有組織的社会中，“社会現象反映着人們的意志，并且一般是不与他們对立的；人們是自己的决定的主人，并且感觉不到社会的压力、社会中自发因素的压

①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論》，1922年汉堡德文版，第7頁。

② 同上书，第8頁。

③ 同上书，第22頁。

④ 同上书，第36頁。

力,它已經为合理的社会組織所代替”^①。

在他的这些也表現在綱領性的著作里面的观点中,机械論和空想主义的因素明显地胜过了对社会結構和历史过程所作的比較深刻的、辯证的分析,历史过程从来就不是在所有的細节中都如此有規律性,以至可以合理地完全掌握它,也不是这样的无矛盾,以至不仅能排除任何历史阶段上的小的冲突,而且也能排除比較尖銳的冲突。如果我們辯证地理解事物,那末这些冲突将来会用別的手段和方式加以解决,这并不是证明它們就不存在^②。

固然,布哈林接受了辯证法的某些基本的方法論的提法:各种現象具有相互的联系性,在現象的对立中,在內部变化的过程中,在产生与消失、量变与质变中去研究現象。但是,在辯证矛盾的基本問題上,他提出了他那有名的平衡論,实际上,这个理論也是以机械論的观点对历史現象所作的解釋的遗产^③。

在这些观点中,最明显地表现出列宁所評定的布哈林的特点:布哈林从来沒有扎实地学过辯证法,因此他的观念必然浸透着某种經院习气。

布哈林事实上打算把辯证法納入平衡論。“然而,問題在于:我們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所看到的那种平衡,不是絕對的平衡,不是不运动的平衡,而是运动的平衡。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平衡产生出来,随即就被破坏,它在新的基础上重新产生,又重新被破坏,这样不断地繼續着。”^④

①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論》,第 36—37 頁。

② 布哈林的这种机械論在他关于偶然性的观点中表现得最突出,他关于偶然性的观点和十八世紀的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是相同的。因此,他才会作出結論說:“所以我們认为,严格說来,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不存在任何偶然現象”(同上书,第 41 頁)。

③ 虽然平衡論是一种陈旧的机械論的观念,但实际上布哈林却是从过去的經驗批判主义者波格丹諾夫那里接受这个观念的。波格丹諾夫在 1910 年以后,尤其是在《生动經驗的哲学》(1920 年)一书中和稍后又在《組織形态学》(1922 年)一书中特別發揮了这个观念。

④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論》,第 74 頁。

由此布哈林作出結論說，在平衡与不平衡的这种搖摆中，在这种“斗争”与“矛盾”中，在各种力量的这种对抗中，产生了运动的条件。而这些矛盾首先是环境（自然界）与制度（社会）之間以及制度本身內部的动态的对抗。“迄今为止我們只談到过环境与制度之間的矛盾，只談到**外部的**矛盾。但是在制度本身內部也存在**內部的**矛盾。任何一个制度都是由各个部分（因素）組成的，这些部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相互联系着……在这方面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不协调、对立。这里不存在絕對的平衡。”^①

如果他把平衡理解为任何过程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必要的因素，如果他把內部的矛盾理解为任何一种发展中的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矛盾，那末在布哈林的观念中就不会有任何非辯证的东西了。然而，他所強調的首先是平衡和外部的对抗。“因为十分清楚，——他在叙述中作出結論說——制度的內部构成（內部平衡）必定会按照制度与**环境**之間存在的关系而发生变化。制度与环境之間的关系是一个决定性的量。因为制度的整个状况，它的运动的基本形式（崩溃、发展、停滞）正是由这种关系决定的。”^②最后，“**內部的（结构上的）平衡是依赖于外部平衡的量（它是这种外部平衡的“职能”）**”^③。

他认为，社会是人們之間的关系的綜合的制度，这种制度不是人們的一般的总和，正如精神生活不是思想的一般的总和一样，而是某种特殊的和新的东西，同时他又把基本問題轉向自然界与社会的关系。在这方面他区分了稳定的平衡（当生产力不发展的时候）、带有正号的运动的平衡和带有負号的运动的平衡（当生产力倒退时）。

也就是說，他从自然界和社会的关系的性质中看到社会的整

①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論》，第79頁。

② 同上书，第80—81頁。

③ 同上书，第81頁。

个动态。“因而，事物归结为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平衡的性质。由于生产力是平衡的确切的表现，因而我们可以根据生产力来评定这种性质本身。”^①

布哈林基本上把革命问题看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表现为人们之间、阶级之间的冲突。他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各个阶段划分为：第一，思想革命，即意识的革命化；第二阶段是打破国家机器的政治革命，即夺取政权；第三阶段是建立新的经济关系的经济革命；最后是加速发展生产力的技术革命。

正如在平衡论中机械论的公式主义占着统治地位（虽然这不是唯一的因素）一样，在关于革命阶段的这种观点中，机械论的公式主义也是明显的，这些阶段只有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而且只有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才会有用。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在于，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能够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这种说法虽然是正确的，但是，把这些阶段完全分开，则是思想上的抽象。

布哈林在他的这本著作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作了分析和分类，后来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基本上接受了他的分析和分类。例如，他从任何一个阶级社会中区分出：两个基本阶级、中间阶级、过渡阶级、混合阶级类型和丧失阶级性的集团^②。

布哈林作为帝国主义和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时期问题的理论家和研究者，是特别突出的。在对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上，布哈林在某些点上和列宁不同（他是在和列宁写自己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大致相同的时间内写这本书的）。首先，他没有那么明确地说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阶段，而是有时把帝国主义说成是财政资本的政策，有时又把它说成是财政资本的组成要素等

^①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131页。

^② 同上书，第331—333页。

等^①。

然而，在帝国主义的基本点上，对于国民經济在帝国主义下的壟断結構、財政資本的莫大势力和超經濟关系的特殊形式的看法，布哈林和列宁是一致的。布哈林在对帝国主义所作的分析中，还特別強調資產階級国家的特殊影响，他清楚地看到，国家資本主义，特别是由于战争的緣故，是壟断資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阶段。

財政資本已“在某个国家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資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相互进行斗争的个别企业家联合为国家資本主义托拉斯”^②。布哈林认为，国家在資本主义下得到加强，資產階級受到国家計劃和国家組織的約束，許多經濟的和政治的权限轉移到国家机构本身，这仅仅是在加强大資本，大資本通过这些行动仅仅是在巩固自己的国家政权。“国家資本主义意味着大大加强大資產階級。正如在无產階級专政下，苏維埃政权、工会、共产党等愈是紧密地合作，工人階級就愈强大一样，在資產階級专政下，資產階級的各种組織相互間联系得愈牢固，資產階級也就愈强大。当国家資本主义把資產階級的各种組織集中起来，并把它們变成一个統一的、唯一的組織的机构时，它就有助于資本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資產階級专政正是在这里欢呼自己的胜利。”^③

布哈林认为，这种国家化的結果首先在于：一国内資本主义的

① 例如，他在《共产主义的ABC》一书中提出这样的定义：“財政資本在爭取市場、原料产地和資本輸出地区的斗争中所执行的侵略政策，叫做帝国主义。”（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共产主义的ABC》，1921年汉堡德文版，第99頁）我要說明，所有从該书引用的段落都是布哈林写的。同样，在論帝国主义的著作中也說：“帝国主义是財政資本主义，即高度发达的資本主义的政策，这种資本主义以一定的、而且是极度成熟的生产組織为前提。”（《帝国主义和世界經濟》，1929年柏林德文版，第149頁）

② 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共产主义的ABC》，第90頁。

③ 《共产主义的ABC》，第109頁。并見《帝国主义和世界經濟》，第131頁。

竞争或多或少地减少，工资提高，阶级斗争缓和。布哈林认为，资本主义这样并没有解决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矛盾的基本问题，因为在各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在加强。“事实上，在个别国家内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或多或少地停止下来，因为最强大的企业家组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托拉斯。然而，**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斗争却更加激烈了，……**因为现在作为竞争者而出現的是巨大的资本主义力量。而它们之间的竞争是和难以置信的浪费和破坏相联系的，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竞争在‘和平’时期表现为军备竞赛，而最后发展为毁灭性的战争。

这样，财政资本便消灭各个国家内部的竞争，但是却导致**这些国家之间巨大的、残酷的相互竞争。**”^①布哈林从这些过程中看到资本主义发生危机和最后崩溃的必然性。

从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发展，特别是在上次战争期间，国家资本主义倾向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点看来，布哈林的分析 and 列宁的分析基本上是一致的，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后一个阶梯。自然，当时也还不可能谈到国家的一定的分离，以及这个发展的某些不一定和个别资产阶级的利益相一致的规律等等，因为这样的过程基本上还没有出现。国家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事实上首先是为大财政资本争夺新的经济和政治的利益范围的斗争服务的。

但是，布哈林走得太远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这个阶段上，已经克服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特别是认为，在这种有计划的资本主义下，交换价值本身也在消失，从而货币的性质本身也在发生变化^②。大危机极明显地否定了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在某些問

^① 《共产主义的ABC》，第91—92页。又见《帝国主义和世界經濟》，第133页。

^② 在論过渡时期的著作中，布哈林写道：“财政资本在资本主义大国中消除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过渡时期的經濟》，1922年汉堡德文版，第5页）消除无組織的商品制度来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过程，“改組财政资本的生产关系的过程，其发展方向

題上接近于社会民主党人关于有組織的資本主义的观点。但是，他們关于在有組織的資本主义制度下国家的作用的改良主义观点（即认为通过这种国家的作用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改革），布哈林从来没有贊同过。在他看来，最后引起战争災禍的帝国主义大国間的均势的破坏，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前提^③。

在过渡时期問題方面，布哈林是除了列宁以外几乎唯一认真研究过这个問題的理論家。他对这个問題的一系列观点，以及上面指出过的他的一般理論思想，后来在反布哈林的宣傳中曾受到尖銳的攻击，并且在許多方面被歪曲了。他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生产資料不屬於整个社会，“而是屬於无产阶级，屬於它的国家組織”^④。因而，在这个时期內还存在着阶级社会、統治阶级、这个阶级对生产資料的壟断、国家力量。然而，在資本主义阶级的反抗被打垮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将不通过任何革命而过渡到共产主义”^⑤。馬克思和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資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間的过渡时期。在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否认国家組織的观点和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民主观念的尖銳論战中，布哈林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存在一种新的、更广泛的和更深刻的民主。苏維埃和苏維埃政权就是这种新的民主的形式。“这种无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就在于把生产資料轉交給劳动者，并从而剝夺资产阶级的权力。在这种民主中，以前的被压迫群众和他們的組織变成了統治的机关……实行苏維埃式的民主，工人的組織不仅不会从政权中被排挤掉，而是相

是：取消商品市場，把貨幣变为数量单位，在一国範圍内有組織地安排生产，使整个‘国民經济’体制服从世界竞争的目的，即首先服从战争目的，以建立无所不包的国家資本主义的組織。”（同上书，第37頁）

③ 除了在上述著作中談到这些問題以外，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的經济》一书中特別說明了这个观点。

④ 《共产主义的ABC》，第69頁。

⑤ 同上书，第70頁。

反，它們成了这个政权的机关。”^①

这样，广大阶层的人民第一次参加政权，苏維埃政权实现着劳动人民在各个領域內的最广泛的自治，并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这种管理。为了保证这种組織和人民政权，和为了使它們充分发挥作用，主要的监督在农村中必須交給貧苦农民的組織，在工业中必須交給工人的組織及其机构。为了不至于仅仅停留在监督上，尤其是为了不至于在国有化企业中停留在监督上，布哈林根据列宁的观点，早在自己的《共产主义者綱領》一书中就写道：“这里很清楚，光靠监督是走不了多远的，不仅需要工人监督，而且需要工人对工业的管理，需要有工人組織、工厂委员会、工会、工人代表苏維埃的經濟委员会以及工农政权机构（各种专门委员会、国民經济委员会等）的管理。这是不仅进行监督，而且进行管理的組織。”^②

为了使某个工厂的工人不至于把工厂視为己有，为了使它們不至于开始相互竞争和在經济上損害对方，“在每个工厂中都必須有工人管理委员会，但是，工人管理委员会应当这样来組織：大多数成員不是由本厂工人担任，而是由該行业的工会、工人代表苏維埃以及区經济委员会所派的代表担任”^③。

布哈林也是早在1919年和列宁一同指出了苏維埃机关中官僚主义的加强以及由此而来的危險的那些人中間的一个。他认为，原因在于許多方面：城市而尤其是农村的发达程度不够和文化水平不高，管理工作的經驗不足；帶有旧的资产階級作風的专家和习惯势力；最优秀的人員已經参加军队和走上前綫。“所有这些情况都严重地妨碍着我們的工作，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官僚主义**在苏維埃机构内部有可能部分地**产生**。这对无产階級來說是一种巨大的危險。无产階級还没有彻底打碎旧的官僚国家，因为官僚国家又

① 《共产主义的ABC》，第162—163頁。

② 布哈林：《共产主义者綱領》，1919年柏林德文版，第54—55頁。

③ 同上书，第55頁。

从下面复活起来了。共产党必須提防这种危險。通过吸引群众本身就能做到这点。当然，最重要的是提高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文化程度，启发他們的觉悟和普及基本教育。除此而外，还必须采取一系列其他的措施。”^① 布哈林以党的名义建議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苏維埃的每个成員必須参加国家管理的工作；不断地更換他們的工作，使他們不至于官僚化；最后，“党主張毫无例外地逐渐吸引全体劳动居民参加国家管理，以此作为总的工作方向。这实际上是我们的政策的基础所在”^②。

鉴于过渡时期社会结构的改变，布哈林认为，首先“在无产階級国家政权和在无产階級的生产国有化的条件下，作为资产階級社会所特有的范疇的剩余价值的創造过程已不再存在”^③。創造剩余价值的过程正在变为創造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剩余产品的过程。

由于工人階級的各种組織（苏維埃、工会、党等）是政权的基础，于是就提出了它們和工人階級的国家組織，即和无产階級的苏維埃国家的关系問題。布哈林用国家主义的观点解决这个問題，从而和列宁的观点发生冲突。“工会国家化和无产階級的所有群众組織的实际国家化，是从改造过程本身的內在邏輯中引伸出来的。工人机构的最小的細胞必定变为总的組織过程的承担者，工人階級的集体智慧有計劃地引导它和领导它，而工人階級則从最高的和无所不包的組織，从自己的国家机关中得到物质上的体现。国家資本主义制度就是这样辯证地轉变为自己的对立面，轉变为工人社会主义的国家形式的。”^④

国家資本主义是在对抗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和在資本統治下实行的生产过程的国有化。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談不到国家

① 《共产主义的ABC》，第 183—184 頁。

② 同上书，第 184 頁。

③ 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經濟》，第 79 頁。

④ 同上书，第 86 頁。

資本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在原則上排斥国家資本主义。布哈林加上括号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专政，是对国家資本主义的辯证的否定^①。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經濟主体是无产阶级国家，集体地組織起来的工人阶级。这不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而是“作为有计划地滿足社会需要的手段”的生产过程^②。

因此，资产阶级的国有化导致国家資本主义制度，而“无产阶级的国有化則导致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③。

在这个改造过程中，各个基本的經濟范疇也发生变化。例如，商品正在失去商品的性质，而变成产品，因为有意識的社会調节者正在代替自发势力。又例如，“价值作为平衡中的資本主义商品制度的范疇，极少适用于过渡时期，因为在过渡时期中商品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消失，这里将不存在平衡”^④。同样，工人的工資成为一个沒有內容的假象的数量，因为在工人阶级是“統治阶级”的地方，“雇佣劳动将会消失。在社会化的生产中，不存在任何雇佣劳动”^⑤。

当人們指責布哈林說，在新經濟政策时期出現了很多和他的論断不一致的新东西时，他在1921年德文版的后記中回答說，这些批評家不懂得对問題的抽象研究和經驗现实之間的区别，抽象的研究从过程中、从对事物的“理想化的剖視中”說明事物，而經驗的现实則比抽象的說明要复杂得多得多。

然而，应当立即指出，布哈林的努力作为从理論上解釋极其复

① 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經濟》，第129—131頁。

② 同上书，第131頁。我們看見，斯大林在1952年宣布为社会主义的基本規律的东西，在这里已經被提出來了。另一段話說得更为明显：“在資本統治下，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为利潤而进行的生产。在无产阶级統治下，生产是为了滿足社会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同上书，第138頁）

③ 同上书，第136頁。

④ 同上书，第166頁。

⑤ 同上书，第167頁。

杂和困难的过渡时期問題的最初嘗試之一，不管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但是却有一个基本的缺点，就是他对一幅理想图画的情景的描繪，多于对现实过程的說明，而在现实过程中，旧制度的傳統和規律必然与新的結構和規律性交織在一起，而且，正是揭露所有这些矛盾、对立的趋势、困难、消极現象等等，对于理解和掌握这个复杂的过程具有更重大得多的意义。

从任何方面来看，布哈林虽然有过种种迷誤和理論上的缺点，他仍然是一位光輝的和有修养的人物；是一位独立大胆地分析了現代历史运动的基本的和困难的問題的馬克思主义者。还在列宁生前，布哈林就在民族問題上，和在苏維埃革命与苏維埃政权問題上同列宁发生了尖銳的冲突。布哈林代表激进的极左派，我們上面已經看到，列宁同样有根据地、尖銳地斥責过这一派人^①。

布哈林不止一次承认过自己的錯誤观点。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是这样一种类型的馬克思主义者：不仅依据馬克思主义中已經讲过的东西，而且也依据自己本身的分析。他是这样一种类型的馬克思主义者：不怕和非馬克思主义的理論思想进行不断的爭論，不怕承认非馬克思主义的理論思想过去和現在达到的积极成果。

在1926年和1927年期間，他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派的最积极的論敌之一，維護斯大林和他自己的关于照顧农民、关于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路綫（布哈林当时提出了众所周

^① 例如，布哈林在《共产主义者綱領》中写道：“这里說的不是民族（即工人和资产階級一起）的自决权，而是說的工人階級的权利，就是說，所謂民族意志對我們來說决不是神圣的东西……因此我們不談民族自决权，而只談每个民族的劳动階級分离的权利。”（《共产主义者綱領》，第97頁）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列宁正确地批判了这个观点，同样也不得不尖銳地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关于工会問題的国家主义观点。布哈林在《共产主义的ABC》一书中把自己关于工会的思想說得最清楚不过：“这样，工会和联合会同样必然会朝着变为国家力量的部分和机构的方向发展，即朝着它們‘国家化’的方向发展。”（《共产主义的ABC》，第281頁）

知的口号：发财吧！）。

在斯大林急剧地轉向以暴力实行集体化之后，布哈林和李可夫及托姆斯基成为反对派，被譴責为“右傾”（1929年），逐漸被撤銷領導職務，在对“托洛茨基总部”的审讯中受到尖銳指責，1937年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后被监禁并于1938年在制造出来的审讯后和阿·李可夫、格·雅戈达、尼·克列斯廷斯基、格·格林柯等人一同被枪决。

“机械論者”和“辩证論者”的斗争

布哈林的机械論观点并不是孤立的。相反地，在馬克思主义和一般理論思想的这个发展时期內交織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从最平凡的庸俗唯物主义（弗·恩茨門）和激烈地反对任何一切哲学的观点（奧·米宁），一直到极端的唯心主义^①。

但是，基本的理論斗争是在机械論者和圍繞哲学家阿·德波林的集团之間展开的。

尽管在机械論者（伊·斯捷潘諾夫、阿·克·季米里亚捷夫、弗·薩拉比楊諾夫、柳·阿克雪里罗得〔奥尔托多克斯〕）中間也有分歧，而且常常是截然相反的理解，但他們大部分人的观点在下列看法上是一致的：与专门科学相比較，哲学是一种神秘和煩瑣的东西；专门科学完全足以解决新的問題；机械的規律能够用来解釋自然界的各种运动。

^① 1922年，他們中間的許多人被解除了教授職務并被驅逐出境。其中有尼·別爾嘉也夫、恩·洛斯基、尔·卡尔薩文等人。特別应当提到，在1920年成立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該研究院在德·梁贊諾夫和后来的弗·維·阿多拉茨基的領導下出版了列宁的著作，并开始了众所周知的出版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的工作，这一工作一直还没有完成。在这次出版中，初次发表了有名的《經濟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态》和《自然辩证法》。关于苏联的哲学发展，到目前为止耶穌会教士古·韦特爾在《辩证唯物主义》一书（1953年弗萊堡德文版）中作了最完全的說明。自然，他对苏联的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評是从新托馬斯主义的立場出发的。

这些观点表明，对于现实的质的差别和不能把高級規律归結为低級規律这样一些极复杂的問題的理論考察的水平是低的。这种片面性常常表現在自然科学界的代表人物身上，他們醉心于自然科学，认为解决所有其他理論問題的一切基本前提也已經被发现了。他們认为，他們为了做到这点，并不需要任何哲学，事实上，正如恩格斯有一次指出过的那样，他們在自己的看法上陷入最庸俗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說，柳·阿克雪里罗得（奥尔托多克斯）在机械論者中間是突出的，她受过基础的哲学教育，她还在和新康德主义者及修正主义者的爭論中就已經出名了，那时她和普列汉諾夫一起捍卫辯证唯物主义。后来，阿克雪里罗得尖銳地攻击列宁关于反映的观点，同时維護普列汉諾夫的象形文字論。

圍繞着阿·德波林（1881年生）的一群馬克思主义者尖銳地反对了这些观点。属于这个集团的有尼·卡列夫、伊·斯騰、伊·波德沃洛茨基、斯·列維特、伊·魯波尔、勃·赫森等人。

德波林曾以自己的辯证唯物主义导論和反对新康德主义的斗争著称，革命后，他对辯证法，特别是黑格尔的辯证法进行了仔細的研究^①。而恩格斯的《自然辯证法》的发表（1925年），以及1929年列宁的哲学筆記的发表，对德波林及其拥护者也有帮助，因为从这些著作中可以找到經典作者本身的令人滿意的論断：黑格尔的哲学对于理解和研究馬克思主义和整个辯证法，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德波林关于辯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念包含在这样的一个观点中，即认为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三部分：“作为一般科学的方法論（本身也包括認識論）的唯物辯证法；作为自然科学方法論的自然辯证法（自然科学史的唯物主义）以及**历史辯证法（历史唯物主**

^① 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有：《辯证唯物主义哲学导論》（1915年），《思想家的列宁》（1924年），《哲学和馬克思主义》（1926年）和《辯证法和自然科学》（1929年）。

义)”^①。

他可以从恩格斯那里为自己的观点找到某种证实，因为恩格斯研究过自然辩证法。但是，这种想法和恩格斯关于哲学是辩证法和逻辑学的观点不同，而且实际上是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把黑格尔在《哲学全书》中所提出的哲学概念倒置过来。可见，无论如何，德波林还没有摆脱极力主张这样解决哲学对象的黑格尔的范畴公式。

实际上，德波林把哲学的对象归结为一般的方法论。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在提出辩证法是包括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普遍方法时，作出结论说：“这样，辩证法是一种普遍的方法论。作为一门专门科学，哲学的内容和对象基本上归结为方法论。作为普遍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必须渗透到各门具体的经验科学中去，因为它可以说是一种把内在联系加入到具体内容中去的代数学。”^②

在这里，德波林追随了恩格斯的某些受到当时的方法论的偏见和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的思想。很清楚，这样就缩小了哲学的范围和意义，这种情况在斯大林主义下达到了可笑的地步。

然而，德波林对机械论者的批评是有理由的，它是对整个问题的更深刻得多的考察和以唯物辩证法的某些基本原则为依据的。在现实的各个领域的关系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德波林派指出了关于量和质的关系的基本辩证规律，这个规律对问题作了回答。

在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方面，德波林特别坚持研究作为

① 德波林：《辩证法和自然科学》，1929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23页。这本书是他的论文集，上述思想见《唯物辩证法和自然科学》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杂志1925年第5期上。

② 同上书，第31页。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同样写道：“这样，目前哲学归结为方法论、辩证法，它在‘现实科学’中起着，或者确切些说，应当起领导作用。”（同上书，第55页）

方法論的辯证法，因而对他說来，黑格尔是在哲学方面值得重視和研究的中心人物。

在这里要作一番有趣的比較。在同一个時間里，卢卡奇也从黑格尔和馬克思的立場出发，接触到和分析了社会意識及其和階級与經濟結構的关系的問題，分析了物化和其他对于現代的人及其实际解放的問題、对于新人道主义的观念具有决定性的現象。

卢卡奇的努力屬於对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价值的貢獻，恰恰遭到也是从黑格尔和馬克思的立場出发的德波林（以及其他許多人）的尖銳攻击，被說成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这种努力所采取的激烈的否定态度。这同时說明，德波林的观念（它实际上后来在很多方面也成為官方的观念）怎样在自己的特殊的情况下，导致对人及其历史，从而也对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采取的实证主义的看法，而馬克思主义哲学和任何偉大的哲学一样，不仅应当是自己的时代的表現，而且也应当是时代的批評者^①。

1929年左右，德波林派在所有基本問題上都取得了胜利，并且占据了学院中的所有重要位置。尽管討論和爭論的方向具有片面性，尽管苏联的馬克思主义者当时在解决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决不是一切）基本問題时，并没有看到和感觉到馬克思主义和現代史的其他某些根本性的問題，但是馬克思主义思想在苏联的这个发展时期無論如何是一个最富有成果的时期。主要的优点在于广泛的討論自由，这必然会有助于許多哲学和社会問題的解决。

然而，德波林集团胜利的頂峰同时也就是它衰落的起点。社

^① 德波林在《乔治·卢卡奇及其对馬克思主义的批評》一文中提出了这个批評，这篇文章发表于《在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1924年第6期，后来又收入《哲学和馬克思主义》一书（192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德波林从自己的狹隘的正統立場出发，认为卢卡奇的书是对馬克思主义的批評，因而除了若干正确的批評意見之外，这表明他根本没有站在卢卡奇的努力的水平上，他没有了解卢卡奇的許多分析的意图。

会环境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在这个时期已經起了剧烈的变化。

国家化的过程（后面还要談到这一点）具有了越来越大的規模。托洛茨基派別和布哈林派別已被战胜，斯大林的政治軌道朝着自己的极端运行。标准开始改变了。在列宁主义的名义下，党性原則成了整个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而这时要求把这个原則理解为无条件地服从政治领导中心，把理論和实践的統一理解为对每一个政治步驟、对国家政策的每一个行动进行辯护，进行理論上的論证。

从这个过程的角度来看，德波林集团被評价为无党性的、不革命的而归根到底是非馬克思主义的，这是合乎邏輯的事情。过分提倡黑格尔和抽象地談問題，被认为是严重的消极現象。把普列汉諾夫提为理論家，馬上便会成为党性上和理論上的严重罪行。至于在德波林派眼中，实行整个这种轉变的主要人物——斯大林根本不算是理論人物，尤其不算是哲学家，这种态度就更不用說了。

理論領域的这种轉变是和政治領域的轉变完全一致的。1929年，在托洛茨基主义失敗和斯大林在經濟政策中、特别是在农村政策中实行轉变之后，也就是在布哈林的观点也遭到失敗之后，斯大林的观点便成了唯一的官方观点。在斯大林的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握有无上权力的政治統治（它已經有强大的、集中的党政官僚集团作为基础）必須以同样来源的理論上和思想上的統治为其附屬物。

斯大林对思想領域的这种統治和开始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整个理論思想的指揮，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候，当时他在1929年，即“大轉变”的一年的12月27日举行的馬克思主义者土地問題专家代表會議上曾說：“但是，如果說我們有理由以社会主义建設方面的**实际**工作成就自豪，那末关于我們在一般經濟方面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的**理論**工作成就就不能这样說了。而且应当承认，我們的理論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成就，我們的实际工作成就和理論思想的发

展之間有些脫节。但是，理論工作不仅必須赶上实际工作，而且要超过实际工作，武装我們的实际工作者去爭取社会主义的胜利。”^①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信号和支持。在这种形势下，随时可以找到这样的人物，他們以虛假的理論上的革命性来弥补自己在理論上的平庸。而这种革命性无非表現在：接受政治标准并把它运用于科学和哲学中，承认自己本身还够不上当一个理論上的裁决者，把政治机构偶像化，从而使它取得一切必需的进行絕對裁决的特权。

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人首先是米丁、尤金和拉利切維奇，他們在1930年6月7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論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新任务》一文，在文章中攻击了这两个集团，并把德波林派称为“形式主义者”。德波林派对此作了尖銳的回答。討論在相互攻击中进行。当德波林批評了提出和解决問題的低下水平，批評了硬要提出一些“小問題”（例如普列汉諾夫和列宁誰是更大的哲学家）的做法，当哲学工作者期待着更重要得多的問題等等的时候，尤金和米丁却越来越多地譴責德波林派脫离了党所提出的迫切問題。

米丁集团对德波林派的所有主要責难，基本上可以归結为一个基本的論点：他們不承认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列宁阶段，使哲学脫离政治，即不去研究党和国家的当前政策的具体任务。

在这个爭論中，米丁批評德波林过高地把普列汉諾夫估价为理論家，他在《真理报》上指出，德波林派的基本缺点在于：“偏重邏輯的东西胜于历史的东西，偏重抽象的东西胜于具体的东西（不是

^① 《論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問題》。《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6頁。斯大林早在1929年4月，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就曾尖銳地批評过布哈林的“右傾”，而在論土地政策問題的演說中，他已經完全从政治上来分析布哈林的平衡論：“不难了解，从客观上說，这种理論的目的是要保持个体农民經濟的障地，用‘新的’理論武器把富农分子武装起来反对集体农庄，破坏集体农庄的障地。”（《論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問題》。《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8頁）

經驗的具体的东西，而是辯证的具体的东西)，使辯证法和它的应用脫节，使哲学和政治脫节”^①。

当时，以及 1930 年 10 月 20 日在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會議上的討論中，米丁等人仍然把德波林派称为形式主义者。米丁在討論会上的发言中更詳細地論证了上面基本上已經指出过的責难：形式主义，抽象地解决問題（这在米丁看来就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党的报刊上提出的責难抱着滿不在乎的态度，低估了列宁作为哲学家的意义，不承认錯誤，理論脫离实践。这已經到了这样一个时期，这时斯大林成了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主要理論家，从而也成了第四个經典作家^②。

但是，在政治領導看来，米丁集团的党性仍然不够。对于每一个哲学和思想現象，必須找出它的直接的政治根源和阶级根源。在評价任何一个思想观点时对党性的新的理解的意义就在于此。因此，1930 年 12 月 9 日斯大林在紅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會議上，不仅支持了米丁及其追隨者的观点，不仅支持了对他个人所作的辯护，而且同时还責备了他們的溫情主义，并把德波林派称为“孟什維克式的唯心主义者”。

既然机械論者在这种政治評价中变成了“右傾”的代表，并且最終成了党內的“富农代理人”，哲学斗争这样也就具有了明显的政治方向。正如政治在两条战綫上进攻一样，也要求思想意識在两条战綫上展开进攻。

凡是在理論上不同意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特点和发展的看法和估价的人，都被归入这一方或那一方。在政治經濟学方面有魯

^① 米丁：《切实研究列宁的哲学遺產》，《真理报》1930 年 8 月 8—9 日。引自米丁：《唯物辯证法的战斗性問題》，1936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15 頁。

^② 米丁在自己的发言中明确地指出：“在談到共产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时，我們首先指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我們在哲学上的意見分歧》。《唯物辯证法的战斗性問題》，第 25 頁）

宾、索柯里尼柯夫等人，在政治和哲学方面有布哈林、德波林，所有那些和领导上的新观念唱着不同調子的人，都不仅在理論上，而且同时也在政治上被剝夺了資格。

最后，1931年1月25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有关德波林派所领导的《在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決議，这同时意味着对这个集团的最后政治判決。中央委员会基本上从已經說过的各方面譴責了德波林及其集团，同时向新的編輯部提出任务：“《在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应当成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性的刊物，应当为党的总路綫和反对任何脫离党的总路綫的現象而进行坚决的斗争，从而在自己的整个工作中彻底地执行列宁的哲学的党性原則。在哲学領域內，杂志应当在两条战綫上进行毫不让步的斗争：反对机械論对馬克思主义的修正，这是現今时期的主要危險，同样也要反对以唯心主义的观点对馬克思主义所作的歪曲，这是德波林、卡列夫、斯騰等同志的集团的錯誤。《在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最重要的任务，应当是真正执行列宁所提出的綱領，研究辯证唯物主义的列宁的发展阶段，无情地批判哲学中、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一切反馬克思主义的，从而也是反列宁主义的派別，不管这些派別在怎样的假面具下出現。”^①

此后，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論活动在于寻找一切可能脫离列宁主义，即脫离基本上为斯大林所解釋的那种列宁主义的現象。米丁在共产主义学院的討論中，在对阿克雪里罗得論黑格尔和論馬克思的唯物辯证法一书进行批評时，在論斯大林和唯物辯证法的辯护文章等等中就这样做了^②。同样，姆·謝列克托尔写了一本

^①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決議(1931年1月25日)》，見韦特尔《辯证唯物主义》一书附录，第593—594頁。

^② 《哲学討論总结》(1931年1月1日)，《斯大林和唯物辯证法》(1933年)和《阿克雪里罗得著〈黑格尔的唯心辯证法和馬克思的唯物辯证法〉》(1934年)，同其他文章一起收入《唯物辯证法的战斗性問題》文集(1936年)。

以尖銳的党性原則批判布哈林的平衡論的书，他把官方对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提法也用到布哈林及其拥护者的头上^①。

这样，我們实际上就进入了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迟早也要在第三国际的政策和活动中被沉重地感觉到。这第二个时期同斯大林及其关于社会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它在苏联的馬克思主义发展中也留下了深远的后果。米丁和他的志同道合者确实在某些問題上提出了比較正确的評价。但是不應該忘記，德波林集团已經对机械論作了十分深入細致的批評，而且从他們的理論目的来看，他們对哲学和一般理論的任务理解得也更为正确。

因此，除了某些可以接受的因素，如強調列宁的哲学遺產的主張以外，所有其他的批評意見实际上預示了哲学和理論的，从而也是馬克思主义的新观念。而这个新观念則是国内的社会变化和当时已經开始的对社会生活的国家主义壟断的相应表現。正如整个經濟运动和政治运动的一切細節都是党和国家机构的活動范围一样，按照斯大林的思想，社会生活的所有其他部分也应当如此。把哲学和整个馬克思主义与政治联系起来，实际上就意味着把馬克思主义变成为替日常政策作辯护的理論。

在馬克思主义問題上，这就是說，在几乎整个理論（哲学、社会

^① 例如，他在这本书中正确地批評了平衡的观点，但同时又力图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贬低布哈林作为馬克思主义者的声誉，他強調考茨基也宣揚过这种理論，在談到考茨基时他这样写道：“这种理論貫穿在他的两卷本的《唯物史观》一书中，貫穿在社会法西斯主义和社会叛徒的这本聖經中”（姆·謝列克托尔：《辯证唯物主义和平衡論》，1934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3頁）。仅仅因为布哈林沒有同意以暴力实行集体化，他就給布哈林下了結論：“平衡論本身否定同資本主义因素的斗争，否定国家工业化，否定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它捍衛資本主义的陣地。它是右傾机会主义观点的思想基础，这种机会主义向富农—資本主义成分投降，它会破坏社会主义建設和在我国恢复資本主义，这样它就表明自己在客观上是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同上书，第268頁）。

学、政治經济学理論和艺术理論等)問題上,最高的裁決者不再是馬克思主义本身,即不再是发展着馬克思主义的科学干部,而是政治上最高的一級。这是政治統治理論的过程的开始,是把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具有其他任何“思想体系”的全部神秘主义特点的“思想体系”的开始。

馬克思主义在苏联以及在其他处于苏联的直接影响下的国家和党內的整个进一步的发展,仅仅证明了馬克思主义在这种观念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形。

列甫·达·勃朗施坦·托洛茨基(1879—1940)

列甫·达·勃朗施坦·托洛茨基是企图反对这种官僚主义化的現象和在政治与理論方面具有广泛的国际意义的最卓越的人物。

和許多有才华的俄国知識分子一样,他很早就接近了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他是一个极其光輝的人物,出色的演說家,是那个革命时期的典型的政治人物。托洛茨基具有表現得特別明显的自信的特点,他企图在孟什維克和布尔什維克的尖銳对立中起着超乎这两个派別之上的中介作用,同时又是独立的作用,而且也搖摆于这两个派別之間。在俄国第一次革命(1905年)中,他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来在俄国1917年的决定性的日子里,托洛茨基也表現了自己的勇敢和无畏精神。在这个时期以前,他多次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反列宁主义派別,因此列宁常常尖銳地批評过他^①。

^① 列宁在1914年对托洛茨基下了极其尖銳的断語：“在1901—1903年間,托洛茨基是个激烈的‘火星派分子’,所以梁贊諾夫把他在1903年代表大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称为‘列宁的棍子’。1903年底,托洛茨基成了一个激烈的孟什維克,就是說,他从火星派方面跑到‘經济派’方面去了;他宣称:‘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間橫着一道鴻沟。’在1904—1905年間,他离开孟什維克而采取了动搖的立場,时而同馬尔丁諾夫(“經济派”)合作,时而标榜荒唐的左的‘不断革命’。在1906—1907年間,他接近布尔

但是，1917年他完全走到布尔什維克这一边，成了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他作为外交人民委員和国内战争中紅軍的組織者，在苏維埃政权中执行极为負責的职务，这样他也就成为和列宁同时的俄国革命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虽然在所有那些最后证明了列宁路綫的正确性的事件之后，托洛茨基承认了列宁在理論上和政治上的最高权力，甚至把列宁看成是自己的导师，但是，他对于某些事件和問題也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在这个时期也和列宁的观点发生过冲突^②。

什維克，而到1907年春天又自称和罗莎·卢森堡見解相同。

在瓦解时代，他經過长久的‘非派別性的’动摇之后，又向右轉了，在1912年8月同取消派結成了联盟。現在，他又离开了取消派，但实际上还是在重复着取消派的所謂思想。这种典型带有过去历史阶段和历史形态渣滓的特色，在过去俄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还处于沉眠状态，任何一个小集团都可以‘自由地’自命为派別、集团、派別組織，一句話，自命为可以談論同他人联合的‘强国’。”（《論高喊統一而实則破坏統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6—347頁）

这无论如何也沒有妨碍列宁在1917年把这样一个能干的馬克思主义人材吸收到中央委员会里面去，把当时极为負責的职务托付給他，并对他和他的能力作了最好的評价。在列宁的所謂“遺囑”中对托洛茨基所作的高度的評价，是尽人皆知的。高尔基在和列宁談話时的感受也是有趣的，当时在說到托洛茨基和有关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关系的各种“閑話”时，列宁对高尔基說：“……閑話很多，特别是关于我和托洛茨基的閑話很多”。

他用手敲着桌子說道：“請給我再指出这样一个人来，他能在一年之間組織起一支几乎是模范的軍隊，并且博得軍事专家的尊敬。我們有这样的人！我們有着一切！奇迹也将会发生！”（馬·高尔基：《同时代人的回忆》，1928年柏林德文版，第277頁）后来的俄文版把这一段話刪掉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如整个地伪造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等人在革命中的作用以及伪造了一系列其他的历史事实一样。

② 后来，托洛茨基在自傳中这样來說明列宁以及他和列宁的关系：“我自己曾意識到列宁对革命、对历史和我个人的意义。他是我的导师。这并不是說，我事后去重复了他的言論和行为。但是我向他学会了独立地作出他經常会得出的那种結論。”（列甫·托洛茨基：《自傳》，1930年柏林德文版，第379頁）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写道：“的确，列宁是一个天才，他具有完美的人的天才。”（同上书，第444頁）在把馬克思和列宁作比較时，托洛茨基表达了关于他們两人的这样一个思想：“馬克思和列宁在历史上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如此的不同，对我來說，他們是人类精神力量的两个最高峰”（同上书，第494頁）。

第一次是在有关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問題的決定性的形势下發生的，当时他在列宁和极左派的观点进行的尖銳論战中提出了不和不战的口号。

無論托洛茨基的想法，或者极左派（布哈林及其他人）的想法都不是偶然的，也不仅仅是当前时期的反映。布尔什維克基本上全都指望，俄国的革命事件会在其他某些国家中引起革命的震蕩，这样，俄国将不会在发达的資本主义内部处于孤立的地位。

托洛茨基的态度同时也是和他以前就提出过的“不断革命”观点联系着的，这个观点是他在1905年俄国革命后立刻就提出来的，因此他才这样出名。在論俄国革命的成就和前途的著作中^①，托洛茨基认为俄国将比发达的欧洲更早地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列宁当时就已经正确地批評过这种观点，认为它看不见事件的正常发展进程和跳过了整整一个阶段——資產階級革命。像馬克思一样，列宁也贊成不断革命，但仅仅是从这样一种意义上說的：尽量加速資產階級革命的 normal 发展并把它引向无产階級革命阶段，同时不要忽視俄国农民的革命性。

在这部著作中，托洛茨基也坚持过这样的想法，即落后的俄国的革命高漲将引起其他国家的革命，也就是說，俄国革命将成为国际性的革命。換句話說，社会主义只有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才能取得胜利，而在比較发达的国家中革命来迟了的情况下，落后的俄国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經濟基础单薄和文化水平低下而必定会失敗或者变质。托洛茨基在革命以后基本上也坚持这个观点。他在1922年为《1905年》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回顾了自己以往的思想，他认为，在落后的俄国，胜利了的无产階級不仅会和一切資產階級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絕大多数的落后国家中，工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的总结和前途》，1906年。

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当俄国革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而打破资产阶级民主所强加于它的狭窄界限时，胜利的无产阶级就会被迫同样打破民族的界限，这就是说，必须有意識地努力使俄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序幕”^①。

托洛茨基这个时期的基本思想在于，他认为个别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依赖国际的经济关系和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当大部分发达国家中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政权的时候，国际的经济关系和发展将会妨碍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因此，在托洛茨基看来，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协议将会在某种较小的范围内带来好处，但是只有当无产阶级在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中取得胜利后，才能期待社会主义在俄国的真正的高涨和发展。

因此，对于托洛茨基说来，并不是说不需要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本身。恰好相反，托洛茨基是最早主张尽快过渡到实行工业化和计划化的人们中的一个，为此，斯大林集团曾批评他，说他赞成“超工业化”，虽然过了两年之后（1929年），这个集团却开始实现更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事实上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发展，个别的国家能否彻底建成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托洛茨基，后来还有当初曾是他在政治局中的激烈反对者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坚决地否定了这种可能性，甚至把它宣布为反动的空想。托洛茨基后来也多次重复谈到过这个问题。他在俄国革命史一书的附录中，曾这样明确地谈到上述观点：“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组织有计划的和和谐的社会生产。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还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它的法律上的前提。不应该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和生产力问题分开，生

^① 托洛茨基：《1905年》，1923年巴黎法文版，第4页。

产力問題在人类发展的目前阶段上实质上是一个世界性的問題。个別的国家对資本主义說来已經过于狹小了，更不能成为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場所。一个革命国家的落后性对于这个国家說来同时也在增加它被拋回到資本主义去的危險性。”^①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他才在論不断革命的著作中作出結論說：“希望在本国的範圍內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意味着，尽管有暫时的成就，但是会把生产力拉回到甚至比資本主义更落后的地步。想在本国的範圍內建立由所有一切經濟部門組成的和諧的和完整的体系，而不考虑作为世界整体的組成部分的这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文化条件，那是反动的空想。”^②

此外，从这部著作以及他的早期著作中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并不是认为在一个像俄国那样落后的孤立的国家內，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是不可能的，而是认为，在任何一个孤立的个別的国家內，如果没有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是不可能的^③。

也就是說，在托洛茨基看来，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的經濟建設，不管其本身多么有意义和多么重要，它必然是有限的和矛盾的，并且不可能——用他的話來說——达到和諧社会、即共产主义（用当时的術語來說是社会主义）的頂峰。还有一次在总结他的观念的各个阶段时，托洛茨基在三十年代初重新作出結論說：“我和以前一样认为，当我国的革命具有国际的性质的时候，它就可能而

① 托洛茨基：《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俄国革命史》第2卷，1933年柏林德文版，第690頁。

②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1932年巴黎法文版，第11頁。

③ 例如，在同一著作中在談到印度和英国时写道：“印度的解放运动的成就推动着英国和欧洲的某种革命运动。不管在印度，还是在英国，都不可能建成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两个国家必然将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部分。只有这点才构成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牢固基础。”（同上书，第15頁）

且必定会导致社会主义。”^①

在1929年为关于不断革命一书写序言中也說：“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内开始，但它不能停留在这个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利用暫时的制度，才能在一国内維持下去，虽然这种制度甚至也会延續相当长的時間，如像苏联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然而，在存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必然会以和成就相同的速度增加起来。如果无产阶级国家以后依然是孤立的，那它最終将作为这些矛盾的牺牲品而遭到失敗。它只有从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胜利中才能得到拯救。从这个观点来看，民族的革命不是目的本身；它仅仅是国际鏈条中的一环。国际革命尽管有暫时的退却和挫折，但却是一个不断的过程。”^②

与这种观念相对立，斯大林提出了另一种关于可能在一个国家内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观念。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1924年12月）中，他尖銳地批評了托洛茨基的观点，說这种观点不仅不相信农民运动的能力，而且也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和能力，同时并提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思想来反对这种观点。

斯大林在这篇文章中的說法是这样的：“沒有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国家内的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就不可能，这个論点是对的；同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給予其余各国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帮助愈切实，世界革命的发展就愈迅速愈彻底，这个論点也是对的。”^③

在爭論的这个阶段上，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与加米涅夫結成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联盟，在捍卫列宁原則的基础上力图把托

① 托洛茨基：《关于“不断革命”論問題的历史資料》。《俄国革命史》第2卷，第709頁。

②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第36—37頁。

③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6頁。

洛茨基貶低为孟什維克和反列宁主义者^①。在这些事件之后不久，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就結成反对派尖銳地反对斯大林和他的关于一个国家内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斯大林由于不滿意自己的上述提法，所以在《論列宁主义的几个問題》的小册子(1926年1月)中更詳細地解說了这种提法，同时把批評指向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而把托洛茨基放在一边，这是由于他从策略上打算尽量推迟托洛茨基和前两人之間的联合。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在說明《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的以前的提法的缺点时指出：“缺点就在于它把两个不同的問題連接成一個問題：第一个是可能用一个国家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問題，——对于這個問題应当給以肯定的回答；另一个是无产階級专政的国家是否可以认为它无须革命在其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就有免除外国武装干涉、因而免除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的問題，——对于這個問題应当給以否定的回答。我且不談这种說法会引起一种想法，以为用一个国家的力量組織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当然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②

这样，在列宁逝世以后，立刻就在关于在一个孤立的国家中是否可能最后建成社会主义的問題上发生了尖銳的理論冲突，这个冲突实际上具有更深刻的而且并非是理論上的背景。首先，托洛茨基通过批評党的机构和官僚主义，以及要求党内生活实行更大程度的民主化，反对了当时担任领导的三个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实质上就在他們三人之間也有领导的首位問題：

^① “托洛茨基的理論和孟什維主义的沒有无产階級革命‘在西欧几个主要国家内’預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国而且还是在落后的一国内就不可能胜利的这个普通的理論有什么区别呢？实质上是毫无区别的。这是不容置疑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論是变相的孟什維主义。”《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8頁）

^② 《論列宁主义的几个問題》。《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1頁。这个提法被采納为第十四次党代表會議《論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任务》的決議的基础，这个決議接受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解釋。

他們之中的每个人都自命为列宁的政策和思想的最合法和最当然的继承者。

唯有这些原因才能說明，为什么在圍繞一个国家内的社会主义問題这样一个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是經院式的問題的爭論中，会表现出政治上的不耐心和偏頗^①。首先，無論从哪一方來說，整个爭論都不能以特別高的水平来自夸。托洛茨基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关于在一个孤立的国家中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不可能得到比較重大的发展等等的論据，和斯大林的論据（这主要是引证列宁的話和相信无产階級与农民的力量）一样，都是不充分的^②。

正因为如此，無論第一种观点，或者第二种观点都不是什么理論，而是最一般的想法和假設。在一个稍微比較協調的馬克思主义的領導中，当国家面临着具体的和非常困难的任务时，这些想法上的分歧决不應該成为内部分裂和丧失宝贵的精力和時間的理由。这些提法必然只能是假設：因为不可能預見，将来的階級冲突，以及帝国主义本身内部的尖銳的矛盾和搏战将在什么时候到来；因为不可能預見，这些冲突将具有怎样的性质和后果；因为不可能預見，在这种并非一帆風順的历史发展中，为了提高国家的經济技术

① 我的任务并不是要在本书中說明个别事件发展中的所有一切历史的和人物的情况，但是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如果讀一下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其他人当时和后来的著作，以及某些比較詳細的专著如伊薩克·多伊彻尔写的《斯大林》一书（1953年巴黎法文版），就会完全合乎邏輯地得出这些結論。

② 必須強調指出，列宁从来没有这样考慮問題：在一个孤立的和落后的国家中是否能够彻底建成社会主义即进入共产主义。作为一个眼光深刻的理論家和政治家，列宁清楚地看到，由于資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必然首先在几个甚至单独一國中獲得胜利。他同样了解，如果这个国家仍然是孤立的，那末它将面临从事困难的和責任重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以及帮助全世界的革命运动的任务。列宁同样有根据地希望，俄国不可能长期是孤立的，因为国际上的搏斗必然会导致其他国家中的革命变革。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忽略另外一点，同样也是錯誤的，那就是：将来只要有一个发达国家的无产階級革命取得胜利，就很可能发生一个大变化，那时，俄国在‘苏維埃’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上來說，很快就会又变成为落后的国家，而不再是模范的国家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頁）（“发达国家”，列宁原书中为“先进国家”。——譯者注）

水平和文化水平以便能消除階級的分工，需要多長時間；除此以外，同樣也不可能預見，科學、軍事技術的發展具有怎樣的性質，維持龐大的軍隊可能還是不可能，而龐大的軍隊本身就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沉重負擔，等等。僅僅這些理由就足以說明這次爭論的煩瑣性質，以及其中任何一種提法的非科學的性質。

斯大林的观点还有另外一个基础（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談到）：对社会主义抱有极不充分的和行政官僚主义式的看法，这就使他还在三十年代末就宣布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已經建成。

然而，这次爭論尽管具有这样的价值，但事实上由于党内冲突和国内的整个形势，它給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后果。托洛茨基虽然自命为列宁主义者，并且关心在国内尽快和尽量有效地建設社会主义，但他的观点使它的队伍发生不和，使对本国的力量和劳动群众的能力发生怀疑。斯大林的批評不是根据个人的想法，而是根据列宁的严密的思想，斯大林不是作为对列宁有某些理論上的保留的独立的人物，而是作为正統的学生、列宁主义的捍卫者发表意見的，所以他以自己的关于用独立的力量也可能建設共产主义的观点，給世界上第一支建設社会主义的队伍带来信心、勇气和自豪。从具体历史观点来看，斯大林的論点有更大的份量，它是一般人的感情和思想更易于接受的，它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滿足革命胆略的极其重大的利益，因而在苏联社会主义的这个发展时期起了比較积极的作用。

这样，托洛茨基就在一場重要的搏战中失敗了。斯大林在党的領導中的地位巩固了，而且很快就成了一个龐大的党和国家的机器的握有无上权力的統治者。在同一时期內三人領導也分裂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参加了反对派。

除了在党内民主制問題上的尖銳分歧以外（当时托洛茨基仍然认为派別組織是合理的），基本的冲突发生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发展方向的看法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当时

就已經主張实行国家工业化、反对富农和为了工业化而增加向农民征收的稅收的比較激烈的方針，而斯大林則基本上贊成布哈林关于依靠农民群众，爭取更穩健的步驟等等的論点，可是在两年之后，在消灭了“左傾”反对派之后，却轉而实行了更激烈的集体化，消灭富农和实行緊張的工业化^①。

斗争是尖銳的，反对派組織了公开的和秘密的討論，在庆祝革命节时(1927年)并举行了单独的游行。

整个这个內部斗争，以1927年托洛茨基和参加了他的反对派的季諾維也夫与加米涅夫被开除出党而告結束。托洛茨基被赶到阿拉木图，而在1929年并被驅逐出苏联国境。

托洛茨基在一生的这个最后的时期內，在各国居住过并困难地爭取避难权，他展开了大規模的主要是历史性的写作活动。他首先写了自傳，然后写了关于不断革命、关于俄国革命等著作。

在論不断革命的书中，他在結尾部分以提綱的形式作了扼要的說明，从这里可以最明显地看出托洛茨基当时对这个問題的观点。他的主要論点如下：

落后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能解决自己的民主的和民族的任务。

在反对本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和农民必須結

^① 不需要依据托洛茨基对这次冲突所作的解釋。在斯大林本人的著作中就有足够的证明。起先，斯大林和布哈林把托洛茨基的工业化計劃称为“超工业化”的冒險計劃，他們摒棄了这个計劃，理由是当时在1927年还没有出現能够对富农进攻和依靠集体农庄的成熟的形势。“在1926年至1927年期間，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曾拚命强迫党采取立刻向富农进攻的政策。党没有采取这种危险的冒險行动，因为党知道，严肃的人是不能允許自己以进攻为儿戏的。……”（《論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問題》。《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7—148頁）我們的任务不是来研究斯大林的論据是否正确，以及两年后形势是否已經成熟到可以对富农展开更激烈的攻势和实行更緊張得多的工业化。我們只想強調指出，托洛茨基所主張的并不是一种使资本主义复辟的反社会主义的政策，而是一种完全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当时遭到了失敗，但两年后却被官方接受为唯一正确的观点。

成联盟。如果没有組織在共产党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这个联盟是不可理解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只能理解为引导农民群众的无产阶级的专政”^①。所以，国际把东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非馬克思主义的和反动的。

夺取政权仅仅是开始。只有在國內和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建設才是可以理解的。“当世界舞台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决定性的統治的时候，这个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内部的国内战争和外部的革命战争的残酷爆发。”^②

社会主义革命在本国范围内是不可能完成的。它在本国的土壤上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展，在世界舞台上完成。

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最广泛的意义上的不断革命：“它只能以新社会在我们的整个星球上的最后胜利而告结束。”^③

托洛茨基在自己的提綱中接着又说，这种理論遭到关于在单独一个国家内的社会主义的理論的反对。从上面說过的政治和經濟环境来看，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建設独立門戶的和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是不可能的。

这些就是托洛茨基当时关于不断革命，并且发表在同名的书中的基本論点。

然而，从理論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他的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发展問題的著作。作为斯大林和社会主义的这种发展方式的頑强的反对者，托洛茨基严密地注視国内发生的事件，在以暴力实行的集体化的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計劃以后，他写了一本分析苏維埃社会制度的书，而在第一批众所周知的审讯之后又写了第二本书。

①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法文版，第 209 頁。

② 同上书，第 211 頁。

③ 同上。

三十年代中期是以苏联国内实践上的和理論上的矛盾的积累为标志的。一方面庄严地宣布社会主义已經胜利，另一方面則又声明階級斗争尖銳化和制造了人所共知的审讯。与这种关于社会主义建設已經完成的官方理論相反，托洛茨基的分析最后得出了不同的結論。

托洛茨基的基本論点是：不應該把斯大林的苏維埃制度称为社会主义，而應該把它称为由一个脱离人民的等級占統治的官僚主义和国家主义。

托洛茨基认为，党发生蜕化、从而国家发生蜕化的前提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欧洲和亚洲革命的失敗，这就使苏联的国际环境恶化了。首先是德国无产阶级的失敗(1923年)，然后是1927年蔣介石对中国革命的打击（共产国际簡直是把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交給这位將軍去摆布）^①，都促使国内的官僚主义分子加强了，他們依靠疲憊的群众，把反对派的不断革命論說成是准备新的革命战争、別有用心的企图等等。

他认为，官僚主义的机构以斯大林为补充，而他也以这种机构为补充，在斯大林这个人身上体现了俄国革命的官僚主义式的特米多尔。

“这个制度的奠基人认为，一切社会职能只能由公民来执行，而不要統治所有公民的职业官僚”^②，可是这里却发展了一个龐大的官僚机构，它成了也对工人階級进行統治的政权。馬克思主义的創始人和列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坚决认为无产阶级国家應該消亡，从而使政权真正轉到劳动者的手中，可是这里我們却看到一个完全相反的过程。“在列宁看来，在剝夺了剝夺者之后，国家就立刻开始消亡，即在新制度开始解决自己的經濟和文化任务之前，

① 托洛茨基：《革命被出卖了》第1卷，1937年巴黎法文版，第109—111頁。

② 托洛茨基：《革命被出卖了》第2卷（《斯大林的罪行》），1937年巴黎法文版，第58頁。

就开始消亡。在实现这些任务方面所获得的每一个成就，都意味着国家重新溶合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这种重新溶合的程度，是社会主义建設的深度和效果的最好的标志。”^①

由于国家和貨幣在共产主义社会下将要消失，“因此，它們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就应当开始逐渐消亡。只有当国家多半不再是国家，当貨幣开始失去它那神奇般的力量和历史时刻到来的时候，才談得到社会主义的现实的胜利。这就是說，社会主义在摆脱資本主义的偶像时，将在人們之間开始建立一种更純洁、更自由和更公正的关系”^②。

在托洛茨基看来，这些观点与苏联的现实发展和理論有着重大的矛盾，在这个国家里实际上形成了对官僚国家的崇拜，这个国家根本不打算消亡。无论我們对苏維埃国家的性质作怎样的說明，有一点是不能怀疑的：“在苏維埃国家的第二十一年末尾，它还远沒有‘消亡’，而且也沒有开始‘消亡’；更坏的是，它成了史无前例的暴力机关；官僚势力远沒有消失，它成了統治群众的、不受监督的力量；军队远沒有被武装起来的人民所代替，它形成了一个特权的軍官等級，在这个等級的上层出現了元帅，可是‘用武器实现了专政’的人民，在苏联則被禁止拥有甚至兵器”^③。

因此，托洛茨基同样清楚地看到，不應該像斯大林宪法中所宣

① 托洛茨基：《革命被出卖了》第1卷，第126頁。

② 同上书，第81—82頁。

③ 同上书，第66頁。实际上，托洛茨基在这里是重新提出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关于必須用“武装起来的人民”去代替常备軍的老观点。然而，只有在社会主义在大部分比較发达的国家中同时获得胜利的条件下，这个观点才是可以接受的。在迄今为止的具体历史事件中，开始有一个国家，而在它之后还只有几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在历史上它們就与武装的帝国主义相对立，这样，关于把有組織的军队溶合到“武装起来的人民”中去的論点就成了最普通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幻想。这还不是說，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发展中，保存有組織的军队的历史必然性不会給社会主义本身提出一定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問題（军队与国家、军队与人民的关系，军队的編制等等，这些問題必然与資本主义制度下的类似的关系在許多重大的特点方面有着区别）。

布的那样，把国家的所有制和人民的所有制即公有制等同起来。为了使私有制成为公有制，必然要经过“国有化，正如幼虫要变成蝴蝶，必须经过蛹化阶段一样。但是蛹还不是蝴蝶，无数的蛹在变成蝴蝶之前就将消失。只有在社会特权和差别消失掉，因而也就是在国家丧失其存在的理由时，国家的所有制才会成为‘全体人民’的所有制。换句话说，当国家的所有制已不再是国家的所有制时，它才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①。

因此，那种社会关系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关系，而报刊上的文章和出版物关于自由的工人和农民的谈论纯粹是“吹牛”。工厂变成国家所有，只是改变了工人的法律地位。事实上，他像以前一样为工资而工作。“工业管理已经极端官僚主义化了。工人对工厂管理完全失去影响。为计件工资而工作，生活极度贫困，被剥夺转移工作地点的自由，在工厂中也受到可怕的警察制度的压迫，所以工人很难感觉到自己是‘自由的工人’。官员是工人的长官，国家是统治者。自由劳动与官僚国家的存在是势不两立的。”^②

党的蜕化是国家官僚化的原因和后果。这样，布尔什维克党就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官僚的政治组织”^③，而领导阶层则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统治等级”^④。

批评自由和思想斗争是党内民主的最重要的内容。目前的学说宣称布尔什维主义和派别组织的存在是不相容的。如果思想、讨论和批评的自由在革命的最艰苦的时日都曾是不可能的，那末在这个时候，无论从经济上或者从政治上来说形势都要有利得多的情况下，为什么反而是不可能的呢？“禁止反对党导致禁止派别组织；禁止派别组织导致禁止与不犯错误的首长的思想不同的思想。

① 托洛茨基：《革命被出卖了》第1卷，第268页。

② 同上书，第273页。

③ 同上书，第161页。

④ 同上书，第158页。

党的警察式的一致性的后果是使官僚可以不受制裁，这又是各种道德败坏和贪污行为的原因。”^①

托洛茨基不止在一个地方为派别组织的自由辩护，认为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原则。然而，派别组织的原则不是列宁主义政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无论如何，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以批评和讨论的完全自由，但也是以对多数、全体会议和代表大会的决议的完全服从作为前提和重要标志的。而派别组织原则除了这种自由以外，还以不服从这些决议的自由为前提。事实上，这意味着承认在党内存在另一个党的权利，这不仅和共产党的正常工作是不相容的，而且和其他任何政党的正常工作也是不相容的。各国共产党迄今的发展表明，派别组织的存在和活动和不存在民主制一样是有害的。派别组织会使党分裂，正如不存在党内民主会使党官僚主义化一样^②。

在科学和艺术自由的问题上，托洛茨基像在革命时期一样赞成它们完全自由地发展，他正确地认为，正是在千百万群众解放的那个时期中，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最大。托洛茨基指出，当卢那察尔斯基袒护某些列宁所不喜欢的现代派时，列宁从来也不认为他自己的看法和文艺爱好应当成为法律。“官僚对于不替它服务和它不懂得的东西，抱有一种迷信般的恐惧。当它要求自然科学与生产相联系时，它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当它命令研究者仅仅注意直接的目的时，它就造成一种使创造活动的最宝贵的源泉陷于枯竭的威胁，这里自然也常常是通过预见不到的方式产生出来的实际发现的源泉。”^③

① 托洛茨基：《革命被出卖了》第1卷，第124页。

② 由此可见，党内民主问题与派别组织问题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平行地存在几个政党的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事实上，在具有特殊发展特点和特殊传统的某些国家里，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

③ 托洛茨基：《革命被出卖了》第1卷，第207页。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极力从每

他尖銳地批評当时的馬克思主义的文学作品是經院习气、死气沉沉、辯护士的作品，并正确地指出，“社会形式的进化每日都在提出重大的問題”^④。苏維埃官僚在本国窒息人民群众的自发性和主动性，在国际範圍內也不可能有什么作用，結果必然是，在世界上它不能够鼓励、发展和維持批判的思想和革命的勇气。

托洛茨基企图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官僚主义发展的結果作出一定的綜合和估价，他认为，斯大林官僚势力实行了特米多尔，革命被出卖了，但是还没有被消灭。“作为一种自觉的政治力量，官僚势力出卖了革命。但是很幸运，胜利的革命不仅是一个綱領，一面旗帜，不仅是政治制度的整体，而且也是社会关系的体系。出卖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它消灭。革命的领导人出卖了十月革命，但他們还没有把它消灭掉。”^⑤“簡而言之：十月革命的重大成果，新的所有制形式，还没有被拋棄掉；但是它已經和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发生了冲突。沒有群众的自发的积极性和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社会主义是不可想像的。斯大林主义既妨碍了前者，也妨碍了后者。人民和新的暴政之間的公开冲突是不可避免的。”^⑥

这就是說，在托洛茨基看来，苏联是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

个政治对手身上找出在理論上脫离馬克思主义的地方，他們以孟什維主义的唯心主义的罪名指責托洛茨基。在这里也表现出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的任意行为和矛盾。一些人指責他坚持宿命論的决定論（例如加克），另一些人則批評他采取唯意志論（米丁）。然而，众所周知，这都是根据断章取义地摘取个别观点得出的牵强附会的說法。从总的理論方面来看，托洛茨基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他是一个在这方面沒有特别的影响和意义的馬克思主义者。正如在每一个展开丰富的政治和著书立說的活动的馬克思主义者身上，可以找到能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解釋的观点一样，这絲毫不能证明：实质上托洛茨基在理論上不是馬克思主义的彻底的拥护者。虽然他沒有专门研究过哲学，但是应该強調指出，他的某些說法具有机械論的性质，不过这一点在他的政治活动中并没有任何反映（例如，他在一次关于門得列也夫的演說中指出，按照他的想法，心理学可以归結为生理学，生理学又可以归結为物理学和化学、物理学和力学）。

④ 同上书，第208頁。

⑤ 同上书，第284頁。

⑥ 托洛茨基，《革命被出卖了》第2卷，第158—159頁。

的过渡社会^①，在这个社会中：“（1）生产力还远远不足以赋予国家所有制以社会主义的性质；（2）由于需要而产生的进行原始积累的要求，通过计划经济的所有毛孔表现出来；（3）分配定额（资产阶级性质的）是社会分化的基础；（4）经济的发展缓慢地改善工人的状况，但却促使一个特权阶层迅速形成起来；（5）官僚造成了社会的对抗，它成了一个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不受监督的等级；（6）被占统治地位的党所出卖了的社会革命还活在所有制关系和工人的意识中；（7）积累起来的矛盾的进化可能导致社会主义，也可能把社会拖回到资本主义去；（8）向着资本主义前进的反革命势力必然要打垮工人的反抗；（9）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工人必然要消灭官僚。问题将由两种活生生的力量在民族范围和国际范围内的斗争来最后解决”^②。

托洛茨基认为，革命所争得的重大的成果还没有被消灭掉，他看到，问题的重心和解决的办法在于工人阶级反对官僚的斗争，官僚不是以新的私有制，而事实上是以革命的成果——国家所有制作为自己进行统治的社会基础的。“由于官僚的活动的这一方面，它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③，但是，这种苏维埃官僚同样是“不通过斗争不会放弃自己的阵地的；国家显然将向着革命的方向运动”^④。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官僚国家主义的批评分析，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作的最严肃和最光辉的尝试之一。如果托洛茨基对

① “因此，把目前的含有矛盾的苏维埃制度不再称为社会主义的制度，而把它称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制度，或者称为准备走向社会主义的制度，要比较确切些。”（《革命被出卖了》第1卷，第62页）

② 同上书，第287—288页。

③ 同上书，第282页。

④ 同上书，第323页。在成立第四国际时，托洛茨基认为，这个国际的苏联支部的任务正是在于准备这些事件，并在有利的历史形势下起来领导群众（同上书，第323页）。

苏联的整个发展进行领导，将会导致何种结果，这样提问题是缺乏历史观点的。托洛茨基在自己的活动中表明了不同的方面：既有非凡的革命的主动精神和领导能力，也有国家主义的企图（例如在工会问题上曾和列宁发生尖锐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也低估了农民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意义，但是从未表现出像后来斯大林集团在集体农庄化时期所表现的那种消极态度；倾向于行政的和不切实际的解决办法（正是在上述问题上，或者在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形势下），即使处在反对派的地位时也进行毫不让步的派别活动，但是对国内国际问题（工业化问题，或者法西斯主义问题，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与社会党人联盟的问题等等）也抱有敏锐的看法。

当官僚的馬基雅弗利主义在审讯期间指责他为帝国主义、直到为德日法西斯主义服务，企图以这种罪名来贬低他的声誉时，他的深刻的激怒和愤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指出下列一点并不是多余的：就是在个人受到如此沉重的损害的时刻，他也认为这些国家反对苏联的战争将是反动的战争，因为十月革命的成果仍然是这种制度的基础和伟大的、进步的方面，纵然这种制度是官僚主义性质的^①。

托洛茨基离开了他在那里进行过活动的革命的土地之后，发起成立了第四国际，当第三国际成为苏联政策的驯服工具时，第四国际应当来反对第三国际的一事无成。但是，从历史上来看，这一个步骤已经过于迟缓而成为幻想了。国际的时代（从统一领导广

^① “打消和平改革苏维埃国家的念头，并不意味着拒绝保卫苏联。由于抱有这种观点，而不久前在纽约出版的论文集（托洛茨基：《保卫苏联》）就证明了这点，我自己始终如一地和毫不动摇地反对过任何犹豫不决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不止一次地不得不同我的朋友决裂。我在《革命被出卖了》一书中指出过，战争既会使官僚面临危险，同时也会使构成人类历史上巨大进步的苏联的新社会基础面临危险。因此，尽管存在苏维埃的官僚势力，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仍是每一个革命者的绝对的义务。”（《革命被出卖了》第2卷，第195—196页）

为分布的工人运动的意义上說),正是由于这种广泛性和多样性而逐漸一去不复返了。另一方面,整整一个大国在許多年来曾是其其他国家工人階級的象征、希望和旗帜,它的政治重心必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占优势。因此托洛茨基的組織从来沒有在工人階級中抓住比較深刻的根基,它們的派別組織的立場必然引起工人階級队伍的分裂,所以終于以小小的集团勉强維持至今。

尽管托洛茨基在他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批評中,在許多重要点上是正确的,但是要使人們相信新社会制度所具有的某些重大的消极方面,个人的努力是不足以打动人心的。为了做到这点,必定要出現整个整个民族的經驗和革命努力,并且要为重新提出和承认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某些重大原則而斗争。

只有在說明这一切之后,才能够而且也应该对托洛茨基这个重要的人物作出另一种馬克思主义的評价,这个人物代表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別和思潮,他由于各种情况的湊合(我們已經提到了其中某些最重要的情况)而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都遭到了失敗。

第二个时期 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斯大林主义

約瑟夫·維·朱加施維里·
斯大林(1879—1953)

第三国际第二个时期的某些問題还必須着重地讲一讲，因为大部分比較重要的馬克思主义的人物，都是在第三国际的这两个时期里进行活动的。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时期，特別对苏联來說，正是斯大林和他的一派对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其他一切派別取得最后胜利的时期，正是建立一种社会制度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最广义的社会关系的时期，而这种制度的主要的代表者和鼓舞者就是約瑟夫·維·朱加施維里·斯大林。

和其他許多居于领导地位的俄国的馬克思主义者不同，斯大林出身于十分貧苦的家庭。他的家庭剛剛摆脱格魯吉亚的农奴制度，后来作为一个貧困的手工业的工人家庭而勉强度日。一直到二十岁，斯大林都在梯弗里斯的宗教学校上学，在那里就已經显示出他的許多特点：出众的智能，酷爱文学，勇敢、頑强和討論时的缺乏耐性，以及极其善于压制自己的感情，这一点在恶劣的社会气氛中，被认为是一种十分重要和有用的特点。

他很早就同該城的进步团体、而后来又同第一批社会民主党的小組发生了联系，在他被学校开除(1899年)以后，便献身于革命工作，并且很快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下工作者。斯大林曾經多次被捕和遭到流放，他从俄国社会民主党一开始发生分裂便屬於布尔什維克派，1912年并当选为布尔什維克中央委员会的

委員。

斯大林帶着這種特性，並且作為《真理報》的編輯，參加了1917年的革命和此後的一切革命事件，後來在1922年並成了黨的總書記。他以後的發展道路以及他身後留下的事業，大體上都是人所共知的。現代文明史上基本上還不會有過更強大和更有組織的國家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形態。整個社會生活，即經濟、政治和精神生活，完全由國家官僚主義的最高一級機關，而歸根到底是它的最高支配者來指揮——這就是斯大林及其所有理論上的辯護者鄭重其事地不僅稱之為社會主義，而且稱之為最終建成了的社會主義，即稱之為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二階段（共產主義階段）的基礎的那種制度的基本特點。

這裡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具體的理論問題：在國家生活中造成的整個這種情景是某些確定不移的客觀環境的產物呢，或者同樣也多半是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解所造成的結果？既然馬克思和後來的列寧都認為現代的文明國家可能過渡到社會主義，那末他們一定設想，文明人類已經成熟到足以着手建立那樣一種新的社會關係，它將使人擺脫各方面的異化，從而帶來一種更人道、更自由、更親密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作為新的光輝得多的前途和歷史發展階段的標志。

十分明顯，沒有一定的客觀環境（關於這一點後面還要講到），社會主義在俄國的這種特殊的發展是不可能的。但是客觀環境從來也不是單方面所提供的，歷史不僅是客觀的事件，而且首先是主觀的創造，是人類投身於這些環境之中並且改變它們的過程——而這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就是它的理論大廈的主要支柱之一。

在積極地掌握和改變俄國的現實這方面，斯大林個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正因為如此，分析這個人物的思想和理論結構就是這樣的一項任務，它之所以向馬克思主義提出，是為了要解釋影響到這種發展的一個重大因素，是為了能夠批判地闡明迄今仍然是

当代馬克思主义者理論兴趣的中心的一种历史現象。

斯大林是作为一个热情的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开始活动的,并且他把毕生的巨大精力都献給了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这是毫无疑問的。但是,在他的领导之下社会主义遭到了可悲的变形,而这种变形使得这一偉大思想受到了极深的損害,这同样也是无可怀疑的。正因为这样,分析他的思想結構这项工作就更其重要和不可缺少了。

第一章 列宁主义問題

在分析斯大林論列宁主义問題这一部比較大的著作之前，我們先从他論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早期著作中引一段話，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这段話对后来的斯大林主义的許多問題都作了解答。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論战时，斯大林是这样說明他們之間的重大区别的：“問題在于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原則上，虽然双方登上斗争舞台时都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基础，认为解放个人是解放群众、解放集体的主要条件。在无政府主义看来，个人沒有解放以前，群众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个人’。而馬克思主义則以**群众**为基础，认为解放群众是解放个人的主要条件。这就是說，在馬克思主义看来，群众沒有解放以前，个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群众’。”^①

无政府主义者非辯证地把个人和群众对立起来，反之，斯大林同样非辯证地把群众和个人对立起来。好像可能有某种和个人无关的群众的解放，好像群众是一个不可区分的整体，它本身可以在作为它的基本要素的个人未得到解放的情况下而获得解放。从这个思想就已經可以断定斯大林后来曾經那么彻底地加以貫徹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这种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廢除私有制和消灭資本主义，不論是以何种社会形式进行的，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群众，因而也就是解放个人。无怪乎后来斯大林认

^①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73頁。

为，在爭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个人是无足輕重的，因此在他看来，个人摆脱从前的一切束縛和異化現象，决不可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提。斯大林在思想上从来不是深刻的欧洲人道主义傳統的继承者，而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的人物却都是这种傳統的最光輝的代表者。

斯大林的思想結構的特点，特別表現在他对列宁主义所作的分析中。无疑地，斯大林作为列宁的思想而援引的那些話，大部分确实是列宁說的。列宁逝世以后，在政治局內的激烈爭論中，当托洛茨基如此自信地以列宁主义者自居，以致常常突出个人的时候，斯大林是作为列宁原則的正統的捍卫者行动的。因此，沒有必要来重复列宁的理論活动中所包含的那些要点。但是斯大林列为列宁主义的重要之点的他对列宁主义的观点，以及他引用所有这些材料的上下文，却是更值得我們注意的^①。

单是关于方法的这一章，实际上就已經說明斯大林对列宁的主要論点的理解是多么狹窄。列宁的特点首先在于他的思想和他对局势的分析和解决办法具有突出的辯证的灵活性，列宁掌握了对整体及其个别組成部分的統一的观点，而斯大林則把列宁主义的方法归結为檢驗第二国际的理論和政策、进行改造和自我批評。

对于斯大林來說，同样还有一个突出之点，就是在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問題，即无产階級专政的問題上（列宁在許多方面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問題并使之具体化了），他总是把列宁的某些最激烈的原理絕對化，而这些原理在它們被制訂的当时的形势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斯大林一般說来是很难超越俄国的特殊形势的，因此，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在其他一系列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問題上，他实际上是把俄国的特殊經驗片面地和非辯证地加以絕

^① 同样，我們也不去分析他对民族問題的解釋，因为在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原理中，斯大林捍卫了列宁的思想。从批判斯大林的观点着眼，关于这一問題可参看爱·卡德尔的《斯洛文尼亚民族問題的发展》一书，1960年貝尔格萊德塞文版。

对化。

列宁在不同的形势下強調了无产階級专政的各种細微差别，并容許有不同的形式，斯大林的定义則在下面这一公式中达到了頂峰，即“无产階級专政就是无产階級对资产階級的統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①，这是列宁在革命时期所下的一个定义。这种观念可以永远作为不仅对资产階級施加一切形式的暴力的“革命”幌子，这种暴力行为在斯大林的統治时期是屡見不鮮的。

在对革命这一对于社会主义力量当前的斗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的理解上，斯大林也表现了同样的非辯证的片面性。和列宁在解释革命力量的这一迫切重要的问题时所抱的灵活和审慎的态度相反，斯大林一味从对階級斗争和階級矛盾的实质所作的片面的理解出发，重新把俄国的特殊經驗当作唯一可能和必須遵行的經驗而加以绝对化，后来并把它强加于人。他說：“換句話說，无产階級暴力革命的規律，摧毁资产階級的国家机器是这种革命的先决条件的規律，是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必然規律。”^②

斯大林的思想的特点，是始終带有健康的理性上的明确性和严格地、刻板地把每一个问题都区分为各个組成部分的习惯。但是这种健康的理性的哲学（当它不占統治地位时是十分有益的）忘記了，历史的现实比合理的分析所能包括无遺或者一成不变地加以分类的东西要复杂得多。另一方面，正像斯大林的哲学观点的特点一样，在斯大林身上有一种主張相当占优势（許多馬克思主义者也常常抱有这种主張）：他把历史理解为类似于自然界，并把历史的規律性和自然界的規律性等量齐观。因此他十分随便而简单地找出“革命运动的必然規律”，虽然历史的必然性常常会由于一种斯大林从来也不认真考虑的因素——人及其創造性的因素——

^① 《論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2頁。

^② 同上书，第104頁。

而被推翻。

对于現代馬克思主义來說，更为重要的問題是社会主义的問題。在这一問題上斯大林用了很多的篇幅，从这些言論中也可以找到理解他的活动中的許多因素的钥匙。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点的基本特点在他的这部著作中已有明显的表現，这就是大力強調国家、国家的領導、国家机器和引帶、国家的首創性和干部，而实际上是从来也不強調群众，不強調曾經被他宣布为“馬克思主义的基础”的群众。关于工人階級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自治的思想，对于斯大林來說实际上是格格不入的；个人的首創性和全面发展、对自己的社会过程的管理，是真正获得解放的前提，是廢棄人的異化的一切主要形式的前提——所有这些馬克思主义理論思想的重要因素，在斯大林身上都是根本不存在的。

列宁、罗·卢森堡、布哈林和葛兰西等人，都把工人委员会問題理解为实现新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现实的一种基本形式和因素，斯大林則和他們不同，他把这一問題看作是国家的組織的問題，而从来也不作其他的理解。而問題的关键恰好在于，这并不是国家的組織，而是非国家的組織，即人民的組織，它的加强决定着另一个相反的过程——国家的消亡。

俄国的苏維埃曾經是新政权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国家的組織的形式。但是根据列宁的意图，它們应当在工业的管理方面和在一切經濟和社会問題上代替国家。在斯大林看来，苏維埃是“最能包括一切的群众組織”，是“群众革命斗争的”“最强有力的机关”，苏維埃是“群众本身的直接的組織，是最民主的因而也是群众的最有威信的組織，这种組織能尽量便利群众参加新国家的建設和管理，能尽量發揮群众在毀坏旧制度的斗争中，在建設无产階級新制度的斗争中的革命毅力、首倡精神和創造能力。

苏維埃政权就是把各地方苏維埃統一成为一个总的国家組織，統一成为无产階級这个被压迫被剝削群众的先鋒队、这个統治

階級的国家組織,即統一成为苏維埃共和国”①。

可見,斯大林只是把苏維埃作为国家組織的因素来談的,并且只是从国家机器着眼来談自我的首倡精神和創造能力,因为斯大林唯一相信的是国家机器,而且他有把握将国家机器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斯大林当时就已經主要是对国家及其机器有了偏見。苏維埃只是被解釋为苏維埃政权的因素,而苏維埃政权被解釋为国家組織的新形式,它“把工人和一般劳动群众同国家管理机关直接联系起来,教导他們管理国家”②。

如果群众仅只是国家組織的那些基层形式的成員,那末早就可以明白,由群众来管理国家是多么靠不住的事情。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和支配,非常容易簡單地流于一般的形式和幻觉。群众对国家的真正的管理,正是在于相反的一面,即在于直接管理他們亲身参加的生产和社会过程③。

因此斯大林主要的偏見正是涉及国家机器的問題,因为在他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中,实际上从那时候起就已經把社会主义的概念同国家的概念混为一談。在革命胜利后,斯大林认为,在党領導下的、采取了生产資料国有化措施的国家,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和特征。正因为一个党的主要領導人在談到社会主义的題目时,从来也不說一点比較肯定的东西,而只是一般地喊喊:“吸引

① 《論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6頁。

② 同上书,第107頁。

③ 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得到明显表現的思想,即认为恩格斯关于在社会主义下国家消亡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这种思想,基本上在这部著作中已經反映出来。斯大林认为,苏維埃政权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只有苏維埃的国家形式才能吸收劳动者和被剝削者的群众組織无条件地經常参加国家的管理,只有它才能准备国家的消亡,这种消亡是将来的无国家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因素之一”(同上书,第108頁)。斯大林把主要重点放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上面,并且仅只通过国家及其发展来看社会主义,所以他当时就把国家的消亡理解为共产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这一点是毫不奇怪的。

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按照把所有劳动者团結在无产階級周圍的精神来組織建設工作”等等，这是令人吃惊的。其他的馬克思主义者曾經努力从理論上加以研究的社会主义这一过渡时期的課題，到斯大林那里就只剩下一般的公式，并且还仅限于階級斗争、消灭資本主义殘余問題和国有化問題方面，因而也正是限于国家力量的干涉和作用在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个方面。

关于人民在国家领导的范围之外的自我首倡性和自治的思想，对于斯大林来说是根本格格不入的。无论他的任何一个关于无产階級专政的定义，或者对这个問題所作的任何一条分析，都没有超出国家机器及其职能和任务的范围。在斯大林后来写的关于列宁主义問題的补充性的著作中，他举出了无产階級专政的下列三个方面：“（一）利用无产階級政权来镇压剝削者，保卫国家，巩固和其他各国无产者之間的联系，促进世界各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二）利用无产階級政权来使被剝削的劳动群众完全脱离資产階級，巩固无产階級和这些群众的联盟，吸引这些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保证无产階級对这些群众实行国家领导**（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三）利用无产階級政权来組織社会主义社会，消灭階級，过渡到无階級的社会，即过渡到无国家的社会。”^①

对于斯大林的思想結構来说，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这一时期的两部主要著作中，根本没有研究社会主义建設的特点。工人委员会的問題，由**群众**即人民来管理国家的問題，好像从来也不是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問題之一，而一切比較卓越的馬克思主义者都把这些問題看作是克服人的各种形式的異化現象的唯一基础。斯大林常常也喋喋不休地談論“社会主义

^① 《論列宁主义的几个問題》。《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1頁。在《列宁主义問題》这本文集（莫斯科1945年第11版）中，最后一句話不是說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說过渡到“无国家的社会”（莫斯科中文版第175頁）。（“无国家的社会”，在《斯大林全集》中为“社会主义社会”。——譯者注）

建設”，这在他看来，实际上首先就是社会主义生产成分的經濟建設，而斯大林是把社会主义成分和国有成分，后来并和集体农庄成分等同起来的。此外，对于斯大林來說，除了“国家对群众的領導”以外，无产階級沒有別的可能去領導群众。完全可以理解，根据这种观点，无产階級除了通过各种官方的組織，首先是通过党以外，不可能有別的办法进行領導。

无产階級专政和社会主义本身，一般按其結構來說，在斯大林那里具有和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不同的形式。馬克思过去說的是“自由生产者协会”和“公社”，恩格斯和列宁說的是无产階級所需要的、但却在消亡的国家，而斯大林所說的社会主义結構則是具有这样一种特征的机构，它是按中央集权的原則組織起来的，其中党作为“指导力量”起絕對的領導作用，这种領導作用是通过“引帶”来实现的。他說：“总之，**工会**是无产階級的群众組織，它首先在生产方面把党和本階級联系起来；**苏維埃**是劳动者的群众組織，它首先在国家事务方面把党和劳动者联系起来；**合作社**主要是农民的群众組織，它首先在經濟方面，在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設方面，把党和农民群众联系起来；**青年团**是工农青年的群众組織，它的使命就是帮助无产階級先鋒队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新的一代并培养青年后备軍；最后，**党**是无产階級专政体系中的主要指导力量，它的使命是領導这一切群众組織，——大体說来，专政‘机构’的情况，‘无产階級专政体系’的情况就是如此。”^①

可見，当时在斯大林眼里就只有一种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結構，在这里党起着統治作用，它在这一体系中通过它的“杠杆”、“引帶”来发号施令。实际上，斯大林不是把党仅仅看作基本的領導机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确实是这样的机关），而是看作唯一的一种領導力量，沒有它的指示就不能解决任何一个比較重要的問題。

^① 《論列宁主义的几个問題》。《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5頁。

他說：“例如在我們苏联，在无产阶级專政的国家里，我們的苏維埃組織和其他群众組織，沒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領導作用的最高表現。”^①

这样，斯大林当时便已經从理論上描繪出自己对社会主義結構的观点，并且他的整个政治活动是努力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牺牲和施加各种压力来实现这种观点，——关于这一点，如果我們知道这一过程后来的整个情况，那就不会有任何怀疑。

斯大林的观点的基本缺陷正是在于：他只看到无产阶级專政机构的一个方面，即为了順利解决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复杂問題所一定必需的那一方面。但是他却很少看見和認識到另外一个实际上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即很少看到这样一些过程，它們是可能在新的人道主义原則的基础上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基础。

斯大林的观点及其本人的全部悲剧就在于：他实质上是从政权机构、国家机器的立場来看社会主义的，一句話，是从行政官僚主义的角度和国家主义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的。按照这种观点，主要一級的即党的領導必然成为社会主义的主要之点^②。他沒有能够看到，除了这个基本的問題以外，还有其他許多問題，这些問題不能列入党和国家的領導和主管的范围，而属于群众自己主动管理的范围，即属于群众在社会上亲自参加的一切地方直接地（亦即是不經過国家机构）管理和領導他們的生活过程的范围。

这种观点在实践上极其容易搞成党本身的專政，更确切些說，

① 《論列宁主义的几个問題》。《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6頁。

② “决不能把无产阶级專政和党的領導（‘專政’）对立起来。其所以不能，在于党的領導是无产阶级專政中的主要东西，如果这里指的是稍微巩固的完全的專政，而不是像巴黎公社那样不完全不巩固的專政。”（同上书，第46頁）

搞成党的上层人物和政权机构的专政。斯大林主义的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不应与党的专政混为一谈的论据和反驳，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性质，它没有说明社会主义发展中有任何相反的过程，可以阻碍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保证不致导致这种状况^①。

斯大林的理論观点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他不能輕易地摆脱俄国革命改造的特殊过程，因此他就难于克服已經过时的因素，并且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就非辯证地把某些在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起消极和阻碍作用的因素绝对化。

这一点表现在斯大林对战略和策略、对农民問題所作的解釋中——这些实际上是列宁的卓越活动中具有代表性的問題，但是完全符合俄国特殊的落后的情况以及与之相近似的情况。根据这种公式，尤其是当它們后来被理解为教条的时候，是不可能指导所有这样一些国家中的革命改造的，这些国家与革命前的俄国农民沒有更多的关系，与斯大林所設想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出現的党也沒有更多的关系。

这一缺点也表现于一种偏見，即认为苏联在党的問題方面的經驗也应当成为适用于所有其他情况的准則。斯大林作出形式主

^① 斯大林主要举出了一些形式上正确的論据，来说明在这种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中談不到党的专政。他說：无产阶级专政要比党的专政更广泛、更丰富，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指示加上无产阶级群众組織对这些指示的实行，再加上居民对这些指示的实行”（《論列宁主义的几个問題》。《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8頁）；因为党只是本阶级的一部分，因此，“誰把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誰就是以党代替本阶级”（同上书，第39頁）；因为党不是“越过国家政权，无須国家政权而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上书，第40頁）。因此，斯大林得出的結論是，說党对无产阶级专政，那就等于說党对无产阶级使用暴力，这就意味着可以把党的威信建筑在暴力的基础上（同上书，第41頁）。所有这些論据，只是在形式上、概念上区分了党的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把两者真正区分开，在理論上和實踐上还必须有一系列其他的社会主义結構的因素，这些因素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它們将真正阻止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国家和党的官僚主义的专政。

义的結論，說无产階級作为一个階級，可以而且必須只有一个党与之相适应，因此他就不可能在理論上看到，其他的革命过程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徑、采取其他的形式来进行，他也根本不可能設想一种与苏联不同类型的革命。因此他认为列宁的战略和策略，应当成为所有其他国家的党必須遵行的法典，一党执政，是适用于其他一切情况的范例。“这个特种形式的联盟的内容就是：这个联盟的領導力量是无产階級。这个特种形式的联盟的内容就是：社会的領導者，无产階級专政体系中的領導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階級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决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領導。”^①这也是斯大林的思想的那种健康理性的特点所造成的后果，他在思想上总是深信某种固定的思想观点是絕對正确的。

^① 《論列宁主义的几个問題》。《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7頁。（“社会的領導者”，在斯大林的原文中为“国家的領導者”。——譯者注）

第二章 理論和實踐的後果

仅仅从以上这些对斯大林的思想 and 观点的結構所作的分析中，便可以看出，所有那些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通常被称为斯大林主义的东西，不仅是各种客观环境和斯大林主观上的特点的产物，而且是以他对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的一定的解釋作为基础的。列宁主义問題在斯大林的解釋下实际上已經表现为斯大林主义問題。斯大林虽然是列宁主义者，但他对列宁精神的全部思想过程，从来没有过彻底的和全面的理解，列宁的思想結構同斯大林的思想結構是有极大的不同的。在苏联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斯大林始終按照自己理論上的設想行事，因此馬克思主义理論归根到底必然要发生不良的变形。

发生所有这些变化的客观环境是十分困难和混乱的。由于內战的破坏性的影响和后果，国家元气还没有恢复；为了設法对付各种問題，特别是經濟問題，作了极大的努力，并且采取了一些常常是十分殘酷的措施。如果再加上几年的天災和資本主义的封鎖，同时还加上整个国家經濟和文化的落后，那末我們便可以看到当时俄国的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极大困难的一般情景。

針对着这些困难，大多数的俄国馬克思主义者是利用国家和党的組織和力量，作为扭轉这种形势的主要手段和保证。因此在他們大部分人身上都曾表現出不同形式的国家主义观念（如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人），这是毫不奇怪的。尤其适合这时的情况的，还有十分严格的、特别是在內战时期必定更是严厉得多的党的集中制，以及按照旧的官僚主义方式来随心所欲地处理

各种事情的新旧官僚机构。

由于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的几个集团发生内部分歧和坚持不同的立场，这种困难就更为严重了。问题是已经出现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其中后来还有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并且在是否可能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的争论。

但是，这并不是冲突的唯一原因。反对派特别尖锐地提出了工业化方面落后的问题，并且要求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成分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以便能够尽早地加紧实行国家工业化。斯大林在这场争论中支持并依靠政治局的另一部分人。政治局的成员在1925年以前有：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①。

布哈林曾经是主要的理论家和反对派的反对者，他提出实行适度的工业化、有步骤地在农村发展合作化、使资本主义成分长入社会主义等主张来反对他们。斯大林基本上支持这些观点，因此1927年召开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把反对派的观点作为“超工业化”来谴责，而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的讽刺也是尽人皆知的。

可是，这一时期的国内形势由于市场上的粮食问题而日益恶化；经济力量较强的农民有可能用剩余产品来做投机生意，这就使城市的供应发生了问题。斯大林在领导集团中掌握了大多数，控制了业已形成的整个国家和党的机器，于是便在自己的立场上实行了急剧的转变——宣布向富农进攻和消灭富农阶级，宣布工业化和集体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比反对派在两年前所提出的主张要激进得多。这样他就与他在这以前表示赞许过的布哈

^① 到1925年12月，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后，还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于是斯大林便有了足够的支持者来不仅对付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而且在稍后，当以前的三人集团（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被开除出党以后，还反对过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

林的观点发生冲突,并且将它们一概宣布为党内的右倾的表现,在1929年4月联共(布)中央的全体会議上加以尖銳譴責^①。

布哈林的观点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右倾,而是很合乎邏輯的一种設想:正是由于权力和手段都掌握在社会主义手里,所以通过合作社的道路逐步地把农民納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軌道是可能的。因此他反对暴力措施。

斯大林从那时候起,就认为应当彻底使阶级斗争尖銳化,并且认为如果不同时在农业中取消私有成分,那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他的这种人为地使阶级斗争尖銳化的做法,以及必定要采用的一整套镇压措施,实际上都是为他的社会主义观点服务的。这种观点就是加强国家机器和使整个生活都由国家和党的领导来壟断。

在关于哲学在苏联的发展这一章中,我們已經看到,斯大林正是在这同时,也干預到机械論者和德波林派之間的爭論,要求尊重党性原則和理論与实践的統一,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实际上就是以实用主义的观点来規定科学和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点的实施进入了自己的最后阶段。国家

^① 斯大林在此以前基本上是贊成列宁和布哈林关于农村逐步社会化的論点的。这里引用几段話:“俄国农业应当循着另一条道路,即循着使千百万小农和中农合作化的道路,循着在农村中发展那种由国家以优惠貸款的办法来扶持的群众性的合作社的道路去发展。列宁在論合作制的論文中正确地指出我国农业应当循着新道路去发展,即循着通过合作社吸引多数农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設的道路,循着把集体制原則逐步应用于农业,起初应用于农产品銷售方面,然后应用于农产品生产方面这一道路去发展。”(《論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9頁)还在1928年,即大轉变的前一年,斯大林在強調指出粮食战綫上的出路在于过渡到大經濟和扩大并巩固現有的国营农場之后,写道:“最后,出路在于不断提高中小个体农民經濟的单位面积产量。我們不能而且不应当支持个体的富农大經濟。但是我們可以而且应当支持中小个体农民經濟,提高它的单位面积产量,引导它走上合作社組織的軌道。”(《在粮食战綫上》。《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9頁)此后不久,斯大林就在1928年10月19日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以及在1929年4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发言批判了布哈林。参閱斯大林1928年写的《論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險》和1929年写的《論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的官僚主义的机构已經作出最後的努力，把那些還多少有些排斥它的控制和指示的社會生活部門（思想領域，工業中的私有成分，特別是農業中的私有成分），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社會主義有了自己確定的公式：由一個中心進行全面的、無所不包的計劃和操縱的體系。如果再考慮到同樣的政策也運用到了國際方面，運用到了共產國際的活動上，那我們就可以看出第三國際第二個時期的開始階段和這一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的某些重要因素。

斯大林對富農的進攻和以暴力推行的集體農莊化，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後果。和原始積累中的情況一樣，採取了加速工業化的手段，但國家本身却因而遭受到震動和打擊^①。

所有這一切並沒有阻止斯大林把這些措施宣布為唯一的社會主義措施，並且最終把社會生活一切部門的國家化都稱為建成了的社會主義。應當考慮到，在這同時，工廠完全改由廠長統治和領導，而廠長是對國家負責並由國家任命的。對於集體農莊的主席來說，也是同樣的情況，並且集體農莊實際上是依賴於機器拖拉機站的，機器拖拉機站並不屬於集體農莊，而是歸國家管理。

^① 斯大林在所謂“大轉變的年代”的第一年底寫了反對布哈林的這樣一段話，它突出地表現了斯大林對這一問題的不老實的態度：“右傾機會主義者（布哈林集團）的斷言已經破產而且被粉碎了，他們斷定說：（甲）農民不會加入集體農莊；（乙）加速發展集體農莊只會引起群眾的不滿和工農結合的破裂；（丙）農村中社會主義發展的‘大道’不是集體農莊，而是合作社；（丁）發展集體農莊和向農村資本主義分子進攻會使國家沒有糧食。所有這些資產階級自由派的陳詞濫調都已經破產而且粉碎了。”（《大轉變的一年》。《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6—117頁）但是布哈林基本上是正確的。所有這些現象都表現出來了，而糧食的缺乏則是对征收的報應。在這篇文章發表了五個月之後，斯大林就不得不出面反對暴力（參閱《勝利沖昏頭腦》一文及《答集體農莊莊員同志們》），儘管進行了這種虛偽的干預，僅僅在這一政策執行了六年的時間內，個別農民在播種面積方面所占的比重，至多不過2—3%（參閱《關於蘇聯憲法草案》）。這一政策的結果究竟如何，從斯大林自己1934年在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總結報告就可以看到，根據他引用的材料，1933年各種牲畜的頭數比1929年減少了一半到三分之二。

在三十年代的中期,当这一过程将要结束时,斯大林得出了最后的理論上的結論。他坚持在早期即已明显表現出来的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认为实现国家工业化、消灭富农和完成集体化就是建成了社会主义。早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当他总结过去几年的过程时就曾这样断言:“国家工业化的政策胜利了。它的成果现在是有目共睹的。有什么可以反駁这个事实呢?”

消灭富农和实行全盘集体化的政策胜利了。它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有什么可以反駁这个事实呢?

我們国家的經驗证明,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有什么可以反駁这个事实呢?”^①

可以列举出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論观点从来都无法理解的許多道理,在这方面他从来都不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偉大思想傳統的真正的继承者。

因此,当在工业和农业中消灭了資本主义,当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成为社会的基本資料和剩余劳动分配的所有者和支配者时,斯大林便认为社会主义已經建成。他根本沒有想过,这只不过是实现了比較全面、比較繁荣的社会主义生活的基本前提,只不过是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最低級的形式。因此,他在論宪法草案时郑重其事地宣称社会主义已經建成。他說:“我們苏联社会已經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級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說,我們已經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②

这就成了足够的理由,在第十七次党代表會議上^③又正式宣

^①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8頁。

^② 《关于苏联宪法草案》。参閱《列宁主义問題》,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版,第679頁。

^③ “第十七次党代表會議”,为“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之誤。——譯者注

布已經直接向共產主義建設過渡！

對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的關係問題所作的完全非辯證的解釋，是這一觀點的基礎，而這種解釋至今仍然是蘇聯的理論家所特有的。斯大林把社會主義理解為國家主義的社會主義，把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解為國家所有制，把社會主義的管理理解為國家的管理，並且把社會主義分配理解為國家機構進行的分配。斯大林在這些概念的框子裏面不可能設想，社會主義雖然包括整整一個時代，但實質上是一個過渡時期，而這種過渡性的特點正是在於：在社會主義本身內部，即在這一過渡時期內，必定要實現一系列的變化，出現一系列社會關係的新形式，它們必然已經具有共產主義的特點，儘管還處於不發達的階段。他不可能設想，共產主義作為一種人們自治的社會，應當是在社會主義本身的过程中，就通過教育人們進行這種非國家的自治而準備起來的。他不可能設想，在這一運動中不僅要改變經濟上的前提，而且也要改變心理方面、思想方面和其他一系列的社會方面的前提。他不可能設想，與此完全不同，國家的極權主義卻發展了完全相反的特點，即統治、服從、官僚主義、不老實的態度等心理和群眾的消極情緒——總而言之，它讓各種形式的人的異化現象在這種社會主義制度下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因此，根據斯大林的觀點，在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國家問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應當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闡明的觀點進行修正，這是完全合乎邏輯的。由於斯大林設想社會主義已經建成，所以他認為自由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已經得到解決，這也同樣是合乎邏輯的。

斯大林不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理解社會主義的實質和任務，即不是把它理解為逐漸排除上述一切形式的依從關係，因此也不是把官僚的國家看作這一過程的主要障礙，所以他就不能超越自己的實踐和從這一實踐作出的理論上的概括。

因此早在 1933 年 1 月 7 日党的中央全会上所作的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的报告中，他就第一次从自己已有的一切观点中作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并且违背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论点，而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辩护，从而也是为加强国家辩护。他说：“有些同志把消灭阶级、建立无阶级社会和国家消亡的论点了解为替懒惰和宽大辩护的论据，了解为替阶级斗争熄灭和削弱国家政权这一反革命理论辩护的论据。不用说，这种人和我们党是不可能有一丝共同之处的。这是应该被驱逐出党的蜕化分子或两面派分子。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国家的消亡不是经过国家政权削弱的道路，而是经过国家政权最大限度地加强的道路到来的；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才能彻底铲除垂死阶级的残余，并组织国防去抵御还远没有被消灭掉而且还不会很快就被消灭掉的资本主义包围。”^①

几年以后，当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1939 年 3 月）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断言国内资本主义因素的最后残余被消灭之后，国家的职能也必然要改变时，他的上述观点，以及他对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的观点（不仅是斯大林所提到的恩格斯的观点，而且也包括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所作的修正，便取得了自己的最终的形式。武装保护的职能，以及为了逮捕外国间谍所必需的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都完全保存着，而同样地，“国家机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职能仍然保存着，而且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现在，我们的国家在国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和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②。

^①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89—190 页。

^② 《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参阅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50 年版，第 792 页。

斯大林在自己国家里找到了社会主义的化身，因而必然要把由这个国家产生的一切东西看作是并宣布为社会主义的东西，把与这个国家相对立的一切东西看作是并宣布为敌对的东西、非社会主义的东西。既然通过一切关系的国家化而实现了社会主义，所以剝削和自由的問題也就随之解决了，因为要是在建成了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自由，而存在剝削，岂不是自相矛盾。

在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只要一旦采取了这种国家主义的观点，那末在理論上和实践上的官僚主义的专断和形式主义的論据就达到了頂点。下面这种結論是没有什么邏輯性的：“寄生階級的消灭使人剝削人的現象消失了。工人和农民的劳动不再受到剝削。”^①他根本沒有想一想：一方面，工人階級在这种制度下还一直沒有掌握分配，即沒有干預剩余劳动的分配，而另一方面，只要存在着包括几百万人的、臃肿的和多余的官僚主义机构，来吸吮大部分剩余劳动，那末，剝削也就是可能的。后来在宪法草案中也提出来的那种論据，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煩瑣哲学的典型：“而在我国，大家知道，資本家階級已被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資料已从資本家手中夺来，交給了以工人階級为領導力量的国家。因而，已經沒有能够剝削工人階級的資本家階級了。因而，我国工人階級不仅沒有被剝夺生产工具和生产資料，反而是同全体人民一起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資料。既然它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資料，而資本家階級已被消灭，那末任何剝削工人階級的可能都完全鏟除了。”^②

即使純粹从形式邏輯方面来看，这种論据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在前提中沒有規定由誰来支配工人劳动的价值，由誰来执行分配，其次，它认为只有在資本家階級存在的情况下，剝削才存在，虽然

①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6頁。

② 《关于苏联宪法草案》。参閱斯大林：《列宁主义問題》，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版，第675頁。

这样也并不能排除别的可能性！

所有諸如此类的論据和对苏联当时的制度的某些关系和特点的說法，都是从前面业已指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中合乎邏輯地产生的。国家官僚主义的领导既然把国家的概念和社会主义的概念等同起来，把自己这一领导力量看作是这种社会主义的主要建設者、管理者和組織者，那末它就可以极其輕易地得出結論說，它的一切行动都是神圣的社会主义的行动，它的一切理論观点都是唯一可能的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此一切其他的思想都必然会被理解为最普通的小資产階級、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对最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的冒犯①。

由于在这一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制度中，斯大林实际上是最厉害的人物和最专橫的独裁者，因此，这种国家主义在人所共知的个人迷信中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形，这同样也是合乎邏輯的事情。可見，个人迷信并不是什么偶然的現象，而是一定制度的合乎邏輯的产物，是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观点和这样的社会主义现实以及这种观点的主要体现者的某些性格上的特点的合乎邏輯的产物。

宪法草案和被通过了的宪法本身，也完全是似是而非的东西，但是也极好地說明专橫独断和官僚主义对事实的粗暴歪曲达到了何种地步。斯大林在他的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认为宪法“不是简单地宣布民主自由，而且按立法手續，用一定的設施来保证这些

① 如果我們考虑一下列宁已經肯定过的斯大林的粗暴和不忠順的态度，如果再加上他在貫徹自己的观点时所明显表現出来的狂热的魯莽行为，那末，根据前面已經讲过的情况，他在这同时所进行的駭人听聞的审讯对于我們來說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时，从1936年到1938年，他消灭了整个一支老的列宁的近卫軍，与此同时还消灭了数以万計的其他的共产党人。1936年，他消灭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諾夫等人；1937年消灭了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謝烈布利雅柯夫等人，同一年消灭了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和其他的軍隊將領；1938年消灭了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柯夫斯基等人。

自由”^①，並且宣布了新的社會主義民主，而在說這些話的同時，他已經處決了最優秀的老共產黨員，已經宣布了一人有罪全家負責，並且像宗教裁判時代一樣，被告的口供就構成作出判決的充分理由。

這樣，第三國際的這第二個時期就已經相當穩固下來，這時斯大林個人和官僚主義國家主義的制度占着明顯的統治地位。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解，也像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本身一樣，在很大程度上變形了。激烈地堅持作如是理解的党性原則和理論與實踐聯繫的原則，是與社會主義制度下階級鬥爭尖銳化的觀點相符合的，並且也在哲學、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方面樹立了為國家政策及其直接行動辯護的思想。政治生活中的統治人物，也成了科學和哲學領域中的統治人物。斯大林的哲學觀點的粗淺看法，竟成為馬克思主義創造性的最高標準。這樣就簡單地排斥了以獨立的、馬克思主義的客觀態度分析現實的可能性，所以全部歷史也得到了最高的作者所宣告的那種官方的解釋。於是一個極其粗暴地偽造歷史和現況的時期出現了。如果說，官僚主義的專橫可以把列寧的最親近的戰友宣布為間諜、兇手、資本主義的復辟者等等，那末把某些人從歷史上抹掉，就更加容易了。在官方的《聯共（布）黨史》中，所有的歷史學家和馬克思主義者都得到了不可更改的解釋。像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等這樣的人物，在這個歷史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是起了消極的作用。因此，斯大林與列寧同時成為中心人物，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藝術家則繪制了許許多多“革命的”圖畫，在那里斯大林總是表現為列寧的替身。

一切主要的精神創作的領域，都有了自己的官方理論。最終在藝術的領域也找到了所需要的公式。藝術不再被看作主觀創造

^① 《關於蘇聯憲法草案》。參閱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0年版，第683頁。

活动的最高表现(艺术之所以是一种创造活动,正是由于它不能按照规格进行),而根据国家主义的党性观点,它应当为日常政治的直接利益服务。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下面,整个艺术队伍被迫要现实主义地描写和表现苏联人民所作的巨大努力,并带上一定分量的浪漫主义色彩,以渲染更为光辉灿烂的未来。艺术的两个主要锋芒、主要价值——主观性和批判性变得迟钝起来了。世界艺术的最优秀的代表真正努力寻求新的表现方法和内容,并且常常用已经为大家所熟悉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形式作出了非凡的贡献,而苏联造型艺术的最高成就则以格拉西莫夫的手法为顶点,它用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的肖像,间或也画个把集体农庄庄员和一部拖拉机来充塞画展,甚至还要出国展览。在建筑术方面,一种虚构的宏伟格式已开始占据统治地位,它需要用新古典式和新哥特式的建筑来使社会主义的胜利永世长存。在所有这些现象中,人的愿望和创造的热情,新世界的朝气蓬勃的人所应有的先锋精神,则是十分缺乏的。

第三国际时期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个第二阶段的特点,在国际方面也表现为苏联的政策在共产国际中完全占统治地位。在党内的生活中窒息了民主以后,在国际机构中也必然会如法炮制,所有从前的首脑人物都从这里被清除出去。

前面提到的斯大林对已经发生的变化所抱的态度的特点,以及按照老一套来评价新事件的倾向,在这一时期都表现得特别明显。这里还有一种关于苏联的领导作用的实用主义观点,它在实践上就是要使各国共产党的政策服从苏联政策的利益的做法合法化。

除了斯大林在对中国革命的评价方面所遭到的破产之外,在这以后不久,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又根据斯大林的评价,对法西斯主义作出了完全错误的评价值,认为社会民主党还是自己的主要敌人,宣布它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说它和法西斯主义是

一对不可分离的暹罗双胞胎^①。斯大林的政策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的缺乏远见，为他们的共同敌人的暂时胜利打开了方便之门^②。

由于法西斯主义在德国也打开了缺口，世界便已经处在新的世界大战的前夕。轴心国的力量很快便开始了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日本是在满洲和中国，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而德国则首先在欧洲。革命的西班牙也遭到了这种厄运，它是被“民主的”欧洲交给法西斯主义摆布的。斯大林的政策对西班牙国内各种进步团体的革命斗争所采取的官僚主义专横粗暴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来了，它直接把自己的政策强加于西班牙共产党，并且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干出了极其粗暴的行为^③。

最后，当斯大林在大国的外交斗争中（各大国都力图使法西斯侵略的锋芒指向对方，法国和英国对苏联如此，反过来也一样），与

① 不仅宣布向社会民主党斗争，而且也向它的左翼斗争。斯大林在1928年曾经两次写道：“如果右倾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共产党在思想上被粉碎，社会民主主义大大加强。而社会民主主义大大加强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加强和巩固，因为社会民主党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94页）稍后，在1929年4月他又写道：“由此就产生了加紧和社会民主党，首先是和它的‘左’翼作斗争的任务，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支柱。”（《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页）

② 对法西斯主义的低估和错误评价达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当时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曼努伊里斯基竟在1939年召开的联共（布）的代表大会上断言：“法西斯德国打一场大战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因为它原料不足、粮食缺乏，它的财政状况危急，它的海岸可能因海上封锁的打击而遭到摧毁，在它的军队中缺乏指挥人员，它的后方是对法西斯主义有危险的后方。尽管党的领袖台尔曼同志被投入法西斯的监狱已有六年之久，尽管地下工作的条件十分恶劣，德国共产党还是保住了自己的组织。它是在德国领导群众政治工作的唯一的反法西斯政党。”（引文系根据《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1952年贝尔格莱德塞文版，第433页）众所周知，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十分不正确的。

③ 读一遍黑楚斯·厄南德兹写的剧本《斗争中的西班牙》，就足以了解情况了。

希特勒締結了公約時，大部分國家的共產黨都完全莫知所從。因為，如果說，為了要使本國在尽可能長的時期內不遭受侵略而締結互不侵犯公約是可以理解的，那末也不應當使各國共產黨人受到蒙蔽，更不應當使他們看不見法西斯主義是他們在國內和國際上的主要敵人^①。

^① 例如在法國，根據保·路易的材料（《法國社會主義史》），在1940年1月，有五個共產黨議員被逐出議會，因為當議會向前方戰士致敬時，他們沒有起立。後來議會宣布將一切承認這一公約的人除名。這時，在二十七名共產黨議員（為七十二名之誤。——譯者注）中，有十六人逃走，三十五人入獄，十五人被動員入伍，而有五個人反對斯大林的政策。

第三章 哲学和理論問題

斯大林不仅想作为国务活动家，而且想作为一个理論家，在馬克思主义理論的一切領域，甚至在更广的範圍內起着头等的作用。这种願望充分表現了一种健康理性的思想方法的勃勃的野心，它相信它永远能够运用絕對真理。这种願望同时还表明了文化知識的狹窄，以为一个人当真能够在若干大的科学領域有指望成为权威。

斯大林的辯护者們花了很多的力气，并且一心希望在斯大林关于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篇小小的著作中，找出馬克思主义理論发展的“最高阶段”，这样也就暴露出苏联的精神生活的深刻的異化状态。因为斯大林写这一著作是抱着普及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图(其实它并不完整、也不出色)，所以沒有必要在一本馬克思主义史中来叙述它。可是它自以为是第一次完整地将唯物辯证法系統化，并且把馬克思主义提高到“更高的阶段”，这就不能不引起每一个知道欧洲的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知道哲学著作的解釋方法、分析和風格的人的理所当然的嘲笑。由于这些原因，就应当整个地来研究它，而且这也因为对于苏联整个哲学和社会学的創作活动來說，这一著作成了一个高不可攀的典范，因而就意味着一种或者不可能、或者不应当超越的界綫。

可是，斯大林的确是缺乏写一本稍微有点独创性的哲学著作所要具备的一切条件。他既缺乏哲学素养，也缺乏比較銳敏的思想方法，同时也缺乏研究这些問題所必需的时间。斯大林实际上

是一个“第二手的”理論家。这就是說，如果他比方說从第一手材料中已根本上了解了黑格尔，那他就不会从字面上去理解馬克思关于把黑格尔順正过来的比喻，就不会把馬克思主义理解为用通常的办法以唯物主义的范疇来代替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范疇。斯大林的观点实际上是典型的順正过来的黑格尔主义。

因此他就犯了与黑格尔同样的本体論的錯誤。整个自然界成了不可避免的規律的一种体系和联系，这些規律又必不可免地产生人类的运动。对于辯证唯物主义來說，这里包含着有一部分真理，但無論如何不是全部的真理。如果說历史的运动也受到事物的本体結構的作用，那末它并不是絕對地、朝着一个方向地、机械地起着作用的。正因为如此，根据本体論的規律对历史过程所作的每一种推論(这是斯大林所特別喜欢的)，都忽視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即忽視了人本身。

因此，关于革命是由量轉化为质，或者关于社会生活中的矛盾这样一些乍看起来是合乎邏輯的和正确的結論，都表現为將辯证法規律机械地搬用到历史上去。首先斯大林从来沒有想到，在这些規律中(而他根本沒有提出究竟有多少規律的問題)，還沒有一条規律經過了充分的研究，以至于可以有把握地被运用到像历史事件这样复杂的事件上去。就以关于质变和量变的关系的辯证規律为例，我們在前面即已指出过，它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并且迄今为止对这一規律的解釋，在許多方面都是粗淺的和公式化的。

而正是基于这种本体論的公式，斯大林把自然界的東西与历史的東西等量齐观，所以他会得出結論說：“既然从緩慢的量变进到迅速的、突然的质变是发展的規律，那就很明显，被压迫階級进行的革命变革，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免的現象。

这就是說，从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人階級摆脱資本主义压迫，不可能通过緩慢的变化，通过改良来实现，而只能通过資

本主义制度的质变,通过革命来实现。”^①

并且这里还以一个过程发展的速度和形式代替了这一过程的实质。所有这些观点的基础,是关于一种质的片面的看法,认为这种质除了急剧的“革命的”变化以外,当然不能有其他的变化。可是他絕沒有想到,一个社会(这里指的是資本主义社会),是多价的、多质的,这种“飞跃”在历史上会表現为一系列的“飞跃”,一系列比較細小的革命的变化,它們不一定具有把旧社会的一系列重大因素急剧地消灭掉的那种革命所具有的彻底性和光輝性。同样地,斯大林从关于矛盾的規律中引伸出了这样一段話,他說:由此可見,“不要掩飾資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矛盾,而要暴露和揭开这些矛盾,不要熄灭階級斗争,而要把階級斗争进行到底”^②,这时他又好像把人和人类历史看作一种无限的宇宙钟表的因素,这种宇宙钟表按照自己的辯证力学的不可避免的規律运动着。好像根本不存在人們以特殊方式参与其事的可能性,其实,人的参与也可以把发展过程引向“自然的結構”所未有过的方向。好像妥协不是一种人的行动,它可能有时在历史上是十分有害的,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几乎是“革命的”行动。好像人类当前要作出妥协以积极共处的願望,不比其他任何一种主張使現代世界的矛盾极度发展的观点更加革命、更加合乎人道,不正是对于人类生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可見,斯大林是按照古典力学的精神来理解規律的。或然率規律、統計的規律性,而尤其是对于了解历史运动相当重要的規律一傾向,在斯大林看来根本不算是問題。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才会完全非辯证地仅从自然界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并且把历史規律看作不因人們的自觉活动而发生任何变形的自然規律。因此,他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式也具有同样的特点,这个公式是:历史

^① 《論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参閱斯大林:《列宁主义問題》,第711頁。

^② 同上。

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①。

其实，问题恰好不在于此。不在于把一种总的辩证的观点应用于历史，而在于需要对那种叫做人和人类历史的极其复杂的现象进行辩证的和唯物的分析。而人类历史不仅是无限的本体的钟表的运动中的一个因素，而同时也是人的创造。

在斯大林的这种关于馬克思主义和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观点中，人完全消失不见了。现代世界的决定性问题，即异化问题、人道主义问题，都从哲学中被抹掉了，虽然实际上它刚刚开始在国际范围内成为现实的哲学和社会问题。当比较敏锐的文明思想开始孜孜探究这些问题，当谢勒、海德格尔、穆尼埃、萨特和其他许多人都感觉到（每人在自己见识的范围内），人的存在和个性问题是当代最突出的问题的时候，斯大林却以自己的著作开始了苏联哲学发展上的一个令人厌烦的阶段，以为整个哲学已由方法和理论的那七个特征包括无遗，而连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也不提出来讨论。

在斯大林关于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一机械论的观点中，前面提到的那些问题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如果他像在最初时期的理论活动中所表现的那样，在群众和个人的选择中，把群众问题理解为馬克思主义的关键问题，那末由此也必然得出其他的结论。既然他认为彻底建成的官僚主义的国家主义就意味着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解放群众，而解放群众是解放个人的前提，那末必然会得出结论说：个人自由的问题，即消除异化的问题，这样就在由他领导建成的社会制度的本身中得到解决了。既然个人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已经通过国家本身的行动得到了解决，并且这种解决是由宪法本身庄严地加以宣布了的，那末一般来说，

^① 《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参阅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703頁。

怎么会把这个問題作为哲学問題提出来呢！

斯大林的哲学观点的特点，也在于方法和理論的分离，这就可能使得許多方法論的問題得不到唯物主义的說明（这一点我們在談到苏联哲学后来的发展时将会讲到），同时可能使得“理論”問題得到非辯证的解釋，而斯大林在这本著作中就是这样做的。相反地，将辯证法同这一辯证法的唯物主义解釋分开，以及将唯物主义同这一唯物主义的辯证解釋分开，在馬克思主义來說是不可能的。前者会导致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后者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庸俗的唯物主义。

在方法方面，斯大林毫无根据地把整个辯证法問題归結为四个特征，而忽略了一系列基本的哲学問題，同样又把整个唯物主义归結为三个特征^①。如果这只是他的一种內心的想法，事情还不会如此地带有悲剧性。但是，当这成为了法規，成为了哲学思想只能在其中轉圈子的不可改变的框子，那末这种观念和一切以这种观念作为絕對的基础而写出来的著作的貧乏和消极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在斯大林对于思維和認識的解釋中，唯物主义与辯证法分离的这种非辯证的性质表現得最为明显。馬克思在他的青年时代的研究中就对实践有了比較深入的理解，并从这种观点出发，与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反，提出了关于人、人的意識、認識和人类历史的新的、更深刻的观点，而斯大林却又回到馬克思以前的庸俗唯物主义的立場上去了。他說，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认为：物质、自然界、存在，是在意識以外、不依賴意識而存在的客观现实；物质是第一性的，因为它是感觉、观念、意識的来源；而意識

^① 斯大林举出了普遍的联系、运动、量到质的轉化和矛盾的統一和斗争作为方法的特征，而举出了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識的第二性以及認識现实的可能性作为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范疇、否定、一般和特殊、異化、人道主义、邏輯原則等基本的哲学問題，好像在馬克思主义的哲学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因为它是物质的反映，存在的反映；思維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的产物，即人脑的产物，而人脑是思維的器官；因此，如果不願意大錯特錯，那就不能把思維和物质隔开”^①。

在对实践問題的解釋中充分表明了，斯大林的这一观点比馬克思对这一問題的解决要落后多少。

正如斯大林喜欢由哲学原理演繹到历史領域一样，他根据馬克思的观点得出結論說，社会的物质生活是第一性的，这当然是指它制約着历史运动中的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方面而言。但是，同时他不是根据馬克思的观点，而是根据自己的本体論断言，“社会的物质生活是不依赖于人們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是存在的反映”^②。由此必然得出結論說，社会也根据那种独立存在的客观現實的不可避免的規律而运动，因此就有一个問題：如果不是由人来改变这个历史現實，究竟由誰来改变它呢？而他如果不是根据自己的願望，或多或少地意識到这些改变的性質，又怎么能够来改变这个历史現實呢？換句話說，当馬克思說人們是处于不依赖于他們的意志的一定的关系中时，这說的是一回事，而这些关系到底又是人来創造的，因此也是取决于人的，这一点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既然斯大林从这一著作中简单地取消了一切特殊的邏輯問題，那就必然地不再把这一問題理解为辯证唯物主义的問題，而是把它理解为形式邏輯的問題。苏联的哲学战綫不久以前才在形式邏輯的各种教科书中涉及一些新的問題，这些教科书至少要比現代的邏輯理論落后五十年。

下面一个因素同样也是一直在苏联理論思想的发展上起着十分消极的作用。斯大林把历史唯物主义也納入馬克思主义的哲学

^① 《論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參閱斯大林：《列宁主义問題》，第 712 頁。

^② 參閱同上書，第 716 頁。

範圍內，因而把不适当的界限和研究方法强加于社会学这一专门科学的问题上。当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在进行研究的工作方法上有了长足的进展时，在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社会学的题目则由于抽象的哲学方法而不得不忍受普罗克拉斯提斯式的约束^①，这种方法只能解决社会学的一般理论问题，当然也是基于以往的许多经验的材料。

但是，苏联的现实在社会学研究的放大镜下面，必然会表现出一系列和公开宣布的自由、社会关系的和谐、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没有矛盾等等的说法不相符合的情况。因此整个社会学的思想必然要在抽象概念里面转圈子，这些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抽象概念，是斯大林在前面已经分析过的关于国家、国家所有制、思想体系等问题的观点中提出来的，它们已经远远离开了经典作家的观点，以致可以理解为十足的修正。

在这一著作中，斯大林还进一步提出了也是作为进行一切研究的框子的思想，而它同时也和斯大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矛盾尖锐化的观点有着显然的矛盾。这种思想断言，在苏联，因而也就是在建成了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②。

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基本的辩证的矛盾，由于一道命令便从历史上勾销了。那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作用的又是哪些矛盾呢？于是苏联的理论界便通过日丹诺夫个人来努力作出解答。

斯大林的辩护者们断言：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作出了创造性的总结，并且具有最高的水平。这种话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及其所达到的高度和这一著作本身是相同的。恩格

① 普罗克拉斯提斯是古希腊的强盗，他把俘虏绑在铁床上，身体比床长的，把足切断，比床短的，就用力拉得和床一样长。——译者注

②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参阅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202页。

斯的《反杜林論》，虽然是論战性的著作，从理解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同这种企图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斯大林作为自己的哲学遗产，留下了一幅描繪世界和历史的貧乏的、庸俗化的、本体論的图画，它設想可以把现实納入几个特征之中，并且可以根据这些特征来划分历史的断代，就好像用五年計劃来划分某个国家的一个发展时期那样。

但是，现实的本体結構不是像斯大林所設想的那么簡單，历史也不是那样絕對地服从这一本体結構。他的历史观和社会主义观在人的問題上破产了。

* * *

关于斯大林的理論观点和实践活动，已經出現过无数篇文章，有极力为他辯护的，也有最具有批判性的，还有抱彻底虛无主义态度的。关于斯大林的精神結構、思想結構、思維方法和他对馬克思主义的看法，我們在分析他的主要著作的过程中已經談到了。

鉴于在他的領導之下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也变成了现实，所以就需要对他的活动概要地加以說明。而在这方面，并且是在馬克思主义者之間，也存在着一些极为不同的看法，有的絕對否认他的活动的社会主义性质，有的則把他的活动和真正的、完善的社会主义等同起来。

毫无疑问，从国内的角度来看，斯大林在許多方面促进了苏联的进一步的强大。虽然他是用粗暴的手段，花費不必要的牺牲而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及其所需要的巩固的物质基础的，但这和旧俄比起来还是前进了一大步。同样地，其結果还大大扩充了文化基础，促进了許多过去还处于封建制度以前的关系中的民族的发展。

这是很少有人否认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从国际的、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评价他的活动就要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最通常的情况是把斯大林主义制度宣布为国家資本主义。但是，比較一下

这两种制度，还是会发现某些重大的区别，它们说明不应该这样来看问题。首先，国家资本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且是在还存在私人资本的情况下产生的，而斯大林主义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对私人资本的一切残余的斗争中产生的。在国家资本主义下，除了生产的国家成分、国家所有制之外，还存在实力强大的私人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而在苏联，则只有生产的国家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因此，在国家资本主义下就仍然存在财政资本的或大或小的影响，而在这里说的第二种情况下，这种影响根本是不存在的。十分明显，在其他许多社会现象方面也必定存在着区别，这些现象是由于存在大量或强或弱的资本主义集团和组织而产生的，而在连这种集团和组织的最后的残余都已经被清除的制度下，这些现象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此，这两种制度的基础是不同的，不应该把一种制度归结为另一种制度。这两种制度中近似的东西、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同一的东西，是国家的作用，国家对国内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干涉。在国家资本主义下，国家垄断还是部分的，而在斯大林主义下它则是总体的、绝对的。因此只能得出结论说，当社会主义制度中基本上还只存在国家的所有制和国家对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垄断时，社会主义的这个发展阶段表明：国家资本主义中的同样的因素和过程，实际上已经是国家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

这种国家主义的现象，基本上也是当代的重大现象之一。国家主义作为一种垄断、干涉、国家的领导，在历史发展的现阶段，是在各种各样的基础上，并且是经过极不相同的过程产生的。

首先，它是从古典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必然的转变，因为私人资本再也不能在一切生产部门进行正常的扩大再生产，并且已经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力量，在现代世界的矛盾中把自己的资本也投到没有赢利的、但却需要巨额资本的部门中。

第二，在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解放的过程中，国家主义表现

为一种进步的現象。这些国家在国内存在着资本主义，它們不願走古典的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是它們的压迫者），而要实行社会主义，它們又还缺乏許多前提条件。随着国家成分的加强，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就成为进到新的社会形态的最有成效的过渡阶段。

第三种情况发生在这样一些国家，这里社会党和工人党通过議會道路掌握了政权，这里通过国有化和由国家施行的各种限制和經濟政治上的干涉，来限制私人資本并加强生产和管理上的国家成分。

这一社会現象的第四种情况正是发生在苏联。这里，在革命以后，在摧毁了资本主义国家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实现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国家化，即国家机器对社会过程的一切領域的绝对統治。

最后，一定形式和一定程度的国家主义必然也会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这样一种情况下存在，这时在社会机构本身实现了更深刻得多的改造和过程。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时期，而过渡的意义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主义的因素必然会得到发展。劳动者的自治是共产主义的一种基本的因素，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定要有一个与此相适应的国家消亡的过程。可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主义，必然在本身中包含着自己的否定，即包含着在社会生活结构中使国家主义削弱、使国家主义消亡、也就是使国家壟断消亡的过程。

斯大林沒有使革命退回到它的起点，退回到资本主义。他却用最粗暴的、非社会主义的方法消灭了富农这一农村的资本主义成分，并彻底剝夺了城市的资产阶级。但是，他把建成了的社会主义理解为万能的社会主义国家，理解为总体的国家壟断以及党的机构和国家机关合而为一。他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保守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最低阶段，即革命时期的阶段，那时无产阶级必須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并且为了保卫革命和开始恢复和組織生活，而把一

切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新的国家手中。

斯大林不是把这一阶段理解为着手实现更深刻的社会主义过程和改造的一个因素、一个必要的环节，而是像对待我們所說过的其他許多因素一样，把它加以绝对化。他不是用列宁的创造性的方法，把国家主义的官僚主义看作必然的灾祸，并把群众的解放和群众的自治看作对官僚主义的一种牵制和出路，而是本身成为这种国家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发展的最低阶段的主要代表者，并且用自己的行动和措施把这个阶段弄到了最彻底和最完全的程度。

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就提出了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的论点，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既然把社会主义与国家壟断和国家极权主义等同起来（当然是在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那末也就会设想，社会主义的完全实现是可能的，因为把整个生活都置于国家机构的绝对领导之下，是可以办得到的。

这样斯大林就陷入了可笑的矛盾之中，因为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的提法本身就是一种奇谈。尽管社会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但它同时又是一个过渡社会，而过渡就是指在这种社会中，资本主义因素（在经济上、政治上、人的思想意识上）在消亡着，而共产主义因素在产生着、形成着和加强着。因此，社会主义任何时候也不可能建成，因为它从革命的胜利结局一直到共产主义始终是“被建设着”，也就是说，它处于自己不同的阶段和过程中，它不断被“破坏着”，又被“建设着”。那些被破坏着的东西按其来源来说并非社会主义的东西，正如建设着的东西按其前途来说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而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东西一样。总而言之，建成了的社会主义是含有形容用语上的矛盾的提法。

可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点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社会主义的彻底发展的第一阶段即最低阶段，是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阶段。强大的无产阶级国家和在很大程度上的初期的国家壟断（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主义），在迄今为止的无产阶级革

命的历史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現象，是进步的和社会主义的現象。社会主义的过程本身，如果希望逐漸实现新时代的基本要求，即首先消除劳动者在經濟上的異化，然后也消除其他形式的異化、无权和从屬的現象（不管是对私人資本家的从屬，还是对国家官僚的从屬），就必定要通过克服这种最低的、国家主义的阶段来发展，并实现越来越多的群众自治。

斯大林則是循着相反的途徑，即通过加强国家机构，加强国家的和党的以及警察的官僚制度来实现这一过程。通过这种大力发展的国家主义壟断，通过其他許多变形，斯大林建立了一种变了形的社会主义制度，它将作为斯大林主义而载入历史。个人迷信不过是已經变了形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后变形。

完全可以理解，在这种凑合而成的社会主义中，一系列最引人注目的現象完全丧失了社会主义的性质。

換言之，斯大林主义是意味着把党和整个国家机构变成国家主义首脑的馴服工具，是意味着把这个最高的一級宣布为不仅在政治問題上，而且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領域內的絕對的裁决者。斯大林主义实质上意味着害怕和不相信群众、工人和知識分子在生产上和文化上的主动性，并且郑重其事地提出了一种幼稚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文化生活是一种可以而且必須按照官僚主义的指令，按照无休止的和令人厌恶的官方理論原則的提法来开展的生活。斯大林主义使整个社会及其各个阶层依从于国家主义官僚，它是俯首听命的精神的同义語，而只有“叫化子才是俯首听命的”，这是年輕的馬克思有一次引用过的偉大的歌德的話^①。

斯大林主义也是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身的这样一种变形，它可以对个人橫加暴力，像1936年至1938年間的审讯那样，造成社会主义史上最大的污点。斯大林主义按其形式來說也是把粗暴

^① 歌德的原話是，“只有叫化子才是謙遜的”。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頁。——譯者注

性(在革命性的假面具下!)加进人們的关系中,輕蔑地拋棄人道主义思想,把它看作某种頹廢的唯智論的幻想,虛伪地坚持进行大胆的、公开的和尖銳的,并且是自夸的批評,可是只有官僚、官僚的最高阶层才有資格进行批評。

一句話,斯大林主义是彻底实行和經過变形的社会主义低級发展阶段,是由国家对社会生活进行統治的阶段,是这样一个阶段,这时主要的重点不是放在自由的和自豪的社会主义个人身上,也不是放在群众身上,而是放在拥有莫大势力的国家主义官僚身上。

· 第六篇

現今时期的馬克思主义

(一) “社会主义陣营”中的 馬克思主义

第一章 安·日丹諾夫和約·維· 斯大林在理論上的干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留下了荒无人烟的廢墟，而且也在人类面前提出了簡直是生死攸关的問題。经历了本世紀如此深重的災难之后，人們有理由在最后时刻提出一个問題——具有如此高度文明的人用如此殘暴和非人道的方式解决自己問題的时期，是不是已經过去了呢？集中营、瓦斯暗室、戰場上的大規模屠杀和原子毀灭的时期，是不是人类历史上不会再重复的可耻一頁呢？人能否消除彼此間的某些对抗并把历史进程引向新的途徑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新的力量配置。首先由于苏联付出了巨大牺牲和承受了战争的最大負担，以及由于在許多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南斯拉夫)中共产党人的英勇斗争，社会主义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声望和同情。一系列新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設的道路，苏联在历史舞台上再不是孤立的了。

历史的辯证法这一次也嘲弄了人們的理論和推断，再次指出了死板的尺寸無論如何也不符合历史。按照一般理解的馬克思主

义观点,現代世界的基本对立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的对立。这沒有任何理由說不正确! 然而复杂的历史运动在一定时期(这个时期永远是具体的和对人存亡危急的)把暂时掩盖了上述对抗的新对抗投入了斗争的舞台。結果,在这个时期中反动的法西斯国家同其他資产階級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最后也成为它們的盟国)之間的矛盾,便成了主要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也开辟了一个新的意义重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蓬勃的解放斗争时期,在这些国家中主导的力量往往不是无产階級力量,而是进步的資产階級力量,或者甚至是民族军队的一些集团。这些对于現代历史时期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过程,在階級力量的对比、政权的性质、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对資本主义和对社会主义的关系方面,必然表現出一系列新的特征,而这一切尖銳地要求以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明确分析这些过程和制定正确的政治方針。

仅仅这些因素便足以向苏联馬克思主义者提出一个关系重大的問題,即估計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和其中出現的新的矛盾,可是斯大林这一次又蹣跚地走上了荒徑絕路。他看不到和平的問題是現阶段的關鍵問題,是能使人們不分社会制度而結成新的集体的一种因素,却仍然用那些陈旧的划分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来估計整个形势,并把集团的实力政策认定是唯一有效的手段。

国际帝国主义反动派也持有这样的立場,他們同样把軍事集团看成是对抗和防御社会主义的最好手段。因此,划分利益范围,便成为这种立場的合乎邏輯的后果,同时也成为在大国会議上占着中心位置的議題。在这种划分世界的热潮中,南斯拉夫也有“幸”被划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反法西斯主义的英勇斗争竟得到这样的奖賞。集团之間的冷战已經露头,它是这种观念的必然后果。

斯大林关于現代世界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的观点，没有什么重大的改变。相反，鉴于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登上历史舞台，他竟认为本国的国家主义的政策和方法可以简单地搬用到其他国家中去。对于各个国家情况的特殊性、它們的傳統、經濟和文化的发展程度、民族的特点等等，一概不加考虑。苏联必須是社会主义建設的根本不可觸犯的榜样。既然苏联已經宣布社会主义建成，所有其他国家就得走同样的路，而不管这些国家的一系列的新的因素和一系列的特征。

斯大林的官僚政治，实际上是企图在其控制下的其他国家建立起完全从屬苏联政治中心的同样的官僚主义組織。

在理論方面，必然要为此制造出一种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有統治权的新观点，其必然結果是，把理論观点强加于其他一切共产党，抱着蒙昧的民族主义的野心，力图证明俄罗斯和苏維埃的科学在几乎一切文化和文明領域內領先。我們亲眼見到，在战后的头几年，官僚主义壟断制如何发动了一种典型的反国际主义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苏联学者和政治家抱着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緒，竭力把俄罗斯民族和苏維埃国家說成在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領域內都是优越的。

安·日丹諾夫在《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問題上，尤其是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所著《西欧哲学史》一书的討論中的干涉，特別助长了这一情况的发展。按照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国家和党的官僚主义机构是基本的裁决者，这种观念在战后也以同样的形式繼續存在下来。中央委员会对任何不符合已經宣布的公式的現象都进行干涉。它的指令成为文化和科学的創作与发展所必須遵循的框子。

为了在社会主义集团內和在集团外的其他共产党內实行政治統治，便宣布苏維埃国家是整个进步人类的榜样，与此相反，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文化只不过是一堆沒落和腐朽的东西。日丹諾夫写

道：“社会主义問題被提到了欧洲許多国家的日程上。这是各色各样的帝国主义者所不高兴的，他們害怕社会主义，害怕我們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它是整个先进人类的榜样。……在这些情况下，苏联文学的任务，就不仅在于給打击者以打击来回答这一切对于我們的苏維埃文化和社会主义的丑恶的誹謗和攻击（指帝国主义进行的誹謗和攻击。——作者注），而且还在于大胆地鞭撻和攻击那处在衰頹和腐朽状态中的資产階級文化。”^①

整个历史情况只具有紅白两色，其中一切市民階級、即資产階級的东西只有一个烙印——頹廢性。而且当資产階級世界在技术进步和技术水平方面都比苏联高，無論科学或艺术都相应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果（尽管还有一系列頹廢現象，整个資产階級世界存在着危机）的时候，仍然死抱着这种看法。

把科学問題同样加以簡單化和作不科学的解釋的，还有日丹諾夫关于哲学史对象的論点，这实际上显然是庸俗社会学的論点。日丹諾夫把整个历史仅仅归結为革命階級和反动階級的斗争，并且把哲学作为直接的意識形态的反映分攤給其中每一个階級。“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別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末，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②

这个极其不精确和片面的論点，立刻成了使哲学“党性”获得充分表現的基础。立刻就有人出来研究，千方百计地力图表明唯物主义是何等进步的哲学，而唯心主义却是何等反动的哲学，这样便

① 日丹諾夫：《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参閱《論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1頁。一年以后，日丹諾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一书的討論会上結束他的报告时高呼“国际主义的”口号道：“我們的时代，是列宁斯大林时代，是我国人民的时代，是我国人民成了胜利者的时代，我們要不愧为这个时代的人！”（《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討論会上的发言》，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0頁）这里不需要多大的智慧，就能发现在圣洁的外衣掩盖下的俄罗斯社会主义。

② 《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討論会上的发言》，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頁。

把这个极其独特而复杂的问题彻底庸俗化了^①。任何“指令”都不能否定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康德、费希特或黑格尔哲学的进步意义，他们的唯心主义不仅标志着哲学发展中的一个时代，而且也是进步的历史力量的表现。这里的特殊性在于，一系列的特殊因素决定了在唯心主义范围内进步的哲学内容的形成，而唯心主义范围在所有这类情况下对于这些哲学促进人类思想的发展这一事实，是无关紧要的。“但是由于上述哲学家所属的社会力量的基本历史倾向，他们的体系必然面向具体的现实、自然界和人，并且由于自己具有往往是非常明显和有决定意义的唯物主义内容而成为人类科学意向的基本表现。因此，他们的体系最好不过地证明了，不能简单地把哲学史解释成唯心主义体系和唯物主义体系斗争的一幅简单化图景，因为在历史进程中，这些体系本身在许多情况下必然既含有唯心主义，又含有唯物主义。总之，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不仅是作为社会上两极分化的表现的意识形态对立，而且也是人类的思想为争取本身的活动有明确的科学基础而进行的内在的根本斗争。”^②

我们的任务，并不是列举日丹諾夫在这次讨论中所有不正确和简单化的地方^③，但还有一点是特别典型和重要的。日丹諾夫根据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相协调的论点，企图使社会主义制度也符合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关于对立面

^① 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列奥諾夫在其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书中写道：“唯心主义始终是对唯物主义的反动，总是力图使人类从科学的进步成就向后倒退。某些唯心主义者在与唯物主义的斗争中有时也提出过一些新问题，但是他们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来解决这些问题，原则上是不可能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194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40页）既然这是一种官方立场，他们的其他一切教科书和著作只好重复同样的论点。

^② 普·弗兰尼茨基：《哲学研究和批判》，1957年贝尔格莱德塞文版，第141—142页。

^③ 参阅我所著的《就日丹諾夫对亚历山大洛夫的批评谈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问题》，1950年塞文版。

渗透的規律是现实运动的一个基本辯证規律的論点。既然社会經濟基础內的对立(这些对立在馬克思主义看来是根本性的)被排斥于社会主义制度之外,日丹諾夫于是宣揚新的对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动力。“在我們苏維埃社会已經消灭了互相对抗的階級,因此新与旧之間的斗争,从低級到高級的发展,不是表現在对抗階級之間的斗争形式中,不是表現在社会生活的急剧破坏的变革中,如像資產階級社会那样,而是表現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形式中,这就是我們发展的真正动力,这就是党所掌握的强大工具。这无疑是新的运动形态,新的发展形式,新的辯证規律性。”^①

日丹諾夫以及后来一切闡述上述論点的人都沒有觉察到,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相协调的非馬克思主义观点把他們引导到了十足的唯心主义。因为,如果属于思想領域的批評与自我批評是新的运动形式和新的辯证規律性,那末自社会主义以后基本的历史規律性就不再存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和社会經濟关系中,而存在于批評与自我批評的思想領域內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观,竟由于他本人所追求的社会“理想”的实现,而不再适用了。

首先,“批評与自我批評”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而且,如果官僚主义地把它理解为“党所掌握的强大工具”(日丹諾夫語),那末人类社会已經有过一些历史时期,当时批評由于沒有受到任何壟断的压制而起过更为强大和更为重要的社会作用。进步的、資產階級的批評在許多国家內曾是它們革命的先声,尽管这种批評当时并不是“运动的基本規律”。

在这方面,社会主义(虽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批評就其建設性而言,可能在許多方面有更大的意义)同其他制度比較起来,就社会过程本身的基本規律性而言,并沒有有什么特殊不同的地方。生

^① 日丹諾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討論会上的发言》,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5頁。

产力发展与整个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之間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何况我們知道，社会主义是整整的一个改造时期，在这个时期內不仅必然要消灭资产阶级时期的残余，而且要消灭一切阶级时期的残余，即各种必然与整个社会发展发生矛盾的关系。

苏联官僚在政治和理論上的野心都是很大的。在政治方面，苏联官僚认为自己的“紅軍”是今后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过程中所能指望的唯一可靠的力量，并且和在第三国际的第二个时期的做法一样，力图使自己的政治观点成为一切共产主义运动所必須遵循和不能触犯的观点。情报局就是根据这种路綫建立起来的，它是作为贯彻一种政策的尝试和工具在新的名义下产生的。但这种政策絲毫不是說什么深刻的洞察力和广泛性所能掩飾的，按其許多特征来看，这种政策是落后于现代历史的复杂事件和过程的。

正因为如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与这些非馬克思主义的和非社会主义的野心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关于这一点，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篇里談到。

在理論方面，在社会科学領域內，党—国家主义的壟断在陣营內的所有国家中使理論思想一直处于苟且偷安的可悲状态中。剩下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狂热地闡述其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对所壟断的东西又完全外行）的某些观点和提法。因此，苏联理論思想便完全忘記什么是科学的批評立場和态度了，因为任何討論只能在既定的範圍內进行^①。

苏共中央在 1948 年进行了上述理論干涉之后，又进行了两次

^① 因此，他們的理論书刊給人一种非常討厭的印象，使人觉得在这些理論书刊中某种較激烈的批評观点总是只有在事后，即在党政领导发表批評以后才出現。不言而喻，他們发表的科学和哲学著作，就都成了堆积无聊乏味的东西和不断“研究”既定观点的場所。如果我們再补充一点，就是这种科学和哲学著作还充滿政治詞汇和思想标准，那末我們可以設想，这种思想在国际範圍內的领导作用会是怎样的了。

干涉：一是对音乐、二是对生物学的干涉。在音乐問題上，袒护特別表現在十九世紀的俄罗斯音乐中的民族旋律的傳統，而这可以說是在犯一种最通常的时代錯誤；而在生物学問題上，則支持那个維護米丘林的观点、反对孟德尔—摩尔根染色体遺傳理論的李森科^①。

这样一来，最高的政治人物便成了最高的万能专家——不仅成了政治和經濟政策方面（政治人物的真正的职责範圍）的专家，而且也成了文学、音乐、哲学、生物学方面的专家，而稍后又成为語言学等等方面的专家。

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向普魯士书报檢查制度作斗争时，就以特有的笔調尖銳而巧妙地写道：“你們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們为什么却要求（引文此处刪去“世界上”三字。——譯者注）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閃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無論它照耀着多少个体，無論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②

^① 当米丘林強調有机体及其生活必需条件的統一，并由此推論出这些条件必然参与影响有机体变化时，他的观点無論如何是很有根据的。虽然米丘林和李森科有理由反对把有机体非辯证地划分为它的軀体和遺傳质，并坚持“軀体”的变化影响遺傳质这个論点，然而李森科的营养杂种毕竟絲毫也不足以证明，軀体部分对于遺傳性有着与染色体同样重要的作用。李森科在其《生物科学状况》的报告和《結論》中斷言，“有些人至今还不清楚，不但染色体而且生物的任何小部分都具有遺傳性。”（李森科：《生物科学状况》，天下图书公司1950年版，第74頁）这个观点使得他后来反对偶然性和盖然性，反对生物过程中所具有的統計学規律。“摩尔根主义者不能够揭发生物界的規律性，便不得不求助于盖然性理論……把孟德尔主义—摩尔根主义—魏斯曼主义从我們的科学內消灭掉，这样一来，我們就把偶然性驅逐出生物科学之外。”（同上书，第88、89頁）

按照我們的想法，关于自然界和有机体的統一这个正确的思想（由此得出人可以能动地掌握有机体的变化的观点），絲毫沒有必要攢棄有机体发展中的統計規律性和偶然性。这种观点实际上处于两个多世紀以前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水平上。

^② 《評普魯士最近的书报檢查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頁。

馬克思嘲笑這些書報檢查官的全才，並得出結論道：“我們在这种**博學多才的官僚**的階梯上登得愈高，接觸到的人物也就愈使人感到惊奇。”^①而在上述情況中，我們也确实碰到这种有本領在人类的思想和理論活動的几乎一切基本領域內充當不可侵犯的裁決者的“使人感到惊奇的人物”。与此相反，偉大的列寧却公开承認对許多这样的領域并不內行。

在这些事件后不久，斯大林又进行过两次干涉，就是对語言学（1950年）和社会主义經濟問題（1952年）討論的干涉。他的論著自然被宣布为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高水平，于是在这以后的几年，馬克思主义理論主要是在这些論斷的範圍內活動。

在語言學問題上，斯大林与馬尔及其学派相反，提出了这样的論点：語言不屬於上层建筑，因为上层建筑随着基础的变化而变化，而語言并不随着这些变化而发生根本变化。語言是为全社会而存在，为全社会服务的，从它作为人們之間的交际工具这个屬性来看，它对于全社会是共同的。存在着同行語、“客厅語言”等等，但这并不是独立的語言。文化可以分資產階級的和社会主义的，但語言却是全民的^②。

斯大林在批評关于語言是上层建筑的論点时，根本沒有回答应把語言放在社会結構的哪一部分的問題。而他举出来反对关于語言是上层建筑的論点的論据，还不足以說明这个論点必須彻底拋棄。

对馬克思主义來說，这里确实存在着尚未全面解決的問題：在階級社会里，难道上层建筑的每种形式都必須是具有明显的階級特性的？难道它始終必須随着社会基础的变化而发生根本变化？难道階級社会不也是社会，換言之，不也是某种統一體？难道这种

① 《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頁。

② 參閱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11頁。

統一的因素不應該有自己的統一表現（這種統一表現會按照各個社會階層的情況發生變形，但不會完全相異和只反映階級的差異性）？例如，在另一種上層建築現象即宗教領域里，就存在着這樣的情況，它在幾個社會經濟形態中存在的形式一直是幾乎相同的，基督教就是這樣。

另一方面，不能否認語言的發展（指語言的結構的發展，而不只是指它的形式的變異）隨人類實踐的發展而發展的事實。從原始公社的羅囉而多義的語言的各個不同階段到現代語言的現代結構，語言結構的變化反映了人類實踐對自然和社會的改造的變化、社會生活日益增長的複雜性和需求，因此，如果不把語言也看成是社會上層建築的一種特殊形式，要解釋這些因素就困難了。

在這一著作中，斯大林就語言發展問題企圖修改量到質的轉化的辯證規律，這樣他實際上就同現實的辯證法觀點發生了某種矛盾。斯大林斷言語言的發展不是像上層建築的發展那樣通過破舊立新的方式進行的，並得出結論說：“並且語言從一種質過渡到另一種質，不是經過爆發，不是經過一下子破舊立新，而是經過語言的新質和新結構的要素逐漸的長期的積累、經過舊質要素的逐漸衰亡來實現的。”^① 斯大林還要走得更遠。他不僅縮小這個規律對語言的作用，而且認為某些其他歷史現象也不服從這個規律。根據他的這種新觀念，自然界和歷史的某些領域是按照這個規律發展的，而某些領域則是按照典型的進化論者的觀點發展的，這些進化論者早就宣揚自然界沒有飛躍。“總之，應當告訴那些醉心於爆發的同志，從舊質過渡到新質經過爆發的規律，不僅不適用於語言發展的歷史，而且也不是在任何時候都適用於諸如基礎或上層建築之類的其他社會現象。對於分成敵對階級的社會，爆發是必需的。但是對於沒有敵對階級的社會，爆發就決不是必需的了。我

^① 參閱斯大林：《馬克思主义與語言學問題》，第 25 頁。

們曾在八年到十年的時間中實現了我国农业从資產階級的个体农民的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制度，这是一个消灭在乡村中的旧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可是这个变革的實現，不是經過爆发，就是說，不是經過推翻現政权和建立新政权來實現的，而是經過从乡村中旧的資產階級制度到新的制度的逐漸过渡來實現的。这件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这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这种变革是根据現政权的倡导、在基本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實現的。”^①

斯大林在自己的这些观点中首先否定了辯证法的基本原理之一，也就是辯证法規律貫穿于整个現實的原理。因此，辯证法的一个規律只获得了局部价值。它的作用的普遍性不仅遭到怀疑，而且也被否定了。

另一方面，剛才引过的斯大林的一段話表明，他完全不懂得問題的实质。他虽然承认消灭資產階級的个体农民制度是革命，却认为它不是由突变(爆发)來實現的，因为它不是“經過推翻現政权和建立新政权”來进行的。斯大林沒有看到，这里所指的是一个社会过程的两个方面，一个社会过程变化的激烈性可以具有这样的性质，而不管它是在現存政权内部还是在某种作为旧政权的革命的继承者的新政权内部发展的。由于沒有发生另一过程而否定一个过程的激烈性、爆发性，这就等于是根据另一种变化，而不是根据这种变化本身來对它进行估計。

稍后，凱德罗夫曾企图从理論上全面論证这种想法，但实质上仍然停留在斯大林的下述观念的范圍中：某些事件是通过事物的质的突变(按照斯大林的观点，是通过一种质的突变，因为照他們的看法，每一事物只由一种质來規定)而发展的，而其他的一些过程則是通过质的漸变而发展的。

^① 參閱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26—27頁。

在本书的理論部分，我們指出了单质論的不可靠性和它所导致的窘境。这里我們只強調一点：無論斯大林或者凱德羅夫都沒有解釋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即决定事物的质本身发生着质的变化而同时仍然保持原来的质？他們簡單地以质变代替了量变，陷入了旧的早已被克服的进化論，而这种进化論实际上任何时候也不能在理論上把这个问题說明白^①。

两年以后，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經濟問題的討論中，进行了生平最后一次理論干涉，在这次討論中他修改了很多自己过去的观点。这已經是这样的时期了，那时南斯拉夫馬克思主义者在大力克服斯大林主义观念和解决社会主义基本問題的活动中，已經明确地宣布过，那些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規律不起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相协调等观点（我們姑且只举这些问题），是十足的幻想，这些幻想在实践中必然导致明显的矛盾。正是苏联发展中的

^① 参閱勃·姆·凱德羅夫：《渐进性是旧质轉变为新质的形式之一》。《哲学問題》杂志，俄文版，1954年第2期。在这个問題上，我本人曾得出如下結論反駁凱德羅夫的观点：“第一，事物只由一种质和一系列非本质屬性規定这个观点，正如給解决这个重要規律制造不可克服的困难的提法一样，在科学上是无法解釋的；第二，不能机械地划分进化的变化阶段和革命的变化阶段，也就是說，把进化阶段仅仅看成是量的渐进时期，而把革命、飞跃的阶段仅仅看成是质变的阶段，是不正确的；第三，說质可以在不經過突变、飞跃的阶段而仍然保持原有的质的情况下发生质变，这种观点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脚的；第四，凱德羅夫认为是渐进的质变的东西，实际上是质变中量的渐进，这种渐进的必然結果是突破旧的度，即向新质突然过渡；第五，把这些质变仅仅局限于飞跃阶段，是不正确的，因为在以前的阶段也发生质变，尽管飞跃、革命的阶段由于其彻底性和短促性而不同于以前的阶段；第六，在新质要素的积累中也发生飞跃的、革命的变化这个推断与单质論是矛盾的，并正好指出这种飞跃是存在的（而不仅仅存在于“偉大飞跃”的阶段上），而一定事物的某些质是同时在发生变化；第七，质变的渐进可以說只是某事物的个别的质的变化較长的時間連續，并且这些变化的总和也导致該事物的根本变化。这些情况事实上并不具有自己的某种‘中心革命’即主要的根本的飞跃，而是由一系列这样的飞跃組成的，这些飞跃給現象本身造成一种假象，好像这一現象是在进化地发展似的。这种‘进化’的观点与认为进化仅仅是量变的渐进性的机械論观点之間的区别的实质，就在于这最后一点。”（《哲学研究和批判》，第66—67頁）

这些矛盾迫使斯大林放棄自己关于計劃占絕對主导地位、調节市場等等的观念，因为必須使苏联經濟在同較发达的資產階級国家的尖銳的国际竞争更加急剧地前进。

斯大林在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規律是否发生作用的問題时答道：“是的，是存在的，是发生作用的。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沒有价值規律的。

在我国，价值規律发生作用的範圍，首先是包括商品流通，包括通过买卖的商品交换，包括主要是个人消費的商品的交换。

在这里，在这个領域中，价值規律保持着調节者的作用，当然，是在一定的範圍內保持着調节者的作用。

但是，价值規律的作用，并不限于商品流通範圍內，同时也扩展到生产方面。誠然，价值規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並沒有調节的意义，可是它总还影响生产，这在領導生产时是不能不考虑到的。問題在于，抵偿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耗費所需要的消費品，在我国是作为商品来生产和銷售的，而商品是受价值規律作用的。也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价值規律对生产的影响。因此，在我們的企业中，这样一些問題，如經濟核算和贏利問題、成本問題、价格問題等等，就具有现实的意義。所以，我們的企业是不能不，而且不應該不考虑到价值規律的。”^①

正如我所引证的，斯大林終於看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不得不考虑到这个規律，而且考虑到这个規律就会教育經濟工作人員去合理地分析过程，“而不去侈談凭空想出来的‘大概数字’”等等^②。

斯大林虽然着重指出，价值規律并不像在資本主义制度下那样是生产的調节者，它的作用範圍受到严格的限制，但他还是克服了过去的抽象論断，这些論断是早为布哈林而后又为他本人所坚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4 頁。

^② 同上书，第 14 頁。

持过的，根据这些論断，国家的計划工作消除了价值規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我們知道，所以不得不作出这个修正，原因十分具体，就是要加强生产过程。与此相关，斯大林还修正了自己以前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相协调的論点^①。

但是，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仍然基本上被斯大林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最高形式。例如，他认为商品流通的存在，正是还没有实行全部国家化的結果。集体农庄所有制是这种状况的原因，而集体农庄除了以商品形式、以交换其他商品的办法来出让自己的产品之外，不願采取其他方式。因此，斯大林把消除集体农庄所有制、实行全盘国家主义化看成是苏維埃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当然，将来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即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由一个包罗一切而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費品的生产成分来代替的时候，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經濟’就会作为国民經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趋于消失。但是，只要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引文刪去了“基本”二字。——譯者注）生产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我国国民經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保存着。”^②

① 斯大林就这个问题回答亚·諾特京时說道：“那末‘完全适合’这种說法該怎样来理解呢？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沒有那些能够組織反抗的衰朽的階級。当然，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它們不了解生产关系有改变的必要，但是这种力量，当然不难克服，不致把事情弄到冲突的地步。”（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問題》，第38頁）同样，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問題上，斯大林也比十五年以前謹慎了（參閱对尔·雅罗申柯的錯誤的批評）。

② 同上书，第12頁。斯大林假設“让国营成分干脆吞沒集体农庄成分”（第12頁）可以是消除两种基本生产成分的途徑，但他认为这不大可能，因为这会被了解为对集体农庄的剝夺；他又提出可以組織一个有工业和集体农庄代表参加的“全民的經济机构”（第12頁），按照我們的想法，这事实上也是国家“吞沒集体农庄”，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在这一著作中，斯大林在理論上十分貧乏而肤淺地又提出了一系列其他問題，对于这些問題他沒有提供任何必要的論据。斯大林仍然把生产資料的国家所有与工人所有等同起来，从而十分輕率地否定了苏維埃社会中的工人处于雇佣关系的任何可能性。国家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框子，仍然是对問題作任何进一步的分析时所依据的基础。

接着斯大林在这一著作中认为，战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他甚至在其生命末期还不能克服自己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本体論观念，这种观念常常最終走向某种对历史和人的二元論。

对于斯大林來說，不仅自然界的客观規律，而且历史的客观規律都是某种存在于人之外的、不以人及其意志为轉移的东西，是人能够認識和利用，但不能創造和廢除的东西等等，好像历史是某种特殊的事件，而人的生活是另一种特殊的东西，在这两者之間存在着一定的平行和反映关系，但却不存在渗透关系似的，好像这一历史和**历史規律性本身**不正是由人本身在发展自己的社会力量，在把一种社会形式和結構改造成另一种社会形式和結構时創造出来似的。

斯大林在他給阿·薩宁娜和符·温什尔的答复中写道：“当然，人們能发现这些客观的規律性，認識它們，并且依靠它們，利用它們以利于社会。但是人們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改造’它們。”^①这一切与他自己的實踐相矛盾，他甚至在人对历史过程的这种干涉并不是唯一的、最好的出路和唯一的可能时，竟然也用自己的實踐廢除了某些結構和規律。

日丹諾夫和斯大林的上述观念成了苏联馬克思主义者的理論框子，在这种条件下，他們当然沒有可能，尤其是沒有能力触及馬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第64—65頁。

克思主義和生活中未曾研究過的新領域，這些領域迫切地需要作出創造性的分析，因為它們對人是具有決定性的。學院式馬克思主義的時期出現了，它是斯大林主義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戰前時代合乎邏輯的繼續。出版了一些寫得有好有壞的關於辯證方法、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教科書，這些教科書死死抱着斯大林主義的公式不放^①。或者像凱德羅夫那樣把才能和精力耗費在完全非現代的課題上，或者根據斯大林的意圖狂熱地復活舊的形式邏輯和編寫新的形式邏輯，而新形式邏輯在編寫上又落后於現代資產階級的形式邏輯^②。

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從他們的這種水平和創作活動來看，不僅沒有能夠實現日丹諾夫在宣稱蘇聯的思想是最高的領導思想時所抱的巨大奢望，而且必然成為蘇聯和其他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精神力量解放的重大障礙。

① 從這些最著名的教科書中，我們可以舉出姆·羅森塔爾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1947年）和姆·列奧諾夫的《辯證唯物主義綱要》（1948年），這兩本書都是在斯大林劃定的範圍內兜圈子的，還有費·瓦·康斯坦丁諾夫主編的《歷史唯物主義》（1950年）。在這些著作中，對於人類今天面臨的問題沒有任何獨創的思想和見解，而基本上只是闡述斯大林關於這些問題的观点，並從這種角度來闡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观点。

② 例如他的《恩格斯和自然科學》（1947年）以及他的關於門德列也夫和某些化學與哲學問題的科學著作。再如出版格·切爾帕諾夫的還是革命前的著作，以及符·弗·阿斯穆斯的《邏輯學》（1947年）、姆·斯·斯特羅果維契的《邏輯學》（1949年）等新寫的书，這種邏輯學完全是非辯證的。在最新的邏輯學著作中可舉出德·普·高爾斯基的《邏輯學》（1958年）和匈牙利的貝·福加賈西的《邏輯學》（1955年德文版）。相反，叶·瓦爾加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引起的變化》一書（1946年）則相當不同，在這一著作中，他對於在其中早已表明自己的博學和分析能力的那個領域作了很具有獨創性的分析。

第二章 其他国家的馬克思主义問題 和关于黑格尔的討論

馬克思主义理論思想在其他国家中的发展最雄辯不过地证明上章末段的論断。这些理論思想以斯大林主义的观点为指南，主要是循着上述的崎岖小路前进。除了几个保持住自己个性的比較突出的人物外，其他大多数人都成了消极意义上的思想家。只要苏联国家主义的首脑和这种观点的苏联闡发者（他們的言論直至今天仍在这些国家中被竭誠搬用和引证）还霸占着发展馬克思主义的优先权，那末，就不可能有任何别的結局。

在一定程度上比較努力地深入研究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問題的著作中，我們可以提到保加利亚哲学家托多尔·巴甫洛夫（生于1890年）的著作，他特別致力于反映問題的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反映論》（1936年俄文第一版），是《辯证唯物主义和反映論》（1929年）一书的修訂和补充。巴甫洛夫的主要意图是闡发和证明，人类的意識—反映的产生，是整个物质界所固有的反映（狄德罗和列宁的說法）的比較基本的形式的合乎邏輯的繼續。巴甫洛夫的基本思想可以归結为这样的一个論断：“客观现实的物体沒有对外界的反应是既不存在，也不可想像的；但同样，如果它本身即个别的物体，不随同自己对外界的反应，来发展作用于它的周圍客观现实物体正好在其中**被反映**出来的一定內在状态，那末，这种客观现实物体作为不断发展着的自然界整体的特殊部分也是既不存在，又不可想像的。当然，这种**反映**在不同的物体中不但形式和程度各不相同，而且所起的作用即具有的意义也不相同，如在胶体中（有机的

和无机的)它不同于在晶体、原子和电子中。”^①

这一著作所作出的有价值的努力和超过同时期苏联类似著作的地方,就是作者坚持不仅要从《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而且特别要从《哲学筆記》出发来研究列宁的思想。仅仅从这个意义上來說,这也是一部有关抽象一般等等問題的著作。在这方面,这部著作是說明……(克思和恩格斯的)認識論、邏輯学和辯证法的統一的重大的……(原文脫漏不全。——譯者注)。巴甫洛夫对实践作广义的理解,而不仅仅把它看作是真理的标准,他在解釋感觉和意識的发展中解釋实践問題,并从这个观点出发探討概念、抽象化、具体和抽象、一般等等問題。在这方面,这部著作认真地努力运用和研究了列宁在《哲学筆記》中以札記、批語、注釋的形式所提供的珍貴遺產^②。

然而,巴甫洛夫动搖于这些意图和斯大林的哲学和反映論的观点之間(他对斯大林的观点是很尊重的),这就不容許他从实质上来克服主体—客体实体的旧提法,摆脱通常的認識論;因此,必然只有停留在“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这种論点的范围之內,并且常常陷入素朴的实在論,这一点我們在本书第二篇中就指出过了。在这一基础上,巴甫洛夫不可能对人类意識的历史上的要素

① 托多尔·巴甫洛夫:《反映論》,1947年貝尔格萊德塞文版,第41頁。(見1949年俄文版,第22頁。——譯者注)

② “正是現在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实践使主体不仅仅同自然界,而且也同社会历史现实发生最直接、最深刻和全面的联系。正是現在比任何时候都清楚,通过实践,人不仅仅同自然的、社会的和精神的事物发生最深刻的相互作用的普遍联系,也不仅仅以自己对这些事物的作用来改变这些事物,而且人本身也在同这些事物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发生全面的变化。这样,人在劳动过程中改变自然界和自己的整个存在,日益发展自己的手、脑、感觉器官、言語、意志和思維,同时,人最初是自发地,而后来則是完全自觉地在自己的人的实践中看出真理的基础、真理的目的和真理的标准。

而現在,实践不仅包括生产活动,而且也包括科学实验活动、社会革命活动、日常生活創造活动、教育活动和艺术創作,因为这些活动創造出的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是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事物(如雕像、繪画、舞蹈等等)。”(同上书,第271頁)

进行分析，即不可能作出要求把馬克思主义的解釋和其他的解釋从本质上区分开来的分析。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巴甫洛夫在給哲学下定义时，只有在恩格斯关于有內容的思維的說法中兜圈子。虽然他正确地看出，正因为这样，哲学必須包括本体論、宇宙論和認識論的一切基本問題，但把这时实际上提到首位的人类学問題疏忽过去了（而恩格斯的时期不同于这一时期，那时大多数的哲学家主要地是研究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巴甫洛夫把哲学仅仅归結为科学，甚至仅仅归結为与其他科学并列的一般的科学。他忽略了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哲学是自己时代的批判工具，因而也是合理而实际地解决不断更新的历史矛盾的人类发展的先知者^①。

同样，巴甫洛夫在給历史唯物主义下定义时也沒有能够超出上述范围，实际上仍然在追随着斯大林关于把辯证法运用于历史的观念。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巴甫洛夫同德波林的观念完全对立时摺棄了德波林关于辯证法是一般方法論的見解，但他对于社会辯证法，实质上主張同样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上是辯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或邏輯学的本身，但是，这种哲学和邏輯学不是仅仅‘适用’于一門科学，而是‘适用’于一切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专门科学：一般社会学、政治經济学、美学、倫理学、語言学等等，或者更确切地說，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哲学或邏輯

^① 巴甫洛夫在把哲学同专门科学以及旧的形而上学区分开来时，得出結論說，“哲学要想成为专门科学，就只有一种可能性（这是恩格斯早已指出过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哲学成为关于作为有內容的思維的思維的一般科学，就是說，它不是作为哲学的部分的旧本体論和旧認識論，不是旧的形式的主观的邏輯学，而是有內容的邏輯学，正因为它是內容的和客观的，而不是形式的和主观的邏輯学，所以它同时包括本体論、宇宙論、旧認識論的全部基本問題，但是，这些基本問題現在是以辯证地被摺棄的形式，即以科学思維或意識的內容和形式問題的形式出現的。”（托多尔·巴甫洛夫：《反映論》，第317—318頁）

學。簡言之，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歷史的邏輯學。”^①

雖然我們認為巴甫洛夫的反映論比同時期蘇聯的著作更深刻地理解了認識論的問題，但是，它不能夠具有更廣泛的意義，這一方面是因為他的反映論陷入了從認識論上解決問題的狹隘的框子裏，另一方面是因為他的反映論以其辯護士作風和斯大林的見解而不可能達到現時代的高度。

在戰後初期，關於黑格爾的討論更值得注意，這次討論是由於出版關於黑格爾的兩部重要著作——盧卡奇的《青年黑格爾》（1948年）和布洛赫的《主體—客體》（1952年）——而引起的。

如果我們注意到從1941年前後直到五十年代中期這個時期蘇聯哲學界對黑格爾和德國古典哲學的態度的變化，那末，這兩部著作的意義就十分明顯了。大家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珍視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尤其是黑格爾的包羅萬象的辯證法，在裏面發現了唯一符合歐洲當時革命事件的時勢要求的德國精神。而在他們生活的後期，不論是馬克思或是恩格斯都認為，在黑格爾的辯證法中最深刻和最充分地研究了他們當作自己的最強大的思想武器的那種方法的問題。大家知道，列寧也同樣詳細地研究過黑格爾的著作，特別是他的邏輯學；革命後，列寧曾遺言囑咐馬克思主義者從唯物主義立場出發全面研究和解釋黑格爾。

對歐洲哲學的這一重大時期在理論上的這種態度和評價，在四十年代初期整個地被簡單拋棄並根據斯大林的倡議整個地被完全修正了。不是把德國和歐洲哲學這一偉大時期的主要人物看作他們本來是的那樣，即他們實質上是這一時期進步的資產階級思想的代表，但在德國落後的封建專制的环境裏，他們有局限性、妥

^① 托多爾·巴甫洛夫：《反映論》，第367頁。關於這些問題，巴甫洛夫發表了幾本小冊子，特別值得提出的是《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和專門科學》（1956年索非亞法文版），這是他在索非亞向科學院各研究所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員所作的三次報告。在他的《藝術概論》中，他同樣堅持了從反映論的觀點出發來解決藝術的現象。

協性，在政治上、歷史實踐上無所作為，而這一點又必然在他們的哲學的唯心主義性質中，在他們其他許多妥協的和保守的方面表現出來，——新的指令卻要求把這一哲學整個地看作是貴族階級對法國唯物主義和法國革命的反動^①。

盧卡奇和布洛赫的書把一股強大的新鮮空氣帶進這種氣氛當中去，當然會引起充滿衛道士精神的理論家不可避免的反應。

盧卡奇向自己提出的任務完全不同於布洛赫。他注意黑格爾辯證法的起源，而布洛赫則注意整個黑格爾體系中的辯證思想。盧卡奇對這種起源所作的卓越分析的批判矛頭既指向上述關於德國古典哲學和黑格爾的斯大林主義觀點，也指向狄爾泰、克朗納、拉松、哈厄林以及其他許多人把黑格爾當作非理性主義者和神學家等等的資產階級觀點。

盧卡奇同時也局限於研究對黑格爾觀點的形成有特別作用的社会歷史的結構要素，至於自然科學的發展，盧卡奇並不去研究它，而把它放在一邊，雖然這個因素對於分析辯證法的起源是重要的，特別是如果我們注意到青年謝林的自然—哲學著作。在這種分析中，尤其是在對黑格爾發展的法蘭克福時期的分析中，盧卡奇發現了黑格爾的經濟論著的意義，並且認為黑格爾正是在這些分析的基礎上最後形成了他的辯證方法，以及獲得對勞動、異化、物

^① 這種立場被所有論述這一問題的人用各種各樣的大同小異的形式重複着。在《蘇聯大百科全書》中表述了官方的定論：“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國的唯心主義哲學在黑格爾的哲學中達到了自己的頂峰，它是貴族階級對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法國唯物主義的反動。”（《蘇聯大百科全書》第10卷，1952年俄文第2版，第306頁）同樣在第11卷中也談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國哲學家反映了德國的貴族和對貴族卑躬屈節的、軟弱和胆怯的資產階級在革命推翻封建制度的變革面前表現的恐懼和仇恨。他們維護德國容克—資產階級的發展道路，即由貴族掌握領導權的君主制政權來實行和平的和不完全的改良的道路。德國唯心主義把反對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實踐和理論的鬥爭看作是自己的基本任務。它反對唯物主義（在大百科全書的原文中，還有“和無神論”四字。——譯者注），也反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原則。”（《蘇聯大百科全書》第11卷，第85—86頁）

化等範疇的非凡發現（雖然採取了唯心主義的形式）；盧卡奇在分析了這些範疇之後，即在分析了《精神現象學》之後，完成了自己的巨著。

相反，布洛赫分析了黑格爾的整個體系，明確地指出，不研究黑格爾就不可能完全理解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黑格爾和歐洲整個精神傳統的真正繼承人。

無論盧卡奇或布洛赫都輕而易舉地證明了德國古典作家中所有的泰斗（例如黑格爾）的哲學研究的市民歷史根源。從而他們反復指出並且證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這種哲學運動的評價的正確性，這種哲學運動，由於它實質上是革命性質的，因此在當時德國的著作中唯一達到了歐洲的政治運動和思想運動的水平^①。

不管現代斯大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辯護士怎樣估價自己，但是必須肯定，德國古典唯心主義的代表是比所有批評他們的現代社會主義者要偉大得多的精神革命家和社会政治方面的革命家。也就是說，他們曾為自由和人道的思想而鼓舞，他們曾熱烈歡迎封建主義在法國的崩潰，最後，他們在黑格爾的立憲君主制的觀念中宣告了資產階級的發展時期的開始，而斯大林主義時期的現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卻不敢在圈定的範圍之外進行理論思考，更談不上在思想政治上宣布要消滅過時的東西和在一定的發展時期消滅社會主義的官僚主義變形的各種反動現象。我不想用這些話來批評社會主義陣營中現代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膽怯，因為，理論表現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關係本身的綜合，我只不過是想指出這樣一點：當批評某人似乎缺乏革命精神時，自己本身就更加應該進行一番自我批評，因為這個人標誌着人類思想發展的一大進步，而現代的批評家卻是對這一思想的最平庸無奇的、不動腦筋

^① 關於馬克思對這個運動的評價，可參看《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的《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特別是恩格斯在《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為科學》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的論斷。

的模仿者。

在头一批起来尖銳地反对布洛赫和卢卡奇观点的人中間，有尔·奥·格罗普。他在东德的杂志《德国哲学研究》上根据上述的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对他們的論点大肆批判，他同时否定黑格尔哲学是市民哲学思想的最高峰，而且还企图把馬克思主义說成几乎是直接来源于法国的唯物主义^①。

此后不久，上述杂志就这些爭論問題发起討論。参加过这次討論的有：奥·科尔努、弗·貝倫斯、符·舒巴特、厄·阿尔勃萊希特、符·門克、伊·施萊夫施坦、亨·賽德尔、克·格布勒、伊·赫普內、伊·費切尔、尤·庫琴斯基，以及該杂志編輯符·哈利希本人。討論表明許多人能够不抱成見地对待这个問題。斯大林和日丹諾夫的歪曲历史事实的說法，遭到符·哈利希特別尖銳的批評。哈利希在布洛赫对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所作的解釋的影响下，激烈反对本国官僚主义化的社会主义，并企图得出政治上的結論。哈利希的批評导致了討論的中断，并引起法院对这个勇敢的批評家的审判。社会主义陣营的社会现实竟然連这种按其意义來說与黑格尔对当时制度的“保守的”批評相同的批評也不允許。

在这一时期，卢卡奇还发表了几部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值得指出的是：关于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著作^②，关于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欧洲非理性主义发展的巨著^③，关于批判现实主义的意义的理論价值极高的著作^④。在他的这些哲学論著中，他对一些資产階級哲学家的地位和思想的評价常常是片面的，然而他关于现实

① 格罗普：《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方法及其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辯证法的对立》。《德国哲学研究》，1954年第1、2期，柏林德文版。我們在这里馬上可以举出格罗普稍后一些的一本书（《談談哲学史和辯证唯物主义問題》，1959年柏林德文版），这本书对黑格尔的态度好得多，謹慎得多。不过，这一著作本身还是以旧方式在老問題中兜圈子。

② 卢卡奇：《存在主义还是馬克思主义？》，1958年巴黎法文版。

③ 卢卡奇：《理性的毀灭》，1955年柏林德文版。

④ 卢卡奇：《批判现实主义的現今的意义》，1956年德文版。

主義的論著，從理論觀點來看，價值則大得多。

盧卡奇在分析馬克思主義和存在主義的問題時認為，現代資產階級哲學的特点是尋求既不是唯物主義、也不是唯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並認為這一事實正好說明唯心主義的失敗。“必須說，‘第三條道路’的觀點含有暗中承認唯心主義的破產的意思。古典唯心主義的代表以宣布自己是唯心主義者和同唯物主義進行公開的鬥爭為驕傲，與此相反，現代‘第三條道路’的追隨者不敢再宣布自己屬於唯心主義，甚至在表面上假裝鞭撻唯心主義。

這條道路使任何誠實的思想家除了折衷主義地、任意地把來自各種不同體系的因素拼湊一下以外，不能有任何別的結果。”^①

他認為在這種“第三條道路”中，存在主義正是這樣一種趨向的最發達的形式，這種趨向在思想方面“反映出現代資產階級知識界精神和道德的混亂”^②。

盧卡奇對現實主義討論的見解，特別是他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革命浪漫主義”的批判態度（所謂革命浪漫主義也和官方的意識形態一樣，故意使一種社會現實神秘化），無疑具有更重要的理論意義。

盧卡奇在自己的序言中提問題的方式，就比官方的意識形態靈活得多，思想要辯證得多。他完全明白，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是我們所處的時代的基本歷史現象和問題，因此，文學和文學理論應該反映這一事實。“但是，這個時代的基本點還遠不意味着它必然直接地和完全地決定任何現象，以至這個時代的任何時期。一個時代的基本趨勢的發展方式是非常錯綜複雜的；現實大量地

① 盧卡奇：《存在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第259頁。

② 同上書，第20頁。盧卡奇把薩特的極端個人主義僅僅理解為“拒絕參與締造和確立民主的事業”（同上書，第116頁）。這裡表明他的一種片面性，這種片面性在他的《理性和毀滅》一書中也有表現，而當他分析現代的現實主義的問題時，這種片面性則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克服。

創造着客观的和主观的联系形式，这些形式的作用大大地改变着基本問題的表现方式。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对立是整个我們时代的基本問題。但是，当企图直接用这种基本对立来解釋今天的現象和趋势，甚至解釋构成时代的各个时期时，这常常会引向錯誤的道路。”^①

卢卡奇指出，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不是这种基本对立，而是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之間的对立决定了主要集团的划分，同时強調指出，現代历史的发展把群众性的和平运动推上了舞台，这一运动是史无前例的，它包括資产阶级的許多成員，首先是資产阶级的知識分子。“因此，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不能直接地用來說明这些历史趋势中的任何一种趋势，相反，这些趋势正好是由社会主义者和資产阶级成員的战斗合作來說明的。”^②

卢卡奇还从这个角度出发考察現代文学、先鋒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問題。他絕沒有拋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我們在論述恩格斯和普列汉諾夫的章节中已經談过了）；即了解历史趋势就能使艺术更深刻地把握人类生活的被掩盖的进程。相反，丧失辨认方向的能力，会产生如此突出地表现在先鋒主义的文学中的恐惧和不安。“因此，恐惧成了主要激情，其直接原因不是教条主义所說的世界混乱，而是相反，由于无能找出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規律，因而造成这样一种对现实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情感上的表现就是恐惧。”^③ 先驗地否定社会主义，就使这些文学家陷入这样的結局，就会导致这样一种后果：在社会矛盾的迷宫中他們虽然对这些矛盾抱批判态度，但看不见现实主义地去表现现实的意义何在。“因为造成混乱和恐惧的不可避免的前提条件，正如我們已屢次证明的那样，是把具体的社会范畴从人

① 卢卡奇：《批判现实主义的現今的意义》，1959年貝尔格萊德塞文版，第4頁。

② 同上书，第5頁。

③ 同上书，第76頁。

的周圍環境，從人對現實的關係中排除出去。因此，在這裡可以清楚看到我們從各種先鋒主義的理論主張和描寫手法中已經領略過的東西，這就是以非歷史化和非社會主義化的原則使對客觀現實的反映主觀化。因此，作為藝術直感景象的混亂和恐懼是這種主觀化的必然後果。而它們的特殊內容、它們的情緒的內容的特殊種類、它們的世界觀的基礎，却仍然產生於知識分子在今天帝國主義發展階段上的十分具體的社會地位，這就是知識分子狂熱地或犬儒式地拒絕社會主義的前途，但是他們又不能用任何資產階級的前途來對抗社會主義前途，因為，他們同樣否認（至少在文學創作領域中）替帝國主義辯護的思想家從理論上提出資本主義發展的某種新前途的一切企圖。”^①

盧卡奇對先鋒主義的批判最後歸結起來就是，盧卡奇承認先鋒主義，特別是它的主要代表（例如卡夫卡）對資本主義中所有那些混亂的和非人道的關係的藝術塑造，但同時批評它把這些因素絕對化和把實際生活中的一切對立的力量和傾向看作是本體論上無關重要的。“因此，不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否這一切都在現實中確實存在？而只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否這就是全部的現實？不問：是否必須說明這一切？而只問：是否必須停留在這一點上。”^②

盧卡奇正是從這些理由出發，並以上述的現代世界的基本矛盾為依據，給予批判現實主義的主要代表以重要的地位，這些代表不是用早已現成的死板公式來看待現實，而是批判地對待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矛盾。由此可見，社會主義作家同批判現實主義者不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在為了人們之間的和平合作、為了人而鬥爭的共同綱領的基礎上結成文學聯盟。

另一方面，盧卡奇同樣明確地強調指出，簡單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參加運動或政黨，對於藝術塑造還不能說明什麼問題。所有那

① 盧卡奇：《批判現實主義的現今的意義》，第72頁。

② 同上書，第79頁。

些认为正确的意識轉变为现实主义地反映现实的过程比錯誤意識的轉变过程在原則上更直接和更簡單的人，都是錯誤的。虽然正确的理論反映和概括同正确的艺术反映和概括在一定意义上是相互接近的，但是，对世界的理論認識，只有当它完全熔化和消失在美学范疇中时，才会鼓舞起創造性的艺术力量。

因此，卢卡奇有根据地认为，表面和片面地对待社会主义现实的态度，如同在資產階級世界中一样，必然会产生文学的自然主义；在資產階級世界中，这种自然主义首先意味着在现实中迷失方向、怀疑主义的急躁或人在超出个别現象的赤裸裸的事实方面的无能。根据对某些抽象真理的教条主义理解（特别是在斯大林时代）以及对艺术职能的实用主义的看法，文学的解决不是从社会生活的矛盾变动中产生出来，而必須是充当說明一种抽象真理的实例。卢卡奇以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性矛盾的消灭为例，着重指出：“如果消灭矛盾的对抗性质不是当作一种过程来研究，而是当作一种一律地支配着一切的絕對化的状态来研究，那末不仅仅对抗，而且連一切生活、一切运动的动力——矛盾都将会从被这样描述的生活中消失。”^①

在苏联艺术中出現了就連他們自己也反对（至少在理論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論”，这是絲毫也不奇怪的。这种論点歪曲了对新的现实的反映。靜止的公式主义，打上美化了的革命浪漫主义的烙印的自然主义代替了新的辯证法。他們认为在科学和政治中可以清楚地区分出典型的东西和非典型的东西，而在文学中，則連从科学的观点看来不过是非典型的、經過文学加工的个别現象的傾向也获得典型的性质。“教条主义地和机械地把典型的观念和科学的政策搬到艺术上去，就可能在艺术中造成不可避免的束縛和歪曲。如果政治上的教条主义（如在斯大林时期那样）主观主

^① 卢卡奇：《批判现实主义的現今的意义》，第 126 頁。

义地歪曲现实，而又要求艺术把它（常常是任意地）强加于艺术的典型性当作艺术上唯一正确的典型性来理解和采用，那末情况就会尤其如此。不言而喻，这种典型性一占上风，就只能更加加强这种‘社会主义的’自然主义的特殊僵硬性和使它更没有生命力。”^①

对于卢卡奇来说，革命的浪漫思想就是经济主观主义的在美学上的等价物，正是因为这样，这种浪漫思想才造成一系列的庸俗化、公式主义、对现实歪曲和对形形色色的和多方面的人们生活的真实进程的捏造。

最近，卢卡奇发表了《馬克思主义美学入门》这一著作，这是他研究文学理论问题的总结。卢卡奇认为，特殊这个范畴是美学的中心范畴，是艺术的活动范围，与此不同，一般这个范畴则是科学的活动范围。

虽然这一著作有很多有价值的意见，但是卢卡奇正是对这个中心范畴以及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分析研究不够。因为只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就会得出相反的看法：科学也包括特殊的现象，就像艺术偶尔也以其特殊手段反映一般一样。

同样，不妨指出，卢卡奇对艺术的看法片面地停留在反映的概念上，他对于艺术作品的看法尤其如此，而艺术作品一方面总是反映一定的社会气氛和社会结构，同时又是特殊的创造，即创造某种不存在的东西的活动，因而也是人们生活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① 卢卡奇：《批判现实主义的现今的意义》，第131—132页。卢卡奇特别强调指出他批判的不是整个社会主义文学，而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系列原则，事实上，馬·高尔基、米·蕭洛霍夫、姆·馬卡連柯、阿·托尔斯泰、康·費定、阿·謝格赫尔斯等人的最佳作品不是根据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出来的。

第三章 恩斯特·布洛赫

从所研究的课题、注意到的问题以至哲学研究的风格 and 方式来看,恩·布洛赫(1885年生)在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从他的第一部篇幅较大的著作《乌托邦精神》(1918年)起,布洛赫就已经注意到乌托邦、空想和希望等现象在人塑造自己的历史生活中的意义,因而这个课题一直是布洛赫在哲学上最关切的,这种关切在他的《希望的原则》(第1—3卷,1954—1959年)这部巨著的论述中获得最为全面的表现。

从最早的一些著作起,布洛赫就已经不仅批判地对待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而且也批判地对待遭到各种各样变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表现。此外,布洛赫还一贯致力于分析人的问题。尽管他力图给这个问题规定一个独特的实在性范围,但是,在空想的现象中也有特殊表现的关于人和人道的课题,仍然是基本的课题,正因为如此,他才这样明显地倾向于马克思的真正人道主义的思想^①。

空想的问题,是人的实质问题。在这方面,布洛赫并没有把空想设想为“空中楼阁”(虽然这一因素在人“对未来的幻想”中也是经常出现的),而是设想为一种作为历史的人的本质的“具体空想”。空想和希望是无所不包的和包罗万象的,因此布洛赫把自己的这个基本的哲学主导思想贯穿在整部主要著作中,指明空想的

^① 《时代的遗产》(1935年)这部著作阐述了对资产阶级文化的继承和处理方法的问题,而《革命的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1922年)和《自由和秩序》(1946年)两部著作则阐述了乌托邦的基本问题。

現象存在于人們的表現的一切形式中，如在政治空想、藝術空想、技術空想等等中。這部著作的價值正是在於，它只從一個角度即空想的角度來如此全面地分析人的創造性。因此，“過去、現在以至將來也存在的哲學，它的基本命題，是尚未形成、尚未取得的誕生地，這個誕生地是在新舊事物辯證唯物主義的鬥爭中建立和形成的。”^①

布洛赫首先關心的是揭示人的存在的時間結構，即人的存在的本質。布洛赫在從人身上揭示本能的總和時，沒有給任何一種本能以優先權，而認為人具有許多基本衝動，它們之中時而這些時而那些得到更強烈的表現。而從消極的激情和積極的激情即恐懼和希望來看，最重要、最為人固有的期待激情是希望的激情，因為否定的期待激情即苦悶和恐懼是消極的。“它們表現出來的恰恰是一些自我毀滅和虛無，其中最後還滲有純粹消極的激情。希望，即相反的一種期待激情，與苦悶和恐懼相反，因而是一切精神激動中最具有人性的，僅為人固有的，它同時又關聯到最廣闊、最明朗的地平綫。”^②

布洛赫由於發現和分析了這一人的存在原則，就與海德格爾的存在就是焦慮與苦悶的存在主義觀點發生內在的對立。與存在主義者的人的苦悶的存在相反，布洛赫實際上發現了人的本質的更為人性、更為根本的範疇，即這樣的規定，這些規定恰恰也指出過去往往只是非人性的生活獲得人性的“表現”的可能性和現實性。

希望，作為對未來的明朗態度，作為 *docta spes*，不是指普通的自動的樂觀主義。“自動樂觀主義，對於每個比較根本性的決定來說，其毒素並不下於絕對的悲觀主義。”^③ 這就是說，後者為公開的

① 恩·布洛赫：《希望的原則》（《Das Prinzip Hoffnung》）第1卷，1954年柏林德文版，第19頁。

② 同上書，第88頁。

③ 同上書，第217頁。

反动服务，目的是使人意志沮丧，前者为隐蔽的反动服务，目的是使人容忍和消极。实际上，希望是指“战斗的乐观主义”而言，通过它，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不是去实现任何抽象的理想，而是去解放新的更富有人性的共同体的因素。在今天，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决定，是主观因素结合经济物质倾向的客观因素而作出的决定。

正因为如此，实践这个范畴在布洛赫的著作中占有中心的哲学地位，布洛赫同时也显示出他是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这个时期马克思的其他思想的最深刻的解释者之一。“这里，具体的决定始终在反对静止的斗争中，但由于具体的决定不是暴动主义，而是战斗的、同样也是有根据的乐观主义，因此，它同破坏着僵死的静止的那个过程和平相处。人和过程，更确切些说，主体如同客体，在辩证的物质的过程中因而也以同样方式站在前线。同时，对战斗的乐观主义来说，除了前线范畴所开辟的地方之外，不存在任何别的地方。这种乐观主义的哲学，即唯物主义地理解的希望的哲学，它本身作为上述非熟思的东西的知识，研究历史的前列部分，而且是还在研究过去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过去中研究尚未实现的未来。因此，被理解的希望的哲学，按其规定来说，处于世界过程的前线，也就是说，处于运动着的、空想所揭示出来的物质很少被深思过的前列部分-存在。”^①

主体，即人，是前线中本质的东西；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社会化了的人类（马克思语）。因而布洛赫认为，“Humanum”（“人性”）在每个社会里并不是作为内在的、无声的共同性存在着，而是正处于艰难的过程中，只有到共产主义才能达到。人道主义这个珍贵的概念，只有在无产阶级立脚点中才获得其真正的地位，并且“社会主义愈科学，也就愈具体

^① 布洛赫：《希望的原则》第1卷，第218页。

地把关心人当作中心，也就愈具体地把切实地消灭自己的自我異化当作目的”^①。

在馬克思主义看来，过去(更不必說現在)并不是古董的排列，因为历史不是普通的博物館。对过去的片面解釋，使每門科学失去未来，而在具体生活中則使資產階級科学家产生最不科学的階級思想偏見。这种对待过去的片面态度，在現在中只看到疑团，在未来中只看到未定形。因此，辯证历史的、有傾向性的馬克思主义科学，是以行动为目的的、中介性的未来科学。“只有未来的地平綫(如同馬克思主义所占領的)同作为前庭的过去的地平綫一起，才使现实具有它的实在的尺度。”^②

因而，在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的中心点是劳动的人，而馬克思的全部十一条提綱就宣称，社会化了的人类連同中介的自然环境乃是誕生地的世界范围。世界是对某种东西的傾向，是对某种东西的趋向。只有拋棄了閉塞的、靜止的存在概念，希望的真实的原来的尺度才能显露。如果說存在是可以从自己的“来路”去理解，那末它同样也可以从“去向”去理解。决定意識的存在和对存在加工的意識一样，归根到底只能从它的去向和目的去理解。“热望、期待和希望需要自己的釋义学，在我們面前存在的东西的微明要求有其特有的概念，新东西要求有自己的前綫概念。而这一切都服务于这个目的，就是通过可能性的中介王国，使一条通向必然被想像到的东西的主要道路，終于能批判地鋪設出来，并一往直前

① 布洛赫：《希望的原則》第1卷，第237頁。布洛赫把人的異化已被消灭这种历史状况称为“誕生地”。布洛赫說明了馬克思的著名原理，并以下述观点結束了自己的主要巨著：“真正的創生不是在开端，而是在終結，而只有当社会和存在发生根本变革时，也就是当涉及到根基的时候，創生才开始。而历史的根基是改变和征服現狀的、劳动的即創造的人。当他在沒有外化、沒有異化的真实民主制中認識了自己和創立了自己时，世界上就出現某种照耀着处于童年的整个人类和还没有人到过的地方：誕生地。”(同上书，第3卷，1959年柏林德文版，第489頁)

② 同上书，第310頁。

地保持着。Docta spes, 被理解了的希望, 恰恰明确表达了世界上不再离开这种希望的一个原则的概念。之所以不离开, 是因为这个原则从来就存在于希望的过程之中, 尽管它在哲学上是如此长久地被忽视了。既然根本不能自觉地创造历史, 在有趋势的历史道路上目的同样也不是一切, 那末, 空想原则的概念, 像希望和符合人的尊严的内容这些概念, 在这里充其量只是绝对中心的概念。但是, 这个概念所表示的东西处于相应地正在产生的意识的已经展开、而且还在展开的地平线上。对尚未产生的可能性的期待、希望和向往: 这不仅仅是人们意识的基本特点, 而且, 当它被具体而正确地提出和了解时, 也是整个客观现实内部的基本规定。从马克思的时代以来, 根本没有对真理的任何可能有的追求和任何对决定采取应当是不顾世界上希望的主客观内容的现实主义态度; 有的只是琐屑庸俗或钻死胡同。哲学或者将具有对明天的良心、对未来的党性、希望的知識, 或者将不再有任何知識。”^①

机械唯物主义从唯物主义方面来看, 也就是从世界本身来解释世界这个方面来看, 是真正的唯物主义。但是, 当机械唯物主义把世界看成是不完整的和狭隘的世界, 认为世界处于无目的的运动、循环运动中, 处于始终被同一条必然性锁链所制约的产生和消灭中的时候, 它就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然而, 机械唯物主义理解的世界并不是存在着作为进步的泉源的矛盾, 存在着将是更美好的生活的地方, 存在着人成为人的过程, 存在着对我们有益的物, 存在着发展与进步的世界。因此, “辩证唯物主义将不成其为辩证唯物主义, 如果它不是哲学上的、即跨进广阔展开的地平线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话。这种跨进广阔地平线的活动, 是反对异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 也就是争取外化的外化 (Entäußerung der Entäußerung)、争取诞生地的出现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在诞生地, 人和世

^① 布洛赫:《希望的原则》第1卷,第16—17页。

界的內核或本质的东西终于能够开始表现出来。而且正是在这个時間、在这个地方和在我們的能最終产生的自由內容之王国中。不管人們对事物如何認識，迄今的史前史总是导向这里，但自觉創造的历史，就經常被思索到的、間接預測到的自由王国的全部內容来看，占有自己的起决定性作用的題目。”^①

对布洛赫來說，存在着三个范疇：前綫、新东西和物质，这些是辯证过程的中心范疇。前綫是下一个东西决定地产生所处的一段時間。新东西是一种尚未意識到和尚未产生的东西、哲学上所指的美好的新东西即自由王国的现实可能性。物质不是机械的殘根，而是辯证过程实在的可能性酶基质，按可能性存在着的東西，它制約着历史上能够出現的一切。后来，有人特別斥責布洛赫的物质概念的神秘性和他的唯心主义的目的論。然而，他在《希望的原則》最后一卷中曾逐字地解釋道：“这种尚无，当然不是这样，似乎在原子或在次原子的物质‘分解’中，以后出現或将出現的一切东西，都早已作为紧縮的存在物或**密封物**存在‘于胚胎之內’。这种对尚无的落后看法正好掩盖或不理解向新东西的辯证飞跃。同样，根据那几乎是神話般地自上而下被控制了的目的論来**預先决定了的**和依同法最終規定好了的目的，当然也不是处于物质过程辯证的、对新东西來說已是揭示了的潜在傾向之中。但目的論的真正問題并不由于那猜想到‘預見’的旧目的論而威信扫地，真正的目的、使命和意向范疇并不因此完全地或教条式地被排斥出世界。这种情况較少，因为傾向恰好常常暗含着对目的的态度；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对目的的态度，进步就不可能衡量，也不能成为客观的东西；因为如果在世界中沒有对世界的能动的計劃，沒有能动的目的、使命和意向，世界就不是馬克思主义的世界。同时目的論的**真理**在任何地方都不是由現成的目的組成的，而是由那些只有在

^① 布洛赫：《主体—客体》，1959年薩格勒布塞文版，第388頁（德文版第475頁。——譯者注）。

能动过程中才能实现的目的组成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新的目的又总是出现和丰富起来。”^①

这样，我们就谈到布洛赫特别注意的另一个概念——进步的概念了。布洛赫在最近的一部有关这个问题的学术著作中，敏锐地分析了这个用得这样多，甚至可以說用得最多但又从未明确确定的概念。正因为如此，在理解上也就经常出现模棱两可和分歧之处。

布洛赫首先指出，甚至成就了进步同时也意味着某种东西的丧失，正如儿童在成长为青年人和成年人，同时在丧失无忧无虑、天真烂漫和纯洁高尚的本性，或如工业获得进步而工人阶级却因此陷入非常困苦的境地一样。

因此，进步的概念必须摆脱那种把任何向前运动和向前发展都视为进步的“偶像化性质”。例如，疾病的进展只会给人带来害处，也就是使健康状况恶化；又如朝向帝国主义的进步就是一种“邪恶的进步”，因为它的运动不是把人性东西当作确定的目的。这是一种虚伪的进步，因为它追求不人道，追求否定性的目的。

由此布洛赫便致力于研究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和进步之间已被发现的差别和不协调。“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可能表现出进步，而上层建筑在一定情况下不仅不与这一进步适应，而且有时甚至以文化的个别的衰落与之相对立。”^②布洛赫以灯的发展为例来说明这点，古老的红木桌子上的古老烛台发出的光不仅比较柔和，而且比较庄严，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过古希腊高度的艺术发展和落后的技术发展之间有差距一样。

考虑到这个问题，布洛赫对建立某些“文化集团”的做法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他把这种做法称为地理主义，认为它非常容易

^① 布洛赫：《希望的原则》第3卷，第487—488页。

^② 布洛赫：《进步概念的区别》（«Differenzierungen im Begriff Fortschritt»），1957年柏林德文版，第13页。

轉变为生物主义和种族主义，并宣揚每种文化类似生物机体有三个內在的阶段（奥·施本格勒、阿·湯因倍）。布洛赫由此却得出另外的結論。文化的一定的分割，即間断（而何处无間断？），并不否定，而恰恰证明向 humanum（向无階級社会）的一种运动的統一性，因为“到处，在社会关系的全部总和中，都存在着人性的东西——从人类学的到人道的。它一方面使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此千变万化、五光十色，另一方面又使之統一起来。毫無疑問，在包罗万象的历史表現中，如此多样而无所不包的資料搜集整理，比分期要困难得多；因为資料的搜集整理，至少作为包罗万象的历史的东西，要求一种**多方面的說明**——而且在時間上也这样”^①。进步概念絲毫也不因此而受限制；相反，这一切向我們說明，这种文化的多方面的說明表明，humanum（人性的东西）尚未被找到，但却到处在寻找。而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愈多，为所有这些多方面說明的目的的統一也就愈广泛和愈有保障。

进步概念同時間概念有着最紧密的联系。因而对時間的分析，也是解釋进步概念的前提。在这种分析中，他在区分出千篇一律的、量的、对內容漠不关心的、“濃度”到处一样的“钟表時間”（Uhrzeit）时，特別強調不能用它来衡量历史过程。这就是說，历史時間是有傾向的、质的、濃度多种多样的，正如同各种音乐形式和文学形式（奏鳴曲、賦格曲、叙事詩、話剧）都有自己的時間。难道水流不断地、刻板地冲击着河岸的時間，真的与唯一濃縮的一年（1917年）同样“濃”嗎？“一切時間序列（不仅是历史的時間序列），都必須結合历史物质事件及其傾向和內容的各种不同濃度的划分来进行理解。”^②

虽然自然時間与历史時間也有区别，如同自然時間和通常的物理時間有区别一样，但是，能否把自然界仅仅了解为某种史前

① 布洛赫：《进步概念的区别》，第23—24頁。

② 同上书，第35頁。

史、某种发生过的东西、某种如十字軍东征一样已經过去的东西呢？不是不仅存在着人对人的經常关系而且存在着人对自然界的經常关系嗎？荷馬时代的太阳不也同样地照耀着我們这一代嗎？这就是說，布洛赫认为，存在着一种不一定始終都表現在历史時間中的自然序列和自然进步，这样我們不仅有“相对空虚的、缺乏未来的自然時間”，而且还有“实体的、充滿未来的自然時間；两者不仅作为方法論上的两方面，而且作为相互补充的两个**实在方面**存在着”^①。两者交織在一起，对它們來說也是存在着多节奏，而后者特別与文化历史時間相联系。因此，历史的人类学的真正的“黄金时代”，如果沒有新的人道主义的宇宙学的同样的真正的“黄金时代”，也就不可理解。

布洛赫論断的尾声，無論如何是有些奇怪的。他认为人类历史的意义在于实现自由王国，这是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历史的革命力量的努力的基本意向，而在这里很清楚，对这种“自由王国”不能作靜止的和非辯证的理解。

但是，布洛赫在这部著作中，并没有认为自由王国仅仅取决于人們的能动性、人們的創造性的历史实践，而是认为还取决于“一切历史事件最終汇流入的整个宇宙学內的积极—可能的和可能—积极的意向。”^②因此，布洛赫的“Humanum”（“人性的东西”）并不只是人类学的东西。“在这方面具体地說（德文原著中为“归根到底”。——譯者注），沒有新的馬克思主义的宇宙学，也就沒有新的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对人的深信以及对世界的深信这两者，很久以来就在革命历史中携手并进，并且不受机械論和与目的格格不入的态度所阻撓。而战斗的乐观主义，作为真正进步的主观方面，也包含着在整个客观方面的探討的方向和目标，从而也包含着对进步的存在（沒有它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的意識）

① 布洛赫：《进步概念的区别》，第39頁。

② 同上书，第41—42頁。

的探討。”^①

布洛赫在爭取“人性的东西”的努力和斗争中似乎放棄历史的唯一实在的舞台，似乎把人性的东西列入某种凌駕于历史的东西之上的东西，并且在里面，意向即目的也找到某种与机械論的循环进程观相对立的东西的基础。如果說在这方面是以一种“自然辯证法”为前提，而“自然辯证法”又以整个自然界而不是局部的自然界的进步为前提，如果把自然辯证法看成是人們竭力追求最終的人道目的的思想基础，那末，布洛赫的这种观念就是放棄了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根本思想即根本立場：人們存在的命运和意义以及“目的”就在于人本身，而且仅仅在于人本身。人是人的意向，人也是历史的意向。个别发生的事件、历史的东西，只有从人的范围来看，才具有意义。

布洛赫在希望的現象中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深刻意义。在自己对这个現象的分析中，他以非凡的洞察力、淵博的知識和卓越的才能揭示了人們种种表現的經常被掩盖的意义。从而对馬克思主义方面的問題，对研究“人”，研究这个永恒的人的命題和任务作出了貢獻。他的研究，根本反对和否定那种荒謬的斯大林主义特征主义，这种特征主义似乎命定只知道一味重复，像那海水一味冲击海岸一样。至于布洛赫力图在宇宙中寻找人类运动的相似現象，而且寻找它的某种基础，則是很不必要的。

在1956年的事件之前，布洛赫受到极高的評价，而在匈牙利和波兰反对一种非人道的、无耻的官僚主义的暴动之后，却来了个大轉折。布洛赫的思想，本质上是人道的，也就是反官僚主义的和反斯大林主义的。他鼓舞了很多人，使他們感到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壟断在現代欧洲文明和文化的条件下是不堪忍受的旧时代殘余，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此，德国党的領導于1957年4月4日和5日仓卒举行了关于布洛赫哲学問題的討論，討論后出版了

^① 布洛赫：《进步概念的區別》，第42頁。

关于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一书^①。

在布洛赫的篇幅巨大的论述中，可以找到各种至少可以有根据对其提出批判性问题的因素。例如，从对希望的现象的解释的独特性、一定的心理说，直到上述的宇宙说。这一切毕竟没有使一种真正生气勃勃的思想努力及其成果有所逊色。但是，如果某种批评是按照旧处方，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把一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而也是人道主义者，是人道主义者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敌宣布为修正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那末这种批评的正确意见也就失去任何意义。不能像格罗普那样非难某个马克思主义者从人出发而不从物质出发，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种种极其不同的看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然的，更不用说在尚待分析的关于人的问题上了。同一位作者还非难布洛赫没有把共产主义理解成“物质的社会进步”(!)，而是理解成“所谓的社会异化的消灭”^②，非难有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除了对异化和物化问题之外对其他任何问题都不感兴趣^③，这是辩护士的口吻，这种辩护士仅仅从官僚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人道主义问题并认为哲学的任务是论证和解释一定的政治实践。

从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来研究人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一片未经耕耘的田野。布洛赫的著作，尽管可能有值得商榷和失误之处，但在这个领域内却犁了一条大沟。

① 《恩斯特·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1957年柏林德文版。书中收集了卢·奥·格罗普、罗·舒耳茨、鲁·罗赫豪森、迪·弥勒—黑格曼、海·莱、格·门德、哥·韩德尔、亨·施瓦策、霍·恩格尔曼、约·费尔斯特、沃·费尔斯特、鲁·赫罗德、沃·舒巴特和约·海·霍恩的论文。

② 格罗普：《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哲学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救世学说》。《恩·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第21页。

③ 同上书，第29页。沃·费尔斯特也以同样的精神认为，把异化概念运用到社会主义的条件中去是毫无意义的（第217页）

第四章 最新时期的理論和实践

我們介紹了卢卡奇和布洛赫的著作的內容以及圍繞这些著作进行的討論，就已經是进入斯大林死后的时期了，这个时期，按其汹涌澎湃的局势和发生的事件来看，在許多方面是一个重要的时期。

斯大林在理論上和实践上的遺產，是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这种遺產，在現代大大发展了的和变化了的形势下，必然不仅是整个苏維埃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而且也是其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发展的巨大障碍，同时也是解决現代人类某些基本問題的巨大障碍。

首先，斯大林瘋狂地破坏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在建設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威信的行徑，越来越反过来对所有那些誣蔑者自己不利了。竭力把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宣称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甚至宣称为法西斯主义（这一点往后我們將要談到）的这种政策，必然会在国际社会主义的和非社会主义的輿論界面前丧失威望。这种政策必然造成对一个苏維埃国家的政策和意图的极大的不信任，而这个国家在和平不仅是社会主义、而且也是整个人类进一步发展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本应是和平的主要台柱之一的。

除此之外，斯大林主义对社会生活一切領域的壟断，也在具有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傳統的东欧各国，起了极端有害的作用。在这些国家里，不管經濟和文化是否有进步，那样的社会主义已显然影响了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下降。

最后，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和这种社会政治关系在苏联本国也

成了經濟和文化生活更大发展的严重障碍,而这种发展,特别是从国民收入的角度来看,还一直明显地落后于各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总之,这种状况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全部社会关系之間的典型矛盾。

整个这种局势,由于国际帝国主义最反动的阶层利用并进一步加深了本来就已緊張的国际关系而恶化了。对于这些国际帝国主义最反动的阶层來說,冷战一直是榨取高额利潤(首先是与軍事工业有关的高额利潤)的最好的政治幌子。另一方面,超集团国家的和平力量,已开始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越来越举足輕重,并且成为和平政策的重要因素。

完全可以理解,大約經過三十年的時間形成的沉重的官僚主义的遗产,不可能一下子克服掉。这不仅仅因为在强大的官僚主义势力中存在障碍,这些势力抗拒任何意味着对它們进行否定的步驟,而且还因为社会主义的意識过去和現在都不得不背着所有那些我們已經有机会介紹过的斯大林主义的贅瘤和斯大林主义的关于社会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于这一切,要克服官僚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大步迈进和摆脱一切斯大林主义的教条,那只能而且必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占着重要的地位。以赫魯曉夫为首的新的领导,在这以前就已經采取了极其重要的行动,承认了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是錯誤的,承认了所有主要的責难是沒有根据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赫魯曉夫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些对于社会主义陣营中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論点。虽然对于某些其他国家的許多馬克思主义者來說,这些論点并不新鮮,但对于社会主义陣营各国的馬克思主义者來說,却是新鮮的,因此,这些論点本身也就意味着对某些重大問題的看法的急剧轉变。

赫魯曉夫在一般理論方面,首先指出被人們忘却的列宁的这

一論点：帝国主义的腐朽趋向并不排除資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就必然要求采取不同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問題。他同时指出一系列新的从根本上影响現代关系和力量改变的因素，证明必須拋棄战争不可避免的論点。由此，对待世界上其他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采取了頗为建設性的态度^①。

因此，代表大会还贊同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則，并強調指出这是列宁在革命后制定的原則。赫魯曉夫在指出最近二三十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时，表示他也同意这样的看法：在当前的形势中，社会主义的力量大大增长了，社会主义对工人、农民和知識分子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通过其他道路（例如通过議会的道路），而不仅仅是通过武装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階級只要把劳动农民、知識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結到自己的周围，并且給那些不能够放棄同資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議會中的稳定的多数，并且使議會从資产階級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許多高度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傳統的机构，也就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民主即劳动人民民主的机关。

爭取了以无产階級、劳动者的群众革命运动为依据的議会的

^① 在这方面，赫魯曉夫（生于1894年）肯定說：“所有这些情况使工人运动的一切活动家負有一个历史性的責任。为和平而斗争的利益要求放棄彼此的責难，找出接触点，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奠定合作的基础。而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那些对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的看法跟我們不同的人，也是可能而且必須进行合作的。在他們中間有不少人在这个問題上是善意地走入了迷途，但是这并不是合作的障碍。今天有許多社会民主党人贊成进行积极的斗争来反对战争危險和軍国主义，主張同社会主义各国接近，贊成工人运动的統一。我們真誠地欢迎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并准备做到一切必要的事情，以便把我們的力量联合起来，为保卫和平和劳动人民利益的崇高事业而奋斗。”（赫魯曉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頁）

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国家的工人阶级，創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

当然，在那些资本主义还很强大而且拥有庞大的軍事警察机构的国家，反动势力必然要进行頑强的抵抗。在那里，向社会主义过渡将在尖銳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的条件下进行。”^①

新的领导同样也看出了，解决苏联发展中的一系列矛盾已到了最后的时刻，因为，这些矛盾压制了劳动者的首创精神，并且限制了他們广泛参加社会主义的事业。恢复苏維埃民主制，克服破坏民主和違反法制的現象，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同譴責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密切相关的。虽然在此以前行政和管理机关已裁减近八十万人，但赫魯曉夫依然不得不強調指出：“必須說，行政机关現在仍然过于庞大，国家用在这方面的經費是浩大的。苏維埃社会关心的是使更多的人在物质生产方面——在工厂、矿井、建筑工地、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国营农场以及創造人民财富的其他地方工作。”^②

因此，批判个人迷信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对斯大林本人的个人迷信，不仅带有彻头彻尾的非社会主义的性质，而且对于人类发展的現阶段來說，已成为一种惨痛的旧时代的残余^③。

从馬克思主义在理論上和实践上的发展来看，所有这些观点，与当时苏联的观点相比，是一种不容置疑的进步。但是必須強調指出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对遭到批判的某些現象缺乏深刻的理論分析。我指的首先是个人迷信和官僚主义問題。只要把官僚主

^① 赫魯曉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40頁。

^② 同上书，第100—101頁。

^③ 关于这个问题，赫魯曉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专门作了报告，根据揭发的材料来看（当然，这些材料只不过涉及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和对待人的态度的一部分），这个报告是一个领导人提供的铁证和作出的果断行动（《赫魯曉夫先生的秘密报告全文》，1956年巴黎法文版）。

義更多理解為官僚主義的行政管理（這只不過是特殊社會結構的一定現象），在個人迷信問題上，就會把這種現象僅僅當作同社會主義制度不相容的現象來批判，就會把它歸結為斯大林的個性，而不會提出問題問一問：在一種社會主義制度中為什麼會產生即使今天在一種高度發達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中也不會發生的、這樣嚴重的破壞法制的變態現象呢？

總之，對蘇聯社會主義發展的階段和發展的內部矛盾，缺乏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蘇聯社會主義發展的內部矛盾，才是這種變態現象的原因和基礎，而這些變態現象是不能只歸結為偶然事件和個人的偶然的特殊性格的。可是，這方面的理論分析和努力，基本上局限在舊的框子內，這些舊的框子使人看不到社會主義運動本身的矛盾變動，而這種變動可以使本來應當成為社會主義根本特性的許多有價值的東西發生“截然改變”。所以批判這些現象就是批判後果，而不是批判原因本身，因為仍然堅持關於社會主義在蘇聯已經建成的舊觀念，這就含有在社會主義關係方面無需再作什麼根本改變的想法。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曾就某些馬克思主義者關於僅僅奠定了社會主義的基礎的觀點斷言道：“個別工作人員在言論中竟錯誤地認為，似乎我們直到現在僅僅奠定了社會主義的基礎。

誰都知道，早在要通過新的蘇聯憲法（1936年）的時候，社會主義制度在國民經濟一切部門中就已經勝利了、鞏固了。這就是說，在那個時候，社會主義社會就已經在我們基本上建成了，從此以後，它就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堅固基礎上發展着。因此，斷定說我們只奠定了社會主義基礎，就會使黨員和蘇聯全體人民，在關於我國的發展前景這樣緊要的問題上迷失方向。”^①

在分析現代社會主義及其發展的某些最重大問題時表現出來

^① 赫魯曉夫：《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第128頁。

的不彻底性和实用主义，大大影响了对一些后来发生的事件和社会主义各国之間关系的評價。在解决社会主义的迫切的問題方面采取了这些最初的重大步驟以后不久发生的若干事件，加快促使他們把不管旧的还是新的观念都統統用来解决社会主义的民主問題。

对斯大林主义的領導方法，特别是对个人迷信的尖銳批判，必然博得热烈的贊成，尤其是在陣营內那些沒有忽視自己的傳統，因而对官僚主义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領域的壟断有特別沉重感受的国家里。由于出現克服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变态現象（这些現象首先表現在机械地把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观搬用于本国的现实）的趋势，而某些共产党領導集团又不能迅速而坚决地处理由于自己的官僚主义的国家主义所造成的矛盾，因此在1956年底，特别是在波兰和匈牙利的生活出現了深刻的动蕩。当波兰人不顾苏联的意图和苏联对哥穆尔卡重新当政的反对而相当順利地解决了十月事件和危机时，由于上述傾向造成的矛盾在匈牙利却导致了人民和政府之間的公开冲突。无能的斯大林主义的領導，仰仗苏联的武装干涉，把事情本身弄糟，从而造成了一出大悲劇，使反动分子乘机利用了人民激憤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納吉和他的同道者的任何努力都未能把事件引上解决內部对抗的軌道，于是，为了防止社会主义力量的全軍复沒，就只剩下一種手段，一种对一个在暴乱中的民族來說最不欢迎的手段——对另一个国家再次进行武装干涉。

匈牙利事件特別成了檢驗現代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和实践的試金石，因为，这里实质上不仅仅要評價一次具有重大国际反应的事件，而且要評價一种导致如此慘痛后果的制度的結構和机能。这里讲的那些国家的馬克思主义思想被檢驗了，但在大部分国家的共产党的領導中，这种思想並沒有經得起檢驗。

反斯大林主义的力量和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還沒

有发展到能够在全世界面前勇敢地用馬克思主义来深入分析事实本身的根源，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同已經而且一直在使社会主义名誉扫地的过去相决裂。官方宣称事件是反革命分子利用过去的领导的缺点策动起来的。这种解釋，从各方面都表明了他們在理論上的貧乏和政治上的軟弱。

凡是具有不同想法的人，都遭到按照旧标准进行的政治上的譴責。由于对这些事件的每一种評价都暗暗含有对社会主义过程的理論看法和观点，因而任何相反的观点都被官方宣称为修正主义观点。許多最有声望的馬克思主义思想家，首先是卢卡奇和布洛赫，都得到这样的遭遇，他們在社会主义問題上的人道主义观点，向来都受到斯大林主义观念的攻击。然而，特别是再次对南斯拉夫的全体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攻击，但他們的革命經驗，特别是对付斯大林的政策和实践的經驗已是如此成熟，以致在估計所有这些事件的性质时，不会有任何迷誤，甚至也不会有任何困惑。早在这些事件方兴未艾之际，铁托就在向伊斯特里亚共产主义者积极分子发表的演說（1956年11月11日）中，对解决这次危机的方式表示了批判的态度，并指出了危机的根源。

同一年12月7日，卡德尔就在联邦国民議会的演說中作了更詳細的理論分析，他肯定說：“在原則上以及在實踐上，我們早就放棄了斯大林主义的这样的論点，按照这种論点，要发展社会主义，只要共产党掌握了政权，然后依靠一定的国家、政治和計劃机构来‘建設社会主义’，也就是建設工厂，实行农业生产集体化，給人們規定工資（而这一切都为了保证党的領導作用）就行了。但是对于我們來說，建設社会主义的概念無論在运动的实质上或者运动的形式上，都要广泛得多，要复杂得多，它只有一部分是取决于領導力量的主观願望的。过去我們这种观点常常受到攻击。然而，最近的匈牙利事件再一次提醒了所有不願意把事实当事实的人，以及所有认为随着革命的胜利或者某一个共产党获得了政权，客观

的社会規律就会停止起作用的人。正相反，誰要想忽視这些規律，誰就会吃苦头。

共产党的真正的社会领导作用不能由法律規定。党只有确实根据客观的社会发展規律行动，才能成为真正的领导力量，也就是成为最进步的社会因素。由于这些規律是通过人、通过各个社会階級起作用的，共产党或某种其他有組織的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在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应当組織得使最先进的社会主义趋势能通过它以及通过整个社会結構表現出来；而且它本身也应当随着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假使一个党不懂得这点，無論它怎样大拍自己的共产主义的胸膛，無論它怎样炫耀自己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标榜它的历史上的领导作用，它仍然会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如果它繼續硬要走这条道路，甚至可以变为反动力量。如果认为，一个党只要称为共产党就可以保证自己的政权的进步性和民主性，那就是严重的反馬克思主义的錯誤看法。这一点在匈牙利表現得很明显。在那里，一个官僚专制的反民主制度，違反劳动群众的意志，多年来奉行了一个小集团的某一种专制政策。这在最后引起了武装行动，行动的主力是工人階級，也就是唯一能够担負起匈牙利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的階級……

如果某个国家内部社会結構复杂，那就可以有一些革命的政治限制暂时存在。但是，这种限制的存在不能用来对付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的自由发展，因为这样它們就会变成官僚主义的专制。不言而喻，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濟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日益加强国家的地位并不是充分解放社会主义力量的道路。不应当忘記，只要作为强力工具的国家还是經濟关系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就談不到某种已建成的社会主义制度，更談不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必須摆脱官僚主义的障碍，以便能够依靠自己内部的动力发展，能够依靠社会經濟关系本身的稳定和内部力量以及依

靠在生产資料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組織起来的广大群众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自觉的主动性得到巩固，并且以此自卫。正因为这样，如果没有与社会主义經濟基础相适应的各种特殊形式的民主的平行发展，社会主义便不可能进步。”^①

从这一場爭論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苏联影响下的各国共产党的理論家和领导人评价这些事件时的理論基础，同南斯拉夫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由于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期間及大会以后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分析不够和不彻底，由于不能同已經被生活駁倒了的某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論决裂，这就大大地助长了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在这一极其关键的时刻占了上风。

所有这些直至今天还对馬克思主义的理論思想产生消极的影响。为了维护自己的理論观点，竟把一切其他的馬克思主义的观点硬說成是修正主义。反对所謂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成为陣营中馬克思主义的基調，而南斯拉夫馬克思主义者則成了主要的修正主义者。如果看一看南斯拉夫馬克思主义者的群众性和彻底性以及他們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明确性，就完全明白那种做法的原因了。除了这些原因外，还因为南斯拉夫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集团政策的观点；不同意关于现代世界的发展和对抗的观点；不同意关于党和政权关系的观点；不同意科学和艺术对国家和党的关系的观点等等，关于这些問題，后面将詳加論述。

由于他們无能和无意用馬克思主义来开誠布公地和批判地对待某些較重大的事件，由于他們把既定的实用主义的观点强加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切就在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和实践上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后果。今天，世界联系如此紧密，而通訊工具又是如此完善，要想在輿論界面前长期地隱瞞某些事实是不可能的。因

^① 卡德尔：《1956年12月7日在联邦国民議会的演說》。《1957年社会計劃的基础》，1956年贝尔格萊德塞文版，第149—150頁。

此,当所有的共产党,特别是西方的共产党固执地重复着一种低于现代要求水平的評價时,当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对这些事件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胜过整个党的观点时,这些党的理論和政治地位,是絲毫也不令人羨慕的^①。

如果說,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馬克思主义的理論思想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振作和勇气,来試图比較独立地去对待某些馬克思主义的問題,并且很快就获得了一定的結果,例如,糾正了过去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对黑格尔的評價,看出了斯大林的哲学观念至少还必須由某些問題来扩充,批判了个人迷信和官僚主义等等,那末,波匈事件却又使維護斯大林主义的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的辯护士神气起来,又使所有那些剛剛开始为历史拋棄的保守的社会主义势力振作起来。

在这样的思想懦弱和混乱之中,正如在这种情况下常常会发生的一样,出現了片面的、人人都能理解的思想进攻的計劃,这种計劃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过去的成就,而且不使苏联的馬克思主义威信发生問題。正如不久以前斯大林时期馬克思主义在“两条战綫”上(反对左傾和右傾)展开进攻一样,近三年来,社会主义陣营的馬克思主义又同样提出了两方面的任务:进行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在这当中,他們既不知道什么是教条主义,也不懂得什么是修正主义。更确切地說,划分的标准純粹是主观的即实用主义的。他們的看法大致是这样:凡是过去的观点所維護的并被宣布为不适用的,都列入教条主义,也就是列入那种认为斯大林主义的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論和实践无需作什么本质改变的主張。而凡是同苏联目前的观点相抵触或者相矛盾的一切观点,則都被列入正式的修正主义。

^① 例如,只需要同让·保·薩特在《斯大林的怪影》这篇文章中对这些事件的分析对照一下就够了。該文見《現时代》杂志,1957年第129、130、131期。

完全可以理解，這樣一來，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沒有能力擺脫自己的某些嚴重的局限，依然如故地給理論思想貼上令人難堪的官方標籤，而由於這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就不具備從事理論工作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說，不能不管那些負責“關懷”思想發展的人的態度如何，自由獨立地向着複雜的理論道路發展，不能以徹底的科學批判態度去掌握理論的領域。

因此，我們至今在那些本應具有最高的科學水平和理論水平的著作中所看到的，仍然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一切基本領域：哲學、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中）的意義和作用的辯護士觀念，和死板地繼續保持荒謬的對待問題的方法、單調的和庸俗政客的作風。他們的理論家不僅根本“忘記了”還存在許多他們沒有提出的問題，而且根本沒有能力再提出某些基本問題，特別是哲學領域中的基本問題。因此，在命題和立意方面竭力嘗試着把少許新東西帶進理論中去的著作，也總是充滿同樣的缺點^①。

無論是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最新教程^②，也無論是理論刊物上的論文，都表明在這方面沒有從根本上批判地分析過去的理論活動。將近七百頁的一本巨著，沒有提出任何一種可以稱得上是衝破斯大林主義思維方法的理論迷霧的有獨創見解的新思想。由於該書的作者使某些問題同官方的觀點，主要是同第二十次代表

① 屬於這一類的著作有：符·普·圖加林諾夫著的《辯證唯物主義範疇的關係》，1956年列寧格勒俄文版；集體寫作的《唯物辯證法的範疇》，1956年莫斯科俄文版；符·普·切爾特柯夫著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非對抗性矛盾》，1957年莫斯科俄文版，等等。同樣，有代表性的著作是一本少有的闡述倫理學問題的書籍，即阿·施什金著的《共產主義道德原理》，1955年莫斯科俄文版，這一著作實質上沒有能克服斯大林主義對個人和集體關係的解釋，也沒有能夠擺脫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和國家的利益完全協調的公式和抽象概念。其次，有代表性的是，形式主義地談論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而根本不提異化問題，更不去通過分析來揭發社會主義發展的現階段究竟把人類關係的這一根本問題解決到什麼程度。

② 《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1958年莫斯科蘇聯科學院出版，費·瓦·康斯坦丁諾夫主編。

大会的观点一致起来，因而这种著作没有什么創造性。甚至在这本著作中也沒有能够克服把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領域問題解釋为哲学問題的錯誤。这样，在这一哲学著作中，关于階級、国家、政党、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等問題都談到了，而对于現代的基本問題即人、異化、人道主义等等問題，却几乎沒有写出片言只字。

值得注意的是，現代苏联的作者在那些即使从形式上看来是正确的地方，也都是不正确的。例如，尽管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思想(当然也包括社会学和經济学思想)的重大的根本变革这一說法是正确的(关于这一点，上述馬克思主义者已用几种标准的提法多次重复过)，但是，他們所設想的那种根本变革却是不正确的。他們认为，这种变革表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辯证法“应用”于唯物主义，同时以此来解釋历史运动的实质。然而，这种观点(在上述著作中也有所反映)中，我們只能看到一种辯证法和唯物主义更机械的結合，只能看到一个“头脚倒置的”黑格尔。早就清楚的是，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在于对順正黑格尔的头脚这个著名比喻作字面上的理解。正如我們已經強調指出的那样，“順正头脚”要求从根本上重新評价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用物质代替黑格尔的思想，而用物质的辯证法代替概念、思想的辯证法是不够的。这是一件十分簡單的工作，要是这样，馬克思完成的就不是如此彻底的变革了。他們沒有看到，說明人，說明人与自然界和历史的关系，在馬克思的观念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实践”和“历史”因素(从这些因素中又接連派生出唯物史观的其他的重要范畴)就是馬克思的新发现的阿基米得那个能挑动地球的支点。

因此，这个按照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計劃而产生的整个庞大的思想机构，本身也充滿了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它的教条主义在一切理論領域都有明显的表現。首先，斯大林的某些基本教条——也包括对哲学、社会学、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党性、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和艺术的意义等等的观念——根本沒有得到克服。馬

克思主义的理論仍然取决于思想和党的领导的观点和指令。实用主义的准則仍然是评价一定观点的根本准則。由于实质上沒有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框子,因此,斯大林的許多修正主义的观点繼續被宣布为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便完全可以理解了。

这一切絲毫也不难于证实,只要我們在这本旨在剖視国际馬克思主义思想的总趋势的著作中举出几个例子,也就可以了。

反对他們所理解的修正主义的斗争,首先是在1956年事件之后加紧进行的,此后,特别是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1958年)发表之后,这种斗争又变本加厉起来。凡是不符合他們的理論观念和“苏联經驗”的思想,一概被宣布为修正主义。因此,不仅仅南斯拉夫的全体馬克思主义者都成了修正主义者,而且也在陣营內的每个国家找出了一些对斯大林主义的粗暴、庸俗和极端狹隘的框子感到不可容忍的大胆人物,并把他們列入这个新的修正主义集团。

我們只要翻閱一下苏联的主要理論和哲学刊物《哲学問題》从1958年到今天的各期,就会相信上述的說法了。以下是几个例子。

在关于历史辯证法的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通向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道路的必然性的问题上,苏联理論家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終于放棄了一条道路論。可是,只要人們像南斯拉夫馬克思主义那样有根有据地彻底坚持这种观点,并試图探索不仅是特殊的、而且是更深刻的社会主义发展的規律,他們的这种主張就被宣称为“民族共产主义”,而这种民族共产主义是“修正主义性质的”,因为它总是力图发现某种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公认的”一般規律不同的“特殊道路”。所以苏联的实践仍然是不可逾越的界綫^①。

^① 例如《哲学問題》1958年第6期上阿·普·布坚科写的《“民族共产主义”是資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一文。布坚科和其他批評家先咬定一种公式,然后洋洋自得地欣賞自己根据这个公式的主要論点作出头尾連貫的分析、批判和結論。就是說,他們先

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仍然这样严重地束縛着这些国家的馬克思主义的思想，以至于他們在处理社会主义的基本問題，如对生产資料的关系、对生产資料的社会化和分配的态度問題时，只是从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国家管理和分配的观念出发。正如我們上面指出过的那样，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和十月革命（1917年）时代的所有比較著名的馬克思主义者都把自由生产者的联合，即公社、工人委员会，看作是一种改变目前世界的重要杠杆，而苏联的思想家却认为这只是某些民族特殊的東西，只是有些人想把它宣布为一般的和必然的东西而已^②。

不言而喻，結果必然是：他們在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家和党的作用等問題上抱着与斯大林相同的国家主义观点。他們认为，国家所有制仍然是极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国家是社会主义生活的主要的組織者，而党是社会主义生活的主要领导者（依靠官僚主义的方式）。至于国家消亡（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和人道主义更有力和更切实地发展的基本前提），这只不过是修正主义的概念罢了。在国家消亡問題上，存在着两种混乱的看法：第一，沒有看出加强国家就必然要加强官僚制度，沒有看出强大的国家壟断主义将成为反对教条主义的主要力量的看法純粹是幻想；第二，提出理論上极其荒誕的說法，认为国家将通过加强而消亡，也就是說，国家要

散播“民族共产主义”这个荒誕的概念，然后发现这正是帝国主义的口号和观念。因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是在为国际帝国主义效劳！根据这一点来看，这种討論和分析同斯大林主义的討論和分析又有什么不同呢？八十一国共产党的最近一次會議（1960年11月）也证明，他們仍然坚持这些看法。在这次會議上所通过的声明，按其质量和理論水平来看，是与通过这一声明的党的数量完全不相称的。

② “这就是說，有人企图把工人参加管理生产的具体的民族形式（工人委员会）說成是所有国家的必然的規律，也就是說，企图使某种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死灰复燃；在批判个人迷信时期的錯誤的幌子下，怀疑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經驗的国际意义。”（阿·布坚科：《“民族共产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哲学問題》，1958年第6期，第10頁）

不断加强，直到它一旦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共产主义的大門口自願而慷慨地解下自己身上的鎧甲并放棄自己的官僚主义的特权时为止。“馬克思主义者始終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須把官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以前的管理方法的残余加以根除。解决这一任务的主要手段就是吸引广大人民群众来管理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当資本主义世界还存在的时候，尤其是在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条件下，借口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而号召使国家尽快消亡，宣布必須拋棄国家，这就是要使劳动人民在他們的阶级敌人面前解除武装。国家消亡的过程是不可能用某种人为的办法来加快的。国家不能被任何人取消，它将随着保存政权的必要性的消失而逐漸消亡。这只有当社会主义国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时才是可能的，而为了解决这种任务就必须巩固人民政权。因此，决不能把关心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与国家消亡的远景对立起来，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①

因此，国家的消亡問題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也就是說拖到不再需要政权的时候为止。而实现国家消亡的条件，正如該书作者所列举的，首先就是要克服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义和国际形势由于最終消除外来进攻的危險而发生变化^②。

苏联的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不能克服官僚主义的見解，这种見解强使別人接受国家消亡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集体削弱和它的軍事威力必然削弱的論点。国家消亡的問題，首先是解决社会主义内部的基本問題的問題，这就是要大力地、广泛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發揮群众的首創精神，使个人摆脱各种官僚主义的束縛和

^① 《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94—595頁。

^② 同上书，第595頁。当然，所有其他的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都坚持同样的意見。这里只要指出卓斯諾柯夫在《哲学問題》杂志1958年第7期上发表的論文，或者康·勃·奧斯特罗維季揚諾夫在《历史問題》杂志1958年第9期上发表的文章和費多謝耶夫以及所有其他人的文章，就足以說明这一点了。

監視，一句話，這是一個由社會本身越來越直接地支配社會的過程，也就是克服對人的管理和實現對物的管理的過程。因此，國家消亡的過程，就是根本克服以往的階級形態和階級關係的那種歷史形式得以發展的基本前提。至於在這個過程中，由於國際關係和帝國主義勢力的存在，只要還沒有實現普遍裁軍，就必須依舊加強國家機構——軍隊，那是不在話下的。就是有馬克思主義也不能赤手空拳往狼阱里跑的！

因此，一切有關反對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大言壯語，總是掩蓋不住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想由於不能擺脫某些基本的斯大林主義的局限造成的明顯弱點。他們總是用粉飾現實的稜鏡來看待馬克思主義，而這就必然要造成對一定情況和關係的理論欺騙^①。

與這些陳腐的和錯誤的觀念不同，在實際上這個過程更活動多變。技術科學和自然科學比社會科學領域中的理論科學，作出了意義重大得多的成就。整個這一經濟—技術的進步（它本身並不是任何一種社會主義制度的證明，因為某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取得了同樣程度和同樣範圍的進步），是現代社會（不管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存在所必不可少的條件。至今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主義的結構，在這方面具有這樣的優越性，就是可以有組織地向認為是重要的部門進行投資，因此能在這些部門中獲得甚

^① 關於這個問題，只要舉出大肆討論和宣傳直接進入共產主義這件事，就足以表明如何非科學地和教條主義地對待社會主義的問題了。1958年中和下半年，從科學院和黨中央宣傳鼓動部到其他各種團體，都舉行了許多隆重的討論會，會上宣布了蘇聯處於直接建設共產主義第二階段的時期。請看看《歷史問題》1958年第9期上刊載的科學院和蘇共中央社會科學院舉行會議的報道。好像進入共產主義是發一道命令或者是分發某個大型展覽館門票一樣的事情似的，好像共產主義不是一個過程似的，不是從經濟—技術因素到文化—心理因素和思想因素在社會主義制度中就必須得到發展和實現，然後使共產主義的勝利完全成為可能這樣的過程似的。由於他們擁有這種思想武庫，存在這樣的個人和人們相互間的關係，由於他們處於這種經濟發展水平，所以在消滅階級分工、國家和政治這方面，他們實際上還只是處於解決社會主義的最起碼的任務的階段。

至胜过技术上一般比較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成就。

然而，社会基础结构的这种积极的发展过程，必然要同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国家主义等等发生冲突，因为这一切阻碍着整个社会的更大发展。因此，在苏共中央十二月（1958年）全会上，尖锐地批判了农业問題上的斯大林主义，同时，某些資料也表明，有些农业部門还处于十月革命以前的水平。这次全会实际上指出了斯大林主义对下述問題的态度和观点：把生产者同生产資料分开（如机器拖拉机站），实施国家的行政强制措施，混淆經濟規律，限制商品—貨幣关系，不尊重物质利益的原則等等。

在1959年2月召开的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同样也談論到必須吸收群众参加管理、参加經濟和文化建設的問題。其实这也就是国家消亡的問題。虽然在理論上沒有因此而得到澄清，也沒有自由撇开政治中心的意見来作比較彻底的理論分析，但是矛盾发展的本身（这些矛盾由于經濟基础的大大发展而越来越强烈地表現出来）却无条件地要求解决这个問題，即使是用实用主义的方式解决也好。然而，在这些社会主义的重要問題上的实用主义态度和理論上模糊的观点，必然会对国内建設和内部关系，以及对评价一系列具有国际性质和意义的因素，产生消极的影响。

由于上述所有原因，社会学、倫理学、人类学和經濟学的問題沒有得到比較可观和比較彻底的研究。而哲学和邏輯学以及許多中間部門則多少摆脱了僵局。但是这里首先指的是形式邏輯，尤其是有其实践意义的符号邏輯学。

毫无疑义，馬克思主义在其他专门科学中也提供了比較显著的成果，因为这些部門的大部分科学工作者，都用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本門学科。可是这些問題不可能在本书內加以闡述，因为本书只是闡述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論問題，而不研究这些問題在各专门領域中的运用。

最近几年来的所有事件表明，馬克思主义無論在理論上或实

踐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不难理解，突然的事变，特别是在匈牙利和波兰发生的突然事变，一方面使得許多馬克思主义者失望和拋棄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要求坚决地和用批判的态度来清算本国的和其他国家的馬克思主义的过时的东西。因此，教条主义同馬克思主义者要求摆脱斯大林主义残余的积极願望相冲突，总是不可避免的。

这一积极的过程，在具有比較重要的革命經驗和比較发达的精神生活的波兰表现得特別突出。在斯大林主义时代，波兰对待本国文化遗产的态度和对待非馬克思主义的进步科学工作者的态度比許多其他国家慎重。

列·科拉科夫斯基^①、伊·維亚特尔和斯·巴烏曼等人主張在哲学和社会学領域內摆脱斯大林主义的观点，这馬上就遭到苏联馬克思主义的官方代表人物的尖銳譴責^②，接着又遭到波兰本国的馬克思主义官方代表人物的譴責，因为在波兰，陣营的官方观念仍然沒有能够得到克服。所有这些人，他們像南斯拉夫馬克思主义者，像卢卡奇、布洛赫和勒弗夫尔等人一样，都被列为修正主义者，并且遭到貶謫。

^① 科拉科夫斯基在1956年和1957年写的論文中，特別尖銳地反对过斯大林主义化的馬克思主义，因此，他当时就被宣布为波兰主要的修正主义者之一。他的所有这些論文的基本目的是反对不动脑筋的教条主义。科拉科夫斯基反对当时的一律化，他认为，在某些哲学和詩学上沒有也不可能有一种唯一真正的馬克思主义的解釋（《现实的和非现实的概念》。《沒有选择的人》，1960年慕尼黑德文版，第19頁）；他还认为，共产主义知識分子的任务就是为思維的世俗化进行斗争，并反对馬克思主义的神話学和伪善行为以及政治上的宗教性和魔术般的实践（《知識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同上书，第49頁）。同样，在《責任和历史》、《哲学家的寄托何在？》和《論“目的决定手段”这一格言的正确性》等論文中，作者主張強調人道主义地解釋价值，主張哲学的任务是影响人們在社会上建立一种道德关系，同时強調必須树立这样一种思想，就是对共产主义者來說，共产主义不仅是目的，而且也是通向这一目的的道路。一句話，科拉科夫斯基的批判是波兰的馬克思主义者同馬克思主义在一定阶段上形成的神秘化和唯思想体系論，进行极端尖銳的清算。

^② 見《哲学問題》杂志1958年第7期和第12期。

在上述的积极的主張中，哲学家亚·沙夫的主張在一定意义上是比較溫和穩健的，虽然从批判性的資料和同非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家辯論的角度来看，他站在与苏联类似企图不同的水平上，但是他的有关真理理論的著作却超出所有研究这个問題的俗套^①。

^① 亚·沙夫：《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的理論的几个問題》，1945年柏林德文版。一般地說，沙夫比較出色地研究邏輯和認識論的問題。同时，他最近写的著作《語义学导論》（1960年华沙波兰文版）对語义学的基本問題进行了馬克思主义的分析。

第五章 中国和馬克思主义

如果說，我們从俄国的事例能够证明，沒有抽象的历史决定論，并正因为这样，人的創造性才能够得到广泛的施展和表現，那末，中国的現代史更是这种錯綜复杂的历史情景和历史发展的夺目事例。

許多世紀以来的封建閉关自守和与世隔絕，加上民族資產階級軟弱，封建殘余和軍閥殘余强大，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日益垂涎之地。十九世紀初^①，它尚面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巨大問題，尚不知道馬克思主义。进步人士（当中也有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受着亚当·斯密、达尔文、斯宾塞、穆勒、海克尔的自由主义思想、民主主义思想和进步的学术思想的熏陶，而在近代卓越的資產階級思想代表当中則深受罗素、杜威、德里施等人的影响。先进的中国知識分子，当中首先是中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偉大領袖孙中山，从欧美資產階級的斗争中，为自己的革命活动汲取經驗。从階級結構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关系来看，中国当时面临几項巨大任务，这就是使国家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影响，推翻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和彻底限制地主和买办資產階級的實力^②。

① 原文如此，疑为二十世紀初之誤。——譯者注

② 后来，毛澤东（生于1893年）在他的《中国社会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不把后两者作为中国革命的同盟者：“在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階級和买办階級完全是国际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屬於帝国主义的。这些階級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們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階級和大买办階級，他們始終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中国社会各階級的分析》。《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頁）

孫中山領導下進行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 1911 年，結束了長達許多世紀的時期；共和國的成立，開始了以往整個歷史上從無先例的發展。要知道，揭開這部史詩的，是寥寥幾位馬克思主義者（在 1921 年黨的成立大會上，他們只有十二人），這就再一次顯示出馬克思主義思想和人的因素，即所謂主觀因素在改變歷史中的威力和作用。

中國真正的革命高漲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但是中國革命的進程在這一時期必然要朝某種不同的方向發展。“古典的”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已成過去。俄國的十月革命开辟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紀元，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國又有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因此，在這些國家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

此外，中國的特点是，孫中山這位重要的革命人物，並不是某一狹隘的資本主義階層的代表，他從廣大人民的立場出發，懷着謀求民族利益的崇高理想去對待革命的任務。他的著名的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雖然不夠明確和有着各種解釋，但他後來的革命步驟和宣言明顯地表明了他的廣泛性和進步性。例如，1924 年，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共產黨人也出席了這次大會），孫中山宣布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的政策。再過一年，孫中山就逝世了，但他的巨大聲譽，他的進步的和廣泛的政治綱領，在許多方面會有助於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活動。

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倡導者陳獨秀教授和李大釗教授組織了第一批小組，並在 1921 年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共產主義運動首先依靠當時人數尚少的中國無產階級，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外，他們加入了第三國際，紀律上服從蘇聯的指令，認為俄國豐富的革命經驗，足以保障這些指令的正確性。而這些指令基本上是要要求無條件地服從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第一階段的群眾性組織和主要實現者的國民黨。

但是，孫中山的逝世，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軍閥的上台領導國

民党以及早在 1926 年开始的反共(如在广州),預示另一派掌握了中国革命的大舵。当中国共产党人还在一心想同国民党联合,一心想首先在无产階級队伍中扩大影响的时候,蔣介石同大資產階級和帝国主义势力就已准备好反革命了。

这时,在莫斯科,斯大林派同党内和共产国际内的反对派正在进行尖銳的斗争。斯大林仍然一味主張同国民党保持巩固的联合,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則坚决反对这一主張,要求中国共产党独立活动。同后来按照 1905 年的榜样采取的工农革命专政的口号相反,托洛茨基认为只有无产階級专政才是出路。托洛茨基的立場,无疑是更彻底的,对于中国无产階級和共产党人來說是更少痛苦的,但它同样是同十分复杂和紛乱的中国局势不相适应的。这也表明了,革命是不能只靠某些既定的經驗去指导,也不能从与群众和局势毫无直接联系的某个中心来指揮的。

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的糾紛和斗争,給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一次革命的領導,如果主要为这一或那一派势力,而且是某个外国的这一或那一派势力的偶然优势所左右,那末,失敗几乎是肯定无疑的。而如果这些势力(不管那一派)越是固执地认为自己的革命道路是所有其他人的范例,那末,人們自然会越加不信任这种指导。

完全可以理解,無論共产国际,或者服从共产国际指令的中国領導,都不能理解来自中国具体情况本身的某些新的提示。中国情况是特殊的,这不仅因为中国当时主要还是农业国家,而且还因为当时的中国革命推动了农民群众,他們公开和秘密地組織和建立了农民协会,并在农村从封建主和資產階級手中夺取了政权。毛澤东正是研究了这种情况,特别是湖南省的情况之后,在 1927 年 3 月写了报告,他在这篇报告中肯定說:“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矯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錯誤处置,必須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

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問題。很短的时间內，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們将冲决一切束縛他們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将被他們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决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头領導他們呢？还是站在他們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評他們呢？还是站在他們的对面反对他們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項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①

中央委员会否定了毛澤东的报告。从当时的革命运动和馬克思主义发展所及的水平和范围来考虑，这是不奇怪的。报告提出的观点竟极其輕易地被說成是“农民傾向”和同小資产階級意識有联系。

然而，这些認識成了中国革命的阿基米得那个挑动地球的支点。毛澤东通过这些認識揭示了当时尚未为人認識的革命路綫，这条路綫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并将大大丰富馬克思主义的理論。

可以說，1927年也是中国革命的轉折年，一方面是因为蔣介石进行四月反革命事变和大規模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因而开始走自己的独立的道路，另一方面是因为毛澤东認識到必須在革命的农民群众当中和在建立自由根据地的游击斗爭当中寻找革命的主要依靠。中央委员会八月全会(1927年)撤換了陈独秀，并派毛

^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澤东选集》第1卷，第13—14頁。毛澤东后来多次強調这一点。在他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論》中写道：“因此农民問題，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問題，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沒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們是工业經濟的生产者。沒有他們（原文应是“沒有近代工业工人階級”。——譯者注），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們是中国革命的領導者，他們最富于革命性。”（《新民主主义論》。《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63頁）

澤东到农业省份江西去建立軍隊和苏維埃。但是以新書記李立三为首的党的領導认为，革命过程仍然是在总起义，特别是城市总起义和解放区苏維埃化的旧範圍內。他們不顾本国的具体情况，把毛澤东的組織游击战争、建立自由根据地、包圍城市等观点看作是农民冒險主义，并且把毛澤东从政治局排除出去。

但毛澤东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他的一小支部队在湖南和江西交界处同朱德的队伍汇合，建立起第一支革命軍隊，他任政治委員，朱德任司令。往后我們將看到，毛澤东由于自己的各种論人民民主等問題的理論著作而特別著名。但是如果从中国革命的整个历史来看，毛澤东的天才恰恰在于認識和力行当时尚未为人認識的革命實踐，这就是：革命从城市轉到革命的、分散的和簡直可以說是閉塞的中国农村的广闊地区，建立紅軍和解放区，在解放区推翻封建和資產階級政权，引导革命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而在第一阶段是建立工农政权。

只要看看中国革命后来的整个进程，这些論点，即毛澤东这种非凡的創造性實踐，是其他一切賴以建立起来的基础。

在这条艰难而緊張的道路上，毛澤东既要反对中央委員會的官方論点，又要反对党内其他許許多多从消极的到“极端革命的”思想和情緒。在这个时期的一篇著作中，毛澤东反对所有这些論点，特别是就沒有在全国赢得所有群众之前不应立即建立新政权的論点，簡述了自己的观点：“这种理論的来源，主要是沒有把中国是一个許許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爭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認清楚。如果認清了中国是一个許許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爭夺的半殖民地，則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統治階級內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終不能有一个統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問題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現在这样的全国規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

世界只有中国有統治階級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紅軍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紅軍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圍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紅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紅軍、游击队和紅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階級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結果；并且无疑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單純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澤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設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綫是經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①

正是在这些方面，毛澤东丰富了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观点，并且不仅从理論上而且从实践上指出，只有一种革命經驗和一种革命理論作指南，在錯綜复杂的历史事件和环境中的完全不够的。应当立即強調指出，中国这个經驗，共产国际实质上沒有接受，它仍然一直是苏联經驗和观点的宣傳中心。

在中国内部，領会毛澤东的这些观点的过程也长达許多年。当时不得不同夺取城市的李立三路綫，同在紅軍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問題上的其他各种观点进行斗争，因此毛澤东派沒有能够击退蔣介石对解放区的第五次圍攻，这就是著名的长征的原因。只是在这次长征途中，在1935年，經過沉痛的經驗和損失之后，毛澤东的路綫才取得了胜利，毛澤东成为党的書記。

这样，我們已經开始談到革命第三阶段的事件了。日本在1931年占領了滿洲，几年后又准备占領全中国。革命紅軍在北方各省推翻封建关系，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人民政权，并同时肩負起

^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东选集》第1卷，第103—104頁。

抗日的重担。在这个时候革命紅軍又一直不得不抗击国民党的进犯和圍攻。只是1936年西安事变(当时蒋介石的生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之后,根据毛澤东及其战友們的十分有远見的政策,重新达成国共合作以反对当时主要的共同的敌人。

两党双方都作了让步和一定的妥协(如:共产党人同意廢除紅軍的名称和停止土地革命,国民党則承认中共地位和答应給予物质帮助等)。但是,这次联合与1924—1927年的合作有着重大的差别,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有了巨大的和沉痛的經驗,而且有了十年游击战争的經驗,并領導着独立的和强大的兵团和解放区。所有这一切,足以保证1927年不将重演。

与国民党的抗日統一战綫把一系列新的問題提到日程上来,首先是合作的性质問題和国家未来政权和結構問題。在这个时期,毛澤东发表了論述当时革命的性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結構和游击战争的战略和策略等問題的意义极其重大的著作。

在1938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扩大六中全会上,毛澤东作了著名的《論新阶段》的报告,他特別着重指出,当时国民党是最大和最强的党,中国共产党人将支持它变成人民的革命联盟。“理由是抗日的友軍越大对抗日斗争的胜利(“对抗日斗争的胜利”,系引者所加。——譯者注)越好。单单一个共产党的发展进步,是不够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处于第二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发起了与坚持了各党各派各界(引文删去了“各軍”二字。——譯者注)的統一战綫,并在自己的組織上向着广大革命志士开門,用以力爭抗日的胜利。但若处于第一党地位的国民党依然保存过去那样的老状态,那就对于抗战,对于統一战綫,都非常不利。抗战将不能获胜,全民族陷于危險。”^①

^① 《論新阶段》。《毛澤东演說和論文集》,塞文版,第38頁;中文本第3章第18节末段。毛澤东清楚地看到,国民党是一个混杂的党,內部的反动分子常常在威胁着

在这一著作中，毛澤东也把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任务概括如下：建立敌后游击队；建立地方人民抗日政权；争取广大群众参加抗战运动和进行群众的政治、文化和軍事教育；官兵平等；重新划分敌后各地作战区域与行政区域，使之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等②。

在这个报告中，毛澤东也提出了未来的社会制度問題，并对他关于中国的人民共和国的論点作了解釋。“各民族在自願原則下互相团結，建立統一的政府。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級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設立人民代表會議的国会与地方議會……就是孙中山的（中文本原文为“就是真正”。——譯者注）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不是苏維埃，也不是社会主义。”③

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阶段和建立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必經阶段的人民民主的直接任务的完整思想，毛澤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論》一文中有最扼要的闡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須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謂民主主义，現在已不是旧范疇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疇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④

毛澤东从中国具体的历史事实和情况出发，他的主要的偉大

它。他說道：“然而誰都明白，国民党中还存在着一些守旧分子，障碍着党的进步，并与社会上其他守旧分子相結合（中文本原文为：“障碍着国民党进步的速度与程度，由于这些分子的存在，并与社会上許多守旧分子相結合。”——譯者注），就在民族革命战争的洪流中造成一股逆流。”（同上书，第39頁；中文本第3章第19节）

② 同上书，第48—50頁；中文本第4章第4节。毛澤东有关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的最著名著作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1936），《游击战争的战略問題》（1938），《論持久战》（1938）。

③ 同上书，第70—71頁；中文本第5章第7节。

④ 《毛澤东选集》第2卷，第636頁。

之处在于他作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能够摆脱一切根据事先规定的观点和經驗去解决历史問題的教条主义做法。他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情况同1905年和1917年俄国的情况不同，并且提出了他与苏联的馬克思主义者和整个第三国际的革命法典中唯一得到确认的論点相反，即与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論点相反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論点。

正如在1927年和1928年独创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問題，从而指导了当时尚未为人了解的进程一样，毛澤东在国共领导下的广泛的人民抗日运动的新情况下，根据具体的条件解决了形势問題。使中国情况同其他已往的革命，特别是俄国的革命有重大差别的一点，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因而在一定时期应当考虑到他們。而外国侵略又促成了这一点，因为在外国侵略的时期，中国资产阶级能够表现出它的革命性。

再一个特点是，处在当时阶段的中国革命在外国侵略时期得到了发展，有了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兵团和丰富的游击战經驗。

因此，毛澤东在这篇文章以及后来写的許多文章里肯定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前途必然是独特的。“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經不是旧的、只是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只是（两处“只是”字样，均为引者所加。——譯者注）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完全地或部分地（“完全地或部分地”，系引者所加。——譯者注）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此处删去了“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一句。——譯者注）这种革命，在其进行中，因为敌情和同盟軍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

段，然而其基本性质在社会主义革命到来之前是沒有变化的。”^①

在經濟上，毛澤东认为这种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是国家主义和私人占有的混合，认为在这个阶段不仅因为同民族資產階級联盟，而且还因为資本主义不发达，因而不可能一般地反对中国的資本主义。大壟断資本必須国有化，但同时又必須使中小資本能够发展，因为沒有它們，落后的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思議的。在农村也是一样，根据孙中山的原則，耕者应有其田，也就是說，不剝夺富农，而只剝夺封建土地和大地主土地。“大銀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規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銀行、铁道、航空之屬，由国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計，此則节制資本之要旨也。’”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这一部分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經濟制度的正确指南。新民主主义政府将不沒收其他資本主义私人財產，将不限制“不能操纵国民之生

^① 《毛澤东演說和論文集》，塞文版，第98頁；《毛澤东选集》第2卷，第639頁。毛澤东在这一时期的另一篇名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中也作了同样的分析。他写道：“但是，現時中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經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們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資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階級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革命的民主的（“革命的民主的”，系引者所加。——譯者注）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資產階級专政的社会。它在經濟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資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經營，把大戶土地分配給农民，同时帮助中小私人工业（中文本原文为：“把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資本主义的企业”。——譯者注），并不廢除富农經濟。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資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創造前提。中国現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間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弗·特斯利奇著《中国革命和莫斯科》一书中的附注，1953年貝尔格莱德版，第358頁；《毛澤东选集》第2卷，第618頁）

这些观点在《論联合政府》（1945）和《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1947）中一再重复。

計”的資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从中国經濟仍然十分落后的事实出发作考虑的。

这个政府将采取一定措施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并分配給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以實現孙博士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和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这是与在农业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不同的。这只是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富农經濟如通常一样,将是容許其存在的^①。

我們看到,毛澤东考虑到孙中山的巨大声誉,在許多方面是依据了孙的观点和口号,特别是他活动后期的观点和口号。但毛澤东也立即指出共产党人对革命的看法同国民党綱領之間的區別,并且特別強調国民党綱領中缺少的革命后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观点。

毛澤东的新民主主义观念是以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当时的阶级关系和革命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的結果。毛澤东創造性地对待当时的問題,并繼續反对各种教条主义的和极左的观点,同样也反对斯大林低估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和支持国民党的做法。

貫穿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路綫,主要是同国民党联合抗日的路綫,但在这当中,中国共产党人領導下的軍队承担了战争的主要重負。蔣介石采取少承担为上的策略,以便保存战争实力来同共产党人作最后的清算。但是他的算盘打錯了。經過几年战争,共产党人領導的中国軍队恰恰在軍事上和思想上得到了进一步的鍛炼,在人民中进一步贏得了声誉和建立了广泛的人民支持网。因此,在日本被粉碎之后蔣介石便开始了新的反革命,虽然得到所有外国帝国主义的軍事援助和外交援助(甚至苏联的外交援助),却年复一年地遭到接連的失敗。

这是一次几百万軍队的冲突。蔣介石軍队占有数量上和物质

^① 《毛澤东演說和論文集》,塞文版,第106—107頁;《毛澤东选集》第2卷,第649頁。这些观点,毛在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論联合政府》中也重复提到。

上的优势，但没有道义上和經驗上的优势。当蔣介石为了中国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即为了同外国帝国主义勾結一起不仅威胁着中国广大工农群众，而且威胁着中小資產階級的官僚資本主义的利益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毛澤东立即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战士的巨大的道义資本和以团結中国一切进步的民族力量的远大綱領——新民主主义的綱領——参加了决战。

虽然局势因中国共产党成了革命的主要力量，国民党領導轉入反革命而起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革命依然是只有在新民主主义綱領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到底。因此，在冲突最激烈的一年的年初，即1947年2月（原文如此，应为12月。——譯者注）毛澤东在中共中央委員會会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的报告中，再一次更明确地說明自己关于这一革命阶段的思想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壟断資本主义，只是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資本主义，不是消灭（引文删去了“上层”两字。——譯者注）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由于中国經濟的落后性，广大的（引文删去了“上层”两字。——譯者注）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义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內，还是必須允許它們存在。”^① 可見，毛澤东当时描繪的新中国的經濟結構，依然符合他在三十年代末的想法。按他的意見，这种結構应是：“（1）国营經濟，这是領導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經濟；（3）独立的小工商业者的經濟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資本經濟。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經濟。”^②

1949年年中，国内战争結束了，反革命被打垮了。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这时一个明显的差別是，共产党人已不是同国民党联合，而是革命的主要領袖。这就使中共有可能加快速度解决某些

^① 《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254頁。

^② 同上书，第1255頁。

問題，有可能彻底消灭大資本和封建地產。为了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并紀念中共成立二十八周年，毛澤东写了《論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他向当时尚未承认他的莫斯科伸出了手，从而同意日丹諾夫关于两个世界的集团观点，他基本上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理論上面，但有差別，就是把工人階級、中国共产党和农民提到第一位加以強調，并把制度更明确地确定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

这也是可能的，因为在革命舞台上留下的首先是这些力量，因而有理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彻底的和唯一的結論：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始終是革命和抗日的主要力量。“‘你們独裁。’可爱的先生們，你們讲对了。我們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剝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現阶段，是工人階級，农民階級，（引文此处删去了“城市”二字。——譯者注）小資产階級和民族資产階級。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結起来，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产階級（引文删去“以及代表这些階級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們”一句。——譯者注）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乱說乱动。”^①

在这个公式里，虽然还有小資产階級和民族資产階級，但他們已經不算是主要力量，同时也被排除在国家领导之外。在这篇文章里，毛澤东特別強調民族資产階級不能是革命統一战綫的領導者，不能是主要国家机构的領導者，因为它的社会地位决定它的軟弱、缺乏远見和勇气。因此，走过的整个革命道路的最終經驗就是实现“工人階級（經過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須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結一致”^②。

① 《論人民民主专政》。《毛澤东选集》第4卷，第1480頁。

② 同上书，第1485頁。

于是，中国踏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門槛。但由于一系列困难和特殊的环境，这个过程也必須同样地按特殊的方式来理解。关于这个问题，毛澤东早在三十年代末就发表了两篇名著《实践論》和《矛盾論》。

这两篇著作，不是对这些十分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作細致的哲学分析，而是更多地从理論上闡明革命实践本身和把这些原則运用于实践。毛当时的批評基本上是針對所謂的教条主义者，他們是苏联斯大林主义学院的出口品，并且由于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地看待馬克思主义，几乎断送了中國革命。

虽然这是毛澤东写这两篇著作的基本意图，但必須強調指出，在这两篇著作里，卓越的辯证家、无与伦比的革命实践家和战略家的思想是明显的，这对中国当时來說，不仅是首要的和最重大的，而且是最迫切的问题。因而，在《实践論》里，毛的基本思想同斯大林的認識論不同，他把实践在极其广义的意义上理解为人的認識、历史和整个生活的源泉和基础。“人的社会劳动（“劳动”，在中文本原文中为“实践”。——譯者注），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階級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領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認識，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階級斗争，給予人的認識发展以深刻的影响。”^①

毛澤东尖銳地批評教条主义的馬克思主义者只会一再重复从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中背熟的女思想和辞句，而不懂得把深刻的馬克思主义辯证法运用到具体和特殊的环境中，他有根据地特別強調实践，強調認識始于实践，并通过理論知識回到实践。这样，毛澤东就能够比斯大林派馬克思主义更深刻地理解这个问题，并駁倒对認識过程的頑固的抽象解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

^① 《实践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第282頁。

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認識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認識，又从理性認識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認識、再实践、再認識，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認識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較地进到了高一級的程度。”^①

毛澤东在对矛盾問題所作的分析中也尖銳地反对教条主义和片面的經驗主义。他在确定矛盾范疇时虽然不应如此片面地不加区别和不应把矛盾范疇同对立范疇和差異范疇混淆，但当他重申和特別坚决主張发现和²研究特殊矛盾和主要矛盾，认为每一个过程都是各种矛盾着的关系和趋向的綜合时，却是正确的。毛澤东強調，我們的認識是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写道：“我們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問題上的錯誤，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認識各別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認識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們認識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的时候（“的时候”，中文本原文为“以后”。——譯者注），还必須繼續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們的教条主义者是懶汉，他們拒絶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現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們所不能够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顛倒了这个人类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他們也不懂得人类認識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結——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們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

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統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規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

^① 《实践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第295—296頁。

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內，都是不同质的。我們的研究工作必須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須从这一点开始。”^①

毛澤东在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不同质的矛盾之間的差別的同时，特別強調和提醒必須不仅懂得經常发现主要矛盾，而且还要寻找解决不同质的矛盾的特殊方法。

后来在革命胜利后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时期，毛澤东又在这些認識和观点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革命經驗，对人民內部对立^②作了著名的分析，提出用非行政方法解决各种对立，特别是思想意識上的对立。虽然这些分析是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丰富的批判經驗之后写出的，但并不降低其意义，因为这些分析比社会主义陣营中的其他分析要深些。

富有特色的是，他強調剝削者和被剝削階級間的对立不仅有对抗性一面，而且还有非对抗性一面^③。但更有意义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內发现对立。

“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对立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对立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識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們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組織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資产階級意識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風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相对立的。”^④

① 《矛盾論》。《毛澤东选集》第2卷，第776—777頁。

② 本书将“矛盾”均改为“对立”。——譯者注

③ “敌我之間的对立是对抗性的对立。人民內部的对立，在劳动人民之間說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說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对立的問題》，引自《南通社公报》1957年6月19日第2頁）

④ 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对立的問題》（毛澤东1957年2月27日在

毛澤东指出，要避免鬧事，就必須消除官僚主义，必須大大改进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必須用正确的和特別的方法解决每一个对立。他认为在全人口中間和在知識分子中間，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并作出結論說，他們不应通过行政命令而应通过思想斗争使別人相信自己观点和理論的正确性。“因此，馬克思主义仍然必須在斗争中发展。馬克思主义必須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現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⑤

在这种观点和政策的基础上，宣布了百花和百家理論，长期共存和互相监督理論。毛澤东在这方面显示出胸怀广闊，并明白任何指令所不能推动的事情。“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風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風格，另一种学派，我們认为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問題，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討論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⑥

然而，百花理論和在中国社会生活中逐漸加强社会主义的关系的做法，在毛澤东的讲话之后不久就遭到根本的否定。毛离开共和国主席的位子而单做党的主席，各种流派的思想斗争遭到官方的譴責，实行共产主义关系的激烈运动开始震蕩整个社会生活。在农村（在某些城市也曾嘗試）推行取消私有制、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和一起生活的中国公社，在国际上則使局势紧张，主張通过正义战争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間进行彻底清算，——这一切于是成了新政治方針的基本口号。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和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这些最新因素开始令人不安^⑦。最近几年表現出来的傾向在很多方面大大地不同于

最高国务會議第十一次扩大會議上的讲话)，引自《南通社公报》1957年6月19日第10頁。

⑤ 《南通社公报》1957年6月19日第22頁。

⑥ 同上，第21—22頁。

⑦ 請看卡德尔1960年就中国对共处和战争問題的观点写的《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該书从許多方面闡述了中国目前有关这些問題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进程中的深思熟虑的非凡活动。在毛澤东的理論和实践的創造性的领导下，中国的革命力量不仅揭开了中国新的最重要的一頁，而且作出了史无前例的历史功績。这一革命史詩将永远是人类的創造性、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最光輝的榜样之一。

然而，客观的馬克思主义的分析，又必然指出确实存在着成为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建設道路上的障碍的某些后果和情况，要克服它們，同样地不仅需要付出最大的努力，而且需要有最大的理論明确性。

首先，中国的进步力量面临的是一个极其不发达的国家，以及由此而来的落后意識，为了更快地克服这种落后性，就必然企望更加加强多半从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的和軍閥主义的领导方法。作为长期战争后果和作为在这种条件下培訓干部的后果的这种軍閥主义心理，必然助长用行政方法对待人和处理問題（由于国家的落后又更加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态度）。如果再加上民主傳統十分薄弱，特别是主要帝国主义力量对中国实行經濟歧視和政治歧視，那末，不仅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困难更加明显，而且由于在这种不可思議的状况拖延下去的情况下不能看到解决加速发展問題的方法而产生的急不及待情緒也更加明显了。这样，由于国内发展碰到的十分巨大的困难和問題而产生的观点，必然取代了对国际关系的广泛考察和加强作为現代世界当前矛盾的唯一出路的共处的耐心工作，那是完全合乎邏輯的。

在更詳尽地分析这些問題的时候，自然不应当忽略社会主义各国間的特殊关系，不应当忽略霸权傾向以至利用某些机会的行为，这些都給一定的关系和运动招致深远的不安。

这些和沒有完全列举的因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他們当前消极的观点和行动，但并不是說这些观点和行动是有道理的。相反，他們在政治上复活一系列的斯大林主义观点和活动的活动，在

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当前条件下,具有明显的消极性质。

中国的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毛澤东,在其革命过程中表明自己是能够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主义并进一步发展馬克思主义的。他們同时表明,在自己的队伍中也有不少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极端革命者和目光短淺的馬克思主义者。然而,今天他們不只是面临上述困难。他們自己还有其巨大的革命經驗,同时还有许多別国的馬克思主义者非凡的革命經驗,特别是南斯拉夫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发现和克服国家主义的、官僚主义的畸形現象的經驗。

所有这些是否有助于使阴晦的天际明朗起来,是否有助于克服不符合他們目前所处地位和不符合国际关系的某些观点,这首先取决于他們自己。

(二) “社会主义阵营”外的 马克思主义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在法国

在西欧各国当中，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仅成为主要思潮之一，而且以自己的生命力和各个重要思想家，粉碎了官方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僵硬而烦琐的原理。对这种发展有功的，根本不是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恰恰是先后同这个政党发生公开冲突的马克思主义者。战后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史甚至可以证明这样一种有代表性的，几乎是普遍的现象——法国共产党(和战后头十五年内世界各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不适应形势和历史向它提出的任务，而形势和任务一天经常在变动，这种变动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行动完全不能安逸地懒坐在自己的进步性上和自恃无所不知。

与此相反，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活力，比其他国家的大得多，这是一系列因素造成的，我们可以举出其中几个最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战前法国工人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法国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一点我们先前已简单地指出过），社会主义运动参加了粉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法国在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吸引力也使别国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聚集到法国，他们的活动或多或少地促进这一思想运动。同时不应忽视，资本主义史无前例的非人道行为给人的历史“教训”也使许多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倾向于马克思的某些重要原理和思想。

因此，战后的形势十分有利于在哲学方面和整个意識形态方面进行創造性的有成果的討論。在基本哲学流派(人格主义、現象主义和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当中，对馬克思主义的兴趣增加了。这不是說他們根本接受了馬克思主义，也不是說他們沒有从自己的立場出发对它抱批判的态度了。但可以說，法国某些最杰出的思想家采納和研究了馬克思的一些基本概念(如異化、实践)，而斯大林的畸形的馬克思主义不仅把这些基本概念忘記掉，而且拋棄掉或弄得庸俗了。

这里自然不是指托馬斯主义或右派人格主义。但是，当一位激进的基督教人格主义者穆尼埃同基督教正統教理，同基督教教会发生冲突，或者无神論存在主义者薩特也达到馬克思主义的时候，这种努力是不能低估的。

例如，穆尼埃接受了几乎是完全意义上的实践概念，认为实践有四种活动范围：改变外界现实的实践，塑造我們形态的实践，使我們接近于人的实践和丰富我們的价值世界的实践^①。

与要求預約論相反，穆尼埃正确地指出，这不是以我們为轉移的，因为我們已經受預約和受預制了。尽管他对世界的理解有其唯心主义的局限性，但是馬克思主义者在他从个人的前景考虑得出的社会政治論断中可以找到共同解决人和历史的具体問題的基礎。这才是最重要的。具体的历史行动計劃、現代的人的生存問題的解决和在人的解放道路上共同劳动，必須优先于一般哲学問題，尤其是自然哲学問題。

穆尼埃在維護关于現代的人的異化的思想时，认为資本主义临近末日，資本主义內部正在出現新的、社会主义的世界的輪廓，如果这里所指的社会主义是：无产階級消失，以个人广闊前途为基础組織的計劃經濟取代无政府状态經濟，生产部門社会化(不是国

^① 見穆尼埃：《人格主义》(《Le personalisme》)，1949年法文第1版。

家主义化，因为国家主义化加深異化)，工会运动发展，劳动重新得到尊重，劳动者个人进步等等。

穆尼埃看到，在这个前景里面，組織的問題与人的問題是不可分开的。他认为当代基本問題之一是要避免技术主义者专政，因为这种专政無論左的还是右的都是只見組織不見人。穆尼埃同时也清楚地看到，議會民主在解决人类現代問題时显得无能，社会主义必須首先是劳动者本身的事业。他对形式民主所作的馬克思主义批評，总的說来是中肯的。“政治民主必須完全調整为与現代生产結構相适应的真正經濟民主。”^①难道还能有对有益的討論來說更好的基础么？难道穆尼埃对当代基本問題的認識不是比整个斯大林主义化了的馬克思主义更胜一筹么？

就在战后不久的这一时期，加·卡桑諾瓦发表了几乎是目前馬克思主义关于数学和辯证唯物主义的唯一著作，而在著作界則出現穆任、加罗迪和勒弗夫尔，特別是勒弗夫尔，他在探討哲学問題方面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富于獨創性^②。

昂利·勒弗夫尔(1905年生)

大家知道，勒弗夫尔在二十年代中期加入一个团体(若·波利澤尔、普·莫昂热、恩·古特曼当时也曾經加入这个团体)，这个团体企图从反抗过去和反抗非人道化中寻求某种出路。从1928年，即发生了有名的危机以后，勒弗夫尔加入的这个团体的許多人都准备研究馬克思主义。从翻譯謝林的《人的自由》一书时期(1925—1926年)以后，他对存在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观点感到不足了。对莫·勃龙台这位天主教徒的恭順“行为”和耳·布倫希維克的抽象的唯智論也同样感到不足了，虽然这两人曾是他的教授。勒弗夫

① 厄·穆尼埃：《人格主义》，1957年巴黎法文版，第128頁。

② 加·卡桑諾瓦：《数学和辯证唯物主义》，1947年巴黎法文版；昂·穆任：《存在主义者的神圣家族》，1947年巴黎法文版，等书。

尔当时已是共产党员，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理論問題和法国馬克思主义界圍繞馬克思主义的一切爭論。他认为必須明确地坚持最优良的馬克思主义哲学傳統，使馬克思主义摆脱政治主义和經濟主义^①。

勒弗夫尔同古特曼一起出版了馬克思、黑格尔和列宁的文选，試图指出必須坚持的那些思想。同时，整个这一活动是直接面临已經到来的严峻事件的情况下进行的。希特勒主义当时正飞揚跋扈。自由世界同这种资产阶级的黑暗势力的斗争进入了紧张关头的阶段。在这种形势下，勒弗夫尔写了自己最好的小册子之一《辩证唯物主义》(«Le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 1939年); 同时又写了两本論述当时局势問題的著作:《民族主义反对民族》(1937年)和《希特勒上台。德国法西斯五年总结》(1938年)。

勒弗夫尔那时已經表现出自己在探究問題时不仅有独立性，而且有灵活性和創見。不管他是否一直是这样，但反教条主义和辩证的態度却是他的思想活动的本质特征。至于勒弗夫尔同其他許多馬克思主义者一样清楚地看到法西斯主义对整个民主人类和对人类在政治和文化領域的正常进步的巨大危險性，就不必多說了。

需要着重指出的則是他在关于民族主义的著作中已經出現了某种不同的音調，这种音調成了勒弗夫尔关于馬克思主义的理論探究的几乎是一貫的主調。他清楚地看到，任何抽象的国际主义，清一色的共产主义以及片面的抽象的民族主义是与馬克思主义沒有共同之处的。“一方面民族不能是自身的目的。它是既定的，是行动范围。民族感情是这样一种事实，它的意义必須永远加以研究，以便考虑到它，对它和通过它进行活动。某种教条主义的和絕

^① 勒弗夫尔在他著的《存在主义》(«L'existentialisme»)一书(1946年巴黎法文版，第10—66頁)和新著的《总数和余数》(«La Somme et le reste»)一书(1959年巴黎法文版)中，对这个时期作了較詳尽的闡述。

对的原則（例如一味贊揚或一味呵斥民族感情）是不值得一談的。只有全部具体条件才能决定应当采取何种立場。沒有原則上的民族主义，也沒有原則上的反民族主义。民族是一个必然的阶段——至少根据欧洲所具有的一些条件来看是这样。”^①

另一方面，抽象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即普遍平均主义等等，是对通常所設想的社会主义世界图景的歪曲，因为这意味着禁欲主义、兵营、一律化、絕頂平庸等等。“奇怪的是完全相反，这种图景竟越来越适合于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主义把一切趋向都引向原始主义、禁欲主义和自然主义，正式把个人对集体的牺牲、他在普遍的貧乏中一律化和他的清一色化称之为‘社会主义化’。这种思想同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因为馬克思主义是丰富的理論，它反对一切类型的自然主义和原始主义而恢复多种多样的需要。”^②

也應該大致根据他的这种思維綫索来研究《辯证唯物主义》一书。就在这一著作之前不久，找到并第一次发表了馬克思的《經济学一哲学手稿》，勒弗夫尔看出这些手稿对于馬克思主义在解釋人方面的意义，于是異化概念（这个概念在馬克思主义著作中至今几乎是未被認識的）重新出現在哲学領域。但是勒弗夫尔在这本以断片构成的著作中对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的分析，在某些重要方面是不正确的。由于他认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发展时期首先是在研究历史問題，同时又考虑到这方面的文章占了大部分，于是得出結論說，这个时期只能說是唯物史观的形成时期。尽管一定的文章数量，如果我們孤立地研究它們，能够引伸出結論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对黑格尔的辯证法，甚至对待一般的辯证法和哲学抱否定态度，但是，毕竟还有其他說明与此相反的許多重要得多的因素（特別是《經济学一哲学手稿》中的哲学問

① 勒弗夫尔：《民族主义反对民族》，1937年巴黎法文版，第212頁。

② 同上书，第38頁。

題和关于費尔巴哈的提綱，他們的唯物史观的紛繁复杂的辯证法，对只作为思辨方法的辯证方法的批判等等）。

勒弗夫尔在这一著作中研究的另一个問題則重要得多，这就是在現代哲学中显然是人道主义的，同时又几乎是中心的問題——人的問題。根据馬克思的一些基本思想，如关于实践是人与自然界之間的中介的思想，关于人在一种是“他物”的物中，在一种是否定人但又促成人（法文原书为“否定人但又被人否定”。——譯者注）的物中，即在自然界中实在化的思想，勒弗夫尔在馬克思主义中重新提出其他一些哲学家和青年馬克思也認識了的概念，即总体的人的概念。

不过，从彻底的馬克思主义来看，总体的人的概念不是靜止地而是变动地理解的。就是說，人不是某种絕对的实质，不是先天地、形而上学地存在的。因此，分割状态沒有被克服，因为人們也可能失去一切；克服局限性，即克服異化，从来不是命定的。

从社会的現今結構和关系来看，人“尚处在生产陣痛阶段，他尚未誕生，他之作为一种統一体和解决，还几乎难于事先察觉，还只是在自己的对立物之中并通过自己的对立物存在，这个对立物就是：人中的非人的东西。他还只是被分散在許許多多活动和專門化了的工作之中，因此实在性和由人的本性产生的意識破碎了。他还只是在有別于自己的他者中，即在思想意識中感觉到自身”^①。

思想意識是人的全面異化的一种形式。所有这些異化的形式只不过是改装了的人类能力。神話和偶像似乎具有实在的力量，而实际上这种力量是由人賦給并轉而反对人的。甚至在今天，人征服自然的能力十分强大的时候，人比任何时候更是偶像的牺牲品。为了揭穿这些偶像，就必须有新的意識。辯证唯物主义应当

^① 勒弗夫尔：《辯证唯物主义》，1949年巴黎法文版，第137—138頁。

成为这种意識的表现和工具。辯证的異化概念胜于并且也概括那种对存在中的人的描述。它闡述人的現代情景和历史情景。勒弗夫尔得出結論道：“異化是这样地扩展至整个生活中去，个人是无法摆脱它的。当他力图摆脱它的时候，他就自我孤立起来，这正是異化的尖銳形式。人的本质来自社会过程的总体。个人只有在同集体的牢固和明确的关系中才能获得它。他不应当与集体分离，也不应当在集体中消失。但是在我們的社会，关系看起来是倒置的，个人可能认为他自我孤立起来就可以使自己实在化。这样他就更加深深地‘丧失了’、脱离了自己的基础，脱离自己的社会根基。他把自己看作只是理論抽象(心灵、内在生活、理想)，或生物存在(軀体、性欲)。他在自身中維持和更强烈地再造成对集体更加严重的隔离。在他自身中的矛盾是多种多样的：无意識与意識之間的矛盾，自然界与人之間的矛盾、社会与个人之間的矛盾、本能与理智之間的矛盾、内容与形式之間的矛盾——实践与理論之間的矛盾。”^①

解决的办法是在爭取实现人的存在的总体，爭取克服人的存在的分散性、片面性和神秘性的努力和斗争中。“总体的人是形成中的主体和客体。他是与客体对立并克服这种对立的有生命的主体。他是在零碎的活动和分散的規定中被破碎而又能够克服这种分散的主体。他是行动的主体，同时又是行动的最后客体，即行动的产物，虽然看起来行动似乎是产生外在的客体的。总体的人是有生命的主体—客体，这个主体—客体起初是被破碎和分解而后又被禁锢在必然和抽象之中的。通过这种碎散性他走向自由；他变成自然界，但这是自由的自然界。他成为总体，像自然界一样，但他却是在駕馭自然界时才如此。总体的人是‘消除了異化的’人。”^②

^① 勒弗夫尔：《辯证唯物主义》，第144—145頁。

^② 同上书，第147頁。

人类集体的这种組織将揭示真正是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将最終力图解决人类特有的問題:幸福、認識、爱情和死亡問題。总体的人的概念在勒弗夫尔看来具有“絕對”概念的性質。沒有絕對,相对就丧失任何意义,我們就陷入片面的相对論。絕對处在相对之中,但又不能同它相替換。絕對是相对的界限、意义和前景^①。

“对于这种人道主义來說,最高阶段不是社会,而是总体的人。总体的人是自由集体中的自由个人。他是在差別无穷的各种可能的个性中繁荣的个性。人的史前史的这种結局不是命定的。这不是經濟的命运,不是历史神秘的的目的性,也不是‘社会’的指令所能导致的。为这种結局奋斗的有生命的个人可能被打敗。人类可能会陷入混沌和紊乱之中。解决办法已标示在总体运动中,它指引預感、活动和意識。它不取消它們。經濟和社会的自动作用的結束怎样能自动完成的呢?”^②

混沌和紊乱加速来临了。但是法西斯的死亡舞蹈结束后还不到二十年,人类又处于二者必須擇一的困境,不仅人类全部珍品和巨大成就有遭到毀灭的威胁,而且人类整个文明和文化有遭到毀灭的威胁。

战后,勒弗夫尔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其中,《日常生活批判》因独創性而特別突出。但是这个自由运动时期不长。斯大林1947—

① 勒弗夫尔后来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版序言中这样表达了这一想法:“人的問題也是这样。或者是想按哲学方式思考和建立人道主义,或者是忽視和拋棄这种深刻的思索,于是对人道主义也就听其湮沒,听其生灭。人方面的前进、进步,只有通过总体的人的概念才能获得意义(这个詞同时作意义和方向解)。每一个历史因素,每一个历史所达到的阶段都組成一个整体,每一个部分的活动,每一个实际掌握了的能力也是如此;每一个因素也都包含有自己的人类现实内核,这个内核在后来的发展的进程中显示和出現。同时,总体的人是通向无限的一个界限。”(《日常生活批判》,1958年巴黎法文版,第78頁)

② 勒弗夫尔:《辯证唯物主义》,第149頁。

1948年的政策，暴露出壟斷整个馬克思主义思想和行动的极端傾向，粗暴地和荒謬地排斥不是与馬克思主义，而是与斯大林解釋的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一切，这种政策的大轉折本身不仅在政治中，而且在其他一切方面都是坚持冷战的一个重要因素。討論、分析、創造性的批判被荒謬的教条主义代替了。勒弗夫尔評論法国这一时期道：“当时应当区分哲学和思想意識同政治的差別（当然不是把它們分离开）。应当不把舌战同广泛討論和交流意見混淆起来和善于适可而止，不要挑撥辯論，不要空喊政治和不要把辱罵当作論据。不应当把革命的政策有理由提出的消灭階級敌人的目标扯到思想意識和哲学領域上去，如果已經这样做了，那就应当做得謹慎小心。不应当以为用辱罵虛假地消灭論据就是真正消灭了論据。最后，也是特別重要的，就是应当劳动、創造、强使自己认真研究一定的对象，这将要求馬克思主义者付出不能立即贏利的长期政治資金和努力，要求多去著书立說而少写論战文章，多做艰苦的工作而少发即兴的議論，多搞深入的理論建設而少作充滿庸俗观点的輕率論断。”^①

在这一时期，勒弗夫尔出版了几部著作：《存在主义》（1946年），《日常生活批判》（1947年），《形式邏輯和辯证邏輯》（1947年），《卡尔·馬克思的思想》（1948年），还写了論述笛卡尔、巴斯卡耳和狄德罗，再后是論述繆塞、拉伯雷等人的文章。

上述情况必然也在勒弗夫尔的活动中留下痕迹。由于某些基本的危机还没有被克服，由于近几年过程中某些重要認識还没有获得，他的著作也遭受这种教条主义压力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勒弗夫尔竭力冲破公式主义的框子，从分析对象本身中得出某些結論，因而越来越同官方的观点发生冲突。他在論述邏輯問題的书中就是如此，在书中，虽然是片断地，但坚持把邏輯問題和认

^① 勒弗夫尔：《馬克思主义和法国思想》。《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学杂志》，1957年第1期，第27頁。

識論問題理解为統一的問題，沿着列宁的足迹走，并把当时遭官方斥責的黑格尔的論著作为解决这些問題所应依据的辯证基础。

在当时的著作中，《日常生活批判》無論如何是最值得注意的著作之一。这本书在1958年再版，并加上一篇很长的序言。虽然这本书仍是由片断构成的，但却是一种有价值的和巧妙的嘗試，就是試图在人类的关系和表現（从艺术到人类日常生活的其他各种不同現象）的現實土壤上細致地研究和具体地闡述異化的問題。

特別是在他后来加上的序言中，他进一步具体地闡述異化的概念，这个概念，正如他本人讲的那样，被共产主义的官方代表人物輕蔑地拋棄了，好像革命后異化就会消失似的，好像這個問題不是伴随着过渡时期的整个阶段似的，好像无产階級和共产党人就有異化的免疫力似的。

根据人类異化的这些不同形式，勒弗夫尔按照自己的意見，強調了一种批判的思想，这种批判的思想对于馬克思主义來說不是陌生的，但他第一次作了更清楚的闡明。这里指的是这样的論点：在資產階級社会中，**形式**在历史上和理論上是脫离內容的、偶像化了的并与內容对立的。他在上述序言中极其明确地叙述了这一点：“内容和形式的任何脫离都包含着幻想和表面現象的部分；这种脫离对形式來說意味着內容的喪失，而不是內容的缺乏和形式的純粹。反过來說，去規定內容本身，也意味着教条主义的妄求和常常是对信任的濫用。这就等于說，表面看来是純粹的和純形式的形式，今天被竭力（在“思想家”和著作家的笔下或口中，这是不言而喻的）說成为自滿自足的东西，竭力要排斥內容，代替內容的位置。这一点表現在內容的毀灭中。这种能动的形式化轉而反对由于变空虛而自我毀灭的形式，除非它还不是用来表示一个外在于它的、与形式无关的‘內容’，除非它还不是需要一种虛幻的術語来表現的。

讓我們来列举一下（不完全地、暫時地）这些冲突：

(1) **理性主义反对理性** (形式主义的唯理主义, 即资产阶级的唯智论, 停留在知性上, 反对活生生的、具体的、辩证的理性);

(2) **民族主义** (旧右派的“古典”民族主义) **反对各民族并反对在民主化和社会主义进程中即道路上的它自己的活生生的民族;**

(3) **个人主义** (独自沉埋于私人的意识和自尊感中的孤独的资产阶级个人的个人主义) **反对真正的、能动的、有生命的、能够解决问题, 首先是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个人;**

(4) **客观主义** (“中立的”和“不偏不倚的”思想的客观主义, 无止无休地既可用去赞成又可用去反对, 或从这一观点跳到另一观点的客观主义, 孤立的事实和彼此不相关的材料的客观主义) **反对深化了的客观, 即反对这样的思维客观, 这种客观在同实践的联系中把握住相矛盾的现实的一切方面, 即它的错综复杂的变化、它的隐藏着趋向……**

(5) **纯粹形式的唯美主义** (艺术中的技巧主义、对纯粹风格和造型的追求), **即完全自由的抽象或形式主义, 反对形式。**

等等。

本可以列出一大串这样的‘主义’。但这里列举的已经足以表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现代思想、思想意识、文化的一般倾向了。这种倾向, 被在一定领域的许多活动中存在着的技术主义和技术统治主义掩盖了, 也因为存在着要重新获得或创造某种内容的各种矛盾着的愿望、探求、努力而被掩盖了。

这种一般的形式主义不是正符合人类的活动和能力的多种多样的、形形色色的同时又单调的异化么? 不是正符合人类的活动和能力随同向彼此外在的和外在于活的人的形式中投射而产生的脱离么? 这是一般的异化, 这种异化是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突然出现的, 从这些结构的运动中产生出来的, 但又经常重新转向生活和返回日常生活中去。我们在那里不是抓住了日常生活批判中一条

可能的引导綫索么？”^①

完全可以理解，勒弗夫尔作为一个以自己的許多方面坚持法国精神和風格的光輝傳統（仍然是片断式地、格言式地）的有創見的思想家，必然会同現代使馬克思主义思想教条化和簡單化的傾向发生冲突。1957年他出版了一部《弗·伊·列宁的思想》，这以后又发表了上面提到的关于馬克思主义和法国思想的文章，最后是《馬克思主义的迫切問題》（1958年）这本小册子，这以后，他被开除出党。

于是批判从四面八方紛紛而来。首先出現的是路西安·塞佛的尖刻但又勉强的批判，然后是让·苏勒—卡納累尔的批判，而加罗迪在党报上发表的文章，則按照人人皆知的俄国处方，集这一切之大成。在后一篇文章中，正如在他們的苏联哲学同僚那里一样，我們可以找到斯大林主义的批評的全部貨色^②。

如果我們扼要叙述一下加罗迪对勒弗夫尔的观点的批評，我們只要列举一下标题就行了。在他看来，勒弗夫尔拋棄了唯物主义，拋棄了自然辯证法，拋棄了历史唯物主义，拋棄了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論，并且成了修正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

現代馬克思主义的历史真是耐人寻味，一个实行了最深刻的变革和真正奠定了社会主义的（不是国家主义的）社会关系的国家，竟被宣布为修正主义的、可疑的，等等。而这个国家的所有理論家則被宣布为修正主义者。在其他国家，所有那些以自己的独创性真正增强馬克思主义思想的威信，实际上有效地坚持了活生生的馬克思主义思想的思想家們，首先是卢卡奇、布洛赫和勒弗夫

^① 勒弗夫尔：《日常生活批判》，1958年巴黎法文第2版，第92—94頁。

^② 路·塞佛：《昂·勒弗夫尔和馬克思的辯证法》（《新評論》1958年3月号）；让·苏勒—卡納尔：《昂·勒弗夫尔的方法》（《新評論》1958年4月号）；罗歇·加罗迪：《評昂利·勒弗夫尔的书。对馬克思主义的說明还是对修正主义的說明？》（《共产主义手册》1958年4月号）。

尔，竟被說成有修正主义和敌对活动而遭到攻击^①。

“领导思想”的代表人物也立即加入了法国批評家的行列，他們从来就认为給每个問題下最后結論是他們的历史特权。他們除了重复上面提到的那些批評外还加上一条，就是猛烈指責勒弗夫尔所說的馬克思主义中基本点是“辯证邏輯、異化理論和商品拜物教理論”，而他們則认为无产階級专政的学說才是基本点。但是某人把什么东西当作馬克思主义的主要之点，这絲毫也不能分辨出他是修正主义者还是彻底的馬克思主义者。无論如何，最有意思的是，苏联的思想家們沒有看到，如果无产階級专政被理解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就是說在整整一个过渡性历史时期中的政权的实质的話，那末，異化和克服異化的問題正是无产階級专政的中心問題。

在自己最近的巨著中，勒弗夫尔試圖回顾已走过的道路——

^① 勒弗夫尔在自己的《馬克思主义的迫切問題》一书中力图批判地說明斯大林主义对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在解釋历史的人的时候，勒弗夫尔指出，现实和思維之間沒有机械的和簡單的反映关系。“沒有什么比一方面是‘实在’和另一方面是实在在人們头脑的‘反映’的提法同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更矛盾的了。虽然实在是錯綜复杂的和矛盾的，但实在的反映也向实在的这些矛盾提供自己的矛盾，自己的无联系性，有时并且还提供自己对具体性的徒然追求。”（《馬克思主义的迫切問題》，1958年巴黎法文版，第75頁）加罗迪簡單地把这宣布为拋棄反映論（見所引文章第563頁）同样，在論述历史和人时，勒弗夫尔力图特別強調實踐的因素，由此得出結論說：“沒有无主体的客体，沒有无客体的主体，如果从實踐的（社会的）活动，而不是从純意識来理解这个观点的話。不在客体中、事物中實現的能动性是沒有的……”（同上书，第42頁）加罗迪和其他批評家割裂第一句話，以达到把勒弗夫尔宣布为唯心主义者的目的（同上文，第565頁）。同样，勒弗夫尔有时在異化問題範圍內解釋社会主义中国家的消亡問題，而加罗迪就反駁他說：“国家消亡的基础不是一种經濟的和社会的管理形式”（同上文，第570頁）。在加罗迪看来，重要的是消灭敌对階級的反抗，而“专政和民主是齐步并进的，因为专政和鎮压是对付敌对階級（大地主和資本家）的，民主是給予劳动階級及其同盟者的”（同上文，第571頁）。好像斯大林主义三十年的历史实际上沒有提出任何一个与社会主义中的民主有關的問題似的，好像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民主的发展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不会有任何变形的危險似的！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至今今天这整整一个历史时期。有两个基本問題，在某种意义上說，自始至終貫穿在这部确实是特种形式的时代紀实的著作中，这就是：哲学和哲学家的地位和任务問題以及用何种方式克服馬克思主义思想在斯大林主义中的庸俗化和僵化的問題。他早在以前就得出結論，认为哲学家的任务是要成为自己时代的批判者，要无情地反对一切異化形式，不管它們在何处出現，因此，他认为，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直接任务首先是拋棄斯大林主义的本体論，从而克服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其次是恢复“克服”这个命題（它自然也包括否定这个如此重要的問題）的意义和价值。同这个問題有关的还有整整一个始終尚未弄清的巨大范疇——異化。勒弗夫尔抱有建立一种“总体的存在”的哲学的特殊要求（在勒弗夫尔看来，这意味着恢复主动性），认为馬克思主义面临的任務还包括研究文明的理論，因为經济学和社会学并没有全部包括整个社会实践^①。

勒弗夫尔的兴趣和研究面是十分广闊的。也許这也是他一直用片断的形式进行分析的原因之一。但是尽管这样，尽管有个別的結論或观点可以責备，或者尽管在探討異化問題方面还没有充分看到实现自由生产者联合已經有了具体的过程，但勒弗夫尔仍然属于在本国内外为增进对活生生的和独创的馬克思主义思想的兴趣作出貢獻的、为数很少的现代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列。

让·保罗·薩特（1905年生）

在现代法国文化的最卓越的人物和思想家当中，薩特不仅以他的发展、地位和杰出的智力、文化和道德政治活动，駁斥許多馬克思主义者对待当代問題和人物所采取的頑固的公式主义态度，而且还指出变化了的形势，这一形势也要求馬克思主义者作出更大的努力和掌握更广的方向。

^① 勒弗夫尔：《总数和余数》，1959年巴黎法文版，第707—715頁。

像法國所具有的這種如此豐富的文化和思想傳統，加上在交流情報和文化創造方面的如此優越的現代條件，是同不動腦筋地宣傳另一種文化，以及同搬用僵硬的教條主義的哲學原理和一般馬克思主義原理互不相容的，至於法國官方馬克思主義所一意孤行的各種政治行動和一味堅持的各種政治評價，就更不用說了。

所有這一切，都在敗壞一種偉大的思想和事業，因為這種做法使這一偉大思想和事業不能得到相應的歷史共鳴。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堅定而勇敢的人物成為自己時代的見證人和良心，他的許多觀點、評價以至行動在某些方面勝過整整一個黨，那是毫不奇怪的。

薩特生於1905年，他的智力發展是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主要是在與勒弗夫爾和上面談到過的經過各種彎路而達到馬克思主義的那群法國青年知識分子相同的時期。薩特自己也強調說（特別是在自己最近的巨著《辯證理性批判》中），當時處在不僅詛咒馬克思，而且詛咒黑格爾，一句話，詛咒辯證法的思想氣氛中，他對馬克思的興趣是冷淡的。原因很簡單，當時在所有那樣的思想前提下，他是不能理解馬克思的。要理解他，這些影響就必須有所變化，而在當時，接觸的是那樣的讀物，這是不會有的事。

人（不僅是抽象的人，而且是活的、歷史的、現代的人）的問題，特別吸引薩特以及他同期的許多別的知識分子；薩特沿着從這個問題來看是合乎邏輯的道路發展。資產階級哲學、特別是德國資產階級哲學，當時的發展標志是現象學，這種現象學在德國本土已經在哈特曼的本體論、謝勒的人本主義和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中歷經盛衰。

薩特在胡塞爾的現象學影響下接受了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的更強烈的影響，因為胡塞爾的現象學用自己的先驗自我已不能使薩特的那樣的一種歷史制約思想完全滿足了。人的狀況、人對他人的關係、人的物化、異化和自由等等問題（雖然是在抽象的存在主義意義上的）不容許他幽居起來，沉溺於思悟、生活、意趣之中。意

識到人类生存的矛盾和不人道，薩特于是通过自己的存在主义，奋力抗議（依然是唯心主义地）这种人类普遍反人道的社会，而且奋力抗議唯心主义本身。

“有与无”的阶段（对薩特本人和对法国哲学的进化來說，都是一个重要阶段）依然是抽象范围的抗議阶段，虽然这里面有活生生的个人的生命在搏动。

薩特对人和現代历史运动中人的問題的关心和密切联系，他在文学作品^①中刻划的事件異常的可感性，以及他不幽居在永远意味着智力的或历史实践的真正无能的思想白发之塔，——这些必然使薩特获得关于現代历史及其运动的結構和意义的最后認識和結論。

我們世紀的整个血淋淋的历史，正如薩特本人后来写的那樣，要求理解现实；而工人階級的斗争和所有当代的事件，促使薩特放眼探求这些历史具体事实的基础。

薩特在这方面走向馬克思主义的时候，必然也同馬克思主义本身，即同馬克思主义的現代的、特别是官方的一种变种发生冲突，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对人和历史的孜孜不倦的研究，在馬克思主义中碰到的是一个真空，因为在斯大林主义化了的馬克思主义中，这个問題不仅被忽視，而且被歪曲了。薩特碰到的不是这个問題，而是对若干辯证法特征的毫无意义的重复，而这些辯证法特征如同說明現代科学的各种成果如何证实辯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的科学論证一样，对人的問題談得很少。

如果在这里再加上他还碰到公式主义的和有局限性的政治实践，那末可以理解，薩特之轉向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浪子回头，而是一个重要而独立的思想家非凡的历史和思想經驗的結果，因此，他必然也給只懂得一种乐譜的清一色的馬克思主义乐队

^① 特别是1938年的《嘔吐》（《La Nausee》）、1945—1949年的《自由之路》（《Les chemins de la Liberté》）和許多作品。

帶进一定的批判性的和不諧調的旋律。

他虽然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体现着一定的社会主义希望的唯一的运动，但并不随随便便地去贊同这一共产主义运动服从另一共产主义运动，也不贊同盲目袒护那种特别是在1948年到1957年这一期間造成震撼当时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的整个体系的事件的政策。薩特就匈牙利事件发表了一篇描繪这一事件的重要特写，在特写中，薩特与一味明眼抹煞事件真实原因的法国共产党的官方立場相反，指出事件的根源在于荒謬地和粗暴地坚持陈腐的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实践。在薩特看来，拉科西主义既不是法西斯专政，也不是什么暴政，“与所有这些相反，它是一种社会主义化；只不过是一种恶劣的社会主义化，这比它什么也不是还坏”^①。

薩特认为不必譴責“敌人，不必拋棄一种体系（指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作者注），应当譴責一种方法和运用这种方法的领导人”^②，因为是这些方法使党和人民之間发生总失調，使人民的观点和利益同官僚主义的观点和利益发生对抗，結果，只有在另一国家的軍隊中才找到了出路，而这个国家的軍隊的铁甲車便“以社会主义名义向整个世界无产阶级开火”^③。

薩特反对法国共产党对这些事件、对由于攻击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和它的共产主义者造成的現代社会主义最严重事件所作的輕浮和詭秘的解釋，并且认为能帮助法国共产党的唯一方法，就是以真理对抗它的謊言，直到全体党员不再相信这些謊言为止。薩特說，他理解法国的领导人同俄国人的密切友誼。但是到头来“他們只有对本国劳动群众負責”^④。

① 薩特：《斯大林的怪影》（《Le Fantôme de Staline》）。《現时代》杂志，1956—1957年第129—131期，第616頁。

② 同上，第677頁。

③ 同上，第674頁。

④ 同上，第682頁。

薩特认为,在現代法国生活中左派进步力量涣散的情况下(正是法国共产党人对这种情况負有特別的责任,因为法共是最强大的組織,在工人階級中扎根最深),只有新的人民陣綫和一切左派力量的联合才能拯救国家。“至于我們,我們同共产党人辯論已有十二年了。起初是苛刻地,后来是友好地。但我們的目的一直是:为实现唯一能拯救我国的左派人士的团結,貢獻出我們微薄的力量。”^①

我們比較詳細地叙述了这些,目的是要指出,在現代历史的許多奇談中还有一种奇談,这就是:現代历史的最先进的力量再不能按旧的方式进行活动,再不能根据外来指令,根据宗派主义的、狹隘的、有局限性的和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政治、哲学和文化問題了。現代共产主义运动在其所有阶段,必須不仅允許,而且促成和实现广泛的文化高漲,在这个高漲中,将不会怀着官僚主义的狹窄心胸拿药房的戩子去衡量任何思想,将不会心惊胆战地害怕在文化复兴中会出现尚不知其結果为何的新思想。思想运动的結果是不能够預見和由官方規定的。只有自由的和丰富的文化和思想实践才能最終使一切事物各得其所。

所有这一切,当我們评价薩特在理論和哲学領域所作的促进哲学問題的发展的努力时,都是必須加以考虑的。

在《辯证理性批判》一书(該书还不是完成了的著作)中,薩特认为任何一种哲学,甚至乍一看来是最思辨的哲学,也都是实践的哲学。方法是社会和政治的武器,因而偉大的笛卡儿主义者的分析和批判的唯理論比他們本人活得更长久。哲学,只要生它育它和被它闡明的活生生的实践仍然存在时,它就仍然是有效的。“如果哲学应当既是知識的总体化、方法、調节的观念,又是进攻的武器和語言共同体,如果这一‘世界观’也是摧毁腐敗的社会的工

^① 薩特:《斯大林的怪影》,第 696 頁。

具，如果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这一个别观念会成为整整一个阶级的文化和往往成为整整一个阶级的本性，那末，十分清楚，哲学創造的时代是罕有的。在十七世紀和二十世紀之間，我看到三个可以用一些名人的名字来表示的时代：笛卡儿和洛克的时代，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最后是馬克思的时代。这三种哲学，每一种在自己的时代都成为全部各种特殊思想的肥沃土壤和整个文化的水平綫，当它們所表現的历史时机还没有被超越的时候，它們是不可超越的。”^①

薩特认为，馬克思主义是现代哲学活动的范围，并強調指出，即使从克尔凱郭尔和黑格尔来考虑，馬克思也是正确的，因为从克尔凱郭尔来考虑，馬克思強調了人的存在的特殊性，而从黑格尔来考虑，馬克思則研究了人的客观实在中的具体的人。薩特自己写道，馬克思主义之吸引他，犹如月亮之吸引潮水，馬克思主义改造了一切旧观念和消灭了资产阶级思維的各个范畴，然而，自此之后，现代馬克思主义違背了認識具体的人这个基本主張。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力和丰富，是因为它最彻底地坚持在历史过程的总体上解釋历史过程。但是它已經停滯二十年了，竭力以自己的官僚主义的保守主义把变化归結为同一性变化，以一般公式解釋个别。薩特具体說明自己的批判意見道：“瓦勒里是小资产阶级知識分子，这是毫无疑問的。但不是每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識分子都是瓦勒里。现代馬克思主义之缺乏探索性就包括在这两句話里。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中介的阶梯来理解在一定历史时期在一个阶级内部和一定社会内部产生着个人和产生着个人的产物的过程。”^②

鉴于这些原因，薩特的思想，他的无神論存在主义（它不是为了与馬克思主义相抗衡而产生的），由于着手分析人和人的关系，

^① 薩特：《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1960年巴黎法文版，第17頁。

^② 同上书，第44頁。

因而仍然有它的意义。这不是为了某一条第三种道路或某种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而擯棄馬克思主义，而是在馬克思主义内部重新掌握人，是研究一种具体的人类学。“存在主义（薩特指自己的存在主义。——作者注）的对象（馬克思主义者缺乏研究的对象），是社会領域的、在集体对象和其他单个的人們当中屬某一階級的单个的人，这是異化了的、物化了的、神秘化了的个人，即劳动分工和剝削所造成的，但又是以各种錯誤手段与異化斗争，而无論如何还总是耐心向前的个人。因为辯证总体化必須包括行为、欲念、劳动和需求，如同包括各个經濟范疇一样，它同样也必須重新安排历史整体中的动力或事件，决定历史整体的形成方向和准确地确定如此这般的現狀的意义。馬克思的方法是前进法，因为在馬克思那里，这是一长串分析的結果；今天，綜合的前进法則是危險的，因为懶惰的馬克思主义者利用它来 a priori（先天地或演繹地。——譯者注）构成现实，政治家則利用它来证明发生了的事必須这样发生，他們用这一純粹詮釋的方法不能发现任何东西。证据就是他們事先知道所要寻求的东西。我們的方法是探索性的，它教給我們新东西，因为这方法既是后溯法，又是前进法。”^①

薩特认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范围必須是馬克思主义的，因为没有另一种哲学能提供更大和更有效的可能来理解历史和人，同时又认为他对人的問題进行具体考察的方法，他的今天已“馬克思主义化了的”存在主义的分析綜合的考察方法（而不是綜合的考察方法），一直是現代馬克思主义所缺乏的东西，是說明特別強調他的存在主义方法有理由的东西。如果这些考察方法的基本差別在于“存在主义思想体系”的真正作用不是描写从来不存在的抽象的人类现实，而是在人类学分析中經常強調这个生存范围，那末我們只能說：这也是真正的馬克思主义的任务。薩特在这方面的主張

^① 薩特：《辯证理性批判》，第 86 頁。

之所以有道理，只是因為現代馬克思主義忘掉具體的分析和陷入公式主義的一般化之中。

薩特不想修正馬克思主義，因為他認為那是荒謬的，他也不想超越馬克思主義，而只想填補一個重要的空白點。“這些看法使人能夠理解，為什麼我們一方面說我們同馬克思主義哲學極為一致而又暫時保留存在主義思想體系的自治。沒有疑問，馬克思主義是今天唯一可能的、必須同時既是歷史的又是結構的人類學。這同時是在人的總體中，即從人的物質狀況出發去研究人的唯一的哲學。誰也不能要它從另一出發點出發，因為那就是要它把**某種另外的人**作為它的研究對象。馬克思主義越是違背本意竭力拒絕對自己的探求的提問者和使被提問者變成絕對知識的對象，我們在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的**內部**就越會發現裂痕。馬克思主義研究用來描述我們歷史社會的概念（剝削、異化、拜物教化、物化等）本身，正是最直接導至存在主義結構的概念。**實踐**和**辯證法**概念（不可分離的兩個概念）本身，是同認識的唯智論思想相矛盾的。同時，我們還要談談主要之點：作為人的本身生活的再生產的**勞動**，如果它的基本結構不是設計，就不能有任何意義。”^①

如果我們知道薩特通過怎樣的道路達到了馬克思主義，知道他首先密切關心的是人的生存的意義和前景，如果我們同時還知道斯大林主義化了的馬克思主義在這些不僅是錯綜複雜的、而且是最重要和最有決定性的人的問題上的貧乏無能，那末我們就不會不理解薩特為什麼厭惡現代辯證唯物主義所特有的抽象的本體論——對物理、生物等範疇和現象的關心遠遠超過對人本身的關心。

^① 薩特：《辯證理性批判》，第107—108頁。薩特強調說：“一旦馬克思主義的探索採取人的尺度（那是存在主義的計劃）作為人類學認識的基礎，存在主義就將不再有d'être（存在）的理由，因為它被哲學的總體化運動所吸收、超越和保存時，就不再是一種專門的研究，而將成為一切研究的基礎。”（同上書，第111頁）

薩特完全关注人的問題，因而甚至把馬克思主义实际上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辯证唯物主义，同时至今还拒绝对自然辯证法作任何肯定。虽然他比較趋向于否定自然辯证法（因为他认为辯证法的来源是实践，而实践是人的实践），但没有明确否定，而是认为我們不能肯定这方面的任何东西。

加罗迪最近的一部著作中附有薩特的一封信，薩特在这封信中这样闡述了自己的观点：“我們明白，馬克思主义是整个現今哲学思想的明显范围，不能超越。我理解的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的內在辯证法为前提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辯证唯物主义，如果辯证唯物主义指的是要揭示自然辯证法这种形而上学的幻想的話。这种自然辯证法可能确实存在，但必須承认，就連证明这一点的最小的苗头我們也沒有。这样，辯证唯物主义只不过是关于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充滿侈談和懶惰的徒然討論而已。它掩盖着（至少在法国如此）最墨守成規的分析的机械論。相反，历史唯物主义（由于它直接抓住一切辯证法的来源，即受人的物质性支配的人的实践）同时是任何人能够具有（和确实具有）的关于自己的**实践**和自己的異化的經驗，同时也是使人能够把人的历史理解为进程中的总体化的改造性的和建設性的方法。”^①

如果有人把自然辯证法理解为整个自然界（总称宇宙）向更高的阶段的前进运动和发展，那末，这种理解当然是无的放矢。但同样地不能认为辯证法的来源只是实践，因为从这个立足点出发，我們必然会走向否定自然辯证法。这就会是把人的因素强加給自然界的运动和运动。在这个問題上我們說的是某些一般的辯证法因素，这些因素我們今天是在存在中，即在自然界中檢驗的，至于它們在自然界的物质或社会的物质中如何表現，則是另一个問題。确切些說，完全可以理解，社会的辯证法具有一些使社会辯证

^① 薩特談論馬克思主义和存在哲学的信，見罗·加罗迪《人的前景》一书，1960年巴黎法文版第112頁。在《辯证理性批判》第125—129頁也可找到近似的說法。

法成为特殊的辩证法的因素(如实践),但这不是说这些因素必须是一切辩证法的前提。同样,只要我们去分析范畴的和逻辑的一般问题,就不可避免地碰到自然辩证法问题。我们思想结构和过程的辩证性,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不能是一种单独的过程的结果。

此外,完全正确,历史领域提供着最丰富的和最错综复杂的结构和过程来进行分析,而萨特恰恰是对这些结构和过程最感兴趣,因为它们对于人来说也是最为重要的。萨特在自己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只能举出一部分)中试图实现自己的哲学纲领。对于整个人的问题,即历史事物,他首先透过实践进行观察,因此,无论是总体或总体化(总体化是一个过程,因而当然也包括暂时性),离开实践这个基本范畴就无法理解。《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力图确定“历史的地位”,即一种结构人类学的基础,而第二卷的任务,将是描绘和确证,存在着一种具有一种真理和一种理性的人的历史^①。

辩证经验揭示历史事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物愈被人“中介”(médié),人就愈被物“中介”。历史的整个辩证法建立在个人的实践上,而任何的和部分的总体化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个人就其自身是在总体化的个人。

实践由孤立的行动者发出,被揭示为真正的理性,即辩证运动的意义。此外,萨特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分析得出结论说:人们自身之间最初的实在化,是一些人们与另一些人们的无穷无尽的粘附。整个历史的这些条件在我们的面前表现为受无机物质制约的条

^① 在这里,我当然只能举出一些基本的思想,而略去萨特对各个历史事件的许多观察和分析。从他的中心概念之一的总体和总体化来看,必须指出,他把总体这个概念理解为整体,而这个整体与其部分的总和不同,但又寓于它们当中的每一个部分之中。总体化的概念同样地是整体借助于各个部分对自己本身的关系,但这是过程中的关系。这是在进程中的描述一种实践领域的行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138页)。“只是总体化同总体不同,因为总体是被总体化了的,而总体化是自身在总体化。在这个意义上,不言而喻,自身在总体化就是自身在暂时化。”(同上书,第143页)

件。因此，“如果存在着作为历史过程的**总体化**，它是通过**物质**达到人们那里的。换句话说，作为有机体的自由发展的实践，在实践领域的形式中使物质环境总体化；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作为人类关系第一次总体化的物质环境”^①。

在这方面，第一个因素（薩特正确地給以特別注意），就是周圍物质以特殊形式在我們的个人历史中表现出来，因为全部人类历史（至少是迄今的人类历史）都是反对**匱乏**（la rareté）的殘酷斗争。这样，在劳动使之形成和使之社会化了的物质的全部水平上，我們发现，一切能动的基础，是作为从人到物质又通过物质回到人的最初統一体的匱乏（不足）结构。匱乏，作为一个量的事实的表现（这种和那种自然实体或工場手工业产品是否存在，对所有的人是否足够），是**我們的**历史的基础关系之一。这同时是人被确定为另一种东西而不是人的基础，即对每个人来说，他作为非人的人，作为某种異类而存在的基础。人的非人性质不是来自他的本性，而是来自上述基础上的那种关系。暴力并不必然是每一过程中的行动，并不是本性的特征，实际上是“人的行为經常的不人道性，即如此內化了的匱乏，以至簡單說每个人都在他人那里看到恶的原則”^②。

薩特同意馬克思的劳动是建立人們关系的现实基础这一发现，并希图通过匱乏（消极）这个因素指出在这些关系中产生的矛盾的条件和根源。通过人的实践，这个物质性“进入”历史，成为历史，成为实践一內在之物，即加工过的物质，这加工过的物质又通过自己的矛盾（因为它本身含有这些矛盾）成为历史中的重要推动力。人对自然界的關係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产生。自然界对人的关系也是如此^③。

① 薩特：《辯证理性批判》，第 199 頁。

② 同上书，第 221 頁。

③ 根据匱乏、实践（劳动）、暴力这个关系，薩特还解釋另一些范畴，如利益（第

在該书第一卷第二篇，薩特研究集团和历史的問題时，同样借助实践范疇去解決問題，认为实践是融合的集团的唯一实在的統一，因为实践創造它、反映它和把自己最初的变化带进它里面去。在这里以及在其他許多地方，我們不得不略去从那些实际上是在闡明历史运动和結構方面唯一的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所作的丰富观察了。通过实践，有机的个人也作为集体的个人被产生和被認識。这首先是由于客体将集团作为实践和实际的認識反映給他，即既从实践領域向他揭示出現狀的客观性出发，又同时从把自己对客体的劳动理解为集体的客体化的单个部分出发；其次是由于作为通过他实现的实际总体化的整体强使他把先驗的客体实际理解为集体的客体，并把实践的領域实际理解为需要变化的集体的实践領域④。

在这种关系中辯证法表现为双循环(circularité)。第一个循环是静态秩序循环，这就是，一定集团的結構和行动路綫由集体的性质决定，同时，集团表现为被控制的他化，直至单纯地成为机械的运动和生产的节拍时止。第二个循环，这是迟早要使集团退化和重又墮入集体去的不断运动⑤。

261—279頁)以及有趣的“序列”(Serie,或譯“群”。——譯者注)問題(第303—377頁)。根据这些分析，薩特在一个注釋中对上层建筑問題提出如下珍貴的意見：“我們在这里試图指出的是：一切所謂的上层建筑已經是包括在基础，即人对加工过的物质界和对他人的根本关系的結構之中的。如果我們看見它們后来作为抽象的因素和作为上层建筑出現和自为地建立起来，那是因为一个錯綜复杂的过程通过其他一些領域和特别是通过語言的領域折射出它們。但是，無論一种观念、一种价值和一种体系，如果不是在全部經驗水平上和以可變的形式已經包括在能動和異化的全部因素之中，同时作为符号，作为对工具的需要和作为通过这一工具借助劳动对世界的揭露等，那就是不可理解的。”(同上书，第303頁)

④ 同上书，第500頁。(在該书此頁上查不到这段話，此处語法很混乱，系揣譯。——譯者注)

⑤ 見“作为总体化的辯证經驗”一章(特别是第641頁前后)，在这一章中，論述这些关系时論及現代集团、階級、殖民地实践等問題。

从薩特的广泛的分析得出的基本結論可以表述如下：辯证經驗告訴我們人的关系的双重性质。作为个人与个人之間的簡單关系，人的关系是直接的相互关系，而这种相互关系是一般共同体的原始結構。相互关系不是思辨的，也不是感情的，而是具有双重（或多重）震动中心的实践。它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这个实践領域最初是由先前的环境和物质条件規定的，因而对抗性的相互关系的条件的总和基于匱乏。人是与許多同类生活在匱乏环境之中的实践的有机体，匱乏，作为一种消极力量，把每一个人都决定为人的和非人的实在。每一个人，如果他希图消費我或所有其他人所必需的某种产品，他就成为危險的人，威胁着我的生命的人，从而成为既是人而又是非人的人，而我的同类对我就表现为我的異类。在最初阶段，生存斗争“不是通过人而相互对立的盲目本能，而是錯綜复杂的結構，是借助于这样一种**实践**来超越物质条件，这种实践或是建立道德，或是毀灭他者，这个他者不是有威胁性的簡單客体，而是被彻底承认和判决了的自由。我們称之为**暴力**，因为唯一可理解的暴力，是自由以无机物质为中介对自由施加的暴力。我們实际上看到了，它可以有两个方面：自由的**实践**可以借助于物质工具直接毀灭他者的自由或把他者的自由放在括号里面（玄虛、欺詐），或者可以反对（異化的）必然性”^①……在这个基础上，我們就能够了解在異化的关系中的压迫、恐怖、奴役、过度劳动等关系。

所有这些探討，应当导致認識历史的真正問題。如果历史确是一切多种多样的实践及其一切斗争的总体化，那末，那些冲突和合作的錯綜复杂的产物，在自己的綜合实在性中必然是明晰的，就是說，必然是作为一种正在进行总体化的实践的綜合产物而可以理解的。如果迄今还停留在同时期的总体化方面，那末剩下的事

^① 薩特：《辯证理性批判》，第 689 頁。

就是要洞察實踐的暫時化的不同时期的深处。薩特认为，这样就获得了一种結構人类学的因素和辯证基础，而剩下的只是要让这些結構自由地生存和在这个自由的发展中被認識。

尽管如我們強調过的，可能有批判性的意見，或者可能有个別观点不一致的地方，尽管薩特坚持存在主义的方法論（如我們指出过的，存在主义的方法論在这种範圍內不可能再是与馬克思主义不同的某种东西），可是他的观点（哲学、社会心理学的观点一并在內）比所有目前自封的馬克思主义观点出色。这些努力只是表明，我們处在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将是，对各个問題的看法，在唯物主义和辯证法中有了共同基础，就可以有尽量充分的自由，就可以各色各样，甚至即使在这一基础上，看法也可能在許多方面是相对立的，但仍然是人类觉醒道路上的进步步骤。

其他理論活动

論述了勒弗夫尔和薩特以后，并不等于把法国馬克思主义者丰富的理論活动論述无遺了。这一理論活动的主要特点是在考察和解決問題时有多种多样的傾向——从官方傾向到对斯大林的馬克思主义持彻底批判态度的傾向。

在特別主張以卢卡奇早期观点进行馬克思主义分析的馬克思主义者当中，首先有路西安·高德曼，他的功績就是复活一种有益的思想創造，而这种思想創造，正如我們看到的，是官方的、特别是俄国的馬克思主义所不理解 and 根本否定的。高德曼特別主張以卢卡奇的总体論以及他在1920年以前的著作中提出的典型說^①作为重要的探索原則。

^① 在卢卡奇的典型說（悲愴世界观、特写观、小說观典型）的基础上，高德曼在《隱藏的上帝》（《Le Dieu caché》）一书（1955年）中对拉辛內和巴斯卡耳作了十分突出的分析，关于这种分析，有过很多的議論。

正是从这个立足点出发,高德曼也不按傳統的方式理解哲学,而把它理解为“对一定社会中一定时代所提出的人的基本問題的概念回答的試图”^①。

对所有那些問題,存在三种可能的答案:概念的和抽象的答案(哲学),情感的和具体的答案(艺术)和实践的答案(行动)。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哲学家和艺术家的活动如此相近和为什么几乎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双生子——哲学家和艺术家。

因此,社会学家們从作者生平和环境来解釋哲学著作或艺术作品的一切試图都不是从根本着手。只有从某社会的生活的总体中才能获得对各种哲学或艺术的性质問題的答案。“作品越是重要,越是有生命力和越是合情合理,就越能够通过对各个不同的社会階級的思想的分析直接加以解釋。”^② 社会学的分析只是进行这种分析时的一个必要步驟。“重要的是寻求出历史的和现实的现实通过作者个人的敏感在被研究的文学或艺术作品中表現出来的道路。”^③

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高德曼同样地对在解釋文化問題当中的反映論和意識的独立能动功能論抱着批判的态度。他如同青年卢卡奇一样,把重心放在活动和意識都是指向社会的整个組織的階級上,认为这些階級在自己的实践、智力和激情生活中渴求一种人的世界和人的面貌,这些只是或多或少地能够被单个的个人所接近,但作为一种傾向,却在整个集团中能动地发生作用。作家、

① 路西安·高德曼:《辯证唯物主义和哲学史》。《辯证法研究論文集》,1959年巴黎法文版,第30頁。

② 高德曼:《辯证唯物主义和文学史》。《辯证法研究論文集》,第50頁。

③ 同上书,第62頁。高德曼在这部論文集的后記里列举在他看来的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科学地理解現代工人运动及其发展;对馬克思主义从馬克思到今天的发展进行历史社会学的研究;研究現代社会的变态;探討在各种类型的工业社会中的現代工人階級是什么;探討不发达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因素,以及解釋在現代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前途(同上书,第353頁)。

哲學家、藝術家不是簡單地反映集團的真正意識，而是在概念或幻想的範圍內塑造符合這一意識的傾向的、但又凝聚得多的世界。偉大的作品說明，集團根本不是意識的，而每一個較重要的人物的思想結構，根據相近的事件，可以得到最好的揭示和認識，因為在這些事件中，思想結構得到最徹底和最一貫的表現。

在具有重大意義的著述當中，應當舉出皮·納維勒的一部巨著，他在这部著作中，從黑格爾著作起敘述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和後期著作，充分地分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勞動問題和勞動這一概念起源問題的观点^①。

同樣應舉出奧·科爾努的重要的歷史著作。他在自己的論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對他們的發展作出了迄今最好的論據確凿的分析^②。

在值得注意的著作中，可以舉出讓·特·德桑蒂的哲學概論和陳德討的胡塞爾的現象學^③。

在官方馬克思主義者當中，羅歇·加羅迪是最突出的人物。他

① 皮埃爾·納維勒：《享受的異化》（《De l'Aliénation à la Jouissance》），1957年巴黎法文版。在這個問題的历史—社會學分析中，納維勒區分出勞動範疇和實踐範疇：“人類集團的生活，作為一般的能動性，作為實踐，是創造，但作為勞動，則是分立的創造物，即異化。在創造中，人，作為一種自我奉獻，是屬於自身，也屬於他人的，但在從勞動，從對他人的強力產生的異化中，人成了自己和他人的異類。作為創造者，他在掌握自己，作為商品生產者，他在消失。在所有這些情況下，他是能動的，他的能動性一直是解決他的社會狀況的鑰匙；但只有對他的勞動條件作特殊的分析，才能使他有可能改變這種狀況，使之有利於自己。”（《享受的異化》，第367頁）此外，納維勒在自己較早的著作《心理學、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1946年）中主張近乎行為主義和機械主義的观点。

② 奧·科爾努：《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1卷（1955年）和第2卷（1958年），巴黎法文版。此外，《馬克思主義批判文集》，1949年巴黎法文版。

③ 讓·特·德桑蒂：《哲學史概論》，1956年巴黎法文版（第二卷分析斯賓諾莎及其時代，比第一卷好得多，第一卷仍然是停留在官方的範圍內）。越南人陳德討寫過《現象學和辯證唯物主義》，1951年巴黎法文版。

相当多的作品主要是反映共产党本身的发展路綫和观点。加罗迪完全处于苏联思想体系的影响下，实质上只能对某些被认为是基本的和絕对的官方观点加以法国的解釋。例如在他的論述唯物主义認識論的主要著作当中，有一部著作具有可知論和实证論的一切特征，而他的理論在許多方面也沒有达到过巴甫洛夫的反映論的水平^①。

加罗迪的以及苏联的認識論，由于許多原因再不能使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想滿足。它們沒有站在現代哲学发展的水平上，原因很簡單，就是因为它們是片面的、公式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理論，不能抓住对馬克思主义來說是重要的因素。所有这些作者，仍然停留在主体—客体关系的古典解釋上，而且主体被理解为一般的主体，它的反映只是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

加罗迪虽然沒有忘記现实是人化了的现实，沒有忘記着重指出實踐的因素，但这个因素仍然是外在的，是附加于一种第一性的关系的。他沒有理解这样一点：實踐不只是对自然界的作用，而且是人們实际的一般相互关系；因此不存在任何进行反映的一般主体（那是唯心主义認識論的遺產），而存在的是在历史环境和結構中的历史的人。他也不理解，这种中介，即历史地形成了的人的意識，历史地构成了的人的思維，观念化了的和往往神秘化了的的人的意識，正是应当加以研究的、对馬克思主义來說最值得注意的和最重要的中介。

加罗迪在本人論述自由的著作中，也沒有超出通常的观念論的范围，而对于在上述問題中应当是基本問題的異化問題，也只是在自己的活动的最近阶段，即在竭力要緩和法国官方馬克思主义对法国哲学各个不同流派的至今不可調和的观点时，才試圖加

^① 《唯物主义的認識論》，1953年巴黎版。这一书名本身就說明这一点，因为这个书名看不出对这問題的一般唯物主义解釋和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解釋之間的重大差異。

以研究^①。

法國官方的馬克思主義者直至今日還沒有懂得採取創造性的辯論方式，而是對所有其他主張採取同蘇聯一樣的態度，凡是與他們不一致的和不符合他們的理論思想現成框子的，一概絕對否定。例如同梅勞-龐蒂和同一位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天主教徒進行的兩場辯論就沒有多大的理論意義^②。

除了在馬克思主義中的這些流派以外，應當指出，一項十分巨大的研究馬克思的觀點和整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的工作正在法國開展。在最著名的“馬克思學家”當中，除了上述者外，有馬·盧貝爾^③。

如同本書其他篇章一樣，這一篇的所有論述自然不是把各種各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全部活動論述無遺了，尤其不是把馬克思主義思想在科學和理論生活的其他許多部門的影響和表現論述無

① 參看他的著作《自由的法則》(1950年)，《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1958年)和《人的前景》(1959年)。

② 莫·梅勞-龐蒂的《辯證法的歷險》(1955年)一書，遭到羅·加羅迪、日·克瓦紐、姆·卡萬、讓·特·德桑蒂、讓·卡納帕、符·勒杜克和昂·勒弗夫爾參加撰写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厄運》一書的反駁。

耐人尋味的是，一些非馬克思主義者，以及耶穌會徒（他們自然是從托馬斯主義的批判立場出發）也寫出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極其廣博和詳盡的著作。如非馬克思主義者昂·巴爾托利著的《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和社會學說》，1950年版。耶穌會徒們的著作，最著名的有：皮·比果《馬克思主義和人道主義（卡爾·馬克思經濟著作集序言）》(1953年)，昂利·尚貝《馬克思主義在蘇聯》(1955年)以及讓·伊弗·卡爾維《卡爾·馬克思的思想》(1956年)。馬克思主義者寫了一本小冊子《馬克思主義者對自己的天主教批評者的回答》加以反駁。

③ 馬·盧貝爾1948年發表了《社會主義倫理學問題文集》，內有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概論，試圖在倫理學基礎上理解馬克思主義。他出版了關於馬克思的大部頭著作，書名叫做《卡爾·馬克思思想傳記》(1957年巴黎法文版)，現在又在出版馬克思學著作《馬克思學概論》，作為《實用經濟學研究所學報》的專輯。在這裡我們還可以舉出保·山多爾對辯證法歷史所作的嘗試，他在1945年寫了《辯證法的歷史》一書，但這部書過於零碎、不完整和不够深刻。讓·伊波利特的《論黑格爾和馬克思》(1955年)則充實得多。

遺了。在这方面，很大一部分法国知識分子和重要的科学工作者都是或多或少地受着馬克思主义的影响的，如克·萊維·施特劳斯、阿·庫維利埃、若·弗里德曼、昂·德罗克和許多其他代表現代进步科学思想的人物。

总之，由于有各种不同的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由于有强大的知識和社会主义傳統，由于消息十分灵通，由于非馬克思主义者和馬克思主义者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法国今天是在馬克思主义理論思想的发展和繁荣方面最值得注意的国家之一。

第二章 馬克思主义在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基本上沒有达到获得国际承认所必需的水平。这不是說某些国家的馬克思主义史今后也不能写下一页在这一方面的积极发展。馬克思主义理論在一些西方国家沒有較为显著的进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只举出最重要的原因，那末，对意大利來說，法西斯长期統治阻碍了它的发展，而从二十年代初的事态以及当时存在的主观力量来看，它是能够得到极大成果的。只是經過二十多年的迫害以后，馬克思主义思想才能够重新自由发展，以至今天在各个方面进行大有希望的努力。在意大利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当中，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傳統是强大的，这些运动的广闊規模保证为一种同全面的社会实践密切联系的思想奠定必要的政治基础。初步的成果已經出現。只要举出《葛兰西研究》就足以证明了。《葛兰西研究》由羅馬葛兰西研究所出版，它正集結着大部分意大利馬克思主义者去完成这样一个既是馬克思主义的又是本民族特有的任务：首先探討葛兰西思想的財富和寻求出意大利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和規律。同样应当举出季昂賈科莫·弗耳特兰納利研究所的《年鉴》，这个研究所也是系統地研究社会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的^①。

^① 《葛兰西研究》，安东尼奥·葛兰西研究所羅馬版，《年鉴》，季昂賈科莫·弗耳特兰納利研究所米兰版。在比較著名的意大利馬克思主义者当中，应当举出安·班菲和克·魯波里尼等。安·班菲在自己的著作中特別強調在对現代自然科学的关系中的文明关系問題，并认为劳动和智慧是实现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唯一出路和可能（見《哥白尼式的人》）。

在德国,虽然是在稍短的时期内,馬克思主义遭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迫害更为粗暴。一切当时是进步的东西(或广义上的社会主义或馬克思主义的东西),从1933年后都被囚禁起来或驅逐出国。馬克思主义思想,甚至較为光輝和进步的资产階級思想,都被反动的納粹主义低能儿所接替了,这些低能儿在自己的庇护者的清一色的服装里找到使自己的精神清一色化的范例,好像理論思想在行軍号令下一齐举步也能够向前发展似的。

被战胜的德国战后的形势尚未带来任何重大进展。东部基本上一直受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和馬克思主义观点的束縛,而在西部,馬克思主义理論只是批判的靶子,如果除了利奧·科夫勒(他現在住在德国的这一部分)^①,基本上就只有那些耶穌会徒和新教教徒們带头进行的狂热的反馬克思主义的理論活动了。但是不应当忘記,斯大林主义化了的馬克思主义在东部使得人們非常容易犯片面性和本体論的毛病,非常容易“忽略”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問題——人道主义問題。如果还加上前面所說的狹隘性和对待馬克思主义思想自由发展的官僚主义态度(这些所造成的后果是:早自二十年代以来不友好地和不可思議地对待每一个較为独創的努力,认为馬克思主义理論領域的每一种活动都必須采用同样的范疇,同样的規律,同样的观点,同样的出发点),那末在德国哲学的批判性研究中有时也能遇到一些中肯的批評,就不应当感到奇怪了。这里特別要指出的是《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上的某些文章,这些文章有时还是值得認真地去討論一下的^②。

^① 利奧·科夫勒用斯丹尼斯拉夫·瓦林斯基的笔名,于1944年在伯尔尼出版了一本名为《社会学》的饒有趣味的书,书中特別接受卢卡奇的某些基本思想去研究历史問題,并批判地对待許多研究过这个問題的人,如李凯尔特、麦·阿德勒、斯·馬尔克、威·桑巴特等。后来,1955年在汉堡出版了《历史和辯证法》,这部著作多半是方法論性质的。

^② 在一般說来价值不同的著作当中,我們可以举出两部較广博的論述苏联辯证

在意大利和德国，政治环境是特別的，即法西斯主义暂时得势，馬克思主义在这两个国家几乎被連根鏟除。而在英国，資本主义的独特发展造成这样的不革命的形势，这种形势非常适合改良主义、工团主义、經驗进化主义的思想的发展，而不利于馬克思主义。美国的情况也相类似，因此在这两个国家当中的任何一国，都沒有較为突出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发展值得我們特別論述。

从上世紀末到本世紀三十年代，英国資本主义的壟断地位也反映在英国工人階級的生活上，英国工人階級較好的社会政治地位（像在本世紀的美国一样）滋长改良主义思想，适合于爭取系統地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这些生活条件本来就比其他許多国家工人階級所处的生活条件好得多）。由于只走工联主义和工团主义斗争的道路（这种斗争在民主傳統的基础上是具有广闊的发展可能的），这些运动的理論家本人就沒有可能广泛考察历史发展并局限于經濟主义的和实用政治的主張上。因此，艰深的馬克思的辯证法便不是必要的了，而英美的哲学和科学思想的經驗主义傳統又根本配不上这一辯证法（这一点我們还会談到的）。

由此还产生一些理論妄想，认为在这种西方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会有完全不同的运动，革命的辯证的馬克思的思想一般不适用于它們，只是在一定的形势下才适用。馬克思主义者数目很少，理論薄弱，不懂得把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用到英国和美国工人階級斗争的特殊条件中去，以便成为本来可望把工人階級大多数聚集在自己周圍的运动的領導者，这些当然也就是促成这一点的原因。

唯物主义的著作：伊·姆·鮑亨斯基的《苏俄的辯证唯物主义》（1950年）和古·韦特尔的較充实的《辯证唯物主义》一书（1952年）。再就是瓦尔特·泰麦的《馬克思主义》（1950年），埃·梯叶尔的《青年馬克思的人类学》（1950年），亨利希·波皮茨的《異化的人》（1953年），麦克斯·格·兰格的《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1955年），雅科布·霍姆斯的《技术的創造力》（1955年），伊尔文·費切尔的《斯大林論辯证唯物主义》（1956年）和《从馬克思到苏維埃思想体系》（1957年），伊·鮑亨斯基和格·尼迈耶的文集《世界共产主义手册》（1958年）等。

的确，这是馬克思主义中尚悬而未决的問題，虽然很明显，由于基本上按照俄国的样本和經驗办事，两国共产党也就孤立于本国工人运动的主流之外，脫离了这个主流。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在英国馬克思主义理論家当中今天可以举出的主要有希·里維、莫里斯·康福斯、莫里斯·多布、尔·米克和两位著名学者日·符·阿耳当內和約·德·貝尔納^①。

在美国，馬克思主义理論的状况和发展与此相类似。只是在英国，資本主义是在强大的封建傳統基础上，随同自己在这一个时期的經濟和文化成就发展起来的，而美国的資本主义則是在缺乏許多这种傳統，特别是文化傳統的情况下蓬勃发展起来的。虽然資本主义发展的个别时期也有过尖銳的階級冲突，特别是在十九世紀末，当时在欧洲侨民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下馬克思主义运动也得到发展；虽然在这些階級尖銳冲突时期馬克思主义思想通过丹尼尔·德·萊昂、耳·薩尼厄、路·布丁等人来促进工人階級組織起来，但是美国經濟在国际上的良好地位和急剧发展促使政治斗争首先导向經濟的目的。从此，美国的工团主义也大大发展起来，这种工团主义如同在英国一样，一直在相当程度上对革命的和更广泛的理論，特别是对馬克思主义漠不关心。不存在强大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和相应的理論，并不是說美国的資本主义解决了自己的問題和內部的矛盾。恰恰相反，在整个蓬勃发展和居民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仍然出現的在三十年代初震撼美国的危机，以及內部向国家資本主义的变化，最明显不过地证明了，旧的資本主义关系对大大发展了的生产力是太狹窄了。但是，美国資本主义的这些矛盾目前主要不是在基本階級力量的政治冲突中解决，

^① 里維著有《社会思想》(1945年)，莫里斯·康福斯著有《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1946年)和《历史唯物主义》，日·阿耳当內将自己在1938年的讲义发表，书名为《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1947年法文版)，莫里斯·多布著有《政治經濟学和資本主义》(1937年)。

而是第一在通过工人联合会进行的尖銳斗争中解决，第二通过国家逐渐地和有力地不仅进入政治过程，而且进入經濟过程来解决。对国家資本主义这种发展采取什么态度，在这个时期成了美国进步力量，首先是工人階級的基本問題。

这种形势無論如何都无助于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发展，虽然馬克思主义思想經常地影响着美国的思想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在本世紀初，路·布丁出版了《卡尔·馬克思的理論体系》一书，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认为有必要将这部书翻譯出版^①。

在三十年代，在馬克思主义思想最著名的代表当中应当举出悉尼·胡克，他所著的論述黑格尔和馬克思的书引起广泛的兴趣^②。但是他后来拋棄了馬克思主义，他的篇幅較小和不充分的著作《辯证唯物主义和科学方法》(1955年)证明这一点。

在現代馬克思主义哲学家当中，最著名的有赫·馬尔庫斯、霍华德·塞尔森、約翰·桑默維勒、哈利·威尔斯、巴罗士·丹汉姆^③。

科利斯·拉蒙特(1949年发表了《人道主义是一种哲学》)也在

① 路易·布丁：《卡尔·馬克思的理論体系》，1909年斯图加特德文版(美国1907年版)。

② 悉尼·胡克：《对卡尔·馬克思的理解》(1933年)和《从黑格尔到馬克思》(1936年)。

③ 赫·馬尔庫斯(我們在三十年代的法兰克福集团中已經認識他了)在战后著有《創造力和文明》(1955年)和批判苏联哲学的《苏維埃馬克思主义》(1958年)。霍·塞尔森试图研究社会主义和倫理学問題(1943年)，还写了《革命中的哲学》(1957年)。約·桑默維勒发表了一本关于苏联的哲学的书(《苏維埃哲学。理論和实践研究》，1946年)，还出版了一部著名的书《和平的哲学》(1949年)，这本书令人信服地告訴美国公众，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其实质來說是一种民主运动，这种民主运动正是要求消除各民族間的战争冲突。哈利·威尔斯发表了批判实用主义哲学的著作《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哲学》(1954年)，而巴罗士·丹汉姆著有《人与神話的对立》(1947年)和《鎖住的巨人》(1953年)。

某种程度上接近于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維護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虽然这种人道主义对現代关系的結構，因而也是对現代人道主义問題的实质尚缺乏比較深刻的观察。

在政治經济学領域可以举出保尔·斯威济，他所著的《資本主义发展的理論》一书(1942年)不仅对資本主义作了頗有趣味的层层分析，而且也运用馬克思的方法分析資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

更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运用，这些研究，尤其是弗罗姆的研究，是一种闡明現代关系中个性和人的問題的有重大意义的尝试。

这样，我們基本上把馬克思主义理論思想闡述完了。如果我們沒有談到某些国家，这不是說这些国家今天或过去对馬克思主义理論沒有兴趣和研究。但是在沒有談到的国家当中的一些国家，沒有什么比較显著的发展可以說是在国际範圍內对馬克思主义有貢獻的发展，因此就沒有打算在这部概述馬克思主义发展的书中一一专门提及它們。那是各国馬克思主义史的任务。許多其他国家由于剛剛踏上摆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依附的道路，工人运动尚不够强大，理論和哲学傳統尚比較薄弱，而这些傳統在許多方面是在馬克思主义中能够有所进展的前提。

現在我們剩下的就是要考察这样的一个国家的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了，这个国家虽然是一个不发达的小国，但是它通过馬克思主义者非凡的活动表明了历史发展的进程能够有何等的加速度，馬克思主义思想是何等創造性的思想，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这个国家今天在撰写現代历史的重要一頁。

第七篇

馬克思主义和南斯拉夫革命

第一章 革命前时期

在我們这个时代，即在二十世紀中叶，写下了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一章，而且南斯拉夫馬克思主义者無論在实践上或理論上都还在繼續写着它。

只要我們回顾一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本世紀初还在进行反对土耳其落后的封建主义和奥匈帝国不合时宜的陈腐制度的解放斗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国家，而在两次大战之間的时期，南斯拉夫几乎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农民占人口的75%以上，并具有由此而来的落后状态），——只有注意到这一切，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組織所作的努力和所获得的成就；这个組織利用了国内外的对抗关系和形势，通过一次革命高潮，不仅使本国升入自由民族之列，而且通过自觉地改造社会結構，使本国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和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心。

虽然使南斯拉夫变成发达的国家，还是一个过程，还需要一番新的努力，还需要經過一段发展，但这并不是說，南斯拉夫馬克思主义思想就沒有自己的长期的历史。实际上，早在十九世紀后半叶，馬克思主义思想就已經随着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現了，并且经历了革命运动本身在不发达的經濟和政

治条件下必然經歷的各个阶段。由于在一个不自由的国家的落后环境里，資產階級很晚才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必然要遇到在欧洲比較发达的土地上发生的这样一些新的过程，这些过程不仅已經預告了資本与劳动、資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并且把这场斗争提到戰場上来。

虽然，南斯拉夫各地的工人階級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但是，这些过程以及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的其他各种派别的斗争必然对社会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所影响并起一定的作用。而这就意味着，除了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思想之外，还必然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錯誤倾向——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①。

因此，尽管馬克思主义思想还是一种不常見的而且不够发展的思想，但是它首先是通过斯維托扎尔·馬尔科維奇（1846—1875）、腊多万·德腊戈維奇（1878—1906）、季米特里·图措維奇（1881—1914）等人，特别是在已經获得独立的塞尔維亚在为自己开辟道路。

斯維托扎尔·馬尔科維奇^②是塞尔維亚政治史和文学史上最偉大和最光輝的人物之一。由于他为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而斗争，所以他标志着塞尔維亚政治和文化发展上的轉折点。但是在他的著作和活动中，一般地說还没有完全摆脱空想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观点。除了他以外，在这一时期还必须指出一位主張社会主义的值得注意的人物瓦薩·佩拉吉奇，而稍后还有腊多万·德腊戈維奇、米塔·切尼奇、季米特里·图措維奇和杜山·波波維奇，他

① 关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可参看铁托所作的《南共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48年）和他在庆祝南共成立和活动四十周年时所作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革命斗争的四十年》的报告（1959年）。

② 斯·馬尔科維奇的主要著作有：《东方的塞尔維亚》（1872年），《巴黎公社和国际》（1871年），《科学和生活的现实方向》（1873年）等等。

們都是塞爾維亞社會民主黨的創始人，同時也是這個黨的最革命和最有才干的領袖，馬克思主義思想就是通過他們在我們日益佔據了統治地位。

事態的這種發展，資本主義發展的日益加強，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勞動階層的困難生活條件和國家在塞爾維亞資產階級和君主制度統治下統一起來之後一系列問題（民族問題、農民問題、一般勞動階層的生活問題和民主自由問題等等）的得不到解決，以及特別是中歐和東歐對戰後革命事件的激烈反應，所有這一切都導致了各地社會黨的統一（1919年4月）和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工人黨（共產黨）的建立，並在1920年的武科瓦爾代表大會上完成了這個統一過程和清除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領袖的過程。從此，馬克思主義思想（儘管它經歷了各種階段）便成為南斯拉夫共產黨人鬥爭的理論基礎和有賴於革命力量的存在和發展才能夠存在的一種世界觀和社會觀。

而正是南斯拉夫馬克思主義者的這種鬥爭碰到了一系列重大的障礙和困難。新誕生的國家，從它創立的第一個小時起，就充滿着一系列的矛盾。主要由於落后的農民經濟，細小而分散的農村莊園，大量的土地掌握在一小撮地主手里，經濟由於在外國資本（起先是法國和英國的資本，而以後尤其是德國資本）的控制和影響下很不發達——這樣的國家就成了進行各種經濟上和財政上的投機活動的理想樂園，這些投機活動一直伴隨着南斯拉夫資產階級的政策，直到它破產。因此，兩派勢力立刻就發生了尖銳的矛盾，一派是以君主制度為中心的統治集團和塞爾維亞資產階級，另一派特別是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的資產階級。懸而未決的民族問題和大塞爾維亞霸權主義傾向，使得其他民族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和要求，在民族鬥爭的幌子下，實際上被抹煞了。

但是，圍繞這些矛盾而發展的，只是政治生活的一個方面。對立的雙方對於南斯拉夫勞動群眾的發展、要求和鬥爭有着共同的

矛盾。南斯拉夫劳动群众，除了民族問題之外，还日益尖銳地把其他的政治和社会要求提上了日程，如：民主化問題，解决困难的經濟状况問題，解决工会問題，土地問題等等。对于这些要求，以及对于共产党人在制宪議會选举中的显著胜利，资产阶级的答复是頒布非常法（1920年的公告和1921年的保卫国家法），从而禁止共产党并撤銷全体共产党議員的当选证书。

只有从这些情况中才能了解南斯拉夫革命力量和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主要革命組織——南斯拉夫共产党，直到战前，完全处于非法状态，受到殘酷的迫害，并在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常有許多最优秀的干部遭到牺牲。迫害是殘酷的，斗争是毫不留情的，党在这样的环境里，必須把严密的地下活动和合法的斗争形式尽量妥善地結合起来，因为党的最优秀的干部，当时只能輾轉过着非法的政治生活，而且这样的生活也常常为多年的监禁和劳役所中断。我們今天可以提到的所有当时的馬克思主义者，即这场革命斗争的主角和这场斗争的馬克思主义理論思想的主要代表者，以及多数今天仍然是居于领导地位的馬克思主义者，都經受了所有这些严重的考驗、迫害和监禁等等。

在这个时期，党內的派別斗争也使得这种形势更加严重，尤其是在1929年1月君主专政以后，党內派別斗争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可是，在三十年代初，党的队伍终于开始逐渐巩固起来，虽然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已经开始产生消极影响，已經成了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和国家主义政策的工具^①。在这一发展过程中，1937年

^① 铁托在南共成立四十周年时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当时共产国际几乎已經准备犯下一个致命的錯誤，那就是：正在党組織随着新的领导的确立而开始巩固的时候，却要來解散南斯拉夫的党組織。考虑到三十年代后半期所发生的事件，铁托对当时的情况作了下面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时共产国际在同其他党的关系中，日益明显地表现出官僚主义的和公式主义的态度。实际上，斯大林在苏联大清洗时期通过共产国际对其他党所奉行的政策，是一种磨灭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造成无气节的共产党人类型的政策。当时，列宁給共产国际的工作确立的原則和精神就开始遭到严重的歪曲。这种

无疑是一个转折性的年头，这时约瑟夫·布罗兹·铁托（生于1892年）担任了党的书记，并且在国内选出了新的领导机构。党的新的领导在极短时期内便在组织上和政治上使党得以胜任当时在日益临近的我国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里最艰巨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思想基本上与代表它的力量具有同样的命运。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当代社会革命力量在思想上的最高表现，在南斯拉夫很难突破严格的书刊检查和政治迫害，而它的代表者没有任何方便条件，可以在地下斗争的尖锐冲突中静下心来建设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单是向南斯拉夫公众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需要克服重重困难，不仅要准备全部出版物可能遭到没收，而且还要准备经受多年被剥夺自由的痛苦^②。

由此可见，形势无论如何是不利于思想理论工作，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原理的建设的。当时的形势是直接准备革命，迅速向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进攻并防止他们的袭击，为影响可能有助于革命高涨的一切力量的觉悟而斗争。

在一个文化活动还没有欧洲那样广泛和发达的国家里，在一

政策给许多党带来了巨大损失，这在法西斯侵略时期，在对这些国家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当时这些党应当表现出自己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同群众是有联系的，在思想上是成熟的，应当组织人民进行反对占领者的斗争，并站在这一斗争的前列。（斯大林的这一政策在1947年后通过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和活动，再度复活了。）

由于斯大林的这种政策，我党丧失了大批干部，他们或者是在政治上堕落了，或者是在苏联斯大林的各次大‘清洗’时期遭到杀害，在清洗中，我党和国际革命斗争多年来所培养的百余名经过锻炼的共产党人遭了难。在他们之中有我们党的几十名从前的领导人，我只想举出几个人来：菲利浦·菲力波维奇、斯切潘·茨维奇—‘什特费克’、弗拉迪米尔·乔皮奇、腊德·沃约维奇、克·霍尔瓦廷等人，他们以及我国其他上百名居领导地位的共产党人都一起死于斯大林的监狱和集中营中。”（《南斯拉夫共产党革命斗争的四十年》。《铁托演说和论文集》第1卷，1960年萨格勒布塞文版，第XX—XXI页）

^② 应该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著作几乎都是以半合法的或秘密的方式出版的，而更不用说列宁的著作或在严格的地下活动状态下出版的党的刊物了。

个理論思想基本上帶有模仿性質，而政治、經濟和民族矛盾極其尖銳的國家里，在這樣的情況下，馬克思主義者的活動一定是針對克服和解決最嚴重的、有時关系到黨組織本身的存在性的政治和組織問題，這完全是正常的。不過，即令在這樣的情況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思想也始終是一種指南針，它不僅給革命力量指出現代發展的總趨勢，而且使革命力量能夠從常常是錯綜複雜和幾乎毫無指望的形勢中正確地找到出路。

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經常批評馬克思主義，硬說它是“片面的”和“站不住腳的”。但是，他們在這裡忘記了一個最起碼的事實：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三次最重要的歷史事件，即俄國、中國和南斯拉夫的革命，是在三種完全特殊的、獨特的情況下，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立場出發而完成的。只要對馬克思主義作創造性的理解，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就能表明馬克思主義比資產階級的一切理論都要優越。

事態的這種發展的另一個特點是，南斯拉夫有相當大的一部分知識分子是同工人階級一起站在鬥爭的行列里的，或者至少是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思想的熏陶的。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就有一部闡述辯證法的著作問世^①。而以後，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作方面出類拔萃的有：奧格年·普里察、西馬·馬爾科維奇、維塞林·馬斯累沙、博日达尔·阿季亞、奧托卡爾·克爾朔萬尼、薩費特·克魯皮奇等人^②。

① 維·里巴爾：《辯證法原理》，1922年薩格勒布塞文版。在該書中作者試圖把辯證法用于生物學物種起源的問題和進化論上。在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關係問題上，維·里巴爾的觀點至今仍然是正確的。

② 所有這些人也都是馬克思主義主要著作的翻譯者和各種進步刊物的出版者。關於奧·普里察我們可以特別指出他的《現代哲學和自然科學》一文（1937年）以及就《烙印》雜誌發表的辯論性文章；西馬·馬爾科維奇出版了一本學術性著作：《因果性原則和現代物理學》（1935年）；阿季亞、馬斯累沙和克爾朔萬尼，就我國文化史和當時的政治和文化情況發表了一系列有關馬克思主義各種問題的文章和短小的學術著作。

在其他的文化工作者、作家、批評家等等中間，馬克思主义思想也有自己重要的代表者。可是，在上面提到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困难情況下，革命的思想往往要通過各種文學作品和刊物才能比較容易地傳達給讀者。例如，某些人物對當時的一代人就特別起了強有力的進步影響。其中首先應該提出米·克爾累日阿所創造的剛強的艺术形象，他以自己全面的文學活動写下了我國進步思想的重要一章，其次是莫·皮雅杰、阿·策薩雷茨、羅·喬拉柯維奇、約·波波維奇、斯·加洛加日阿、治·約凡諾維奇、普·比哈里—梅林、馬·里斯提奇、布·克雷夫特、韋·格利戈里奇、米·波格丹諾維奇、恩·基基奇、克·腊津、伊·格腊霍尔和其他許多人。

所有這些人都曾經作了多次的努力來出版進步刊物，他們面對巨大的困難，通過下述雜誌為了宣揚馬克思主义以及為了用馬克思主义來闡明各種現象首先是社會生活現象而進行了鬥爭，這些雜誌是：《火焰》、《文壇》、《科學和生活》、《文學》、《新文學》、《今天》、《軸心》、《犁溝》、《藝術和批評》、《我們的實況》、《表現》、《自由》以及其他許多雜誌。但是在馬克思主义思想的這一發展中也出現過偏差，特別是曾有人企圖從馬赫主义的立場來解釋哲學和科學的某些基本問題（茲·李希特曼），因而就圍繞着《烙印》雜誌引起了尖銳的爭論，當時出版《文學筆記》（1940年）曾是重要的嘗試，來把當時已經掌握了馬克思主义原則應用於這些問題。

然而，為民族生存而鬥爭的時期以及決定性的階級搏鬥的到來，比可能預想到的要快得多。歐洲到1941年年中，幾乎全部處於法西斯的占領之下。1914年第二國際曾面臨一次生命攸關的事件——帝國主義戰爭，而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原文如此，疑

杜·內德利科維奇，一位講授哲學的教授，贊成馬克思主义並發表了若干值得注意的論文，其中尤其突出的是《民主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衝突》（1938年），《反對柏格森》（1939年），尤其是他還翻譯了黑格爾的邏輯學，並作了廣博的歷史注釋，譯本書名為《辯證法》（1939年）。

为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之誤。——譯者注), 第三国际內的各国的党又遇到了类似的問題。当时的形势是新的、特殊的, 这种形势也就应当特殊地加以解决。但是, 第三国际內斯大林的领导在估計新战争方面优柔寡断, 对当时的主要危險認識不清, 官僚主义地使第三国际的领导服从于苏联对外政策的一切权宜行动, 不理解如果不解决具体的民族矛盾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問題就沒有国际主义, 斯大林妄想解决一切理論之謎并把自己的教条主义决定强加于所有的运动和国家——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各国共产党的混乱和束手无策, 以致整个欧洲, 除了南斯拉夫之外, 没有一个党能够积极地应付这种新的特殊的形势。

实际上, 不仅应该成为彻底的列宁主义者, 而且应该达到列宁的天才的革命創造的水平, 从而得以实现迅速的、刻不容緩的和根本的轉变, 指导革命力量从一条道路走上另一条道路, 并为革命力量創造出在当时情况下是唯一现实而富有成果的活动条件。

南斯拉夫有它許多內在的特点, 其中某些特点我們已提到过。但是, 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 整个欧洲形势的特点是法西斯占領的事实, 和法西斯主义正为反对资产阶級世界的民主力量、而稍后也为反对社会主义世界的民主力量而战。而这些情况完全不同于1917年俄国的情况或者1927年中国的情况。

对馬克思主义來說, 在理論上并且在实践上解决每一个国家当时的这种情况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早在1941年4月10日(即法西斯刚开始占領时)以主要的革命战略家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党的领导, 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准备起义, 而稍后,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6月22日发表了告人民书号召起义, 6月28日成立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所有这一切都是天才的战略决定, 但是在当时还不能看出这些决定对我国以及对整个国际社会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的一切后果。

当时的基本問題当然是民族解放問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认

为这一问题解决当时形势的关键，因此，把这个问题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提出来了。在整个斗争期间，民族解放问题一直是最基本的问题。早在1941年8月，铁托就对这个基本问题作了如下的说明：“第一、南斯拉夫各地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门的内哥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其顿、伏伊伏丁那、散贾克、达尔马提亚）人民解放游击队的主要目的是：使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从占领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并反对帮助占领者压迫和屠杀我国人民的内奸。

第二、我国人民自由和独立的最大敌人是德国法西斯主义及其在我国各地进行抢劫的所有其他法西斯帮凶。因此，一切爱国者的神圣职责，就是毫不留情地进行斗争，直到这群法西斯匪帮被彻底消灭为止。

第三、游击队之所以称为人民解放游击队，就是因为它不是任何政党和派别的战斗组织（具体地说也不是共产党的战斗组织，虽然共产党人是站在斗争的前列），而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战斗队。凡是能够参加反对占领者的武装斗争的爱国者都应加入这一队伍，不问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

第八、游击队的政治路线必须是：由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不分政治和宗教信仰的差别，组成人民解放反法西斯阵线。”^①

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和对革命斗争所进行的独特的指导，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经验 and 革命理论的创造性贡献，而且从它们以后的结果和影响来看，还使得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南斯拉夫能够具有今天这样一些特点。

这是一个天才的决定，是我国革命的主要战略家——约·布·铁托的丰富经验、坚定意志和革命的敏锐性的产物。由于这个文件和后来在1948年所持的立场，以及由于开始了迄今从未实

^① 《人民解放游击队的任务》。《铁托演说和论文集》第1卷，第1—2页。其他各条（一直到第十六条）谈的是游击队的其他任务和策略等等。

現过的社会主义过程，铁托成了現代历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人物之一。这个决定不仅发挥了勇于牺牲自己并在淪陷了的城市的殘酷斗争中成批遇难的共产党人的积极性，而且也发挥了全体南斯拉夫人民的积极性，向他們指出了明确的前途。同时，这个决定也使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妄想充当所謂人民利益的捍卫者的任何企图都不能得逞，并迫使那些企图这样做的人立即暴露出他們的真面目：同占領者相勾結，反对人民解放斗争和共产党人。虽然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懂得广泛的人民陣綫是胜利的根本保证，他們并很好地为建立这样一个人民陣綫而工作——然而，由于种种情况的湊合，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还是保留了自己唯一的組織，这个組織的全体成員和領導都参加了斗争，并从而成为整个人民解放斗争的公认的領袖和基本的活动力量。

与此相适应，在人民解放斗争范圍內，还进行了一个逐漸改变当时旧的南斯拉夫的资产阶级結構的过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前途既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旧南斯拉夫（因为它不能解决一系列內部矛盾和問題，因为它最后听任占領者任意宰割南斯拉夫人民），更不可能是法西斯性质的南斯拉夫。所以，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預告要粉碎旧政权和建立以人民解放委员会为其形式的新政权。这一点早在1941年10月，就在爱·卡德尔（生于1910年）关于人民解放委员会是人民政权的临时代表者一文中在理論上得到了反映。卡德尔在文章中說：“在由于人民起义的胜利发展而业已驅逐占領者的地区內，現在正在建立从人民中間直接而自由地选出的新的政权机构——人民解放委员会。”^①

^① 卡德尔：《人民解放委员会应当成为人民政权真正的临时代表者》。《新南斯拉夫的道路》，1946年貝尔格萊德—薩格勒布塞文版，第234頁。卡德尔早在战争期間，而特别是在战后时期，就成了铁托身边精通社会主义的复杂問題的最卓越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家。卡德尔通过他就这些問題发表的著作，在国际范圍內也成了最有能力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家之一。

由此可以看出：“南斯拉夫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明确地认识到，为了保证人民斗争最后取得胜利，必须粉碎旧的国家政权机构，并代之以新的、人民的政权机构。在被占领的欧洲，还没有任何其他共产党能够做到这一点。”^①

事态的整个发展还在斗争进行的过程中就达到了顶峰：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于1943年11月就在法律上使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工作合法化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同民族委员会一起组成了立法机构和执行机构，从而宣告了新的、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诞生，因为这个国家是以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为首的。

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所未见的方式，以人民解放斗争的形式并通过这样的斗争，解决了根本任务，体现了历史发展现阶段的基本规律性，即摒弃和克服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不言而喻，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只不过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阶段的任务——确保人民民主的、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新政权和建立新的国家机构，这种国家机构意味着根本消灭旧的国家机构，同时也是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保卫业已进行的社会改革的主要工具。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作为这次人民革命的第一批战斗者和领导者，深得本国各族人民的信任，这尤其表现在广泛地计划和建立起来的人民阵线上。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人民政治组织，离开了它，就不能设想解放斗争会具有如此广泛的基础，同样也不能设想后来人民会如此积极地投身于国家的恢复和建设。

耐人寻味的是，斯大林的最高机构对于我们的这种发展情况（例如，建立无产者旅和设立国家的管理机构，等等）是很少表示赞同的，而在解放后，由于这种革命不同于俄国的革命，又根本不懂

^① 莫·皮雅杰（1890—1957）：《南斯拉夫共产党三十周年》，1949年贝尔格莱德塞文版，第15页。

得我們这个新型的人民民主国家实质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們的官僚主义的自命不凡的态度不可能承认那些沒有按照他們的意图和計劃进行的事情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而在不屈从他們的一切指示和他們要支配一切新的社会主义过程的霸权主义願望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了^①。

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国家主义忽視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正如我們已經強調过的,不仅对我国境内各族人民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也像以后的情况所表明的,对于国际社会主义也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个事实就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独立地解决了如何摆脱我国人民历史上的一个最困难的处境問題;他們出色地解决了这个問題,并且几乎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和领导才干进行了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切不仅使领导力量能够最充分地认清本国的各种問題和过程,而且使他們获得了极

^① 例如安·日丹諾夫在其众所周知的論1947年国际形势的报告中,在談到人民民主时把它說成是某种介于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东西,他說:“同时也就奠定了全民国家所有制的基础,建立新型的国家,即人民共和国,这里政权屬於人民,大工业、运输机关和銀行屬於国家,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各劳动阶级联盟是主导的力量。于是,这些国家中的人民不仅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榨,而且已在奠定着过渡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础。”(安·日丹諾夫:《論国际形势》。參看《几国共产党代表情报局會議(1947年9月末在波兰举行)》,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局1948年中文版,第18頁)

因此,在就这些問題而产生的爭論中,卡德尔还在当时就不得不強調指出:“鉴于我們的革命是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条件开始发展的,这次革命在它的第一阶段具有人民民主的形式,但是就其阶级力量和这些力量的内部关系来看,这次革命实际上只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它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除了解决了政权問題本身外——主要只是解决了一些一般的民主任务,而只是在战争結束阶段和战后不久,才开始在比較广泛的范围内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一点是无关紧要的。基本的問題是政权的性质和革命的力量内部关系,而不是革命变革的速度本身。因为速度要取决于革命的客观条件和革命领导力量的策略手段。所以我們有权利說,我們的人民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形式,因为我們的革命是在以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条件产生和开始发展的。”(卡德尔:《論南斯拉夫的人民民主》。《共产主义者》杂志,1949年第4期,第3頁)

其丰富的革命經驗，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勇气，从而在順利地克服各种最困难的障碍的同时，繼續独立地、自由地、以革命方式解决自己所負的国内和国际任务。

不言而喻，在社会主义各国之間的关系以及各个国家内部过程方面的两种对立的态度和观点，即国家主义官僚主义的态度和观点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态度和观点，有朝一日必将发生尖銳的冲突。然而，若不理解我們的上述这一革命过程，就不能理解南斯拉夫馬克思主义理論和实践的整个以后的发展情况。

第二章 革命后时期

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革命既是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也是他们的实践。在真正创造历史和加速历史过程的紧要关头，革命的决定既不是根据什么方案，也不是按照什么书本作出的，而是在对本国和国际的整个一系列关系作透彻的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首先是他们的领导，在由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前景的条件下，的确是能够胜任历史任务的。他们用自己的历史使命，把广大人民阶层吸引在自己周围。广大人民阶层在毫不留情的解放战争和革命的烈火中，经历了在别的情况下需要几十年和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内部改造。

这一革命创造也必然在武装革命以后显示出来，从而给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变革深深地打下烙印，使国家领导具有独立的性质。解放后，根本性的问题，即社会主义问题，根本没有成为问题。问题仅仅在于进行这一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方式、形式和速度。

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所能依据的仅仅是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苏联的经验。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所作的解释，也影响了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的观念，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作为第三国际的组成部分，一直无私地承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威望，承认“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称号。过去甚至于认为，这个狭隘的联盟是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最合乎逻辑的和唯一可能的前景。在国家的组织、对党的作用的理解、对农村的态度以及一般对科学文化的态度等方面，这种影响当然最厉害。严格的集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因素曾不断地阻碍我们的

发展，结果就必然造成了困难和各种畸形现象，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时广泛民主的革命道路却经常抵制了这些畸形现象。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革命是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的，这个革命始终充满着旺盛的革命热情，它完全是一次独特的革命，因此必然要求采取一系列特殊的措施，对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作一系列特殊的研究，而由于上述种种情况，就不可能轻易地把它纳入其他某些“规定”的范围和道路。而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则在于：革命的领导力量是真正想把革命过程进行到底的，是终身忠于建设新世界的伟大而崇高的理想的，我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女为了建成这样一个新的世界，在革命前和革命时期都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个世纪以来，这些伟大的原则一直推动无数的劳动群众同多少年来的剥削人和损害人的尊严的世界进行殊死的斗争。这些原则同把斯大林及其领导的思想 and 政治实践强加于人的倾向，同轻视国内和国际上的独立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无原则行为，以及同那些与本国和国际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实践格格不入的馬基雅弗利主义的行为是无法一致的。

冲突曾经是不可避免的，而这次冲突的高峰（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很快就表明，这实质上是两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冲突。冲突初期（1948年）所发生的情况连我们自己也感到难以置信和模糊不清，随着这些分歧的进一步发展，许多刻板公式的被抛弃和通过整个国内生活所必不可缺的自由分析，现代世界及其趋势的概况以及这种冲突的性质才获得了另一种、越来越清楚的轮廓。

事实上，必须把斯大林及其辩护者们在第三国际的第二个时期精心制造和硬要强加于人的那一套教条主义遗产全部抛弃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明显地感到，有必要对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大肆宣扬的斯大林的种种德行作真正的重新估价。对于现代资

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国家的理論、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政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及其智力活动的分析，所有这一切都通过这次冲突获得了新的說明。

尽管从那次事件以来历史上相隔的时间还很短，但是，今天已經很清楚，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领导所采取的立場是具有头等意义的历史性行动，是现代社会主义发展中的轉折点之一。

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問題

这一冲突本身把社会主义实践的一系列問題，特别是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学、經济学和政治学的一系列問題提出来了。在当时开始的反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运动中出現的某些現象，不仅使南斯拉夫馬克思主义者和南斯拉夫全体人民感到吃惊，而且使他們深深地感到痛心。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应当弄清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么可能使用往往低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实践和政治水平的方法呢！^①

当苏联和陣营中的其他国家开始对进入紧张的經济建設时期的我国实行經济封鎖和采取歧視措施时，南斯拉夫馬克思主义者

^① 在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除了我們已經提到的所有那些偉大活动和成果之外，还需要永久写下这样一些估价和观点，它們被认为是达到了馬克思主义分析的最高水平，人們并以此来約束所有共产党和指导它們的某些活动，而实际上这些估价和观点只是一个官僚主义集团的最卑鄙的污蔑和愚蠢的自以为是。1948年我們被指責为犯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錯誤，保存資本主义因素，使党消失在人民陣綫中等等；此后，情报局在1949年的決議中又声称：“在1948年6月間，共产党情报局會議已經指出铁托—兰科維奇集团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方面轉变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方面去的事实，而在情报局那次會議后所經過的这一时期內，該集团則已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場完全轉到法西斯主义和公开出賣南斯拉夫民族利益的立場上去了。”（《南斯拉夫問題參考資料》，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年版，第15頁）在各种結論中还有这样一条：“因此，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认为反对这受人雇佣的铁托間諜凶手集团的斗争，乃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职责。”（同上书，第19頁）对待一个实际上是欧洲的唯一作出了重大牺牲和努力，完成了自己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作的分析，所用的辞句，一句話，馬克思主义和对待这个国家的态度原来竟該是这样的！

不仅作出了巨大努力来頂住这一切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压力，而且也努力从理論方面来解釋这一切現象。我国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和实践十来年所取得的成果，一方面根本否定了和战胜了斯大林对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解釋，同时也給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和实践开辟了新的境界。

在社会主义的最初阶段，主要的危險之一是被推翻了的资产階級，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也存在另一种危險，这种危險是在社会主义过程本身内部产生的，它可能使社会主义关系发生致命的变形，变成国家主义官僚主义的关系，这一点在現代馬克思主义中則几乎是无人知曉的。正如铁托后来在总结这一过程和問題时所說的那样：“然而，在經濟和其他方面仍然很落后的情况下，国家机器在管理經濟和社会生活其他方面过大的作用，政权高度集中在国家中央机构手中，以及党直接领导国家机构，这些情况自发地产生出新的現象和危險：官僚主义，党和国家机构合而为一的危險，政权机器独立行事及其置身于社会之上的危險，社会政治工作者变成行政首长和劳动人民变成命令的执行人，而不是社会建設的积极和自觉的参加者的危險等等。这一切現象有使政治领导脱离群众的危險，并且会使劳动人民的創造性主动精神受到压抑和使社会生活及經濟生活陷于停滞。但是，尽管我国經濟落后，官僚主义的变形和党同行政机构合而为一的傾向并不是在我国的国土上产生的，而是通过抄襲斯大林的做法中的一切，作为斯大林的做法的思想影响和物质影响从外部傳来的。这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給我們造成了不少的損失。

另一方面，尽管南斯拉夫革命經常強調需要貫徹民主作風，強調自己的特点，反对官僚主义蜕化，但是，直到同斯大林的压力发生冲突和对它进行反抗之后，我們才懂得了官僚主义变形的全部意义及其危險性。霸权主义是官僚主义的外部表現，而内部的官僚主义分子則是官僚主义在威胁革命成果和社会主义发展方面的

积极支柱。

因此，在外部同官僚主义的冲突，更加要求对国内官僚主义分子进行更彻底的清算。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經預言，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受到資本主义复辟的威胁，而且还受到官僚主义的威胁。这一預言在我国发展的实践中得到了表現和证实。”^①

从革命初期就开始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經過这些事件之后达到了新的高潮。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認識到，国家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必然会加强官僚主义因素和国家主义因素，所以便大胆地开始了国家机器的非集中化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正是由于事态发展的这种情况，在理論方面也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特别是在1948年以后，社会主义及其实质和发展道路的問題在南斯拉夫曾經是一个中心的实际問題，同时也是一个理論問題，解决这些問題的不仅有职业理論家，而且还有最强的理論干部，他們同时也在实践上指导着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設。1958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肯定是通过这些努力制訂的最重要的文件。

綱領中提出了下面两个基本問題（而这两个問題又包括一系列其他問題）：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性质問題，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問題；以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及其建設的道路問題。

在解决这些問題的时候，得出了一系列十分重要的結論，这些結論实质上证实了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的某些基本思想，但是却与一系列观点相抵触，这些观点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近的发展时期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

首先，关于只存在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观点被彻底抛

^① 《南斯拉夫共产党革命斗争的四十年》。《铁托演說和論文集》第1卷，薩格勒布前进出版社塞文版，第34—35頁（以下凡是引自該版的引文，均只注明卷数和頁碼）。

棄了，这种观点是斯大林主义頑固地、教条式地强加于国际馬克思主义的。对于这一点，無論在實踐上，还是在理論上都有理由可作說明。我們南斯拉夫實踐的本身就清楚表明，社会主义不是用俄国革命的方法，而是在民族解放斗争的範圍內，通过完全独特的途徑爭取到的。除了这一点之外，对于这一問題的理論分析使人必然得出这样的結論：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不應該被歸結为一种唯一的形式。这是同辯证法关于发展过程中的一般、特殊和个别的統一这个基本論点相違背的。每一个实现历史过程的一般規律性的个别国家，都是一个具有自己特殊的內部結構，并处在不断变化的特殊的外界条件下的特殊的国家。可見，这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般規律性必然要在具体的形式中得到体现，而这些具体形式是由某个国家的性质以及某个时刻的各种历史情况所决定的。各个国家的特殊性是如此的多种多样，情况又是如此的不同，因此，任何从教条主义出发指定道路的做法，都是对馬克思主义基本真理的最寻常的違背。

卡德尔在奧斯陆所作的众所周知的演說中，曾精辟地闡述了这个問題。他指出，一系列国家已通过欧洲正統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政治机构走上了向社会主义进化的道路，因此革命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适用的，他并且強調指出，这里不能忽視两点：“首先，目前这种过程主要是在高度发达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因为这些国家老早便出現在資本主义的历史舞台上，获得了特殊的經濟特权，有了經濟力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高度的生活水平，而这就会减弱它們內部的社会矛盾。在这样的条件下，民主傳統便真正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会矛盾的調节者，以逐漸加强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落后的国家，几乎通常都沒有任何悠久的民主傳統，而內部又存在着尖銳的矛盾，这种过程的开展要困难得多，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簡直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現代国际資本的巨大集中以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間的鴻沟日益加深的情況下，任何一个落后

国家都不能指望沿着正統的資本主义发展道路求得发展。因此，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就不仅面临着解放劳动的方法問題，而且首先面临着使本国从落后状态以及从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依賴地位解放出来(这才是不发达国家达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条件)的道路和方法問題。

除此以外，不管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如何，事实仍然是，任何內部矛盾的极端尖銳化（这种尖銳化是在某种不能对工人运动实行妥协和让步的制度客观上在經濟和政治方面毫无出路的特殊情况下发生的），其本身都会使这些矛盾的民主的解决成为不可能。这种尖銳化必然会导向革命的冲突。旧南斯拉夫的情况也正是这样的。如果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工人运动的革命道路不能成为一种社会主义发展的出发点，就是說，如果固守正統的資產階級民主形式，认为这是向社会主义发展唯一可能的政治范围，那就等于制造一种教条，其危害性并不次于这样一个相反的教条，例如把十月革命的道路强加于一切国家。終究有一些国家已經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足够清楚地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今天来否认这个事实，正像当社会主义通过正統的民主形式而逐渐演变已成为一系列国家的历史事实的时候，还繼續来爭論这种演变是否可能一样，也是錯誤的和可笑的。依我看来，这两种教条今天都是实现当代国际社会主义的一种絕對要求的巨大障碍，而这种要求就是：找到一条有机的內部团結的道路；不是像共产党情报局那种类型的要思想划一和行动划一的团結，而是要一种建設性的民主合作，以便在通往社会主义的总的运动路綫的基础上把个别的国际社会主义潮流联系起来。”^①

这一历史发展因素的另一个重大問題，是社会主义的实质和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問題，这个問題在我們这里已經提出来了。在

^① 卡德尔：《社会主义民主在南斯拉夫的實踐（1954年10月8日在奧斯陆所作的报告）》。參閱《南斯拉夫資料汇编》，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234—236頁。

这一大堆問題中，必需解决国家、政党、社会主义民主和符合新的社会关系的新道德等問題。在这些問題上取得的成果肯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下面这种做法对于斯大林主义來說已是习以为常的：以各种数字——从生产出多少吨鋼、牛奶和谷物直到工厂的数目和军队的实力——来衡量社会主义的发展。正如我們所指出的，他們简单地认为，社会主义已經建成，只需要从經濟上加强它，而忘記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历史范疇，因此是一个过程。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个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問題，在这种关系中，人逐渐地不再是客体、数目、听任摆布的对象，而成为历史的真正的創造者。社会主义的任务是，逐渐消除对人的統治，而实现对物的統治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統治。然而人們只是有权选举那些管理他們或“以他們的名义”进行管理的人，是实现不了这一点的。而只有他們自己来管理生活的一切主要領域，即經濟、政治、教育等領域，才能实现这一点。

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关系，人們才能認識到，才能充分意識到，他們是历史的真正的創造者，从而摆脱一切历史幻想，摆脱思想、宗教和政治方面的各种盲目崇拜。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唯有自由的人才能具有的那种人的尊严，因为他們自己管理自己，他的命运不取决于这种或那种国家暴力，不取决于官僚主义机构或者等級制度的輕率决定，而取决于他在其中作为平等的一員的自己的集体。

这种認識实际上把社会主义的关键性問題提了出来。关于这个問題，我們已有机会从馬克思和恩格斯对公社和国家消亡問題的解决，从列宁致力于組織工人管理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以及从当时的其他一些偉大的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中得到一些了解。

但是，必須考虑到，在这以后的整整三十年中，整个馬克思主义受到斯大林所宣揚的观点的影响，这些观点頑固地反复出現在

一切刊物、論文、書籍和指示之中，甚至无产階級的国际实践也以它們为指南。正因为如此，便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这些思想和認識不仅得到了特別的闡述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且获得了真正新穎的內容和意外的收获，因为这些东西是在新的历史經驗的基础上創造性地被发掘出来的，而这种經驗是同所有那些在不久以前为止还被认为是符合傳統的經驗不相符的。而傳統的經驗同发掘出来的經驗恰恰相反。

这样决不是貶低那些在得出历史經驗本身之前就提出了这些思想的人的天才，但是也不貶低下面这些人的創造性活动，他們同整整一个被奉为“神圣的”时期相反，創造了自己的历史，而使他們的理論观点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他們的历史性的創造和人类的自我牺牲精神。

由于种种原因，1950年对現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論來說，将成为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那一年在上述理論認識的基础上开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过程——把政权和管理交給劳动群众自己的过程，这也意味着国家在社会生活的个别部門的消亡。那一年铁托便能够指出，“国民議會今天要討論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最重要的一个法律的草案——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家經濟企业和高級經濟联合組織的根本法草案。这一法律的通过，将是国民議会在通过关于生产資料国有化法律以后的一个意义最重大的历史性行动。把生产資料收归国有，这并没有实现工人运动的‘工厂归工人’的行动口号，因为‘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的口号，不是什么抽象的宣傳口号，而是一个含有深刻內容的口号。它包含着关于社会所有制、关于劳动人民的权利和义务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部綱領；因此，如果我們真正想建設社会主义的話，就可以而且必須把这一口号付諸实现。”^①

^① 《論工人管理經濟企业》。《铁托演說和論文集》第5卷，第205頁；中譯本參閱《南斯拉夫資料汇编》，第179頁。

資本主义的剝削关系（不論私人資本主义，还是国家資本主义），只能由建立在生产資料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的那种关系来代替。生产資料的社会所有制和生产資料的国家所有制并不是一回事，因为，社会所有制是以社会管理这些資料作为前提，也就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解放和独立作为前提的。

在无产階級用武力夺取政权，而資本主义关系在此以前未发展到高級阶段的情况下，由工人階級領導的国家集中行使权力和实行管理，是国家繼續生存的必要条件。（在社会主义将通过高度发达的国家資本主义形式而产生的那些国家中，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在上面提到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在理論上給它指出的那种任务：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整頓国内的关系，保障自己不受其他可能发生的情况的侵犯和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在完成巩固革命的首要和基本任务以后，还会面临一种在其本身中存在的内部危險——官僚主义的危險^①。

^① 关于官僚主义問題，在我們的理論書籍中已經談得很多了。铁托在談工人自治的同一篇报告中曾經指出：“把工厂、矿場等等交給劳动集体来領導，就使一种名叫官僚主义的傳染病不能在我国的经济中栖身。这种傳染病是令人难以置信地、輕易地、迅速地从資產階級社会带来了，并且它在过渡时期是具有危險性的，因为它像水螅虫一样以它成千的触鬚妨碍和阻撓着正确和迅速的发展过程。官僚主义之所以居于社会主义最大的敌人之列，就在于它毫不被人觉察地就渗入了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而人們在开始时連自己都意識不到。认为官僚主义在我們这里并没有开始生根的想法是錯誤的。在我們这里，它也已开始钻进各个机关、国家机构和經濟部門，可是我們意識到了这一点，并且已經采取了一整套措施，使它不能得逞。在这个問題上，仅仅采取运动式的措施是不够的，而是要展开不断的斗争和教育人民。”（《論工人管理經濟企业》。《铁托演說和論文集》第5卷，第229頁；中譯本參閱《南斯拉夫資料汇编》，第201頁）

而卡德尔在人民革命十周年时曾經写道：“举例来說，国家的消亡过程是社会主义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过程是不会自发地完成的。听任这一过程自发地发展，这就等于加强同这一过程相对立的反动因素，就等于首先加强想使整个社会屈从于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以及最后屈从于官僚主义帮会的官僚主义傾向。虽然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已經很重視官僚主义的危險，可是，所有这些事实告訴我們，在从資本主义向

凡是在无产階級国家还没有开始消亡的过程，首先是在經濟职能方面还没有开始消亡过程的情况下，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必然会得到加强，并独立而成一个凌駕于整个社会之上的特殊机构。劳动群众的經濟解放以及整个社会方面的解放被推迟了，这必然使那些在經濟上最近似国家資本主义的关系停滞不前。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过去就已明确看到的那样，为了建立起社会主义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建立起标志着社会发展的另一个历史阶段的那些关系，工人階級的国家必須开始一个实际上意味着它本身的消亡的过程。这当然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問題。

这一过程具体就是指非集中化和社会主义生活民主化，也就是說，首先是指实行社会对經濟生活的管理，把工厂交給工人階級，以及在其他社会主义生活領域內实行社会管理。铁托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对这一問題作了如下的說明：“首先，我想談一談經濟部門和人民政权的非集中化和民主化問題。我想立即強調指出，并不是任何非集中化都同时是管理的民主化。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在社会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也就是說，只有在生产資料充分掌握在生产者手中，只有在工人通过自己选出的管理机构来自己管理工厂和企业的时候，这两种管理形式才能够、而且也必須平行展开。因此，只有当国家不再通过国家机构对經濟进行管理的时候，真正的民主管理才能开始。自然，即使在革命发展的初期阶段，也就是說，当生产資料还掌握在国家（但是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手中的时候，也存在民主因素，可是，这些因素只是在高級阶段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且并不真正反映社会主义民主。因此，在我国革命发展的初期阶段，当国家还没有把工厂和企

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中，官僚主义的危險甚至更大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所能預料的程度。我們从目前时期得到的經驗告訴我們：官僚主义是階級制度殘余的最后和最頑固的堡垒，因而也是社会主义的最危險的敌人。”（《人民革命十周年》。《共产主义者》杂志，1951年第2—3期，第97頁）

业交给工人管理，国家还是通过自己的机构，也就是说只是通过经理——自己的专职工作人员——来管理这些工厂和企业时，在这一时期是谈不上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的。在这最初的发展阶段，劳动人民的国家必须根据物质可能性立即尽量妥善地解决劳动者的社会问题。人民的国家自己逐步地增加了工人的工资，制订了宪法、各种法律和规章，根据这些法律和规章，职工的退休权、工资照发的年度休假权等等都有了保障。国家自己出钱，承担了职工的保险，为劳动者建立了各种文化机关和其他机构，可是，只有把工厂和企业交给工人掌握，国家的首要的和最重大的行动才算完成。这个行动本身就包含着国家消亡，亦即国家经济职能消亡的因素，而同时也包括在生产中，从而也在社会中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①

在这些话里，实际上包含着新时代的民主化的实质，人的进一步解放的实质。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受到自己的社会范围和资产阶级范围的限制（在这种范围内，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自由达到了高度的发展水平），他们只是从政治自由和多党制方面来看待民主和自由问题，而看不到，人的自由问题是一个深刻得多的问题，归属这个或那个政党的政治自由使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人民不可能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自己掌握自己的活动和发展，因为他们不掌握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生产力^②。

^① 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为争取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摘自在南共六大的报告。《铁托演说和论文集》第7卷，第224—225页。关于这些问题还可以参看铁托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国际局势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内部发展中的任务》的报告（1958年）和在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的作用和任务》的报告（1960年）。

^② 米·德热拉斯在自己对共产主义的批评（《新阶级》，1957年巴黎法文版）中也表明了他同样不理解这个问题。在该书中他重复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陈旧的批评，重复了把官僚视为阶级的观点，这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得不够。可是，他对这一问

正因为如此，他們才陷于自己的发展和生存都毫无出路的处境，为資本家集团或国家本身的眼前利益所損害。这种不明前途的情况，这种自己不掌握自己的生存和进步的情况，在今天也仍然是各种心理偏見和形形色色的宗教組織賴以进行活动的心理状态的基础，这些組織也只有对人类生存遭到这种損害的基础上才能順利展开活动。

人的解放正是在我們这一发展时期經歷着迄今为止的最剧烈的形式，因此，人的解放不能仅仅和首先指赋予政治自由，而是首先要建立起这样的民主机构，它将确保劳动人民通过自己本身的生活和社会过程，簡言之，即通过实现經濟自由，有最大的可能来实行自治，因为唯有經濟自由才能成为人在其他一切方面获得彻底解放的重要先决条件。

卡德尔在1954年在奥斯陆所作的报告中曾經写道：“依我們看来，在生产資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上发展着的民主的組織机构，也应该适应这个客观过程。我們认为，只有这样的直接民主机构才能适应这些任务，这种直接民主机构能保证劳动人民有最大的可能通过相应的主要管理机关，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領域实行民主自治。我們的工人委员会、合作社、公社、彼此間有垂直联系的自治的經濟組織以及教育、文化、科学、卫生和其他社会服务机关的独立的社会管理机构，都具有这种职能。这些形式和这种社会活动的日益巩固，同时将是逐漸建立新的民主机构的形式，而这

題的缺乏了解主要表现在，他試圖把共产主义同斯大林主义混为一談，并把斯大林主义的变形視为一种必然性。像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样，他认为唯一的出路是采用資产階級民主的政治制度，不理解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不是去重复已經走过了的历史阶段，而是发展新的、更深刻的、內容更充实的民主形式，发展唯一能够克服人的異化、不自由和隶属关系的那些形式。而这一点，通过已經完成了自己历史任务的資产階級政治民主的形式是再也不可能办到的，唯有通过实现經濟民主、直接民主（工人委员会和一般的社会管理）才能办到，这种民主最終将压倒一切政治。德热拉斯由于不理解这些根本性的区别，必然被抛在一边，必然反对当代历史的进步发展。

种机构将在新的社会經濟的基础上有机地成长，而且归根到底将成为国家这一权力和暴力工具的消亡形式。換句話說，在生产資料社会化的条件下，应该建立这样一种民主的社会管理的組織机构，它将使劳动群众有可能直接地和經常地、而不是仅仅通过自己某一个政党的上层来在这一机构中发表意見。公民們直接参加社会自治机关，就能通过它們直接决定由誰在上級机关中作他們的代表。任何其他道路都会导致官僚主义和阻碍每个人的社会主义創造性的主动精神。当然，在这样的条件下，自觉的社会主义战士的主要斗争場所不是狭义的国家的管理，而是劳动群众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的社会自治机关。国家管理机关应该是一个服从于这种社会自治机关的专门机构，而自觉的社会主义战士必須在群众中进行斗争，使他們在相应的民主机关中作出的决定是社会主义的决定，也就是說，使之符合于保卫社会主义免受反社会主义傾向的影响，以及符合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因素的需要。”^①

为了实现这一切，必需着手建立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經濟机构，这些机构将尽量接近生产者本身，并将接管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中的若干重要职能，从而同工人委员会和其他社会管理机关一起，构成新的社会集体。这些单位不是别的，正是公社，而馬克思就曾把公社看作完成国家的消亡并最終代替国家本身的一种形式。卡德尔在同一篇报告中說道：“公社的力量和重大的社会作用首先在于它在經濟发展方面具有行动的独立性，其次在于它和工人委员会及其他的生产者自治的民主机构有着有机的联系。因此，公社不仅是一个政治机构，而首先是一个社会經濟机构；它的第一个职能将逐步削弱，而第二个职能則会日益增强。归公社支配的剩余劳动的基本分配，事实上也是通过公社进行的。这样，公社就会直

^① 卡德尔：《社会主义民主在南斯拉夫的实践》。参閱《南斯拉夫資料汇编》，第247—248頁。

接关心其範圍之内的生产力的經常发展。”^①

完全可以理解，这样按照馬克思的精神来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建立，即使在整個經濟制度的概念已經改变的情况下，也必然有其基础。这里拋棄了斯大林关于国家拥有絕對权力、国家完全管理和組織經濟、計劃工作以及占有和分配剩余劳动等等的国家主义概念（根据这种概念，劳动人民仍然只是被管理的对象），在对国家和劳动集体的經濟职能、計劃工作的性质以及經濟規律的作用等問題的理解方面，同样也发生了剧烈的轉变。

鮑·基德里奇(1912—1953)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就对这一問題作了十分正确的闡述。他說：“因此，从为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反对官僚主义，即反对官僚主义的因素和使社会主义革命退化的潜在可能性而斗争的角度来看，正在我国建立的新的經濟制度的实质是什么呢？……

这样来看問題，我认为我們可以而且必須要求我們正在建立的新經濟制度具有下列几点：

1. **由直接生产者自己管理我們的工厂和企业。**这一要求是建立真正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达不到这一要求，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就得不到最終保证，因为，生产資料就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与直接生产者分离……

2. 新的經濟制度应当建立在客观經濟規律的基础上，并尽可能避免用行政的办法制止这些規律发生作用。

从行政上来同客观存在的經濟規律进行‘斗争’，最終是不会有什麼結果的，而且是沒有道理的。不管我們願意还是不願意，客观經濟規律总是存在的，即是客观存在着的，因此，无視客观經濟規律的存在和作用的行政的和官僚主义的做法，总是会受到毫不留情的报复，而且通常是以十分厉害的形式……

^① 參閱《南斯拉夫資料汇编》，第260頁。

3. 社会对客观经济规律的掌握，必须严格地仅限于那些一般的范围（在我们的现代计划工作术语中我们称之为社会计划的基本比例），它们保证社会生产中不致发生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现象，同时给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出总的方向。应该在这些基本比例的范围內，最大限度地发挥直接生产者和公社的主动性……

4. **真正由社会占有剩余劳动和对剩余劳动进行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我要立即指出，我现在下的这一定义，形式上确实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可以作各种各样的、截然相反的解释。在斯大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说法以前，苏联的官僚们也曾形式上同意这一定义并加以运用。可是，苏联的实践又如何呢？按照苏联的做法，全部剩余劳动（集体农庄的一部分剩余劳动除外）都为国家所占有。具体地说：全部剩余劳动不属于直接生产者，而由苏联的官僚等级来决定它的进一步使用并用它来满足自己奢侈的要求。在这方面苏联官僚等级的社会经济作用完全与资本家阶级的作用相似……

我不想提出具体的技术性的和专门经济性的办法。对这个问题的具体探讨还需要进行一定的技术性的和专门经济性的深入研究。然而，这里要谈的问题是我们在进一步发展对剩余劳动的社会主义民主管理方面应遵循的一般的方针。

我想这些一般的方针主要有如下几点：

1. 应当完全抛掉下面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当剩余劳动完全与直接生产者和公社分离时，这种占有才是对剩余劳动的社会主义占有，即社会占有。这种看法也正是一种官僚主义制度的理论‘出发点’。如果能够把生产资料的管理托付给直接生产者进行，那末，也可以把一部分扩大再生产交给他们直接管理，不过是以这种对剩余劳动的直接管理不致于妨碍其社会流动为限。而在我们这里，特别是在完成关键性的基本建设以后，这种

限度将大大扩大。比方說，为什么我們的企业不能用它們自己生产的剩余劳动来大力改建和扩建呢？企业直接管理剩余劳动决不会等于积累为它們所有，正如它們管理工厂并不等于工厂为它們所有一样。为什么劳动集体不能在直接管理自己生产的大部分剩余劳动的基础上来改善自己的社会福利——建立住宅、診療所等等呢？……

2. 剩余劳动的这种必要的社会流动不应只通过社会計劃規定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流动的一部分也可以通过客观經濟規律的单方面的作用来进行……

3. 至今的所謂关键性投資制度实际上仍旧是一种預算制度，尽管我們迄今为止曾設法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改組这种制度。这种制度之所以是一种預算制度，正是因为，投資的赢利和合理因素并没有在客观經濟規律的作用的基础上得到足够的考虑，在投資問題上仅仅从行政上加以确定是不够的。在决定关键性投資方面，赢利和合理的因素目前整个來說可以通过人民銀行規定的信貸制度得到充分体现。当然，信貸制度要規定每年偿还的数目和利息。因此，苏联的‘理論家們’可以叫嚷什么信貸、每年偿还的金額和利息是一种回到資本主义方法的做法。誠然，这三者在形式上的确是符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換的。然而，鉴于我們的生产力是低的，我們还长期不能放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換，但是，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換不再是在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而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固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換仍然是新事物中旧东西的殘余，但是已成为社会主义分配的手段和方法。因此，信貸、年金和利息只在形式上是一种老方法，而就內容而言却已不再是老方法了。”^①

^① 鮑·基德里奇：《在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文集》，1952年貝尔格萊德塞文版，第183—192頁。十分明显，这些想法实际上指的是克服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異化，而为了实现这些想法，應該实现首先表現为生产者自己参

上述所有这些看法都对斯大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过程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剧烈的和深刻的批判,并且从理论和实践上指出了社会主义本該已经开始实现的那些共产主义因素,指出了在同落后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和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傳統和倾向进行斗争时唯一能使一个社会主义运动得到充分的表現和取得完全胜利的那些因素。在我們的理论和实践中彻底根除了一种偏見,这种偏見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官僚制度由于进行了绝对控制、組織和分配剩余劳动,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并能代替劳动人民的創造性。这样就不仅为我們,而且总的来說也为馬克思主义理論从根本上否定了和克服了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并表明,如果不經常致力于实现劳动人民尽量广泛的社会管理,就决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目的——把人从各种形式的依賴关系和非人道化現象中解放出来。

这一切認識必然也反映在我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的发展的看法上。强力推行农村集体化的短暂时期(1949年前后)很快就表明,無論从經濟观点还是从政治观点来看,这都不是办法。因此馬上放棄了强行建立合作社的主張,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重大問題和未来的前途擱下来了,但是,当时存在着技术設備基本上是落后的小农和中农以及一定数量的大型国营农場、城市經濟农場和

加分配社会收入的具体自治。从这种意义上來說,近年来取得了十分重大的进展,因为經濟組織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达66—72%(1958年至1960年)。这方面已經提出了使得工人委员会的分配职能进一步接近更小的基层生产单位的问题,以便通过这一过程使每一个人都参与决議的制訂。我們只有在那时才能談得到雇佣关系的最終廢除。凡是由脱离經濟过程的某一級(国家等等)机关进行这种分配的地方,雇佣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还存在着。

現代世界的自由这一重要的問題也在于这些过程,而不在政治特点和政治动向,多党制或者一党制等等,因为这些东西不过是表明从资产阶级的前景来观察問題,同时还表明人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本质上的異化还没有取消。

农民合作社，针对这种局面，也必须找到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适当途径。

弗·巴卡里奇(生于1912年)特别从理论上研究了这些问题，他同卡德尔一起对解决这个问题作了重要贡献。他在自己所著的《过渡阶段的地租问题》一书(1950年)中就指出了，某些理论家认为土地国有化就意味着必须完全取消地租，由于国家的干涉(国家企图取消地租)，地租在苏联没有以传统的形式出现，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他的这种透彻的观点对于集体化运动前后出现的级差地租尤为适合。巴卡里奇在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般原则来解决我国发展的特殊性问题方面，曾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三次代表大会上(1954年)特别阐述了我国农村发展的可能性和途径，实质上他提出了以下两条出路：“第一条是俄国的道路。他们在1928年前后曾面临类似的(不完全相同的)问题，实际上他们在‘农村集体化’的幌子下着手剥夺所有的粮食生产者，从而为自己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一生产领域打下了基础。毫无疑问，我们完全不能走这样的道路。这条道路将会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发展趋势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相违背。

可见，留给我们的只有第二条道路。我认为，这条道路具有两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它首先要求我们的公社、劳动人民和劳动集体更直接地参与这些产品的生产，并密切注意消费的情况……

这条道路的第二个方面是对农业生产者的关系问题。我们看到，我们目前常用的刺激农业生产者的手段是不够的……这就是说，毫无疑问，要在农村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小商品生产者市场，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美利坚的’道路是痛苦比较少，比较迅速的，我们的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这种‘美利坚的’道路，即提高小生产者的商品性和稍为增加他们的收入，就使农村市场活跃得多……

自然，自发势力这样完全‘不受约束的’发展会在农村导致资

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倾向的复活。因此这种完全‘自由的’和自发性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大农业资本家在生产中的作用在我们这里应该为社会主义成分所代替。从土地面积和其他条件来看，我国农民不可能成为大农业资本家。他们明显的前途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依靠自己的劳动力、自己家庭的劳动力和现代技术工具的尽量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者。应该向他们指明这种前途，并帮助他们加以实现。在这样的前途下，不仅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且还会有助于我们动员农村自身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力和为社会主义工业扩大市场。”^①

可见，由此应当得出结论：鉴于我国农业的发展情况，我们既放弃了俄国的强制性的集体化道路（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这条道路在逻辑上必然属于斯大林主义的，亦即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的范围之内），同时也抛弃了助长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的发展和仅仅依靠个体农民的道路。“在农业生产的方针问题上，大致说来有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的问题在于：是应该大大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农场和社会主义合作社，还是让个体农民保持现状？大家知道，我们在现阶段的方针是大力支持和发展农村的社会主义农场和社会主义合作社，而不是支持完全个体的农民，这正是因为，我们努力解决的是农业问题，而不是农村、农民和农民生活问题。我们不应该错误地理解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不应该把这理解为不关心农民。情况远非如此！我们全力支持小农，只是我们认为，一个国家不能这样来解决农业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幻想，不能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农场和社会主义合作社中，我们竭力加强的，正是个体农民不能为我们解决的东西，因此我们这样做决不是给他们制造障碍，而是帮助他们

^① 巴卡里奇：《关于农村工作和农业的迫切问题（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农业和农村问题》，1960年贝尔格莱德塞文版，第382—385页。

找到自己的道路。”^①

卡德尔在他的論农村社会主义政策問題的著作中，对这些問題进行了詳細的分析并提出了丰富的論证，这部著作已比較肯定地論述了这一发展的方向。当然，我們从来也沒有放棄基本目标：对我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或者換句話說，在农村实现社会主义。但是，这里的主要問題是这一过程應該采取什么途徑。正如前面所述，卡德尔也曾強調指出，由于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原因，我們放棄了在簡單的劳动合作的基础上使土地普遍集体化的道路，而确定了首先在社会主义成分中，即在大型农場中扩大对現代化生产手段的社会投資，并采取联合土地以及同个体农民合作的相应方法。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們不贊成采取任何运动式的联合土地和使土地社会化的办法，而主張社会主义成分和农民在符合双方物质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符合現代化生产資料的現有規模的具体联系。我們关于綜合地建設具有最便利的条件的合作社的观点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这是使土地逐渐实行社会主义的現代化大規模生产并定能立即提供高产和高度劳动生产率的途徑。在这条道路上取得的每一項新成就都将成为新的、使大家信服的示范，并将把愈来愈多的土地吸引到促进农业的过程中来，这样，也会使农村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每前进一步就更容易一些，而从經濟的观点来看，則更便宜，更能赢利。”^②

① 巴卡里奇：《社会主义經濟和社会主义合作制在农业現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关于农业和农村問題》，第 527—528 頁。巴卡里奇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題为《关于农村的内部发展和农业政策》的报告（1959 年）中，也探討了这些問題的某些重要方面。

② 卡德尔：《农村社会主义政策問題》，1959 年貝尔格莱德塞文版，第 22 頁。

关于农业生产中的社会主义合作化問題，卡德尔指出：“合作化是社会主义經濟組織（国营农場、农民劳动合作社、綜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及其經濟农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包括工商业組織）与个体农戶进行生产合作的一切形式的名称。它在社会組織的和为这种生产过程而准备的整块土地上准备、建立、开始或发展社会生产过程的因

卡德尔根据这些因素和我们至今的经验得出如下结论：在我国今天的农村，资本主义类型的分化倾向已经十分微弱，十分有限，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向资本主义倾向作任何让步。其次，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下的中小农户占优势，我国农村尽管社会关系已发生改变，但是它本身并没有比战前更胜任实行技术改造和发展农业的任务。“由此可以得出第三个结论，即在这个过程中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不断从生产能力和在市場的作用方面来加强社会主义农业成分，从而使它越来越能同农民进行合作。

因此下面这项任务应当具有最重大的意义：我们要最大限度地装备我国的一切国营农场、农民劳动合作社、合作社经济农场，以及每一个比较发达的、能够在较大的耕地面积上同农民进行认真的生产合作的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并使它们能够进行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所有这些因素以大量的、生产成本比农民的成本低的商品在市場上出现，肯定会激起和加速个体农户转向现代化农业生产，从而转向同合作社进行合作。近几年来，已相当强烈地感觉到这种趋势。”^③

可见，社会主义生产成分与合作化是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迅速提高整个农业生产的基本因素。正如卡德尔所强调指出的，土地社会化的过程也将在这一发展的范围内展开。这一过程有两种实现的方式：“第一，扩大社会主义成分的面积，这将成为伴随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合作化发展而经常发生的现象；第二，为了建立现代化的生产过程而逐步地把私有土地联合起来，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私有土地将在工艺和经济的意义上社会化，而土地所有权将日益直接地表现为货币地租。社会将对这种地租进行愈益有力的监督，根据自己的经济需要指导其发展，但

素，它在这种过程中，在社会投资和社会基本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促使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成为扩大再生产的承担者。”（同上书，第151页）

^③ 同上书，第139—140页。

是，要符合一定的政治关系，要符合保持和加强城乡劳动人民的政治团结的需要。”^①

这样我国就按照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解决并且确实解决了过渡时期中，尤其是在那些农民在人口中占很高的百分比、农业生产比較落后的国家中的一个最困难的問題。至今沒有一条道路可以机械地搬用于我們的情况，而是應該像在社会生活的其他一切領域內一样，以特殊的方式方法来解解决特殊的情况。从农业产量的提高来看，情况很快就表明，这条新开拓的道路在短时期內已取得了重大的成績：

其他理論問題

由于对我国自身的社会主义内部发展、对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官僚主义等等进行了分析，研究理論的兴趣也就扩大到对全世界当前的发展和各种关系的探討，同时很快地发现了斯大林主义在这些問題上也落后于形势的具体发展几十年。再不能仅仅以四十年前的理論观点来看待資本主义了，而應該解釋为什么正是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就不存在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情况表明，資本主义在这几十年間未能解决某些最重大的和最关键的内部問題，首先是危机、战争和某些已成为現代生活不可缺少的經濟部門的扩大再生产問題。但是情况也表明，資本主义找到了某些解决办法，这些解决办法最終仍然意味着对私人資本的否定，尽管整个过程仍然是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範圍內发展。在發揮这种

^① 卡德尔：《农村社会主义政策問題》，第168頁。除了這些問題以外，南斯拉夫的馬克思主义者还解决了并且正在解决着一系列其他的問題：經濟理論問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經濟規律問題，計劃問題，国家資本主义問題等等。在他們中間，除了上面已經提到的人之外，还可以举出：亚·巴伊特、杜·查利奇、斯·达普切維奇—庫查尔、阿·德腊吉切維奇、米·科腊奇、里·兰格、柳·馬尔科維奇、左·皮安尼奇、雅·西罗特科維奇、亚·斯坦諾夫尼克、亚·斯托楊諾維奇和其他許多人。

認識方面，米·波波維奇的分析具有特別重大的意义，他在一篇文章中得出結論說：“在大危机中，資本主义再也不能自己——資本本身作为一种独立自主的社会力量——进行扩大再生产了（这一点表現得很明显）。就連在危机过程中吞嚥了許多小資本的最大的壟断組織在这方面也无能为力。

在經濟和社会发展到这种程度，社会化的生产达到这种程度的情况下，資本主义和資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規律，首先是作为資本主义的一个基本規律的平均利潤規律，再也不能推动社会，不能进行整个社会資本的再生产了。然而，社会不能垮台。纵然作出种种牺牲，它也必須找到解决問題的办法。而且它也确实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这就是通过前面列举过的措施，在全国範圍內使經濟生活进一步社会化。客观发展必然要求全国性的社会化，以便使社会能够繼續进行生产和生存下去，并且这一点必須在适当的程度上做到。因此，国家資本主义首先是按照經濟生活全国性的社会化（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研究一个民族及其民族經濟生活的話，則是經濟生活的无所不包的社会化）的方向发展起来，而且在日益发展和加强。而如果不取消私人資本，不取消資本的私人所有制，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①

南斯拉夫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問題所作的理論上的探討特別反映在所有这些思想动态的綜合性文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綱領中。綱領认为：資產階級国家是在資本主义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即私人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时，才承担起經濟职能的。国家机器这样也就获得了独立的經濟基础，从而大大加强了它的社会作用。資產階級国家和国家机器由于上述原因而竭力置身于社会之上，不仅力图抵制工人階級的独

^① 米倫蒂耶·波波維奇：《国家資本主义在社会发展中意味着什么？》，《我們的实况》杂志，1953年第2期，第6—7頁。也可参看他写的《关于現代社会主义思想的若干問題的札記》一文，《社会主义》杂志，1959年第3、4期。

立的社会作用,并且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的情况下,限制私人资本的作用^①。

由于这一切是在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些国家里统治势力同不发达国家相比已长期享有优越地位)发展的,这些国家由于长期积累了超额利润,因此大大发展了生产力,并在世界上享有优惠地位。“根据以上各种原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在经济和政治上有能力在较大的程度上,满足工人阶级某些阶层的物质要求,甚至民主要求,同时也就影响着他们的政治觉悟。这种趋势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对本国资产阶级和国家资本主义官僚分子采取机会主义态度的基础,而且也是他们有时支持国家上层分子的帝国主义政策——霸权政策的基础。因此,发达国家的高度物质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落后国家的贫困和附属地位的直接结果;而世界大部分地区上的压迫、强暴和缺乏民主权利又成为少数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先决条件和基础。”^②

綱領在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的同时,强调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没有纯粹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仍然存在强烈的私人资本和垄断资本的因素。綱領同时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某种特殊的独立结构,而是一种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由于垄断资本主义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无能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① 这种发展的一个后果就是国家官僚政治大为发展,这种官僚政治视阶级力量对比的情况而可以起到不同的作用。“国家作用的加强也产生了官僚分子的经济政治力量,这种力量在加强并有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政治因素的倾向。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为其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影响和地位的斗争的均势愈大,官僚分子的职能也就在努力加强和保留垄断资本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特权的同时更为独立。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思想就是建立在这种倾向的基础上,它们力图把国家描绘为社会经济关系中超阶级的民族调解者。资产阶级的力量愈大,官僚分子就愈为明目张胆地为资产阶级服务,从而推行其反动的政策。”(《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南斯拉夫資料續編》,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年版,第392—393頁)

^② 同上书,第395頁。

而产生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资本主义关系的特殊形式可以是资本主义保全自己的最后努力，也可以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这首先取决于工人阶级的力量及其自觉的政治行动，也即取决于工人阶级为政权斗争的结果。”^①

东方集团的批评家们正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国家主义观念的辩护士，他们尤其大肆攻击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消亡的观点（我们已经看到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因素之一），他们还攻击我们，说我们把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神秘化，赋予它超阶级的性质。

在第一个问题上他们表明，他们在理论上根本弄不清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是指什么，它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有何不同，因而赞成那种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必然产生人的异化，而且也产生像个人迷信之类的畸形现象；而在第二个问题上，他们也表现出没有现实感和不正确。纲领中没有一个地方断定那种说是要调和阶级矛盾的超阶级性。相反地，纲领现实地指出：“工人阶级不能幻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每个经济职能的国家化也就是经济职能的社会主义社会化。只要资产阶级还是国家政权的决定性力量，它就力图用经济职能的国家化达到其保持和加强资本主义特权和政治地位的目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自动过渡到社会主义和真正的生产资料社会化，也就是说，不可能有那种将生产资料服务于全体和每一个劳动人民的社会化。只有工人阶级自觉的政治行动、工人阶级争取政权中的领导作用的斗争，以及它利用这种领导作用来真正改变社会关系的准备和能力，才能实现这一过渡。”^②

至于谈到社会主义本身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实质的理解，谈到社会主义制度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质，以及国家、政党和劳动人

① 参阅《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南斯拉夫资料续编》，第397页。

② 同上。

民之間的关系，我們还想強調一下国家和政党的关系問題以及一般对待科学艺术的創作和过程的态度問題。在这些問題上，南斯拉夫馬克思主义者也同斯大林主义的观点断然决裂，这些观点在第三国际第二个时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深蒂固，而且到今天仍然在許多运动和国家中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

社会主义关系的开始产生和实际实现，是对官僚主义国家主义关系的否定，它使人認識到，在人类发展的現阶段，無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或者社会主义制度下都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只要社会存在等級制度，只要还存在权力、存在一部分人从属于另一部分人的問題，那末，官僚主义作为一种傾向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們已提出的种种看法的基础上，对这个問題具有明确的認識，就不致于使官僚主义发展为占統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同时可以进行具体斗争，防止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滋长。而只有在发展劳动人民的平等和使国家职能的統治消亡的基础上才能达到这一点。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机器有官僚主义化的危險这一問題的理論上的明确性，同样也应当运用到主要政党的問題上，因为党很容易成为国家机器的附屬物 and 一种强烈的官僚主义因素。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党逐漸失去典型的政党的特征，因为它“并不把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的特权从人民群众手中轉入政治领导机构手中”（卡德尔語），而它的任务正是在于培养劳动人民尽量順利地掌握那些以前为国家所壟断的职能。真正实现和加深社会主义民主，并不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由最有觉悟的分子組成的組織存在的必要，而是使这种組織在爭取新的社会主义內容，反对一切在社会主义发展初期存在和起作用的反社会主义傾向的斗争中，發揮特別重要的作用^①。

^① 铁托早在 1950 年就特別強調指出斯大林对这个問題的解决办法和对这个問題的更先进的社会主义解决办法之間的差別：“此外，斯大林是怎样提出党对国家的作用这一問題的呢？在他的著作中，他从未确定党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时期

俄国关于党政合一以及把党变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万能裁决者的论点被坚决抛弃了。问题不在于革命以后，最有觉悟的力量(党)将成为领导力量。问题在于如何进行领导。而在这方面我们的实际和理论的全部经验表明，应该把领导作用理解为党在教育 and 培养劳动人民通过各种社会组织 and 机构来管理自己的生活方面发挥作用，而不是理解为通过国家和党的领导来官僚主义地包办代替。

綱領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一重要的和本质的问题作了如下的明确的阐述：“因此，共产党人同人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统治的政党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先生同学生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必须日益成为平等者之间的关系。在实现他们集体利益中最称职和最有能力的人们因而得到最大信任。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领导力量开展自己的活动必须通过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进行发展社会主义的斗争，而首先是通过劳动群众本身的生活、劳动和社会活动。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努力为社会主义发展而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越来越少通过自己的权力，而更多地通过劳动人民即社会生产

的作用；他把党的作用归结为领导依然打上阶级社会烙印的国家机器。因此，无怪乎苏联的党越来越同国家的官僚机构长成一个整体，也就是成为它的同一体，它本身就是官僚主义机器的一个部分，而这样苏联的党就失去了和人民的联系，失去了与那些应当成为其职责的那些事物的联系。而党的职责是：成为全部政治、文化和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和最积极的参与者，群众监督和直接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组织者，用它自己的榜样来提高群众的创造性热情。把党及其作用归结为官僚机构，归结为进行强制、执行种种强制措施的国家机器的一个部分——这一切都违背了列宁关于党在第一阶段即过渡阶段的作用的学说，党在此时应当是领导者和教育者，而不是强制者。这种陈腐的观点也曾开始在我国有所表现，但是我们采取了必要措施，并且将对我国发生这类事情严加提防。”（《论工人管理经济企业》。中译本参看《南斯拉夫资料汇编》，第196页）

关于这类问题，可参看维·弗拉霍维奇写的文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概念和实质》（《社会主义》杂志1958年第1期）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和思想斗争的“尖锐化”》（《社会主义》杂志1958年第2期）。

資料生产者的直接权力，通过各种社会自治机关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同时，共产党人必須为調动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切因素而斗争，使这种活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并教育和培养广大生产者群众参加社会主义管理。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领导力量进行这样的活动可以保证自己不官僚主义化，同时可以不断地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觉悟，逐渐地减少和消除政权和‘被統治者’之間、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間、国家和公民之間的矛盾。”^①

只有探討了这一切过程，才能不仅对社会主义和現代世界的重大問題，不仅对具有不同社会經濟結構的國家的关系問題（在这方面南斯拉夫馬克思主义者首先采取了认为可能积极共处的坚定立場^②）作出答复，而且也才能对本世紀伴随着馬克思主义的修正

① 《南盟綱領》。參閱《南斯拉夫資料續編》，第 486 頁。

② 在現代世界中的关系这一十分重要的理論問題方面，南斯拉夫馬克思主义者关于积极共处和新战争可以避免的观点，对于共产党人的实际政策是特別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些否认集团政策制度的观点在綱領中作了十分精辟的闡述：“积极共处政策是生产力飞速发展的一种表現和一种需要，这种发展促使全世界事实上的联系，和各国經濟紧密的相互依賴，考虑到由于使用核武器給人类带来不可避免的灾难，这种发展使作为解决各国間一切問題和爭端的工具的战争毫无意义。这种政策体现出当代世界对广泛的經濟合作，全面的文化、科学等合作的客观需要。在选择战争或和平面前，积极共处政策是唯一现实的和平政策。积极共处政策符合于目前整个世界經濟的需要。如果没有在世界普遍經濟繁荣道路上进行平等的、日益广泛的、正常的自由的世界經濟合作，那末世界經濟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便是不可想像的。社会主义目的之一应该是世界經濟的統一。但是这种統一将比資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國際分工形式优越，这种統一将建立在世界各国經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在各民族經濟之間內容全新的、比資本主义制度更紧密的关系上。

这样理解的积极共处政策不仅通过国际合作和巩固和平服务于消除战争危險，而且同时也为社会主义的飞速发展創造了条件。积极共处政策在每个資本主义国家都必然会制止和削弱那些阻碍前进，同时并挑起新的世界大战的潜在危險的力量；这种政策还会使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取得更广泛的基础，削弱实行霸权政策的可能性，摧毁滋长官僚主义的基础并使社会主义国家得以更迅速和健全地发展。因此，这种政策不但使現有的社会形式无法长期保存下去，而且将促使其更迅速地改变。”（同上书，第 451—452 頁）

主义的重要理論問題給予答复。

情况表明，綱領本身也指出，两种社会因素至今阻碍了社会主义理論思想的发展。这首先就是官僚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現象，这种現象必然产生思想壟断，使馬克思主义变成一堆靜止的教条和抽象的真理；影响这一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影响，这种影响导致了特殊形式的修正主义，我們曾有机会在那种对馬克思主义作康德主义的解釋的傾向中看到这一点^①。

在党、科学和艺术的关系方面，南斯拉夫馬克思主义者也特別在自己的正式綱領中拋棄了对这种关系的一切官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观点，第一次在一个党的共产主义綱領中把它摆在正确的位置上。实质上，科学、哲学和艺术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限制它們的自由发展，因为这三者是十分复杂的領域，它們只有在自身的发展中（当然也要面临社会实践）才能得到真正的校正和获得真正的标准。无論是个人，还是政治因素——它們实际上都有自己的特殊的活动範圍——都不能成为这种发展的裁决者，任何死板的公式和規章都不能成为在这些領域进行必要的創作活动的刺激因素。

因此，可以以馬克思主义的充分責任心和完全符合馬克思主义的創始人和最偉大的代表人物的精神得出結論：“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认为，科学思想愈是大胆公正地追寻真理，它的发展就愈符合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真正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絕不想在这方面有任何的壟断，而是努力通过更深入地認識社会客观現實的办法繼續不断地发展和丰富馬克思主义。无論是整个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或是它的个别机构都不认为自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或其他某些社会科学方面的公断人。共产党人根据社会利益、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最先进部分的社会觉悟程度和

^① 参看《南盟綱領》关于这一問題的有关部分。《南斯拉夫資料續編》，第423—426頁。

社会的物质可能性，利用或运用科学的成果。科学自己就是判断者，而在社会科学方面，檢驗客观真理的决定性的标准只能看社会科学的成果是否符合实际，而这一点在社会和科学的实践中将得到最后的檢驗。”^①“根据社会的相互制約性和科学艺术在社会中的重大作用，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时既反对对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艺术在社会中的作用的观点作任何实用主义的歪曲，也反对把科学艺术变成日常政治利益的手段。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时也反对这样的‘理論’，即以抽象的自由观念为名在实际上取消科学艺术創作的真正自由，使它实际上从屬於反动的政治傾向。我国彻底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要求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思想作用不要成为对科学艺术的各种流派、学派和風格进行武断裁判的作用。……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根本目的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在思想意識上应反对一切对人不够信任的現象，反对貶低人的創造力，貶低人能改变世界，使人生活得更合理、更有內容，对待一切更有人性的才能。它也应该反对以科学艺术自由为幌子而实际上要确立反动的和反社会主义的观点，或是破坏社会主义社会政治道德基础的企图。”^②

这不仅是由于認識到科学、哲学和艺术有其发展的固有特性，同时也由于意識到整个來說馬克思主义思想比其他有关社会和整个生活的资产階級观点更优越。这还由于，对思想、科学和艺术发展的錯綜复杂的性质持一种正确的、辯证的观点，而思想、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总是粉碎了，并将粉碎任何想把某些絕对的框子、教条和規章等等强加于人的企图，这些东西就叫做神学原則、唯心主义的假設、斯大林規定的特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主观局限性或历史局限性的任何其他产物。

自然，社会主义和馬克思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这种独特的和創

① 《南盟綱領》。《南斯拉夫資料續編》，第 584 頁。

② 同上书，第 601—602 頁。

造性的发展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其他领域产生了积极影响。我們已經提到了同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学和政治观念的断然决裂。对于这个问题，我們只能再补充这样一点，这就是，作为哲学的一門学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占統治地位以及要把社会学的題目真正理解为社会学的題目，需要有一定的時間。在这方面不仅必需提出进一步解决一般社会学的问题，而且还需要提出一般社会学和特殊社会学的十分重要的关系问题，以及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来发展特殊的社会学方法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討論还在进行，而分歧往往并不是不明显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特别是在工作一方法論方面和特殊社会学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并获得了重大发展。鉴于这一事实，马克思主义者便面临着下列最迫切的任务：客观地估計整个这一发展和成就，并建立为了进行具体的社会学研究所必不可缺的研究方法論的机构。显然，不能用实用主义的經驗主义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点，实用主义的經驗主义是大部分资产阶级的叙事的、經驗主义的社会学的特点，这种社会学缺乏一般的理論論点，因此，也沒有必要的綜合^①。

在談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时，首先应強調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以及整个哲学正日益使得比先前能够設想的要广泛得多的阶层发生兴趣和密切注意。

我們可以认为，我国革命改造中产生的这种情况，是从思想上使广泛的人民阶层摆脱傳統的思想異化（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任何

^① 尽管观点上有分歧，在这方面我們可以提出的人物有：阿·菲亚門科、約·戈利查尔、腊·魯基奇、奧·曼迪奇、納·帕施奇、魯·苏佩克、柳·塔迪奇、鮑·季赫尔以及柳·日夫科維奇等人。在著名的作品中我們可以举出：腊·魯基奇的《国家和法概論》（1956年），奧·曼迪奇的《从顛骨崇拜到基督教》（1954年），鮑·季赫尔的《文学和社会》（1958年）以及柳·日夫科維奇的《关于社会的科学》（1958年）和《社会上层建筑》（1960年）。

其他非科学的異化)的重大轉折。在发展新的、自由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个性方面,除了社会經濟的因素以外,这种情况是这一过程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也是摆脱思想異化的必要前提之一。現代的人道主义思想在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和實踐中,尽管并不总是到处出現,可是無論如何在我国的社会发展和思想动态中表明了,它在历史上比資产階級的人道主义思想更为优越,它具有創造性,因此已成为伴随整个社会改造的現象,也日益成为糾正社会发展达到这种水平时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偏差的因素。

馬克思主义哲学家,特别是在同情报局发生冲突以后,面临着一系列需要解决的問題。社会主义发展的两种不同傾向的社会政治冲突,对我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在那以前,我們的哲学思想并没有教条主义地为一种政治实践进行辯护,也没有面临这种要求,尽管如此,受斯大林主义的某些观点的影响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整个社会的、而特别是馬克思主义者的創造性努力,极大地推动了哲学思想以及整个理論思想,并使它們具有可靠性和勇敢精神。不为任何学派辯护的哲学工作者逐渐占据了新的理論陣地,摆脱了一定的限制,开始批判性地对待整个哲学(馬克思主义哲学和資产階級哲学)至今的发展,不以黑白的标准,也不以政治尺度来評价两种哲学的成就。

既然认为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和辯证的哲学,在我們的哲学活动中就必然反对通常把辯证法和唯物主义分割开来的做法,这种做法导致了完全不正确的結果。

其中的一个問題就是形式邏輯和辯证邏輯这两种邏輯的問題。关于这些問題的討論主要是傾向于拋棄把这两种邏輯割裂开来的观点,这种情况是由于对辯证唯物主义一貫的解釋和認識而产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形式邏輯(以其数学的形式)在个别一些問題上取得的进展。可是,也否定了任何对基本邏輯問題作形式上的和形式主义的解釋的可能性,同时不断努力从辯证唯

物主义的立場来闡明这些問題^①。

由于这些問題，重新提出了对黑格尔辯证法以及对全部哲学史作出評价的問題。苏联官方譴責黑格尔哲学是貴族政治对法国革命和唯物主义的反动。南斯拉夫的哲学家同这种态度相反，他們明确地指出，这种估价是完全錯誤的，并指出这种态度的目的实际上是放棄研究辯证法思想。而在今天，如果我們仅限于狭义的哲学范围，那末，辯证法思想也还是黑格尔研究得最透彻的思想。馬克思主义的客观分析必然得出下列結論：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达到了最頂点；黑格尔的个别观点的局限性和保守性是对当时严重的社会情况的让步，也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产物；唯心主义当时是德国唯一的哲学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可以对当时的哲学成就作出全面的总结。

此外，事实表明，竭力把整个哲学史归结为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简单对立，并且认为唯物主义必然具有进步性，这种看法也是不正确的。对哲学思想史的分析表明：这一过程要复杂得多；存在过这样的时期，当时进步的哲学思想只有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唯心主义观念同唯物主义倾向的斗争不仅是对立的体系的斗争，而且往往也是同一体系内的一种内在的创造性的对立状态和过程，这种体系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它有时通过自己的許多因素表明是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前景和科学前景。当然，这样来研究哲学史就获得了完全另一种、不是死板公式的基础。从新的、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及其一切物质和精神面貌的观点的发展来看，这的确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結果。

我国的哲学思想很早就摆脱了（至少是基本上）一定的局限性。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哲学

^① 从著名的著作中我們可以举出：姆·馬尔科維奇的《現代邏輯学中的形式主义》（1957年），波·舍施奇的《辯证邏輯导論》（1957年）和安·克雷希奇的《关系判断》（1958年）。

思想具有思想和展开批評的充分自由。因此，和其他某些人民民主国家在經受了官僚主义机构的多年直接干涉后，終于要摒棄斯大林主义实践的情况不同，我国的哲学思想并没有經受这种典型性的危机。

相反地，我国的哲学思想保持了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的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的特点，愈来愈多地对当代的各种动向进行大胆的分析 and 评价，并完全正确地看到，资产阶级哲学（尤其是它的著名的代表人物的著作）由于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危机发生冲突，所以不可能仅仅是一种辯护，而且也是一种批評，至少是寻找出路的表现。尽管资产阶级哲学不可能完全克服资产阶级的观点，但是它通过这些努力必然会察觉到当前大家十分关心的一些問題，并加以解决。另一方面，哲学工作者的巨大努力必須提出和解决一系列新問題，哪怕是从錯誤的立場出发，因为哲学領域同任何其他思想領域一样，也是相对独立的部門，它具有自己的特殊发展規律。

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哲学思想的所有代表人物身上就产生了同斯大林主义的馬克思主义的尖銳对立，尽管各人摆脱某种局限性和这种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这种立場的根源是双重性的：首先，对于阻撓哲学的发展以及整个思想的发展，使它服从于政治领导（斯大林、日丹諾夫）的空洞的似是而非的哲学概念，歪曲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将成为新的創造的那种思想，使一切可能的傳統思想的偏見占据上风，——对于所有这些情况，南斯拉夫馬克思主义哲学家現在和将来都始終是出自内心地不能同意，因此进行尖銳的抵制。其次（这一点本身就是第一种情况的結果），一种生动的有思想性的气氛，决不能与在內容上和風格上都不具备現代水平的、无思想性的和教条主义的高談哲理的做法相协调。

在这方面，一部分人較多地依据馬克思早期的著作，从而几乎完全专去注意人道主义和人类学問題以及現代资产阶级关于人和历史的某些观点。另一些人更多地是繼續研究恩格斯后来关于辯

证法的观点，这种辩证法的观点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著作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在这些研究活动和分歧中，往往在观点上也存在排他性，尽管这种排他性并不真正有必要，但是，它却是积极的，因为它促使人们进行始终一贯的和彻底的研究和提出论据。

除了这些倾向以外，还有人认为上述两条研究哲学的路线并不相互排斥。无论如何，这种推进哲学思想的情况只是一种积极的迹象，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大胆地扬帆驶向了哲学问题的大海，而每一只哲学小船都必须克服一系列难题，而有时根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地^①。

斯大林主义的至今的官方观点认为，对于国家的全盘生活必须直接推动和领导，并使其为直接的政治实践作辩护和进行“理论上的”解释。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则通过所有上述这些特点，同这种观点断然决裂。事态的发展表明，这种哲学思想的论调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必然的后果，而实际上是国家主义偏差的后果，这种偏差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只会通过其社会政治和思想方面损害马克思主义缔造者的伟大思想。

当代哲学的发展，正如其他任何科学的发展一样，不再只是沿着资产阶级哲学的路线进行，但是，也不再只是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路线进行，而终究是在这种对立、但也是渗透中进行的。因此，在批判地克服一切想从唯心主义或者折衷主义—多元论的观点来阐述哲学原理的企图的同时，决没有任何理由对于使马克思主义思想教条化的做法，不进行同样严厉的批评和予以克服，同样，也决没有任何理由不承认资产阶级哲学界个别重要人物的成就。

这样的方针和使科学、哲学和艺术的自由表现成为可能的良

^① 在哲学工作者中我们可以列举布·博什尼亚克、伊·佛赫特、弗·科腊奇、安·克雷希奇、米·马尔科维奇、杜·内德利科维奇、弗·帕维切维奇、加·佩特罗维奇、弗·苏特利奇、普·弗兰尼茨基等人，在他们之间当然也存在一系列的分歧。

好的社会气氛，也为馬克思主义思想在南斯拉夫取得进一步深入的和持久的成果提供了前提，这些成果今后也将同整个社会創造（这种創造在現代人和人道陷入危机的情况下已获得了一定的历史意义）相适应。

通过这一切开辟了人的人道的新的发展阶段。建立新的更人道的关系的問題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問題。但这决不是一个通过关于人、道德和善意的各种思辨就可以解决的抽象問題。新人道主义的問題实质上是人类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整个精神領域內都获得解放的問題。而人的这一切形式的解放是不能通过个别人物的崇高的意願来实现的，因为只有在爭取使社会从經濟上的不自由、也就是从一切剝削中解放出来的具体历史行动中，才有可能获得实现这一切的基础即經濟自由。

因此，人道主义的問題基本上是一个历史行动的問題，如果看不到人的問題終究也是历史問題，就决不会看到人类进步中的最本质的东西。

正如以前历史性的革命行动是人类取得日益增多的成就和全面解放的基础一样，今天它仍旧起着这样的作用，而且在将来也是如此。人可以赢得自己的人性的場所只有一个，那就是历史的实践。

因此，新的、社会主义的关系問題，自觉地和正确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問題，在今天实质上也就是新人道主义的問題。正因为南斯拉夫革命在过去和現在都通过理論和实践表明了社会主义过程的实质，并在国家主义迄今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中造成了轉折，因此这一革命意味着社会主义和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新阶段，继承了馬克思主义的一切偉大而深刻的思想，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具有这些思想才成为現代历史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

結 論

对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趋势和它的历史进行的这一总的考察，就足以清楚地不仅說明馬克思主义思想的内容丰富的历史，而且也說明它始終是当代的基本理論思想。馬克思主义思想是作为欧洲文化的表現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在欧洲文化的基础上創造了自己的至今最偉大和最富有成果的篇章。現代文明的其他发源地由于缺乏整个古希腊羅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以及资产阶级的文化（这种文化发展的最高頂点是法国启蒙运动和德国的唯心辯证法），因此不是适宜于这样一种錯綜复杂的理論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土壤。由于历史上落后的情况，由于缺乏上述文化和思想的傳統，其他地区只有在最深刻的实际革命的創造时期，即在馬克思主义由于政治社会問題和革命实践而得到丰富的时候，才能对这一发展有所貢獻。

在現代世界特殊的和复杂的过程中，不管馬克思主义思想将通过何种途徑被人吸收和接受，它間接地或直接地都是当代主要的积极思想，因为历史的发展虽然遇到种种困难和发生偏差，但仍然使人的力量获得进一步的解放，并且导向社会主义时代。馬克思主义特別是一种革命的和批判的思想，因此也成为現代主要的思想，因为时代本身就是革命的和批判的。

不过这一发展既不是片面的，也不是簡單容易的。由于今天已經十分清楚的原因，某些最发达的国家至今避免了較深刻的革命变化，尽管这些国家仍然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因此就产生了一种往往被人們所忽視和加以片面解釋的局面：基本的理論思

想(首先是哲学的、社会学的理論思想)仍然在两条軌道上发展。资产階級世界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同样在竭力寻找出路。科学和理論的蓬勃发展，本身包含着自已发展过程的一定的邏輯。最卓越和最有素养的资产階級思想家，尽管抱有资产階級的观点，都不可能对当代世界的似是而非的議論、愚蠢的行为和不人道的表現漠然置之，正比较有才能的馬克思主义者也决不能容忍馬克思主义的煩瑣哲学和斯大林主义的精神一样。

科学和理論思想仍然按照馬克思主义的路綫和各种非馬克思主义观点的路綫发展。闭眼不看这种发展的各种积极因素，对于馬克思主义思想來說就是使本身縮小下去。正因为这种发展的平行性和同时必然产生的渗透現象还要保持很长的時間，所以馬克思主义思想在理論上的优越性就不能表现为抽象地否定其他一切东西，而应表现为批判地和創造性地双方发表意見。这就要求馬克思主义者承担更多的义务，并且表明不能糊里糊塗地援引經典作家的言論和思想。因此，仅仅停留在最卓越的馬克思主义者的見解上，是不够的和在理論上是落后的，甚至那种认为只需要“繼續他們的思想”的提法也是不够的，因为历史每前进一步，就提出前所未有的新問題。因此，問題不仅在于继承一定的思想材料(当然这些材料是基础)，而且也在于根据一般的馬克思主义精神，独立地解决現代的人所面临的一切問題：哲学、社会学、政治、經濟等等方面的問題。

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創造性的思想。它既是唯物主义，又是辯证法，但也是人道主义。馬克思之所以高明，并不在于他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理解世界，也不在于以辯证法的观点来看待现实。这些观点在馬克思以前就已經有了。馬克思之所以高明，就在于他把这些最偉大的思想成果統一起来，在于他对历史和人，对人本身的历史这一領域作出了嶄新的、獨創的解釋和闡述，而这一領域在馬克思以前是沒有人說明过的，同时它也是人的利益的基

本領域，是人的努力、願望、利益、鬥爭和理想的活動範圍。

歷史是自然發展的最為錯綜複雜的因素，同時也是整個由人創造的。這個領域按照舊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刻板公式是解釋不清的。因為，只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又先於歷史存在本身而存在，那末就只有在這種相互促進的關係中才產生歷史。

現代最偉大的資產階級思想著作（我決不是貶低它們的價值）不是只抓住了人類和歷史的局部，就是發展為非辯證的本體論，要不就陷於極端的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經濟學家在大多數場合是為處於經常不斷的危機之中的資產階級社會進行種種辯解，而社會學家則往往淹沒在一大堆經驗材料裡面，而不了解這樣一種社會結構的職能。他們都是不了解解剖學和生理學的有機組織學家。

在雙方都發表意見時，馬克思主義只有以完整的和創造性的形式才能保持優越地位。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來說，這種完整性意味著：不片面地停留在客觀辯證法上並把它導致本體論，而忽略人以及與人有關的全部問題；也不片面地停留在已成為整個辯證法的同義語的歷史辯證法上。儘管強調這些問題在今天對於人類更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但是這種做法必然會陷入片面的人本主義，片面的人本主義就是缺乏切合實際的和一般辯證的現實基礎，而這種基礎也是歷史辯證法的前提之一。忽視自然的、片面的人本主義是與在自己的實證哲學中忽視人和歷史的、片面的本體論（特別是斯大林時期的本體論）相抵觸的。

作為一種科學思想和哲學思想，馬克思主義曾經是，並且仍將是現代歷史上革命力量的體現。但是這些革命力量也經歷着各種不同的過程、情況和變化。一部分革命力量在不同程度上同資產階級世界發生衝突，另一部分則或多或少地在資產階級世界中融為一體。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在自己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明確地反映了這種種傾向。形形色色的改良主義和修正主義並不是偶然

現象。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在馬克思主義內部將永遠存在政治和理論方面的緊張狀態，因為每一種改良主義和修正主義都沒有合適地反映一定的歷史情況。馬克思主義今天也面臨着一項極為重要的任務，即科學地研究這些傾向，說明階級力量及其關係的發展情況，從而確定自己的政治行動。因為，當無產階級同歷史上的反動派發生公開衝突的時候，向無產階級提出改良主義的口號，是一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同樣，當無產階級已經在很大的程度上結成整體，而對於資產階級世界只是作為議會或工會反政府派存在的時候，對無產階級發表革命的口號，也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這還並不意味着，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就不是實現進一步社會改造的歷史體現者。但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這種情況下必須為制定一種真正的和富有成效的政策，同樣也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深刻的和具有歷史意義的變化提供主要因素。

馬克思主義實質上是歷史上新生力量的思想，因此也是社會主義的思想。馬克思主義史在這方面指出了這樣一種反常的現象：除了資產階級專政的某些時期以外，在社會主義的一個發展階段，即在斯大林主義時期，馬克思主義本身的思想發展的範圍最為狹小。在這一時期居然把政治和理論非常不幸地等同起來，並且把政治上的決定強加於理論。這不可能不產生後果。沒有使人的思想和精神隨着歷史上的社會主義復興運動的展開，而有同樣程度的復興，沒有不斷致力於建立那種使人類財富的全面實現越來越具有可能的關係——整個這一大規模的創造活動僅僅由於把一種要求即政治要求絕對化而被忽視了。這種政治要求代替了千百萬群眾、生產部門的勞動者和主要的文化領域、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領域的工作者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社會主義和國家最高權力被等同起來，因此顯然就是肯定國家官僚政權掌握着整個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產生，是為了反對對人的統治，爭取建立這樣一種關係，這種關係將根本消除人的物化和人在經濟上、政治上和精神上

的異化这一事实，彻底消灭以本身的存在而貶低人的个性的一切拜物教的現象。

斯大林主义只是以新的形式保持和加剧了这些反常現象，并以为这样就完成了历史任务。斯大林主义的理論家們非辯证地仅仅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取消私人所有制和建立国家和官僚机构的莫大势力，他們沒有看到，社会主义本身就具有自己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沒有看到在斯大林主义中把一个最低的阶段絕對化了，在这个阶段中，經濟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異化（雇佣关系、政治权力和理論上的不自由等等）达到了尖銳的地步，这种異化基本上还是由革命产生的。因此，斯大林主义既不仅仅是教条主义，也不仅仅是修正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关系的变形，是个性的变形，是整个文化、特别是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变形。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論的全部財富（在本书中至少大致上对此作了說明）被归結为用我們两只手上的指头就可以数得过来的几点特征。并且想要根据这种思想武器来占有当代世界文化中的社会障地。而根本沒有看到，资产阶级的思想提供了許多很銳利的（虽然是局部性的）工具，或者至少是提供了这样的分析，它們比在那样短短的几頁上以不可移易的形式提出的分析要更胜一筹。

斯大林主义阶段現在还没有完全被克服。馬克思主义思想决不应忘記这一阶段，以便始終清楚地了解什么阶段是不应当有的。斯大林主义是某些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定的阶段，但是在类似的情况下，斯大林主义同样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出現。因此，完全了解斯大林主义的消极作用，正如了解资产阶级思想（即便是最明智的思想）不能在解釋世界、历史和人及其斗争和争取解放的道路等方面代替馬克思主义思想一样，是創造性地发展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前提。任何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疇都不能代替馬克思主义所創造的这样一些范疇，它們在創造性的运用中始終表明，不仅是了解过去，而且也是了解今天和未来的最重要的思想工具。这些范

疇就是實踐、总体、異化、拜物教、物化、人道、生产关系和社会經濟形态等等，它們至今是人在爭取尽量高的覺悟和自由的頑強斗争中变得高尚起来的最高程度。

因此，在一般理論領域內，馬克思主义也要对这些范疇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全面分析至今阻碍了或分裂了馬克思主义思想的各种偏差——从忽視人的各种本体論观点到忽視具体的历史和自然的各种人本主义观点。

因此，不仅向馬克思主义提出了詳細分析資本主义現阶段的发展和各个殖民地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克服資本主义的独特的办法問題，而且还提出了作为一种統一的和复杂的現象的文化和文明問題。而在这方面，还只談得上某些至今已完成的非常微小的初步工作。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本身表明是一种比原先設想的要复杂得多的过程。因此，克服斯大林主义，就意味着在理論上和實踐上作出进一步的努力。这也意味着，不断对社会主义的个别阶段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改变，而有人却始終企图把这些阶段保持原样，使之固定不变，并称之为合格的。應該把社会主义理解为馬克思主义思想全面和自由发展的唯一的历史範圍和媒介物。不仅如此，还應該把它理解为全面解放人及其各种才能和潜在能力的唯一媒介物。正因为如此，所以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特殊的形态，而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时期。这一过渡性的最深刻的实质，就是同一切階級的遺產和旧时代的殘余（一句話，它們都表現为異化現象）作斗争并为爭取人的解放而进行不断的、群众性的斗争。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向国际工人运动經常指出：社会主义不是把权力从資產階級的手里轉交給具有莫大勢力的国家和官僚，即使这个国家也是由革命队伍产生的。需要經常指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基础，是真正的創造者和真正的权力。把所有这些历史性的特权交給个别的人，这就意味着承认自己的幼稚。正由于

这一切，在革命的劳动群众的旗帜上不能再写着自由、平等、社会主义民主等抽象的口号，而应该写着具体的、唯一符合历史的要求——直接实现经济解放，首先是实行劳动人民的全面自治。在这个问题上，重要之点不在于，是称为工人委员会还是称为自由生产者协会，是按照南斯拉夫的形式发展还是按其他的形式发展，是比较快地还是比较慢地取消国家的、官僚主义的和类似的权力和管理形式；重要之点在于，自治和直接民主是社会主义发展的轴心，正好像私人所有制和间接民主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轴心一样。国际无产阶级和整个社会主义力量应该在自己的革命旗帜上写出这一条作为基本口号，并把它视为自己的历史权利和任务。

十分明显，这是一个复杂而艰巨并且充满矛盾的过程，这个过程同各种旧的习惯、关系、心理状态、等级制度和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消极现象等等发生冲突。但是，如果缺乏生气蓬勃的、创造性和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实践，就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因此，社会主义的创造性的媒介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全面发展的前提，正如自由的、批判性的和大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全面而顺利地发展的前提一样。

任何其他思想都不能为这种发展提供基本因素和指出方向。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思想任人摆布，那末，它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史本身的一个重大经验。对于某种思想来说，如果把它编成法典和写成若干条文，那是最有害不过的。文化和科学理论的创造不是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教师的学校，而是成熟的个人的活动、思想讨论和冲突。这些人不是有了已谱好的总乐谱的扬声器，而是创作总乐谱的作曲者。

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迄至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积累的丰富的发展经验来看，可以断言，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社会主义实践方面争得了许多阵地，而且在理论方面也已經很清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未来在于它的各种不同的理论提法。

一些人必然会強調某些問題和观点，以便从这些观点出发进行彻底的分析，一些人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來理解問題，另一些人則从較局部的意义上來理解問題，从而在理解各个科学和哲学領域、一定的規律和范疇等的重要性和性质方面，必然会存在差別。

从馬克思主义至今的历史可以看出，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循着这一路綫來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人拋棄了馬克思的思想的某些重要点，而陷入了某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同样也发生了前面談过的情况，即不仅把一定的范围，而且把一定的起点和終点都强加于馬克思主义的每一种思想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极端的做法，这种做法今天已不再导致富有成效的創造；馬克思主义理論家應該認識到，这是他們自己的思想的发展史上的重要經驗之一。

馬克思主义当然是一种理論，可是它是一种批判性的理論。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不仅表現在对資產階級社会的态度上，而且也表現在对待一切社会，包括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态度上。历史在实质上也是一种批判，历史的发展就是批判地克服一定的关系和一定的阶段。批判性的理論也必須符合历史发展过程的这一內在的批判。

可見，馬克思主义不能指望通过用聖經十誡或者七个特征去灌輸絕對知識的办法來培养信徒，而是要提醒人們了解人的真正的誕生地，了解自然和历史，了解人的創造以及人創造的全部历史过程的辯证法。應該向人指出，不存在任何能成为现实力量的抽象概念，而抽象概念只是在一定的关系中才成为历史上的虛假的现实力量。要摆脱所有这些假象，通过創造新的理想的抽象概念是办不到的，这只有通过采取最具体的历史性行动才能做到，在这样的历史性行动中，人将成为自己的关系、自己的劳动和自己的产品的主人。

馬克思主义又是这一解放过程的理論。这不是由于馬克思主

义向真正的历史上的人提供了不现实的理想，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为他揭示了他本身，揭示了他的历史发展的各个成分，他自己创造的规律，以及他必须经历的发展过程。

从哲学上和理论上明确和了解这些因素，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创造性理论和人的自觉的历史性行动的先决条件。这不是绝对真理，不是人的发展的终极的目的。这是对那种从本质上说是人性的、此岸性的和历史的東西的认识，是那种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能实现、而又只能是一个过程的普遍性的东西。

某种创造性的思想的最困难的地方正是抽象理论的过程和具体过程的这种结合。只要这种真正的抽象概念仍然是主导思想，那末了解客观可能性以及了解应该经历的具体阶段，就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如果不对各种途径和远大目标进行这种普遍性的说明，任何具体的历史行动都必然会淹没在日常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浑水中；同样，陷于抽象概念中，必然导致脱离实际过程，导致那种掩盖真正的弱点的虚假的崇高和优越。

马克思主义是至今的唯一的这样一种理论思想，它用全部力量指出这些过程的统一性，并且为建立人们的劳动集体提供了基本前提。人们将理解到，他们生活的直接生产，是他们生存和思想的基本前提；但是他们也将理解到，他们的思想是他们的生产过程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重新提高了人的身价，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摧毁了一切不现实的偶像、崇拜物、神秘现象以及统治人的势力。

但是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抽象地、费尔巴哈式地进行这一工作，而且也指出人必须经历和实现的现实的过程和关系，以便使人觉醒起来和重新感到自己是一个人，是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思想的创造者。

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实质上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争取实现人身上的一切高尚品质的斗争，这就使人能

够了解自己和自己的历史,能够丢掉过去的沉重的思想遗产,并理解到自己的历史、生活和时代的意义,而这只是因为,正是人才赋予自己的历史、生活和时代以这种意义。

如果没有这一点,人的生存就可能是真正的苟且偷安,或者是执行无法实现的计划。人的全部伟大之处以及生存的乐趣正是在于:人创造出自己的生活,使生活具有意义和前途。

此外,马克思主义还提出了一种伟大的和重要的认识: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历史;这种创造是一种统一的实践和理论的过程,它和人类生活同样是无限的;任何一种神秘现象都是人本身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人不仅是最高级的生物和人本身的唯一的涵义,而且也是人的唯一的命运。

参 考 书 目

在这个参考书目中，仅仅列出在正文中以某种方式引用了的那些著作。为了不致于重复同样的材料，并且为了使读者从参考书目本身中也能获得新的材料和知识，在每一本引用过的著作后面只标明初版年代。某些著作的写作和出版时间间隔得较久，在这些书名后面则注明两个年代。书名使用我采用和引证时所用的文字（有时也有出入，因为我在某些地方用我国文字列举书目）。在某些情况下，目前我还没有来得及了解初版年代，所以就标明我所有的那一个版本。大多数出版年代我是能够检查了的，但是对于某些年代来说，我参考了各种不同的材料，所以这些年代的准确性要取决于这些材料。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Adler, Friedrich)

《馬赫战胜了机械唯物主义》，1918年德文版(«E. Machs Überwindung des mechanischen Materialismus». 1918)。

麦克斯·阿德勒(Adler, Max)

《因果性和目的论》，1904年德文版(«Kausalität und Teleologie». 1904)。

《马克思主义问题》，1903年德文版(«Marxistische Probleme». 1913)。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1922年德文版(«Die Staatsauffassung des Marxismus». 1922)。

《政治民主还是社会民主?》，1926年德文版(«Politische oder soziale Demokratie?». 1926)。

《唯物史观读本》，第1册1930年德文版，第2册1932年德文版(«Lehrbu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I, 1930, II, 1932)。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第1卷1935年法文版，第2卷1937年法文

版(«A la lumière du marxisme» I, 1935, II, 1937)。

格·費·亚历山大罗夫(Aleksandrov, G. F.)

《西欧哲学史》，1946年俄文版(«Istorija zapadnoevropejskoj filozofii», 1946)。

符·弗·阿斯穆斯(Asmus, V. F.)

《邏輯学》，1947年俄文版(«Logika», 1947)。

加斯东·巴赫拉德(Bachelard, Gaston)

《理性的唯物主义》，1953年法文版(«Le Matérialisme rationnel», 1953)。

弗拉迪米尔·巴卡里奇(Bakarić, Vladimir)

《过渡阶段的地租問題》，1950年塞文版(«Problem zemljišne rente u prelaznoj etapi», 1950)。

《关于农村工作和农业的迫切問題(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54年塞文版(«O aktuelnim pitanjima rada na selu iu poljoprivredi», Ref. na III K. SKH. 1954)。

《社会主义經濟和社会主义合作制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在克罗地亚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总委员会會議上的讲话)》，1957年塞文版(«Uloga socijalističkog gazdinstva i socijalističke kooperacije u modernizaciji poljoprivrede», Govor na savjet. G. odb. SSRNH. 1957)。

《关于农村的内部发展和农业政策(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56年塞文版(«O unutrašnjem razvoju na selu i poljoprivrednoj politici», Govor na IV Kongresu SKH. 1956)。

米哈伊尔·巴枯宁(Bakunjin, Mihail)

《国家与革命》，1873年俄文版(«Gosudarstvo i revoljucija», 1873)。

安东尼奥·班菲(Banfi, Antonio)

《哥白尼式的人》，1950年意大利文版(«L' uomo copernicano», 1950)。

昂利·巴尔托利(Bartoli, Henri)

《卡尔·馬克思的經濟和社会学說》，1950年法文版(«La doctrin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Karl Marx», 1950)。

布魯諾·鮑威尔(Bauer, Bruno)

《路·费尔巴哈的特点》，1845年德文版(《Charakteristik L. Feuerbachs》. 1845)。

奥托·鮑威尔(Bauer, Otto)

《民族問題和社会民主党》，1907年德文版(《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1907)。

《苏維埃专政还是民主?》，1919年德文版(《Rätediktatur oder Demokratie?》. 1919)。

《布尔什維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1920年德文版(《Bolschewismus oder Sozialdemokratie?》. 1920)。

《世界社会主义的形势和社会民主党的綱領》，1926年(《Svjetski položaj socijalizma i socijaldemokratski program》. 1926)。

《世界大战后的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1931年德文版(《Kapitalismus und Sozialismus nach dem Weltkrieg》. 1931)。

《奥地利工人的起义》，1934年塞文版(《Ustanak austrijskih radnika》. 1934)。

奥古斯特·倍倍尔(Bebel, August)

《德国帝国議会和地方議会的議會活动和社会民主党》，1876—1893年(《Die parlament. Tätigkeit des deutschen Reichstags und der Landt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1876—1893)。

《妇女和社会主义》，1883年德文版(《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 1883)。

《沙利·傅立叶》，1888年德文版(《Charles Fourier》. 1888)。

《基督教和社会主义》，1892年德文版(《Christentum und Sozialismus》. 1892)。

《社会民主党和普选权》，1895年德文版(《Die Sozialdemokratie und das allgemeine Wahlrecht》. 1895)。

《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立場的攻击》，1899年(《Napadi na osnovne poglede i taktičko stajalište partije》. 1899)。

《自傳》(三卷本)，1910—1914年德文版(《Aus meinem Leben》, 3 sv. 1910—1914)。

麦克斯·貝尔(Beer, Max)

- 《社会主义和社会斗争通史》，1924年(«Opća historija socijalizma i socijalnih borbi». 1924)。
- 雅·亚·别尔曼(Berman, J. A.)
- 《从现代认识论来看辩证法》，1908年俄文版(«Dijalektika v svete sovremennoj teorli poznanija». 1908)。
- 爱德华·伯恩斯坦(Bernstein, Eduard)
-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Pretpostavke socijalizma i zadaci socijalne demokracije». 1899)。
- 皮埃尔·比果(Bigo, Pierre)
- 《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卡尔·马克思经济著作集序言)》，1953年法文版(«Marxisme et humanisme», Introduction à l'oeuvre économique de Karl Marx. 1953)。
- 奥古斯特·布朗基(Blanqui, August)
- 《社会批判》，1885年法文版(«Critique sociale». 1885)。
- 恩斯特·布洛赫(Bloch, Ernst)
- 《乌托邦精神》，1918年德文版(«Geist der Utopie». 1918)。
- 《革命的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1922年德文版(«Thomas Münzer als Theologe der Revolution». 1922)。
- 《时代的遗产》，1935年德文版(«Erbschaft dieser Zeit». 1935)。
- 《自由和秩序》，1946年德文版(«Freiheit und Ordnung». 1946)。
- 《主体—客体》，1952年德文版(«Subjekt-Objekt». 1952)。
- 《希望的原则》，第1卷1954年，第2卷1955年，第3卷1959年德文版(«Das Prinzip Hoffnung». I, 1954, II, 1955, III, 1959)。
- 《对于进步的理解的分歧》，1957年德文版(«Differenzierungen im Begriff Fortschritt». 1957)。
- 亚·波格丹诺夫(Bogdanov, A.)
- 《经验一元论》，1905年俄文版(«Empiriomonizm». 1905)。
- 《生动经验的哲学》，1920年俄文版(«Filosofija živogo opyta». 1920)。
- 《组织形态学》，1922年俄文版(«Tektologija». 1922)。
- 伊·姆·鲍亨斯基(Bochenski, I. M.)
- 《苏俄的辩证唯物主义》，1950年德文版(«Der Sowjetrussische

dialektische Materialismus» 1950)。

伊·鲍亨斯基和格·尼迈耶(Bochenski, L i G Niemeyer)

《世界共产主义手册》，1958年德文版(«Handbuch des Welt-Kommunismus». 1958)。

《苏联大百科全书》(«Boljšaja sovetskaja enciklopedija»)。

尤·博尔夏特(Borchardt, J.)

《历史唯物主义》，1931年法文版(«Le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 1931)。

路德维希·白尔尼(Börne, Ludwig)

《巴黎来信》，1832—1834年(«Briefe aus Paris». 1832—1834)。

路·勃·布丁(Boudin, L. B.)

《卡·马克思的理论体系》，1907年德文版(«Das theoretische System von K. Marx» 1907)。

尼古拉·布哈林(Bucharin, Nikolai)

《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1913年德文版(«Die politische Oekonomie des Rentners». 1913)。

《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1918年德文版(«Imperialismus und Weltwirtschaft» 1918)。

《共产主义者纲领》，1918年德文版(«Das Programm der Kommunisten». 1918)。

尼·布哈林和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Bucharin, N. u. E. Preobraschensky)

《共产主义的ABC》，1918年德文版(«Das ABC des Kommunismus». 1918)。

尼·布哈林(Bucharin, N.)

《过渡时期的经济》，1920年德文版(«Oekonomik der Transformationsperiode». 1920)。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1年德文版(«Theor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1921)。

格奥尔格·毕希纳(Büchner, Georg)

《丹东之死》，1835年德文版(«Dantons Tod» 1835)。

阿·普·布坚科(Butenko, A. P.)

- 《“民族共产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958年俄文版（《“Nacjonalnij Kommunizm”-ideologičeskoe oružie buržoazii》.1958）。
- 让·伊·卡尔维(Calvez, J. Y.)
《卡尔·马克思的思想》，1956年法文版（《La pensée de Karl Marx》.1956）。
- 加斯东·卡桑诺瓦(Casanova, Gaston)
《数学和辩证唯物主义》，1947年法文版（《Mathématiques et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1947）。
- 昂利·尚贝(Chambre, Henri)
《马克思主义在苏联》，1955年法文版（《Le marxisme en Union Soviétique》.1955）。
- 海尔曼·柯亨(Cohen, Hermann)
《带有批评性补充意见的前言》，见朗格《唯物主义史》，1896年德文版（《Einleitung mit Kritischen Nachtrag》 Langeovom djelu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1896）。
- 《纯意志伦理学》，1904年德文版（《Ethik des reinen Willens》.1904）。
- 莫里斯·康福斯(Cornforth, Maurice)
《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1946年英文版（《Science Versus Idealism》.1946）。
- 《保卫哲学》，1950年英文版（《In Defence of Philosophy》.1950）。
- 奥古斯特·科尔努(Cornu, August)
《莫·赫斯和黑格尔左派》，1934年法文版（《M. Hess et la Gauche hégélienne》.1934）。
- 《马克思主义批判文集》，1949年法文版（《Essai de critique marxiste》.1949）。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第1卷1955年，第2卷1958年法文版（《K. Marx et F. Engels》. I, 1955, II. 1958）。
- 亨利希·库诺夫(Cunow, Heinrich)
《原始时代的技术》，1912年德文版（《Die Technik in der Urzeit》.1912）。
- 《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理论》，第1卷1920年，第2卷1921年德文版（《Die Marxsche Geschichts-, Gesellschafts- und Staats-

- theorie». I, 1920, II, 1921)。
- 《經濟通史》第1—4卷, 1926—1931年德文版(«Allgemeine Wirtschaftsgeschichte». I—IV, 1926—1931)。
- 符·普·切尔特柯夫(Čertkov, V. P.)
-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非对抗性矛盾》, 1957年俄文版(«Neantagonističeskie protivorečija pri socializme». 1957)。
- 阿·莫·德波林(Deborin, A. M.)
-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导論》, 1915年俄文版(«Vvedenie v filosofiju dialektičeskogo materializma». 1915)。
- 《思想家的列宁》, 1924年俄文版(«Lenin kak myslitelj». 1924)。
- 《哲学和馬克思主义》, 1926年俄文版(«Filosofija i marksizm». 1926)。
- 《辩证法和自然科学》, 1929年俄文版(«Dialektika i estestvoznanie». 1929)。
- 彼得·德梅茨(Demetz, Peter)
- 《馬克思、恩格斯和詩人》, 1959年德文版(«Marx, Engels und die Dichter». 1959)。
- 让·特·德桑蒂(Desanti, J. T.)
- 《哲学史概論》, 1956年法文版(«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1956)。
- 伊薩克·多伊彻尔(Deutscher, Isaac)
- 《斯大林》, 1949年法文版(«Staline». 1949)。
- 卡尔·迪耳(Diehl, Karl)
- 《无产階級专政和苏維埃制度》, 1920年德文版(«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und das Rätssystem». 1920)。
- 《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1922年德文版(«Über Sozialismus, Kommunismus und Anarchismus». 1922)。
- 欧根·狄慈根(Dietzgen, Eugen)
- 《狄慈根傳略》, 1915年德文版(«Dietzgen-brevier». 1915)。
- 《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参照約·狄慈根的認識論解决这一問題的嘗試》, 1921年德文版(«Materialismus oder Idealismus? Ein Lösungsversuch gemäss J. Dietzgens Erkenntnislehre».

1921)。

約瑟夫·狄慈根(Dietzgen, Joseph)

《人脑活动的本质》，1869年(《Suština umnog rada čovjeka》. 1869)。

《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認識論領域中的漫游》，1886年(《Ekskurzije socijalista u oblast teorije spoznaje》. 1886)。

《哲学的成就》，1887年德文版(《Das Acquisit der Philosophie》. 1887)。

《邏輯学通信》，1894年德文版(《Logische Briefe》. 1894)。

莫里斯·多布(Dobb, Maurice)

《政治經濟学和資本主义》，1937年(《Politička ekonomija i kapitalizam》. 1937)。

阿道夫·德腊吉切維奇(Dragičević, Adolf)

《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发阶段的体系中的历史地位》，1957年塞文版(《Historijsko mjesto socijalizma u sistemu razvojnih etapa ljudskog društva》. 1957)。

巴罗士·丹汉姆(Dunham, Barrow)

《人反对神話》，1947年英文版(《Man against Myth》. 1947)。

《鎖住的巨人》，1953年英文版(《Giant in Chains》. 1953)。

米洛万·德热拉斯(Đilas, Milovan)

《新階級》，1957年法文版(《La nouvelle classe》. 1957)。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烏培河谷来信》，1839年德文版。

《謝林論黑格尔》，1841年德文版。

《謝林和启示(对絞杀自由哲学的最新反动企图的批判)》，1842年德文版。

《謝林——基督的哲学家，或变人間智慧为神的智慧》，1842年德文版。

《倫敦来信》，1843年德文版。

《政治經濟学批判大綱》，1844年德文版。

弗·恩格斯和卡·馬克思

《神圣家族》，1845年德文版。

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德文版。

- 《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
-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改革》，1878年德文版。
- 《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1883年德文版。
- 《马克思与〈新莱茵报〉》，1884年。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
- 《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德文版。
- 《法德农民问题》，1894年。
-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序言》，1894年德文版。
- 《自然辩证法》，写于七十年代，1925年出版。
- 黑楚斯·厄南德兹(Ernandes, Hesus)
- 《共和西班牙和苏联》，1953年(《Republikanska Španija i SSSR》, 1953)。
- 《恩斯特·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1957年德文版(《Ernst Blochs Revision des Marxismus》, 1957)。
- 伊尔文·费切尔(Fetscher, Irving)
-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1956年德文版(《Stalin über den Dialektik》, 1956)。
- 《从马克思到苏维埃思想体系》，1957年德文版(《Von Marx zur Sowjetideologie》, 1957)。
-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Feuerbach, Ludwig)
- 《黑格尔哲学批判》，1839年德文版(《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1839)。
- 《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德文版(《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1841)。
- 《哲学改革的预拟提纲》，1843年德文版(《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 der Philosophie》, 1843)。
- 贝拉·福加腊西(Fogarasi, Bela)
- 《逻辑学》，1955年德文版(《Logika》, 1955)。
- 伏·阿·福米娜(Fomina, V. A.)
- 《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1955年俄文版(《Filosofskie vzgljady G. V. Plehanova》, 1955)。

黑尔維希·費德爾(Förder, Herwig)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的前夜》，1960年德文版(«Marx und Engels am Vorabend der Revolution» 1960)。

埃利希·弗羅姆(Fromm, Erich)

《論分析社會心理學的方法和任務》，1932年德文版(«Über Methode und Aufgabe einer analytischen Sozialpsychologie». 1932)。

羅歇·加羅迪(Garaudy, Roger)

《自由的法則》，1950年法文版(«Grammaire de la Liberté». 1950)。

《唯物主義的認識論》，1953年法文版(«La théorie matérialiste de la connaissance». 1953)。

《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1958年法文版(«L'humanisme marxiste». 1958)。

《評昂利·勒弗夫爾的書：對馬克思主義的說明還是對修正主義的說明？》，1958年法文版(«A propos d'un livre d'Henri Lefebvre, Initiation au marxisme ou initiation au revisionisme». 1958)。

《人的前景》，1959年法文版(«Perspectives de l'homme». 1959)。

彼得·蓋伊(Gay, Peter)

《民主社會主義的抉擇》，1952年德文版(«Das Dilemma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1952)。

路西安·高德曼(Goldmann, Lucien)

《辯證唯物主義和哲學史》，1947年法文版(«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 et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1947)。

《辯證唯物主義和文學史》，1947年法文版(«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 et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1947)。這兩篇文章和其他文章均收入《辯證法研究文集》一書，1959年法文版(«Recherches dialectiques». 1959)。

《人文科學和哲學》，1952年法文版(«Sciences humaines et Philosophie». 1952)。

《隱藏的上帝》，1955年法文版(«Le Dieu caché». 1955)。

馬克西姆·高爾基(Gorki, Maksim)

《回憶同時代人》，1928年德文版(«Erinnerungen an Zeitgenossen».

njem. izd. 1928)。

德·普·高尔斯基(Gorski, D. P.)

《邏輯学》，1958年俄文版(《Logika》. 1958)。

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 Antonio)

《工会和委员会》，1919年(《Sindikati i savjeti》. 1919)。

《工团主义和委员会》，1919年(《Sindikalizam i savjeti》. 1919)。

《劳动手段》，1920年(《Sredstvo rada》. 1920)。

《工厂委员会》，1920年(《Fabrički savjeti》. 1920)。

《知识分子和文化组织》，1949年版(《Intelektualci i organizacija kulture》. 1949)。(这一著作和下列各书均系1929年至1935年间在狱中写成。)

《文学和民族生活》，1949年版(《Književnost i nacionalni život》. 1949)。

《論馬基雅弗利、論政治和論現代国家》，1952年版(《Bilješke o Machiavelliju, o politici i o modernoj državi》. 1952)。

《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导論》，1955年版(《Uvođenje u studij filozofije i historijskog materijalizma》. 1955)。

《对一种通俗说明社会学的尝试的批評性札記》，1955年版(《Kritičke bilješke uz jedan pokušaj popularnog oglada sociologije》. 1955)。

《实践哲学研究中的若干問題》，1955年版(《Neki problemi u proučavanju filozofije prakse》. 1955)。

《貝·克罗齐的哲学》，1955年版(《Filozofija B. Crocea》. 1955)。

卢·奥·格罗普(Gropp, R. O.)

《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方法及其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辯证法的对立》，1954年德文版(《Die marxistische dialektische Methode und ihr Gegensatz zur idealistischen Dialektik Hegels》. 1954)。

《談談哲学史和辯证唯物主义問題》，1959年德文版(《Zu Fragen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und des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 1959)。

亨利希·格罗斯曼(Grossmann, Henryk)

《資本主义制度积累和崩潰的規律》，1929年(《Zakon akumulacije

i sloma kapitalističkog sistema». 1929)。

《馬克思〈資本論〉写作的初步計劃的修改》，1930年(«Promjena prvobitnog plana izgradnje Marxovog “Kapitala”». 1930)。

茹尔·盖得(Guesde, Jules)

《論社会主义基本原理》，1878年法文版(«Essai de catéchisme socialiste». 1878)。

《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1879年法文版(«Collectivisme et socialisme». 1879)。

《階級的道德状况和政治状况》，1901年法文版(«Etat morale et politique de classe». 1901)。

日·符·斯·阿尔当內(Haldane, J. B. S.)

《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1938年法文版(«La Philosophie marxiste et les sciences». 1938)。

尼古拉·哈特曼(Hartmann, Nicolai)

《論本体論原理》，1934年德文版(«Zur Grundlegung der Ontologie». 1934)。

《可能性和现实》，1937年德文版(«Möglichkeit und Wirklichkeit». 1937)。

《现实世界的建設》，1939年德文版(«Der Aufbau der realen Welt». 1939)。

乔·威·弗·黑格尔(Hegel, G. W. F.)

《精神現象学》，1807年德文版(«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1807)。

《邏輯学》，1812年德文版(«Wissenschaft der Logik». 1812)。

《哲学全书》，1817年德文版(«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1817)。

《法哲学原理》，1821年德文版(«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1821)。

《宗教通信》(摘自《宗教哲学讲演录》，1832年德文版)(«Begriff der Religion». Iz Vorlesungen ü. d. Phil. der Religion. 1832)。

《哲学史讲演录》，1833—1836年德文版(«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1833—1836)。

乔·威·弗·黑格尔——杜·内德利科维奇 (Hegel, G. W. F.—D. Nedeljković)

《辩证法》，1939年塞文版(«Dijalektika». 1939) (指内德利科维奇翻译并注释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译者注)。

马丁·海德格尔 (Heidegger, Martin)

《存在和时间》，1927年德文版(«Sein und Zeit». 1927)。

亨利希·海涅 (Heine, Heinrich)

《法国状况》，1833年德文版(«Französische Zustände». 1833)。

《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834年德文版(«Zur Geschichte der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 1834)。

莫泽斯·赫斯 (Hess, Moses)

《欧洲的三人政治》，1841年德文版(«Europäische Triarchie». 1841)。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行动的哲学》，1843年德文版(«Sozialismus und Kommunismus, Philosophie der Tat». 1843)。

鲁道夫·希法亭 (Hilferding, Rudolf)

《财政资本》，1910年(«Financijski kapital». 1910)。

《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1952年塞文版(«Historija međunarodnog radničkog i socijalističkog pokreta». 1952)。

保尔·霍尔巴赫 (Holbach, Paul)

《揭穿了基督教》，1761年(«Hrišćanstvo razgolićeno». 1761)。

雅科布·霍姆斯 (Hommes, Jakob)

《技术的创造力》，1955年德文版(«Der technische Eros». 1955)。

悉尼·胡克 (Hook, Sidney)

《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1933年英文版(«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 1933)。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年英文版(«From Hegel to Marx». 1936)。

《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方法》，1955年英文版(«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Scientific Method». 1955)。

麦克斯·霍克海默 (Horkheimer, Max)

《关于科学和危机的意见》，1932年德文版(«Bemerkungen über Wissenschaft und Krise». 1932)。

- 《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1933年德文版(«Materialismus und Metaphysik». 1933)。
- 《社会科学中的预见问题》，1933年德文版(«Zum Problem der Voraussage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 1933)。
- 《关于哲学人类学的意见》，1935年德文版(«Bemerkungen zur philosophischen Anthropologie». 1935)。
- 《哲学和批判的理论》，1937年德文版(«Philosophie und kritische Theorie». 1937)。
- 《对形而上学的最新抨击》，1937年德文版(«Der neueste Angriff auf die Metaphysik». 1937)。
- 尼基塔·赫鲁晓夫(Hruščov, Nikita)
- 《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56年(«Izvještaj na XX kongresu KPSS». 1956)。
- 《赫鲁晓夫先生的秘密报告全文》，1956年法文版(«Texte Intégral du Rapport secret de M. Khrouchtchev». 1956)。
- 让·伊波利特(Hyppolite, Jean)
- 《论黑格尔和马克思》，1955年法文版(«Études sur Hegel et Marx». 1955)。
- 《历史唯物主义》(费·瓦·康斯坦丁诺夫主编)，1950年俄文版(«Istoričeskij materializm», red. F. V. Konstantinova. 1950)。
- 让·饶勒斯(Jaurès, Jean)
- 《感性世界的现实性》，1891年法文版(«De la Réalité du monde sensible». 1891)。
- 《德雷福斯案件》，1898年法文版(«Affaire Dreyfus». 1898)。
- 《社会主义行动》，1899年法文版(«L'Aktion socialiste». 1899)。
- 《社会主义研究》，1902年法文版(«Études socialistes». 1902)。
- 《法兰西共和国社会主义史》，1901—1908年(«L' Histoire socialist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1901—1908)。
- 巴·索·尤什凯维奇(Juškević, P. S.)
- 《唯物主义和批判实在论》，1908年俄文版(«Materializm i kritičeskij realizm». 1908)。
- 爱德华·卡德尔(Kardelj, Edvard)

- 《斯洛文尼亚民族問題的发展》，1939年塞文版(«Razvoj slovenačkog nacionalnog pitanja». 1939)。
- 《人民解放委员会应当成为人民政权真正的临时代表者》，1941年塞文版(«Narodnooslobodilački odbori moraju postati istinski privremeni nosioci narodne vlasti». 1941)。
- 《論南斯拉夫的人民民主》，1949年塞文版(«O narodnoj demokratiji u Jugoslaviji». 1949)。
- 《人民革命十周年》，1951年塞文版(«Deset godina Narodne revolucije». 1951)。
- 《社会主义民主在南斯拉夫的實踐》，1954年塞文版(«Socijalistička demokratija u jugoslavenskoj praksi». 1954)。
- 《1956年12月7日在联邦国民議会的演說》，1956年塞文版(«Govor u Saveznoj narodnoj skupštini 7. dec. 1956.». 1956)。
- 《农村社会主义政策問題》，1959年塞文版(«Problemi socijalističke politike na selu». 1959)。
- 《社会主义与战争》，1960年塞文版(«Socijalizam i rat». 1960)。
- 《唯物辯证法的范疇》，1956年俄文版(«Kategorii materialističeskoj dialektiki». 1956)。
- 卡尔·考茨基(Kautsky, Karl)
- 《托馬斯·莫尔及其烏托邦》，1887年(«Thomas More i njegova utopija». 1887)。
- 《卡尔·馬克思的經济学說》，1887年(«Ekonomska učenja Karla Marxa». 1887)。
- 《法国革命时期的階級对抗》，1889年(«Klasne suprotnosti u razdoblju Francuske revolucije». 1889)。
- 《爱尔福特綱領原則部分解說》，1892年德文版(«Das Erfurter Programm in seinem grundsätzlichen Teil erläutert». 1892)。
- 《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驅》，1895年(«Preteče novijeg socijalizma». 1895)。
- 《土地問題》，1899年(«Agrarno pitanje». 1899)。
- 《倫理学和唯物史观》，1906年德文版(«Ethik und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1906)。

《民族性和国际性》，1907—1908年(«Nationalität und Internationalität». 1907—1908)。

《基督教的起源》，1908年(«Porijeklo Kršćanstva». 1908)。

《取得政权的道路》，1909年德文版(«Der Weg zur Macht». 1909)。

《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德文版(«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1918)。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德文版(«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 1919)。

《民主还是专政?》，1919年德文版(«Demokratie oder Diktatur?». 1919)。

《从民主到国家奴役》，1921年德文版(«Von der Demokratie zur Staatssklaverei». 1921)。

《唯物史观》第1、2卷，1927年德文版(«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I, II 1927)。

勃·姆·凯德罗夫(Kedrov, B. M.)

《恩格斯和自然科学》，1947年俄文版(«Engels i estestvoznanie». 1947)。

《渐进性是旧质转变为新质的形式之一》，1954年俄文版(«Postепенno st kak odna iz form perehoda ot starogo kačestva k novomu kačestvu». 1954)。

鲍里斯·基得里奇(Kidrič, Boris)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52年塞文版(«Diskusija na VI kongresu KPJ». 1952)。

彼得·克尼尔施(Knirsch, Peter)

《尼古拉·伊·布哈林的经济观点》，1959年德文版(«Die oekonomischen Anschauungen Nicolai I. Bucharins». 1959)。

《文学笔记》，1940年塞文版(«Književne sveske». 1940)。

利奥·科夫勒(Kofler, Leo)

《关于社会的科学》(以斯·瓦林斯基的笔名发表)，1944年德文版(«Die Wissenschaft von der Gesellschaft». 1944)。

《历史和辩证法》，1955年德文版(«Geschichte und Dialektik». 1955)。

列澤克·科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 Leszek)

《知識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1956年德文版(《Die Intellektuellen und Kommunistische Bewegung》. 1956)。

《哲学家的寄托何在?》，1956年德文版(《Wovon leben die Philosophen?》. 1956)。

《现实的和非现实的概念》，1957年德文版(《Aktuelle und nichtaktuelle Begriffe》. 1957)。

《論“目的决定手段”这一格言的正确性》，1957年德文版(《Über die Richtigkeit der Maxime “der Zweck heiligt die Mittel”》. 1957)。

《責任和历史》，1957年德文版(《Verantwortung und die Geschichte》. 1957)。这几篇文章均收入《沒有选择的人》一书，1960年德文版(《Der Mensch ohne Alternative》. 1960)。

卡尔·柯尔什(Korsch, Karl)

《工厂委员会的工作权利》，1922年德文版(《Arbeitsrecht für Betriebsräte》. 1922)。

《唯物史观的观点》，1922年德文版(《Der Standpunkt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1922)。

《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年德文版(《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1923)。

《“馬克思主义和哲学”問題的現狀》，1930年德文版(《Der gegenwärtige Stand des Problems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1930)。

《卡尔·馬克思》，1938年德文版(《Karl Marx》. 1938)。

安德里亚·克雷希奇(Krešić, Andrija)

《关系判断》，1958年塞文版(《Relacioni sudovi》. 1958)。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Labriola, Antonio)

《〈共产党宣言〉回忆》，1895年法文版(《En mémoire du Manifeste du parti communiste》. 1895)。

《論历史唯物主义》，1896年法文版(《Le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 1896)。

《社会主义和哲学概論》，1898年意大利文版(《Discorrendo di soci-

alismo e di filosofia》. 1898)。

《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1925年意大利文版（《Da un secolo all' altro》. 1925）。

保尔·拉法格(Lafargue, Paul)

《懒惰权》，1883年（《Pravo na lijenost》. 1883）。

《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1885年（《Ekonomski materijalizam K. Marxa》. 1885）。

《革命次日》，1887年（《Neposredno poslije revolucije》. 1887）。

《共产主义和经济演变》，1892年（《Komunizam i ekonomska revolucija》. 1892）。

《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1894年（《Francuski jezik prije i poslije revolucije》. 1894）。

《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1895年（《Idealističko i materijalističko shvaćanje historije》. 1895）。

《财产的起源和发展》，1895年（《Postanak i razvitak svojine》. 1895）。

《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9年（《Ekonomski determinizam Karla Marxa》. 1909）。

科利斯·拉蒙特(Lamont, Corlis)

《人道主义是一种哲学》，1949年英文版（《Humanism as a Philosophy》. 1949）。

弗·阿·朗格(Lange, F. A.)

《唯物主义史》，1865年德文版（《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1865）。

麦·格·兰格(Lange, M. G.)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1955年德文版（《Marxismus, Leninismus, Stalinismus》. 1955）。

斐迪南·拉萨尔(Lassalle, Ferdinand)

《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德文版（《Philosophie des Herakleitos des Dunklen aus Ephesos》. 1858）。

《弗兰茨·冯·济金根》，1859年德文版（《Franz von Sickingen》. 1859）。

《取得了的权利的制度》，1861年德文版（《Das 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1861）。

《巴斯提阿特-舒尔兹·冯·德里奇先生，或资本与劳动》，1864年德文版（《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oder Kapital und Arbeit》. 1864）。

昂利·勒弗夫尔(Lefebvre, Henri)

《卡·马克思著作选录》，1934年法文版（《Morceaux choisis de K. Marx》. 1934）。

《民族主义反对民族》，1937年法文版（《Le Nationalisme contre les Nations》. 1937）。

《希特勒上台。德国法西斯五年总结》，1938年法文版（《Hitler au pouvoir. Bilan de cinq années de fascisme en Allemagne》. 1938）。

昂·勒弗夫尔和恩·古特曼(Lefebvre, H. et N. Guterman)

《黑格尔著作选录》，1938年法文版（《Morceaux choisis de Hegel》. 1938）。

《列宁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笔记》，1938年法文版（《Cahiers de Lénine sur la dialectique de Hegel》. 1938）。

昂·勒弗夫尔(Lefebvre, H.)

《辩证唯物主义》，1939年法文版（《Le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 1939）。

《存在主义》，1946年法文版（《L' Existentialisme》. 1946）。

《日常生活批判》，1947年法文版，1958年法文再版（《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1947, II izd. 1958）。

《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1947年法文版（《La Logique formelle et la Logique dialectique》. 1947）。

《卡尔·马克思的思想》，1948年法文版（《La Pensée de Karl Marx》. 1948）。

《列宁的思想》，1957年法文版（《La Pensée de Lénine》. 1957）。

《马克思主义和法国思想》，1957年（《Marksizam i francuska misao》. 1957）。

《马克思主义的迫切问题》，1958年法文版（《Problèmes actuels du

marxisme». 1958)。

《总数和余数》，1959年法文版 («La Somme et le reste». 1959)。

弗·伊·列宁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俄文版。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5年俄文版。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年俄文版。

《怎么办？》，1902年俄文版。

《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俄文版。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俄文版。

《〈卡·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的俄译本序言》，1907年俄文版。

《〈威·李卜克内西《不要任何妥协，不要任何选举协议！》〉一书的俄译本序言》，1907年俄文版。

《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1908年俄文版。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9年俄文版。

《政论家的短评》，1913年俄文版。

《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1914年俄文版。

《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俄文版。

《论欧洲联邦口号》，1915年俄文版。

《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俄文版。

《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1916年俄文版。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俄文版。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7年俄文版。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7年俄文版。

《给中央委员的信(1917年10月24日)》，1925年发表。

《工人监督条例草案》，1917年俄文版。

《奇谈与怪论》，1918年俄文版。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俄文版。

《国家与革命》，1918年俄文版。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俄文版。

- 《关于党綱的报告》，1919年作，1930年发表。
 《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1919年作，1930年发表。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1919年俄文版。
 《偉大的創举》，1919年俄文版。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俄文版。
 《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1920年俄文版。
 《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1920年俄文版。
 《論粮食稅》，1921年俄文版。
 《再論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1921年俄文版。
 《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22年俄文版。
 《論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俄文版。
 《怎样改組工农檢查院》，1923年俄文版。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俄文版。
 《哲学筆記》（主要部分写于1914—1916年），1929—1930年发表。
 《书信选集》，1956年俄文版。

姆·阿·列奧諾夫(Leonov, M. A.)

- 《辯证唯物主义綱要》，1948年俄文版(«Očerok dialektičeskogo materializma» 1948)。

《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的天主教批評者的回答》，1957年法文版(«Les Marxistes répondent à leurs Critiques catholiques» 1957)。

希門·里維(Lévy, Hymen)

- 《社会思想》，1945年英文版(«Social Thinking» 1945)。

路西安·萊維—布律尔(Lévy, Bruhl Lucien)

- 《低級社会的智力职能》，1910年法文版(«Les Fonctions mentales dans les Sociétés inférieurs» 1910)。
 《简单的智力》，1922年法文版(«La mentalité primitive» 1922)。
 《原始精神》，1927年法文版(«L'Ame primitive» 1927)。

卡尔·李卜克內西(Liebknecht, Karl)

- 《軍国主义和反軍国主义》，1907年德文版(«Militarismus und Antimilitarismus» 1907)。
 《反战的階級斗争》，1919年德文版(«Klassenkampf gegen den Kr-

- ieg》. 1919)。
- 《社会发展的运动规律的研究》，1922年德文版(《Studien über die Bewegungsgesetz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1922)。
- 威廉·李卜克内西(Liebknrecht, Wilhelm)
- 《知識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知識》，1872年德文版(《Wissen ist Macht—Macht ist Wissen》1872)。
- 《論土地問題》，1876年德文版(《Zur Grund-und Bodenfrage》.1876)。
- 《法国革命史》，1890年德文版(《Geschichte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1890)。
- 《罗伯特·欧文》，1892年德文版(《Robert Owen》1892)。
- 《回忆卡尔·馬克思》，1896年德文版(《Karl Marx zum Gedächtnis》. 1896)。
- 特·捷·李森科(Lisenko, T. D.)
- 《生物学状况》，1948年塞文版(《O stanju u biološkoj nauci》. 1948)。
- 魯道夫·林道(Lindau, Rudolf)
- 《紀念弗兰茨·梅林誕生一百周年》，1946年德文版(《Franz Mehring zu seinem 100 Geburtstag》1946)。
- 保尔·路易(Louis, Paul)
- 《法国社会主义史》，1946年法文版(《Histoire du socialisme en France》1946)。
- 卡尔·勒維特(Löwith, Karl)
- 《从黑格尔到尼采》，1941年德文版(《Vom Hegel zu Nietzsche》1941)。
- 乔治·卢卡奇(Lukács, Georg)
- 《灵魂和形式》，1911年德文版(《Die Seele und die Formen》.1911)。
- 《历史和阶级意識》，1923年德文版(《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1923)。
- 《德国文学中的进步和反动》，1947年德文版(《Fortschritt und Reaktion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1947)。
- 《哥德及其时代》，1947年德文版(《Goethe und seine Zeit》. 1947)。
- 《青年黑格尔》，1948年德文版(《Der junge Hegel》. 1948)。

《存在主义还是馬克思主义?》，1948年法文版(《Existentialisme au marxisme?》. 1948)。

《美学史論文集》，1954年德文版(《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Aesthetik》. 1954)。

《现实主义問題》，1955年德文版(《Probleme des Realismus》. 1955)。

《理性的毁灭》，1955年德文版(《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 1955)。

《批判现实主义的現今的意义》，1957年(《Današnji značaj kritičkog realizma》. 1957)。

《自傳补遺》，1957年德文版(《Postscriptum》. 1957)。

《馬克思主义美学入門》，1960年塞文版(《Prolegomena za marksističku estetiku》. 1960)。

腊多米尔·魯基奇(Lukić, Radomir)

《国家和法概論》，1956年塞文版(《Opšta teorija države i prava》. 1956)。

罗莎·卢森堡(Luxemburg, Rosa)

《波兰工业的发展》，1898年德文版(《Die industrielle Entwicklung Polens》. 1898)。

《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1898—1899年(《Socijalna reforma ili revolucija?》. 1898—1899)。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組織問題》，1904年德文版(《Organisations fragen in der russischen Sozialdemokratie》. 1904)。

《群众罢工、党和工会》，1906年德文版(《Massenstreik, Partei und Gewerkschaften》. 1906)。

《民族問題和自治》，1908—1909年德文版(《Nationalfrage und die Autonomie》. 1908—1909)。

《資本积累論》，1913年(《Akumulacija kapitala》. 1913)。

《資本的积累，或后人从馬克思的理論中造出了什么? 反批評》，1913年(《Akumulacija kapitala ili šta su epigoni učinili od Marxove teorije, Antikritika》. 1913)。

《社会民主党的危机》，1916年德文版(《Die Krise der Sozialdemokratie》. 1916)。

《开始》，1918年德文版(«Der Anfang». 1918)。

《国民议会》，1918年德文版(«Die Nationalversammlung». 1918)。

《国民议会还是委员制政府?》，1918年德文版(«Nationalversammlung oder Räteregierung?». 1918)。

《国民议会的选举》，1918年德文版(«Die Wahlen zur Nationalversammlung». 1918)。

《论俄国革命》，1922年(«O ruskoj revoluciji». 1922)。

伊·恩·马凯(Mackey, J. H.)

《麦克斯·施蒂纳的生平和事业》，1898年德文版(«Max Stirner,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1898)。

奥列格·曼迪奇(Mandić, Oleg)

《从颞骨崇拜到基督教》，1954年塞文版(«Od kulta lubanje do kršćanstva». 1954)。

卡尔·曼海姆(Mannheim, Karl)

《思想体系和空想》，1929年德文版(«Ideologie und Utopie». 1929)。

毛泽东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

《矛盾论》，1937年。

《实践论》，1937年。

《论新阶段》，1938年。

《论持久战》，1938年。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译者注)。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

《中国的民主》，1941年(指《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译者注)。

《论联合政府》，1945年。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对立的問題》，1957年(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內部矛盾的問題》。——譯者注)。

赫伯特·馬尔庫斯(Marcuse, Herbert)

《总体論国家观中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1934年德文版(《Der Kampf gegen den Liberalismus in der totalitären Staatsauffassung》. 1934)。

《哲学和批判的理論》，1937年德文版(《Philosophie und kritische Theorie》. 1937)。

《享乐主义批判》，1938年德文版(《Zur Kritik des Hedonismus》. 1938)。

《理性和革命》，1941年英文版(《Reason and Revolution》. 1941)。

《創造力和文明》，1955年英文版(《Eros and Civilisation》. 1955)。

《苏維埃馬克思主义》，1958年英文版(《Soviet Marxism》. 1958)。

米哈伊洛·馬尔科維奇(Marković, Mihajlo)

《現代邏輯学中的形式主义》，1957年塞文版(《Formalizam u savremenoj logici》. 1957)。

西馬·馬尔科維奇(Marković, Sima)

《因果性原則和現代物理学》，1935年塞文版(《Princip kauzaliteta i moderna fizika》. 1935)。

斯維托扎尔·馬尔科維奇(Marković, Svetozar)

《巴黎公社和国际》，1871年塞文版(《Pariska komuna i Internacionala》. 1871)。

《东方的塞爾維亞》，1872年塞文版(《Srbija na Istoku》. 1872)。

《科学和生活的现实方向》，1873年塞文版(《Realni pravac u nauci i životu》. 1873)。

卡尔·馬克思

《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学的区别》，1841年写成，1902年德文版。

《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級會議紀錄的辯論》，1842年德文版。

《第79号〈科倫日报〉社論》，1842年德文版(指《第179号〈科倫日报〉社論》。——譯者注)。

《評普魯士最近的书报檢查令》，1843年德文版。

《黑格尔国家法批判》，1843年写，1927年发表(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譯者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德文版。

《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写，1932年德文版。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綱》，1845年写，1888年德文版。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德意志意識形态》，1845—1846年写，1932年德文版。

卡·馬克思

《哲学的貧困》，1847年法文版。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1848年德文版。

卡·馬克思

《雇佣劳动与資本》，1849年。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階級斗争》，1850年。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1852年。

卡·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

《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德文版。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德文版。

《福格特先生》，1861年。

《临时总委员会关于个别問題給代表們的指示》，1866年。

《資本論》，第1卷1867年，第2卷1885年，第3卷1894年德文版。

《法兰西內战》，1871年德文版。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規章》，1871年。

《哥达綱領批判》，1875年写，1891年德文版。

《工資、价格和利潤》，1865年写，1898年。

《致庫格曼书信集》，1902年初版。

《剩余价值理論》，1905—1910年。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通信集》第1—4卷，1913年德文版。

《致倍倍尔、李卜克內西、考茨基等人的书信集》，1933年德文版。

《通信选集》，1956年。

古斯达夫·迈尔(Mayer, Gustav)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1—2卷，1934年德文版(«Friedrich Engels». I—II 1934)。

弗兰茨·梅林(Mehring, Franz)

《关于莱辛的传说》，1893年德文版(«Lessing-Legende» 1893)。

《论历史唯物主义》，1893年德文版(«Über den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1893)。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4卷，1897—1898年德文版(«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I—IV 1897—1898)。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著作遗产》第1—4卷，1902年德文版(«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 Marx, F. Engels und Lassalle». I—IV 1902)。

《哲学的实质和时间条件性》，1904年德文版(«Wesen und Zeitbedingtheit der Philosophie». 1904)。

《历史唯物主义》，1910年德文版(«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1910)。

《中世纪末以来的德国史》，1910—1911年德文版(«Deutsche Geschichte vom Ausgange des Mittelalters». 1910—1911)。

《马克思传》，1918年德文版(«Karl Marx». 1918)。

莫里斯·梅劳—庞蒂(Merleau-Ponty, M.)

《辩证法的历险》，1955年法文版(«Les Aventures de la Dialectique». 1955)。

《反马克思主义的厄运》，1956年法文版(«Mésaventures de l'anti-marxisme». 1956)。

罗伯特·米歇尔(Michels, Robert)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1907年德文版(«Geschichte des Marxismus in Italien». 1907)。

米丁、尤金·拉利切维奇(Mitin, Judin, Rajcevič)

《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新任务》，1930年俄文版(«O novyh zadachah marksistsko-leninskoj filosofii». 1930)。

馬·米丁(Mitin, M.)

- 《切实研究列宁的哲学遗产》，1930年俄文版(«Za dejstviteljniju razrabotku leninskogo filofsokogo nasledstva» 1930)。
- 《我們在哲学上的意見分歧》，1930年俄文版(«Naši filofsokie raznoglasija» 1930)。
- 《哲学討論总结》，1931年俄文版(«K itogam filofsokoj diskusii» 1931)。
- 《斯大林和唯物辩证法》，1933年俄文版(«Stalin i materialističeskaja dialektika» 1933)。
- 《阿克雪里罗得著〈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和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1934年俄文版(«Akseljrod "Idealističeskaja dialektika Gegela i materialističeskaja dialektika Marksa"» 1934)。这些文章和其他文章一同收入《唯物辩证法的战斗性問題》一书(1936年俄文版)。
- 昂利·穆任(Mougin, Henri)
- 《存在主义者的神圣家族》，1947年法文版(«La Sainte familie existentialiste» 1947)。
- 厄曼努尔·穆尼埃(Mounier, Emanuel)
- 《人格主义》，1949年法文版(«Le Personalisme» 1949)。
- 保尔·那托尔卜(Natorp, Paul)
- 《社会教育学。在共同的基础上意志形成的理論》，1899年德文版(«Sozialpädagogik, Theorie der Willensbildung auf d. Grundlage der Gemeinschaft» 1899)。
- 《社会唯心主义》，1920年德文版(«Sozialidealismus» 1920)。
- 皮埃尔·納維勒(Naville, Pierre)
- 《心理学、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1946年法文版(«Psychologie, Marxisme, Matérialisme» 1946)。
- 《享受的異化》，1957年法文版(«De l' Aliénation à la Jouissance» 1957)。
- 杜山·內德利科維奇(Nedeljković, Dušan)
- 《民主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冲突》，1938年塞文版(«Ideološki sukob demokratije i fašizma» 1938)。
- 《反对柏格森》，1939年塞文版(«Anti-Bergson» 1939)。
- 《黑格尔〈邏輯学(辩证法)〉注釋》，1939年塞文版(«Komentari Heg-

- elovoj Logici» Dijalektika. 1939)。
- 《馬克思主义哲学概論》，1908年俄文版(«Očerki po filosofii marksizma». 1908)。
- 《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費·瓦·康斯坦丁諾夫主編，1958年俄文版(«Osnovy marksistkoj filosofii» red. F. V. Konstantinov, 1958)。
- 伊·符·帕苏坎尼斯(Pašukanis, J. B.)
- 《法学概論和馬克思主义》，1924年塞文版(«Opća teorija prava i marksizma». 1924)。
- 托多尔·巴甫洛夫(Pavlov, Todor)
- 《反映論》，1936年(«Teorija odraza». 1936)。
- 《辯证唯物主义哲学和专门科学》，1956年法文版(«La Philosophie matérialiste dialectique et les Sciences particulières». 1956)。
- 达尼洛·佩約維奇(Pejović, Danilo)
- 《现实世界——尼古拉·哈特曼的_本体論的基础》，1960年塞文版(«Realni svijet—Temelji ontologije Nicolaiia Hartmanna». 1960)。
- 加約·佩特罗維奇(Petrović, Gajo)
- 《格·瓦·普列汉諾夫的哲学观点》，1957年塞文版(«Filozofski pogledi G. V. Plehanova». 1957)。
- 莫薩·皮雅杰(Pijade, Moša)
- 《南斯拉夫共产党三十年》，1949年塞文版(«O tridesetgodišnjici Komunističke partije Jugoslavije». 1949)。
- 柏拉图(Platon)
- 《詭辯学派篇》(«Sofist»)。
- 格·瓦·普列汉諾夫(Plehanov, G. V.)
- 《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1883年俄文版(«Socializm i političeskaja borba». 1883)。
- 《我們的意見分歧》，1885年俄文版(«Naši raznoglasija». 1885)。
- 《論一元史观的发展問題》，1895年俄文版(«K voprosu o razvitii monističeskogo vzgljada na istoriju». 1895)。
- 《唯物主义史論丛》，1896年德文版(«Beiträge zur Geschichtes

- des Materialismus». 1896)。
- 《論唯物主义的历史观》，1897年俄文版(«O materialističeskom ponimanii istorii». 1897)。
- 《論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1898年俄文版(«K voprosu o roli ličnosti v istorii». 1898)。
- 《再論唯物主义》，1899年(«Još jednom materijalizam». 1899)。
- 《沒有地址的信》，1899—1900年俄文版(«Pisma bez odresa». 1899—1900)。
- 《論馬薩利克的书》，1901年(«O knjizi Masaryka». 1901)。
- 《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十八世紀的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繪画》，1905年俄文版(«Francuzskaja dramatičeskaja literatura i francuzskaja živopis XVIII v. s točki zrenija sociologii». 1905)。
- 《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一书俄譯本第二版的譯者序言》，1905年俄文版(«Predislovie perevodčika ko 2-mu izdaniju broš. F. Engelsa "L. F. i kr. klas. n. filos."». 1905)。
- 《馬克思的哲学演变》(讲演)，1906年俄文版(«Filosofskaja evoljucija Marksa». predav. 1906)。
- 《〈二十年〉文集第三版序言》，1908年俄文版(«Predgovor trećem izdanju žbornika "Za dvadeset godina"». 1908)。
- 《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問題》，1908年俄文版(«Osnovne voprosy marksizma» 1908)。
- 《战斗唯物主义》，1908—1910年德文版(«Materialismus militans». 1908—1910)。
- 《艺术与社会生活》，1912—1913年俄文版(«Iskusstvo i obščestvennaja žiznj». 1912—1913)。
-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Pokrovski, M. N.)
- 《俄国史》，1920年俄文版(«Povijest Rusije». 1920)。
- 若尔日·波利澤尔(Politzer, Georges)
- 《一次哲学表演的終結：柏格森主义》，1929年法文版(«Fin d'une parade philosophique, le bergsonisme». 1929)。
- 亨利希·波皮茨(Popitz, Heinrich)
- 《異化的人》，1953年德文版(«Der entfremdete Mensch». 1953)。

米倫蒂耶·波波維奇(Popović, Milentije)

《国家資本主义在社会发展中意味着什么?》,1953年塞文版(«Šta državni kapitalizam znači u društvenom razvitku». 1953)。

《关于現代社会主义思想的若干問題的札記》,1959年塞文版(«Beleške o nekim problemima savremene socijalističke misli». 1959)。

馬賽尔·普雷南(Prenant, Marcel)

《生物学和馬克思主义》,1935年法文版(«Biologie et marxisme». 1935)。

奥格年·普里察(Prica, Ognjen)

《現代哲学和自然科学》,1937年塞文版(«Suvremena filozofija i prirodne znanosti». 1937)。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綱領》,1958年塞文版(«Program Saveza komunista Jugoslavije». 1958)。

約瑟夫·蒲魯东(Proudhon, Joseph)

《什么是財產?》,1840年法文版(«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1840)。

《經濟矛盾的制度》,1846年法文版(«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1846)。

《人民銀行》,1848年法文版(«Banque du peuple». 1848)。

《社会問題的解决》,1848年法文版(«Solution du problème social». 1848)。

《交換銀行》,1848年法文版(«La banque d'échange». 1848)。

《进步哲学》,1853年法文版(«Philosophie du progres». 1853)。

《第一国际》,1950年塞文版(«Prva Internacionala». 1950)。

麦克斯·拉法伊尔(Raphael, Max)

《蒲魯东、馬克思、毕加索》,1933年法文版(«Proudhon, Marx, Picasso». 1933)。

《精神創造論》(«Teorija duhovnog stvaralaštva»)。初版书名为《具体辯证法的認識論》,1934年德文版(«Zur Erkenntnistheorie der konkreten Dialektik». 1934)。

《史前的岩洞繪画》,1945年英文版(«Prehistoric Cave Painting». 1945)。

《埃及史前的陶器和文明》，1947年英文版(«Prehistoric Pottery and Civilisation in Egypt». 1947)。

威廉·萊希(Reich, Wilhelm)

《辯证唯物主义和心理分析》，1934年塞文版(«Dijalektički materijalizam i psihoanaliza». 1934)。

卡尔·倫納(Renner, Karl)

《法律制度的社会职能》，1904年(«Socijalna funkcija pravnih instituta». 1904)。

《馬克思主义、战争和国际》，1917年德文版(«Marxismus, Krieg und Internationale». 1917)。

《作为完整过程的經濟和社会化》，1924年德文版(«Die Wirtschaft als Gesamtprozess und die Sozialisierung». 1924)。

《实现的途径》，1929年德文版(«Wege der Verwirklichung». 1929)。

《人和社会》，1952年德文版(«Mensch und Gesellschaft». 1952)。

《現代社会的变化》，1953年德文版(«Wandlungen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1953)。

維利科·里巴尔(Ribar, Veljko)

《辯证法原理》，1922年塞文版(«Principi dijalektike». 1922)。

德·梁贊諾夫(Rjazanov, D.)

《馬克思和恩格斯》，1922年俄文版(«Marx i Engels». 1922)。

亨利埃特·罗兰-霍斯特(Roland-Holst, H.)

《約瑟夫·狄慈根的哲学对无产阶级的意义浅釋》，1910年德文版(«Joseph Dietzgens Philosophie gemeinverständlich erläutert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as Proletariat». 1910)。

阿尔都尔·罗森堡(Rosenberg, Arthur)

《从馬克思到現在的布尔什維主义史》，1932年德文版(«Geschichte des Bolschewismus von Marx bis zur Gegenwart». 1932)。

让·雅·卢梭(Rousseau, J. J.)

《社会契約論》，1762年法文版(«Contrat social». 1762)。

姆·姆·罗森塔尔(Rozental, M. M.)

《馬克思主义辯证方法》，1947年俄文版(«Marksistskij dialektičeskij, metod». 1947)。

馬克西米利安·卢貝耳(Rubel, Maximilien)

《社会主义倫理学問題文集》，1948年法文版(«Pages choisies pour une éthique socialiste» 1948)。

《卡尔·馬克思思想傳記》，1957年法文版(«Karl Marx essai de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 1957)。

保尔·山多尔(Sandor, Paul)

《辯证法的历史》，1945年法文版(«Histoire de la dialectique» 1945)。

让·保·薩特(Sartre, J. P.)

《嘔吐》，1938年法文版(«La Nausée» 1938)。

《有与无》，1944年法文版(«L'Être et le Néant» 1944)。

《自由之路》，1945—1949年法文版(«Les Chemins de la Liberté» 1945—1949)。

《斯大林的怪影》，1957年法文版(«Le fantôme de Staline» 1957)。

《辯证理性批判》，1960年法文版(«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1960)。

庫尔特·薩烏尔兰德(Sauerland, Kurt)

《辯证唯物主义》第1卷，1932年德文版(«Der dialektische Materialismus» I, 1932)。

亚当·沙夫(Schaff, Adam)

《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的理論的几个問題》，1954年德文版(«Zu einigen Fragen der marxistischen Theorie der Wahrheit» nj. izd. 1954)。

《語义学导論》，1960年波兰文版(«Wstep do semantyki» 1960)。

厄尔文·施略丁格尔(Schrödinger, Erwin)

《論物理学上的非决定論》，1932年德文版(«Über Indeterminismus in der Physik» 1932)。

姆·謝列克托尔(Selektor, M.)

《辯证唯物主义和平衡論》，1934年俄文版(«Dialektičeskij materializm i teorija ravnovesija» 1934)。

霍华德·塞尔森(Selsam, Howard)

《社会主义和倫理学》，1943年写，1955年德文版(«Sozialismus und

Ethik», 1943, n. j. izd. 1955)。

《革命中的哲学》，1957年英文版(«Philosophy in Revolution», 1957)。

路西安·塞佛(Sève, Lucien)

《昂·勒弗夫尔和馬克思的辯证法》，1958年法文版(«H. Lefevre et la dialectique chez Marx», 1958)。

伊格納集奧·西朗內(Silone, Ignazio)

《法西斯主义》，1934年(«Fašizam», 1934)。

威納尔·桑巴特(Sombart, Werner)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1924年德文版(«Der proletarische Sozialismus», 1924)。

《現代資本主义》，1927年德文版(«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1927)。

約翰·桑默維勒(Somerville, John)

《苏維埃哲学。理論和实践研究》，1946年英文版(«Soviet Philosophy. A Stud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1946)。

《和平的哲学》，1949年英文版(«Philosophy of Peace», 1949)。

若尔日·索列尔(Sorel, Georges)

《論暴力》，1906年法文版(«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1906)。

《馬克思主义的分析》，1908年法文版(«Décomposition du Marxisme», 1908)。

《进步的幻想》，1908年法文版(«Illusions du progrès», 1908)。

《一种无产阶级理論的材料》，1919年法文版(«Matériaux d'une théorie du prolétariat», 1919)。

約·維·斯大林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1907年俄文版。

《馬克思主义和民族問題》，1913年俄文版。

《論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俄文版。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1925年俄文版。

《論列宁主义的几个問題》，1926年俄文版。

《在粮食战线上》，1928年俄文版。

《論联共(布)党內的右傾危險》，1928年俄文版。

- 《論联共(布)党內的右傾》，1929年俄文版。
《大轉变的一年》，1929年俄文版。
《論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問題》，1929年俄文版。
《胜利冲昏头脑》，1930年俄文版。
《答集体农庄庄員同志們》，1930年俄文版。
《第一个五年計划的总结》，1933年俄文版。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年俄文版。
《关于苏联宪法草案》，1936年俄文版。
《論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俄文版。
《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俄文版。
《論馬克思主义在語言学中的問題》，1950年俄文版。
《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1952年俄文版。

魯道夫·施塔姆列尔(Stammler, Rudolf)

- 《从唯物史观看經濟和法》，1896年德文版(《Wirtschaft und Recht na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1896)。
《社会主义和基督教》，1920年德文版(《Sozialismus und Christentum》1920)。

弗兰茨·施陶丁格尔(Staundinger, Franz)

- 《倫理和政治》，1899年德文版(《Ethik und Politik》1899)。
《道德的經濟基础》，1907年德文版(《Wirtschaftliche Grundlagen der Moral》1907)。
《政治的文化基础》，1914年德文版(《Kulturgrundlagen der Politik》1914)。

弗里茨·施特恩堡(Sternberg, Fritz)

- 《帝国主义》，1926年德文版(《Der Imperialismus》1926)。

大·弗·施特劳斯(Strauss, D. F.)

- 《耶穌傳》，1835年德文版(《Das Leben Jesu》1835)。

姆·斯·斯特罗果維契(Strogovič, M. S.)

- 《邏輯学》，1949年俄文版(《Logika》1949)。

让·苏勒-卡納累(Suret-Canale, J.)

《昂·勒弗夫尔的方法》，1958年法文版（«La méthode de H Lefevre». 1958）。

保·姆·斯威济 (Sweezy, P. M.)

《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1942年（«Teorija kapitalističkog razvoja». 1942）。

《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1908年法文版（«Syndikalisme et socialisme». 1908）。

波格丹·舍施奇 (Šešić, Bogdan)

《约瑟夫·狄慈根的辩证唯物主义》，1957年塞文版（«Dijalektički materijalizam Josepha Dietzgena». 1957）。

《辩证逻辑导论》，1957年塞文版（«Uvod u dijalektičku lagoku». 1957）。

阿·施什金 (Šeškin, A.)

《共产主义道德原理》，1955年俄文版（«Osnovy komunističeskoj morali» 1955）。

奥古斯特·塔尔海麦 (Thalheimer, August)

《辩证唯物主义导论》，1928年德文版（«Einführung in den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 1928）。

瓦尔特·泰麦 (Theimer, Walter)

《马克思主义》，1950年德文版（«Der Marxismus» 1950）。

埃利希·梯叶尔 (Thier, Erich)

《青年马克思的人类学》，1950年德文版（«Anthropologie des jungen Marx» 1950）。

约瑟夫·布罗兹·铁托 (Tito, Josip Broz)

《人民解放游击队的任务》，1941年塞文版（«Zadatak Narodnooslobodilačkih partizanskih odreda». 1941）。

《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南共中央的政治报告》，1948年塞文版（«Politički izvještaj CK KPJ na V kongresu». 1948）。

《论工人管理企业》，1950年塞文版（«O radničkom upravljanju preduzećima» 1950）。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为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在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52年塞文版（«Borba komunista Jugoslavije za

- socijalističku demokraciju», Ref. na VI kongresu KPJ. 1952)。
- 《向伊斯特里亚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积极分子发表的演说》，1956年塞文版 (《Govor pred aktivom komunista iz Istre》1956)。
-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国际局势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内部发展中的任务 (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58年塞文版 (《Zadaci Saveza komunista u vezi s međunarodnom situacijom i unutrašnjim razvojem socijalističke izgradnje Jugoslavije», Ref. na VII kongresu SKJ. 1958)。
- 《南斯拉夫共产党革命斗争的四十年》，1959年塞文版 (《Četrdeset godina revolucionarne borbe Komunističke partije Jugoslavije》1959)。
- 《社会主义建设和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的作用和任务 (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0年塞文版 (《Izgradnja socijalizma i uloga i zadaci Socijalističkog saveza radnog naroda Jugoslavije》 Ref. na V kongresu SSRNJ. 1960)。

陈德討 (Tran-Duc-Thao)

- 《现象学和辩证唯物主义》，1951年法文版 (《Phénoménologie et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1951)。

列·托洛茨基 (Trocki, L.)

- 《俄国革命的总结和前途》，1906年俄文版 (《Itogi i perspektivy Russkoj revolucii》1906)。
- 《1905年》，1923年法文版 (《1905》. franc. izd. 1923)。
-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驳考茨基》，1920年德文版 (《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 Anti Kautsky》1920)。
- 《自传》，1929年德文版 (《Mein Leben》. 1929)。
- 《俄国革命史》第1,2卷，1931—1932年德文版 (《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I,II, 1931—1932)。
- 《不断革命》，1932年法文版 (《La révolution permanente》. fr. izd. 1932)。

- 《关于“不断革命”論問題的历史資料》，1933年德文版(«Eine geschichtliche Information zur Frage über die Theorie der “Permanenten Revolution”», 1933)。
- 《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1933年德文版(«Sozialismus in einem Lande?», nj. izd. 1933)。
- 《保卫苏联》(«In Defense of the Sovjet Union»)。
- 《革命被出卖了》第1、2卷, 1937年法文版(«La Révolution trahie», I, II. 1937)。
- 符·普·图加林諾夫(Tugarinov, V. P.)
- 《辯证唯物主义范畴的关系》，1956年俄文版(«Sootnošenie kategorij dialektičeskogo materializma» 1956)。
- 恩斯特·翁特尔曼(Untermann, Ernst)
- 《狭义馬克思主义的邏輯缺陷》，1910年德文版(«Die logischen Mängel des engeren Marxismus» 1910)。
- 弗·瓦連廷諾夫(Valentinov, V.)
- 《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1908年俄文版(«Filosofskie postroenija marksizma» 1908)。
- 利奧·瓦利安尼(Valiani, Leo)
- 《二十世紀社会主义史》，1946年法文版(«Histoire du socialisme au XX^e siècle», 1946)。
- 叶·瓦尔加(Varga, E.)
-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資本主义經濟中引起的变化》，1946年(«Promjene u ekonomici kapitalizma uslijed drugog svjetskog rata», 1946)。
- 維利科·弗拉霍維奇(Vlahović, Veljko)
- 《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概念和实质》，1958年塞文版(«Pojam i suština proleterskog internacionalizma» 1958)。
-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和思想斗爭的“尖銳化”》，1958年塞文版(«Program SKJ i “zaoštrenje” ideološke borbe», 1958)。
- 符·恩·沃洛申諾夫(Vološinov, V. N.)
- 《弗洛伊德主义》，1937年塞文版(«Frojdizam», 1937)。
- 卡尔·沃倫德尔(Vorländer, Karl)

《康德和社会主义》，1900年德文版(«Kant und der Sozialismus». 1900)。

《康德的生平》，1911年德文版(«Kants Leben». 1911)。

《康德和马克思》，1911年德文版(«Kant und Marx». 1911)。

《哲学家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1920年德文版(«Marx, Engels und Lassalle als Philosophen». 1920)。

《从马基雅弗利到列宁》，1926年德文版(«Von Machiavelli zum Lenin». 1926)。

《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1929年德文版(«Karl Marx,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1929)。

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Vranicki, Predrag)

《就日丹诺夫对亚历山大洛夫的批评谈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问题》，1950年塞文版(«O nekim pitanjima marksističke teorije u vezi sa Ždanovljevom kritikom Aleksandrova». 1950)。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一般、特殊和个别问题》，1952年塞文版(«O problemu općeg, posebnog i pojedinačnog kod klasika marksizma». 1952)。

《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发展》，1953年塞文版(«Misaoni razvitak Karla Marxa». 1953)。

《哲学研究和批判》，1957年塞文版(«Filozofske studije i kritike». 1957)。

《对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的一种看法》，1957年塞文版(«Jedan pogled na problem odnosa teorije i prakse». 1957)。

昂利·瓦龙(Wallon, Henri)

《对思维的作用》，1942年法文版(«De l'acte à la pensée». 1942)。

哈利·威尔斯(Wells, Harry)

《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哲学》，1954年英文版(«Pragmatisme—Philosophy of Imperialism». 1954)。

古斯达夫·韦特尔(Wetter, Gustav)

《辩证唯物主义》，1948年写，1952年德文版(«Der dialektische Materialismus». 1948, 1952)。

威廉·文德尔班(Windelband, Wilhelm)

《哲学史讀本》，1891年德文版（《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1891）。

《序論》（一、二），1911年德文版（《Präludien》. I, II, 1911）。

卡·阿·維特福格尔(Wittfogel, K. A.)

《市民社会的科学》，1922年德文版（《Die Wissenschaft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1922）。

《市民社会的历史》，1924年德文版（《Die Geschicht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1924）。

路德維希·沃尔特曼(Woltmann, Ludwig)

《道德意識体系》，1898年德文版（《System des moralischen Bewusstseins》. 1898）。

《达尔文理論和社会主义》，1899年德文版（《Darwinsche Theorie und der Sozialismus》. 1899）。

《历史唯物主义》，1900年德文版（《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1900）。

鮑里斯·季赫尔(Ziherl, Boris)

《文学和社会》，1958年塞文版（《Književnost i društvo》. 1958）。

安·亚·日丹諾夫(Ždanov, A. A.)

《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1946年俄文版（《Referat o časopisima "Zvijezda" i "Lenjingrad"》. 1946）。

《論国际形势》，1947年俄文版（《O međunarodnoj situaciji》. 1947）。

《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一书討論会上的发言》，1947年俄文版（《Vystuplenie v diskusii, pov. knj. Aleksandrova. 1947》）。

柳博米尔·日夫科維奇(Živković, Ljubomir)

《关于社会的科学》，1958年塞文版（《Nauka o društvu》. 1958）。

《社会上层建筑》，1960年塞文版（《Društvena nadgradnja》. 1960）。

期刊和报纸

《年鉴》（《Annali》, 季·弗耳特兰納利学院出版），《布尔什維克》（《Borbovik》），《战斗报》（《Borba》），《犁沟》（《Brazda》），《共产主义手册》（《Cahiers du communisme》），《社会批判》（《Critica sociale》），《今天》

(«Danas»)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社会进步》(«Devenir Social»), 《平等》(«L'Egalité»), 《新世纪》(«L'Ere Nouvelle»), 《马克思学研究》(«Études de marxologie», 《实用经济学研究所学报》评论专集), 《钟声》(«Die Glocke»), 《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①, 《人道报》(«Humanité»), 《国际》(«Die Internationale»), 《火星报》(«Iskra»), 《表现》(«Izraz»), 《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学杂志》(«Jugoslavenski časopis za filozofiju i sociologiju»), 《斗争》(«Der Kampf»), 《文坛》(«Književna republika»), 《列宁格勒》(«Leningrad»), 《文学报》(«Literatura»), 《马克思主义研究》(«Marxismusstudien»), 《马克思研究》(«Marxstudien»,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治期刊), 《我们的实况》(«Naša stvarnost»), 《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新时代》(«Die Neue Zeit»), 《新评论》(«La nouvelle critique»), 《新文学》(«Nova literatura»), 《新生活》(«Novaja žiznj»), 《新秩序报》(«Ordine Nuovo»), 《烙印》(«Peč-at»), 《思想》(«La Pensée»), 《火焰》(«Plamen»),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Pod znamenem marksizma»), 《真理报》(«Pravda»), 《工人事业报》(«Raboče delo»), 《法兰西共和国》(«République Française»), 《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 《红旗报》(«Die Rote Fahne»), 《瑞士共和主义者》(«Schweizerischer Republikaner»), 《自由》(«Sodobnost»), 《社会主义者》(«Der Sozialist»), 《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轴心》(«Stožer»), 《葛兰西研究》(«Studi Gramsciani»), 《电讯》(«Telegraph»)②, 《现时代》(«Les Temps Modernes»), 《艺术和批评》(«Umjetnost i kritika»), 《新路》(«Voies Nouvelles»), 《哲学问题》(«Voprosy filosofii»), 《历史问题》(«Voprosy istorii»), 《前进报》(«Vorwärts»), 《前进》(«Vpered»), 《天平》(«Die Wage»), 《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科学和生活》(«Znanost i život»), 《星》(«Zvijezda»)。

① 全称应为《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译者注

② 全称应为《德意志电讯》。——译者注

人名索引

三 画

大卫, 爱 · (David, F.)
山多尔, 保 · (Sandor, P.)

四 画

比果, 皮 · (Bigo, P.)
比哈利-梅林, 普 · (Bihalji-Merin, P.)
比霍夫斯基, 勃 · (Bihovski, B.)
比索拉蒂, 列 · (Bissolati, L.)
巴比, 日 · (Baby, J.)
巴尔特, 亨 · (Barth, H.)
巴伊特, 亚 · (Bajt, A.)
巴枯宁, 米 · (Bakunjin, M.)
巴乌曼, 斯 · (Bauman, S.)
巴卡里奇, 弗 · (Bakarić, V.)
巴尔扎克, 奥 · (Baizac, H.)
巴尔托利, 昂 · (Bartoli, H.)
巴札罗夫, 符 · (鲁德涅夫, 符 · 阿 ·)
(Bazarov, V. [Rudnev, V. A.])
巴甫洛夫, 托 · (Pavlov, T.)
巴门尼德(Parmenid)
巴拉托诺, 阿 · (Baratono, A.)
巴斯卡尔, 布 · (Pascal, B.)
巴赫拉德, 加 · (Bachelard, G.)
切尼奇, 米 · (Cenić, M.)
切尔诺夫, 维 · (Černov, V.)
切尔帕诺夫, 格 · (Čelpanov, G.)
切尔特柯夫, 符 · 普 · (Čertkov, V. P.)

厄尔斯特, 埃 · (Elster, E.)
厄南德兹, 黑 · (Ernandez, H.)
日果, 阿 · (Gigot, A.)
日夫科维奇, 柳 · (Živković, Lj.)
日丹诺夫, 安 · 亚 · (Ždanov, A. A.)
尤尔, 安 · (Ure, A.)
尤克(Jukes)
尤金, 巴 · (Judin, P.)
尤什凯维奇, 巴 · 索 · (Juškević, P. S.)
戈宾诺, 约 · 阿 · (Gobineau, J. A.)
戈利查尔, 约 · (Goričar, J.)
内特劳, 姆 · (Nettlau, M.)
内德利科维奇, 杜 · (Nedeljković, D.)
韦特尔, 古 · (Wetter, G.)
韦斯顿, 约 · (Weston, J.)
文巴尔格, 鲁 · (Wienbarg, L.)
文德尔班, 威 · (Windelband, W.)
丹汉姆, 巴 · (Dunham, B.)
丹尼尔逊, 尼 · (Danielson, N.)
方志敏(Fang Čih-min)
毛泽东(Mao Ce-tung)
孔德, 奥 · (Comte, A.)
牛顿, 伊 · (Newton, I.)
王德威尔得, 艾 · (Vandervelde, E.)

五 画

布丁, 路 · (Boudin, L.)
布尔, 路 · (Buhl, L.)
布坚科, 阿 · 普 · (Butenko, A. P.)

- 布洛克, 馬 • (Bloch, M.)
 布洛利, 德 • 耳 • (Broglie, de L.)
 布洛赫, 約 • (Bloch, J.)
 布洛赫, 恩 • (Bloch, E.)
 布哈林, 尼 • (Buharin, N.)
 布特魯, 埃 • (Boutroux, E.)
 布朗基, 奧 • (Blanqui, A.)
 布萊特, 約 • (Bright, J.)
 布雷叶, 厄 • (Brehier, E.)
 布魯諾, 喬 • (Bruno, G.)
 布魯斯, 保 • (Brousse, P.)
 布兰德勒, 亨 • (Brandler, H.)
 布倫坦諾, 羅 • (Bretano, L.)
 布尔加柯夫, 謝 • 尼 • (Bulgakov, S. N.)
 布勞恩塔爾, 阿 • (Braunthal, A.)
 布倫希維克, 耳 • (Brunschvicq, L.)
 白尔尼, 路 • (Börne, L.)
 白里安, 亞 • (Briand, A.)
 白拉克, 威 • (Bräcke, W.)
 卡万, 姆 • (Caveing, M.)
 卡普, 沃 • (Kapp, W.)
 卡夫卡, 弗 • (Kafka, F.)
 卡尔文, 让 • (Calvin, J.)
 卡尔維, 让 • 伊 • (Calvez, J. Y.)
 卡列夫, 尼 • (Karev, N.)
 卡納帕, 让 • (Kanapa, J.)
 卡特林, 乔 • (Catlin, G.)
 卡勒帕, 格 • (Canepa, G.)
 卡萊尔, 托 • (Carlyle, Th.)
 卡德尔, 爱 • (Kardelj, E.)
 卡德龙, 彼 • (Calderon, P.)
 卡尔納普, 魯 • (Carnap, R.)
 卡尔斯基, 尤 • (Karski, J.)
 卡尔薩文, 尔 • (Karsavin, L.)
 卡列耶夫, 尼 • 伊 • (Karejev, N. J.)
 卡桑諾瓦, 加 • (Casanova, G.)
 卡斯巴里 (Caspari)
 卡雷舍夫, 尼 • 亞 • (Karyšev, N. A.)
 弗兰克, 菲 • (Frank, F.)
 弗拉塞, 让 • 格 • (Fraser, J. G.)
 弗罗姆, 埃 • (Fromm, E.)
 弗雷斯, 卡 • 尼 • (Fraas, K. N.)
 弗兰克尔, 列 • (Fränkel, L.)
 弗里布尔, 厄 • (Fribourg, E.)
 弗里德曼, 若 • (Friedmann, G.)
 弗路朗斯, 古 • (Flourans, G.)
 弗兰尼茨基, 普 • (Vranicki, P.)
 弗拉霍維奇, 維 • (Vlahović, V.)
 弗萊里格拉特, 斐 • (Freiligrath, F.)
 弗里德里希二世 (Friedrich II)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Friedrich Wilhelm III)
 加尔, 路 • (Gall, L.)
 加克, 格 • 姆 • (Gak, G. M.)
 加里宁, 米 • (Kalinjin, M.)
 加罗迪, 罗 • (Garaudy, R.)
 加米涅夫, 列 • 波 • (Kamenjev, L. B.)
 加洛加日阿, 斯 • (Galogaža, S.)
 古特曼, 恩 • (Guterman, N.)
 古尔維奇, 若 • (Gurvitch, G.)
 兰克 (Ranke)
 兰格, 里 • (Lang, R.)
 兰格, 麦 • 格 • (Lange, M. G.)
 兰格, 普 • (Lange, P.)
 兰茨堡, 普 • (Landsberg, P.)
 兰科維奇, 亞 • (Ranković, A.)
 卢格, 阿 • (Ruge, A.)
 卢梭, 让 • 雅 • (Rousseau, J. J.)
 卢卡奇, 乔 • (Lukács, G.)
 卢貝耳, 馬 • (Rubel, M.)
 卢利叶, 阿 • (Lurije, A.)

卢森堡, 罗 · (Luxemburg, R.)
 卢克萊茨, 卡 · (Lukrecije, K.)
 卢那察尔斯基, 安 · 瓦 · (Lunačarski, A. V.)
 尼采, 弗 · (Nietzsche, F.)
 尼迈耶, 格 · (Niemeyer, G.)
 尼古拉也夫斯基, 鲍 · (Nikolajevski, B.)
 皮克, 威 · (Pieck, W.)
 皮雅杰, 莫 · (Pijade, M.)
 皮达可夫, 格 · 列 · (Pjatakov, G. L.)
 皮安尼奇, 左 · (Pjanić, Z.)
 皮薩列夫, 德 · 伊 · (Pisarev, D. I.)
 圣西門(Saint-Simon)
 司丹达尔(Stendhal)
 司徒卢威, 彼 · (Struve, P.)
 台尔曼, 恩 · (Thälmann, E.)
 宇伯威希, 弗 · (Überweg, F.)
 瓦龙, 昂 · (Wallon, H.)
 瓦尔加, 叶 · (Varga, E.)
 瓦尔兰, 路 · 欧 · (Varlain, L. E.)
 瓦格納, 阿 · (Wagner, A.)
 瓦勒里, 保 · (Valéry, P.)
 瓦尔斯基 (米哈尔科夫斯基) (Warski (Michalkowski))
 瓦利安尼, 利 · (Valiani, L.)
 瓦連廷諾夫, 尼 · (Valentinov, N.)
 左拉, 艾 · (Zola, E.)

六 画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
 亚历山大洛夫, 格 · 費 · (Aleksandrov, G. F.)
 艾伯特, 弗 · (Ebert, F.)
 艾耶尔, 阿 · 約 · (Ayer, A. J.)
 艾韦貝克, 奧 · (Everbeck, A.)

艾希特迈, 泰 · (Echtermayer, Th.)
 毕丰, 乔 · (Buffon, G.)
 毕加索, 帕 · (Picasso, P.)
 毕希納, 格 · (Büchner, G.)
 毕希納, 路 · (Büchner, L.)
 毕歇尔, 卡 · (Bücher, K.)
 乔皮奇, 弗 · (Čopić, V.)
 乔拉柯維奇, 罗 · (Čolaković, R.)
 朱德(Ču De)
 达尔文, 查 · (Darwin, Ch.)
 达烏盖, 巴 · (Dauge, P.)
 达普切維奇—庫查尔, 斯 · (Dapčević-Kučar, S.)
 多布, 莫 · (Dobb, M.)
 多伊奇, 利 · (Deutsch, L.)
 多尔富斯, 恩 · (Dollfuss, E.)
 多伊彻尔, 伊 · (Deutscher, I.)
 伊波利特, 让 · (Hyppolite, J.)
 伊壁鳩魯(Epikur)
 伊格納托夫, 瓦 · (Ignjatov, V.)
 吉約姆, 詹 · (Guillaume, J.)
 考茨基, 卡 · (Kautsky, K.)
 考茨基, 敏 · (Kautsky, M.)
 色諾芬(Ksenofan)
 列宁, 弗 · 伊 · (Lenjin, V. I.)
 列金, 卡 · (Legien, K.)
 列昂, 德 · 丹 · (Leon, de D.)
 列曼(Lehmann)
 列維, 保 · (Levy, P.)
 列瓦伊, 伊 · (Révaj, J.)
 列維特, 斯 · (Levit, S.)
 列昂节夫, 阿 · (Leontijev, A.)
 列奧諾夫, 姆 · 阿 · (Leonov, M. A.)
 迈尔, 古 · (Mayer, G.)
 迈耶尔, 厄 · (Meyer, E.)
 迈耶尔, 格 · (Meyer, G.)

米丁, 馬·鮑· (Mitin, M. B.)
 米宁, 奧· (Minin, O.)
 米克, 羅· (Meek, R.)
 米涅, 弗· (Mignet, F.)
 米尼耶, 昂· (Mineur, H.)
 米丘林, 伊·弗· (Mičurin, I. V.)
 米勒蘭, 亞· (Millerand, A.)
 米歇爾, 羅· (Michels, R.)
 米歇爾, 路· (Michel, L.)
 米赫里遜, 亞· (Michelson, A.)
 米哈伊洛夫, 季· (Mihajlov, T.)
 米海洛夫斯基, 尼·康· (Mihajlovski, N. K.)
 西朗內, 伊· (Silone, I.)
 西姆科維茨, 格· (Simkowitch, G.)
 西羅特科維奇, 雅· (Sirotković, J.)
 孫中山 (Sun Jat-sen)
 托倫, 昂·路· (Tolain, H. L.)
 托蘭德, 約· (Toland, J.)
 托爾斯泰, 列· (Tolstoj, L.)
 托爾斯泰, 阿· (Tolstoj, A.)
 托洛茨基, 列·達· (列·勃朗施坦)
 (Trocki, L. D. (L. Bronstein))
 托姆斯基, 米·巴· (Tomski, M. P.)
 伏羅希洛夫, 克· (Vorošilov, K.)

七 画

貝爾, 麥· (Beer, M.)
 貝爾納, 約·德· (Bernal, J. D.)
 貝希曼 (Bechmann)
 貝倫斯, 弗· (Behrens, F.)
 貝爾福特-巴克斯, 厄· (Bax Belfort, E.)
 別爾曼, 雅·亞· (Berman, J. A.)
 別爾托夫, 恩· (瓦·普列漢諾夫) (Belj-tov, N. (V. Plehanov))

別林斯基, 維·格· (Bjelinski, V. G.)
 別爾嘉也夫, 尼· (Berdjajev, N.)
 伯姆-巴韋克, 歐· (Böhm-Bawerk, E.)
 伯恩施坦, 愛· (Bernstein, E.)
 邦奈, 阿· (Bonnet, A.)
 邦納羅蒂, 菲· (Buonarotti, F.)
 克瓦紐, 日· (Coignot, G.)
 克羅齊, 貝· (Croce, B.)
 克朗納, 理· (Kroner, R.)
 克虜伯 (Krupp)
 克蘭諾德, 阿· (Kranold, A.)
 克尼爾施, 彼· (Knirsch, P.)
 克利文柯, 謝·尼· (Krivenko, S. N.)
 克里斯平, 阿· (Crispin, A.)
 克倫斯基, 亞·費· (Kerenski, A. F.)
 克朗能堡, 姆· (Kronenberg, M.)
 克勒斯比, 斯·布· (Crespi, S. B.)
 克雷夫特, 布· (Kreft, B.)
 克雷希奇, 安· (Krešić, A.)
 克魯皮奇, 薩· (Krupić, S.)
 克爾湖萬尼, 奧· (Keršovani, O.)
 克爾累日阿, 米· (Krleža, M.)
 克爾凱郭爾, 蕭· (Kierkegaard, S.)
 克努泡特金, 彼· (Kropotkin, P.)
 克里切夫斯基, 鮑· (Kričevski, B.)
 克列斯廷斯基, 尼· (Krestinski, N.)
 陳獨秀 (Čen Tu-sju)
 陳德討 (Tran-Duc-Thao)
 車斯諾柯夫, 德·伊· (Česnokov, D. I.)
 車爾尼雪夫斯基, 尼·加· (Černiševski, N. G.)
 杜林, 歐· (Dühring, E.)
 杜岡-巴拉諾夫斯基, 米·伊· (Tugan-Baranovski, M. J.)

杜恒, 比 · (Duhem, P.)
 杜威, 約 · (Dewey, J.)
 杜尔克姆, 艾 · (Durkheim, E.)
 狄尔泰, 威 · (Dilthey W.)
 狄特曼, 威 · (Ditmann, V.)
 狄慈根, 欧 · (Dietzgen, E.)
 狄慈根, 約 · (Dietzgen, J.)
 狄德罗, 德 · (Diderot, D.)
 麦克唐納, 拉 · (Donald, R. M.)
 佛赫特, 伊 · (Focht, I.)
 伽利略, 伽 · (Galilei, G.)
 谷兹科夫, 卡 · (Gutzkow, K.)
 希法亭, 魯 · (Hilferding, R.)
 希特勒, 阿 · (Hitler, A.)
 辛格尔, 保 · (Singer, P.)
 亨利克斯, 海 · 弗 · 威 · (Hinrichs, H. F. W.)
 劳貝, 亨 · (Laube, H.)
 里若, 尔 · (Rigot, R.)
 里維, 希 · (Levy, H.)
 里巴尔, 維 · (Ribar, V.)
 里斯提奇, 馬 · (Ristić, M.)
 李大釗(Li Ta-čao)
 李比希, 尤 · (Liebig, J.)
 李可夫, 阿 · 伊 · (Rikov, A. I.)
 李立三(Li Li-san)
 李森科, 特 · 捷 · (Lisenko, T. D.)
 李普曼, 奧 · (Liebmann, O.)
 李嘉图, 大 · (Ricardo, D.)
 李希特曼, 茲 · (Richtmann, Z.)
 李凯尔特, 亨 · (Rickert, H.)
 李卜克内西, 卡 · (Liebknecht, K.)
 李卜克内西, 威 · (Liebknecht, W.)
 那托尔卜, 保 · (Natorp, P.)
 沙夫, 亞 · (Schaff, A.)
 沙佩尔, 卡 · (Schapper, K.)

苏勒-卡納累, 让 · (Suret-Canale, J.)
 苏佩克, 魯 · (Supek, R.)
 苏沃洛夫, 謝 · 亞 · (Suvorov, S. A.)
 苏特利奇, 弗 · (Sutlić, V.)
 沃尔弗, 尤 · (Wolff, J.)
 沃尔弗, 洛 · (Wolff, L.)
 沃尔弗, 威 · (Wolff, W.)
 沃龙佐夫, 瓦 · (Voroncov, V.)
 沃尔特曼, 路 · (Woltmann, L.)
 沃約維奇, 腊 · (Vujović, R.)
 沃倫德尔, 卡 · (Vorländer, K.)
 沃洛申諾夫, 符 · 恩 · (Vološinov, V. N.)

八 画

阿貝馬, 日 · (Habermas, J.)
 阿季亞, 博 · (Adžija, B.)
 阿倫特, 恩 · 摩 · (Arndt, E. M.)
 阿勒曼, 让 · (Allemane, J.)
 阿德勒, 弗 · (Adler, F.)
 阿德勒, 麦 · (Adler, M.)
 阿德勒, 維 · (Adler, V.)
 阿多尔諾, 特 · (Adorno, Th.)
 阿斯穆斯, 符 · 弗 · (Asmus, V. F.)
 阿基米得(Arhimed)
 阿夫拉莫夫, 阿 · (Avramov, A.)
 阿多拉茨基, 弗 · 維 · (Adoratski, V. V.)
 阿芬那留斯, 理 · (Avenarius, R.)
 阿尔勃萊希特, 厄 · (Albrecht, E.)
 阿克雪里罗得, 巴 · (Aksel'rod, P.)
 阿克雪里罗得, 柳 · 依 · (奧尔托多克斯)(Aksel'rod, Lj. I. (Ortodoks))
 阿那克西米尼(Anaksimēn)
 阿那克西曼德(Anaksimandar)
 阿那克薩哥拉(Anaksagora)

- 波尔, 尼 · (Bohr, N.)
 波佩, 伊 · 恩 · (Poppe, J. H.)
 波基, 阿 · (Poggi, A.)
 波尔恩, 麦 · (Born, M.)
 波皮茨, 亨 · (Popitz, H.)
 波洛克, 弗 · (Pollock, F.)
 波诺米, 伊 · (Bonomi, J.)
 波尔迪加, 亚 · (Bordiga, A.)
 波利泽尔, 若 · (Politzer, G.)
 波波维奇, 米 · (Popović, M.)
 波波维奇, 杜 · (Popović, D.)
 波波维奇, 约 · (Popović, J.)
 波多林斯基, 斯 · 阿 · (Podolinski, S. A.)
 波格丹诺夫, 亚 · (馬林诺夫斯基, 亚 · 亚 ·) (Bogdanov, A. [Malinovski, A. A.])
 波克罗夫斯基, 米 · 尼 · (Pokrovski, M. N.)
 波格丹诺维奇, 米 · (Bogdanović, M.)
 波德沃洛茨基, 伊 · (Podvolocki, J.)
 尚贝, 昂 · (Chambre, H.)
 金蒂雷, 卓 · (Gentile, G.)
 雨果, 维 · (Hugo, V.)
 林道, 鲁 · (Lindau, R.)
 罗兰-霍斯特, 亨 · (Roland-Holst, H.)
 罗素, 柏 · (Russel, B.)
 罗伦兹, 亨 · 安 · (Lorenz, H. A.)
 罗森堡, 阿 · (Rosenberg, A.)
 罗森塔尔, 姆 · (Rozenal, M.)
 罗赫豪森, 鲁 · (Rochhausen, R.)
 罗蒙诺索夫, 米 · 瓦 · (Lomonosov, M. V.)
 门克, 符 · (Mönke, W.)
 门德, 格 · (Mende, G.)
 门采尔, 沃 · (Menzel, W.)
 门得列也夫, 德 · 伊 · (Mendeljejev, D. I.)
 孟德尔, 格 · (Mendel, G.)
 孟德斯鸠, 沙 · (Montesquieu, Ch.)
 弥勒-黑格曼, 迪 · (Müller-Hegemann, D.)
 帕兰, 希 · (Parain, Ch.)
 帕施希, 纳 · (Pašić, N.)
 帕勒托, 维 · (Pareto, V.)
 帕尔乌斯 (Parvus)
 帕本海姆, 符 · (Pappenheim, W.)
 帕苏坎尼斯, 伊 · 布 · (Pašukanis, J. B.)
 帕维切维奇, 弗 · (Pavičević, V.)
 佩拉吉奇, 瓦 · (Pelagić, V.)
 佩约维奇, 达 · (Pejović, D.)
 佩路提埃, 斐 · (Pelloutier, F.)
 佩特罗维奇, 加 · (Petrović, G.)
 彼洛夫斯卡娅, 索 · (Perovskaja, S.)
 拉松, 日 · (Lasson, G.)
 拉伯雷, 弗 · (Rabelais, F.)
 拉辛内, 伊 · 布 · (Racine, J. B.)
 拉狄克, 卡 · (Radek, K.)
 拉法格, 保 · (Lafargue, P.)
 拉采尔, 弗 · (Ratzel, F.)
 拉马克, 让 · 巴 · (Lamarck, J. B.)
 拉维涅, 耳 · (Lavergne, L.)
 拉蒙特, 科 · (Lamont, C.)
 拉萨尔, 斐 · (Lassalle, F.)
 拉伯伦纳, 普 · (Laberenne, P.)
 拉甫罗夫, 彼 · (Lavrov, P.)
 拉法伊尔, 麦 · (Raphael, M.)
 拉波波特, 沙 · (Rappoport, Ch.)
 拉普拉斯, 比 · 西 · (Laplace, P. S.)
 拉加尔德勒, 于 · (Lagardelle, H.)
 拉布里奥拉, 安东尼奥 (Labriola, An-

tonio)

拉布里奧拉, 阿尔图諾 (Labriola, Arturo)

拉利切維奇, 弗·(Raljcevič, V.)

拉柯夫斯基, 赫·格·(Rakovski, H. G.)

叔本华, 阿·(Schopenhauer, A.)

舍施奇, 波·(Šešić, B.)

季赫尔, 鲍·(Ziherl, B.)

季諾維也夫, 格·叶·(格·叶·拉多梅斯尔斯基)(Zinovjev, G. E. (G. E. Radomysljski))

季米里亚捷夫, 阿·克·(Timirjazev, A. K.)

图措維奇, 季·(Tucović, D.)

图加林諾夫, 符·普·(Tugarinov, V. P.)

图哈切夫斯基(Tuhačevski)

九 画

查利奇, 杜·(Čalić, D.)

查苏利奇, 維·(Zasulić, V.)

柯尔什, 卡·(Korsch, K.)

柏拉图(Platon)

柏格森, 昂·(Bergson, H.)

勃朗, 路·(Blanc, L.)

勃龙台, 莫·(Blondel, M.)

勃柳姆, 奥·(Blum, O.)

科尔, 乔·赫·(Cole, D. H.)

科本, 克·弗·(Köppen, C. F.)

科亨, 海·(Cohen, H.)

科昂, 姆·(Cohen, M.)

科夫勒, 利·(斯·瓦林斯基)(Kofler, L. (S. Warinski))

科尔努, 奥·(Cornu, A.)

科布頓, 理·(Cobden, R.)

科腊奇, 弗·(Korać, V.)

科腊奇, 姆·(Korać, M.)

科惹弗, 阿·(Kojève, A.)

科拉科夫斯基, 列·(Kolakovski, L.)

約里奧-居里, 弗·(Curie, F. J.)

約吉赫斯, 利·(Jogiches, L.)

約翰斯頓(Johnston)

約凡諾維奇, 治·(Jovanović, D.)

欧文, 罗·(Owen, R.)

欧格米尔(Euhemer)

迪耳, 卡·(Diehl, K.)

迪腊克, 保·安·莫·(Dirac, P. A. M.)

洛克, 約·(Locke, J.)

洛莫夫, 阿·(Lomov, A.)

洛斯基, 恩·(Loskij, N.)

耶穌(Isus)

哈姆, 符·(Hamm, W.)

哈澤, 胡·(Haase, H.)

哈厄林, 泰·(Haering, Th.)

哈利希, 符·(Harich, W.)

哈特曼, 尼·(Hartmann, N.)

哈登堡, 卡·奥·(Hardenberg, K.A.)

哈尔当内, 日·(Haldane, J.)

哈克納斯, 姆·(Harkness, M.)

哈恩尼施, 康·(Haenisch, K.)

胡克, 悉·(Hook, S.)

胡登, 姆·(Hutten, M.)

胡斯曼, 凱·(Huysmans, C.)

胡塞尔, 埃·(Husserl, E.)

施什金, 阿·(Šiškin, A.)

施瓦策, 亨·(Schwartz, H.)

施韦澤, 約·巴·(Schweizer, J. B.)

施米特, 罗·(Schmidt, R.)

施米特, 康·(Schmidt, C.)

施利克, 摩·(Schlick, M.)

施拉姆, 康 · (Schramm, K.)
 施泰因, 卡 · (Stein, K.)
 施莱登, 馬 · 雅 · (Schleiden, M. J.)
 施蒂納, 麥 · (伊 · 卡 · 施米特) (Stirner, M. (J. K. Schmidt))
 施穆勒, 古 · (Schmoller, G.)
 施本格勒, 奧 · (Spengler, O.)
 施特勞斯, 大 · 弗 · (Strauss, D. F.)
 施泰因能, 馮 · 卡 · (Steinen, von K.)
 施特勒貝爾, 亨 · (Ströbel, H.)
 施略丁格爾, 厄 · (Schrödinger, E.)
 施陶丁格爾, 弗 · (Staudinger, F.)
 施萊夫施坦, 伊 · (Schleifstein, J.)
 施塔爾根堡, 海 · (Starkenbug, H.)
 施塔姆列爾, 魯 · (Stammler, R.)
 施瓦茲希爾德, 耳 · (Schwarzschild, L.)
 施泰因畢歇爾, 泰 · (Steinbüchel, Th.)
 威爾斯, 哈 · (Wells, H.)
 威斯特華倫, 埃 · (Westphalen, E.)

十 四

海涅, 亨 · (Heine, H.)
 海涅, 沃 · (Heine, W.)
 海爾曼, 厄 · (Heilmann, E.)
 海爾堡, 伊 · (Heilberg, I.)
 海克爾, 恩 · (Haeckel, E.)
 海涅曼, 恩 · (Heinemann, H.)
 海森堡, 威 · (Heisenberg, W.)
 海德門, 亨 · (Hyndeman, H.)
 海爾巴特, 約 · 弗 · (Herbart, J. F.)
 海爾方德, 亞 · 耳 · 馮 · 帕爾烏斯 (Helphand, A. L. v. Parvus)
 海爾方德, 奧 · 伊 · (Heljfond, O. J.)
 海德格爾, 馬 · (Heidegger, M.)
 馬爾, 尼 · 雅 · (Marr, N. J.)

馬朗, 恩 · (Maron, H.)
 馬凱, 伊 · 恩 · (Mackey, J. H.)
 馬赫, 恩 · (Mach, E.)
 馬隆, 邊 · (Mallon, B.)
 馬爾克, 西 · (Marck, S.)
 馬克思, 卡 · (Marx, K.)
 馬克思, 勞拉 (Marx, Laura)
 馬爾托夫, 爾 · (尤 · 奧 · 策杰爾包姆) (Martov, L. (J. O. Zederbaum))
 馬爾庫斯, 赫 · (Marcuse, H.)
 馬卡連珂, 姆 · (Makarenko, M.)
 馬特奧蒂, 賈 · (Matteoti, G.)
 馬斯累沙, 維 · (Masleša, V.)
 馬薩利克, 托 · (Masaryk, T.)
 馬爾丁諾夫 (Martinov)
 馬爾科維奇, 米 · (Marković, M.)
 馬爾科維奇, 西馬 (Marković, Sima)
 馬爾科維奇, 柳 · (Marković, Lj.)
 馬爾科維奇, 斯 · (Marković, S.)
 馬烏伯朗士, 爾 · (Maublanc, R.)
 馬基雅弗利, 尼 · (Machiavelli, N.)
 恩茨門, 弗 · (Enčmen, F.)
 恩格斯, 弗 · (Engels, F.)
 恩格斯, 瑪 · (Engels, Marija)
 恩格爾曼, 霍 · (Engelmann, H.)
 恩培多克勒 (Empedoklo)
 恩格哈爾特 (Engelhardt)
 格蘭特 (Grant)
 格布勒, 克 · (Gäbler, K.)
 格林柯, 格 · (Grinko, G.)
 格拉貝, 弗 · (Graeber, F.)
 格拉貝, 符 · (Graeber, W.)
 格羅普, 盧 · 奧 · (Gropp, R. O.)
 格羅斯, 卡 · (Gross, K.)
 格律恩, 阿 · (Grün, A.)
 格歇爾, 卡 · 弗 · (Göschel, K. F.)

格里福斯, 維 · (Griffuelhes, V.)
 格羅斯曼, 亨 · (Grossmann, H.)
 格腊霍尔, 伊 · (Grahor, J.)
 格列則尔曼, 格 · (Glezerman, G.)
 格利戈里奇, 韦 · (Gligorić, V.)
 特拉齐尼, 姆 · (Terracini, M.)
 特斯利奇, 弗 · (Teslić, V.)
 特雷維斯, 克 · (Treves, K.)
 特倫德倫堡, 阿 · (Trendelenburg, A.)
 索列尔, 若 · (Sorel, G.)
 索罗金, 皮 · (Sorokin, P.)
 索瓦热奥特, 阿 · (Sauvageot, A.)
 索洛維約夫(Solovjev)
 索柯里尼柯夫(Sokolnikov)
 庫恩, 貝 · (Kun, B.)
 庫格曼, 路 · (Kugelmann, L.)
 庫諾夫, 亨 · (Cunow, H.)
 庫琴斯基, 尤 · (Kuczynski, J.)
 庫維利埃, 阿 · (Cuvillier, A.)
 爱丁頓, 阿 · 斯 · (Eddington, A. S.)
 爱斯內, 庫 · (Eisner, K.)
 爱尔維修, 克 · 阿 · (Helvetius, C. A.)
 爱因斯坦, 阿 · (Einstein, A.)
 倍克, 奧 · 卡 · (Beck, O. K.)
 倍倍尔, 奧 · (Bebel, A.)
 埃卡留斯, 約 · 格 · (Eccarius, J. G.)
 埃克尔曼, 約 · 彼 · (Eckermann, J. P.)
 埃克施坦, 格 · (Eckstein, G.)
 高尔基, 馬 · (Gorki, M.)
 高德曼, 路 · (Goldmann, L.)
 高尔斯基, 德 · 普 · (Gorski, D. P.)
 泰麦, 瓦 · (Theimer, W.)
 泰恩, 伊 · (Taine, H.)
 泰勒斯(Tales)
 泰西埃尔, 日 · (Teissier, G.)
 倫納, 卡 · (Renner, K.)

倫施, 保 · (Lensch, P.)
 納吉, 伊 · (Nagy, I.)
 納維勒, 皮 · (Naville, P.)
 哥白尼, 尼 · (Kopernik, N.)
 哥穆尔卡, 瓦 · (Gomulka, V.)
 拿破侖第一(Napoleon I)
 拿破侖第三〔路 · 波拿巴〕(Napoleon
 III (L. Bonaparte))
 翁布萊特, 保 · (Umbreit, P.)
 翁特爾曼, 恩 · (Untermann, E.)
 桑巴特, 威 · (Sombart, W.)
 桑默維勒, 約 · (Somerville, J.)
 烏尔木, 伊 · (Wurm, E.)
 班非, 安 · (Banfi, A.)
 唐恩, 特 · (Dan, Th.)
 俾斯麦, 奧 · (Bismarck, O.)
 茨維奇, 斯 · (什特費克) (Cvijić, S.
 [Štefek])
 热利亚鮑夫, 安 · (Željabov, A.)
 茲罗齐斯蒂, 特 · (Zlocisti, Th.)
 铁托〔約瑟夫 · 布罗茲〕(Tito〔Josip
 Broz〕)
 席勒 · 弗 · (Schiller, F.)
 晏森, 奧 · (Jensen, O.)

十一画

培根, 弗 · (Bacon, F.)
 張伯倫, 豪 · 斯 · (Chamberlain, H.
 S.)
 康德, 伊 · (Kant, E.)
 康福斯, 莫 · (Cornforth, M.)
 康普夫迈尔, 保 · (Kampfmeier, P.)
 康斯坦丁諾夫, 費 · 瓦 · (Konstanti-
 nov, F. V.)
 都德, 阿 · (Daudet, A.)
 笛卡儿, 勒 · (Descartes, R.)

盖伊, 彼 · (Gay, P.)
 盖得, 茹 · (Guesde, J.)
 盖伯勒, 格 · 阿 · (Gabler, G. A.)
 基佐, 弗 · 比 · (Guizot, F. P.)
 基基奇, 恩 · (Kikić, H.)
 基得里奇, 鲍 · (Kidrić, B.)
 基巴尔契奇, 尼 · 伊 · (Kibalčić, N. I.)
 荷马(Homer)
 朗格, 弗 · 阿 · (Lange, F. A.)
 朗之万, 日 · (Langevin, J.)
 朗之万, 保 · (Langevin, P.)
 累德布尔, 格 · (Ledebour, G.)
 勒 · 鲁比兹(Le Lubez)
 勒杜克, 符 · (Leduc, V.)
 勒维特, 卡 · (Löwith, K.)
 勒弗夫尔, 昂 · (Lefevre, H.)
 曼迪奇, 奥 · (Mandić, O.)
 曼海姆, 卡 · (Mannheim, K.)
 曼内斯曼(Mannesmann)
 曼努伊里斯基, 德 · 查 · (Manuilski, D. Z.)
 梅因, 爱 · (Meyen, E.)
 梅林, 弗 · (Mehring, F.)
 梅劳-庞蒂, 莫 · (Merleau-Ponty, M.)
 梅茨克, 厄 · (Metzke, E.)
 莫尔, 托 · (Mor, Th.)
 莫尔夫, 克 · (Mort, C.)
 莫里斯, 威 · (Morris, W.)
 莫昂热, 普 · (Morhange, P.)
 莫姆森, 泰 · (Mommensen, Th.)
 莫斯特, 约 · (Most, J.)
 莫罗佐夫, 阿 · (Morozov, A.)
 莫洛托夫, 维 · 米 · (Molotov, V. M.)
 梁赞诺夫, 德 · (Rjazanov, D.)
 梯也尔, 路 · 阿 · (Thiers, L. A.)
 梯叶尔, 埃 · (Thier, E.)

梯叶里, 奥 · (Thierry, A.)
 陶里亚蒂, 帕 · (Togliatti, P.)

十二画

斯密, 亚 · (Smith, A.)
 斯腾, 伊 · (Sten, J.)
 斯大林, 约 · 维 · (朱加施维里) (Stalin, J. V. (Džugašvili))
 斯威济, 保 · (Sweezy, P.)
 斯宾塞, 赫 · (Spencer, H.)
 斯穆茨, 扬 · 希 · (Smuts, J. Ch.)
 斯图科夫, 伊 · 恩 · (Stukov, I. N.)
 斯特拉敦(Straton)
 斯特恩堡, 弗 · (Sternberg, F.)
 斯宾诺莎, 巴 · (Spinoza, B.)
 斯米尔诺夫, 伊 · 尼 · (Smirnov, I. N.)
 斯捷潘诺夫, 伊 · (Stepanov, I.)
 斯塔德哈根, 阿 · (Stadhagen, A.)
 斯托扬诺维奇, 尔 · (Stojanović, R.)
 斯坦诺夫尼克, 亚 · (Stanovnik, J.)
 斯特罗果维契, 姆 · 斯 · (Strogovič, M. S.)
 斯维尔德洛夫, 雅 · 米 · (Sverdlov, J. M.)
 普兰克, 麦 · (Planck, M.)
 普拉顿, 奥 · (Platen, A.)
 普连厄, 约 · (Plenge, J.)
 普里察, 奥 · (Prica, O.)
 普芬德, 卡 · (Pfähder, K.)
 普雷南, 耳 · (Prenant, L.)
 普雷南, 马 · (Prenant, M.)
 普赖尔(Preyer)
 普列汉诺夫, 格 · 瓦 · (Plehanov, G. V.)
 普尔济路斯基, 伊 · (Przyłuski, J.)
 普罗柯波维奇, 谢 · 尼 · (Prokopovič

S. N.)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 叶·(Preobraženski, E.)
 菲克, 阿·(Fick, A.)
 菲亞門科, 阿·(Fijamengo, A.)
 菲力波維奇, 菲·(Filipović, F.)
 萊, 海·(Ley, H.)
 萊伊, 阿·(Rey, A.)
 萊辛, 哥·埃·(Lessing, G. E.)
 萊希, 威·(Reich, W.)
 萊維-布律耳, 路·(Lèvy-Bruhl, L.)
 萊維·施特勞斯, 克·(Lévy Strauss, C.)
 萊布尼茨, 哥·威·(Leibniz, G. W.)
 萊克列爾, 安·(Leclair, A.)
 費利, 恩·(Ferri, N.)
 費定, 康·(Feđin, K.)
 費舍, 庫·(Fischer, K.)
 費雷, 泰·(Ferré, T.)
 費切爾, 伊·(Fetscher, I.)
 費希特, 約·哥·(Fichte, J. G.)
 費奈迭, 雅·(Venedey, J.)
 費德爾, 黑·(Förder, H.)
 費薩德(尔·普·)(Fessard[R. P.])
 費爾巴哈, 路·(Feuerbach, L.)
 費爾斯特, 約·(Förster, J.)
 費爾斯特, 沃·(Förster, W.)
 費多謝耶夫, 彼·尼·(Fedosjejev, P. N.)
 舒佩, 威·(Schuppe, W.)
 舒巴特, 沃·(Schubart, W.)
 舒爾茲-德里奇, 海·(Schulze-Delitzh, H.)
 舒耳茨, 羅·(Schulz, R.)
 舒貝特-索爾登, 理·(Schubert-Soldern, R.)

舒斯特爾, 泰·(Schuster, Th.)
 雅戈達, 格·(Jagoda, G.)
 雅科比, 伊·(Jacoby, J.)
 雅科比, 約·(Jacoby, Joh.)
 雅基爾, 約·埃·(Jakir, J. E.)
 雅羅申柯, 爾·(Jarošenko, L.)
 黑森, 勃·(Hessen, B.)
 黑格爾, 喬·威·弗·(Hegel, G. W. F.)
 傅立叶, 沙·(Fourier, Ch.)
 博爾夏特, 尤·(Borchardt, J.)
 博耳諾夫, 奧·弗·(Bolnow, O. F.)
 博什尼亞克, 布·(Bošnjak, B.)
 敦克爾, 克·(Duncker, K.)
 敦克爾, 海·(Duncker, H.)
 策薩雷茨, 阿·(Cesarec, A.)
 捷爾任斯基, 費·(Deržinski, F.)
 提利克, 普·(Tillich, P.)
 凱爾-哈第(Hardi, K.)
 凱德羅夫, 勃·姆·(Kedrov, B. M.)
 馮特, 威·(Wundt, W.)
 溫什爾, 符·(Venžer, V.)
 湯因倍, 阿·(Toynbee, A.)
 閔采爾, 托·(Münzer, Th.)
 隆哥, 路·(Longo, L.)
 腊津, 克·(Racin, K.)
 屠拉梯, 菲·(Turati, F.)

十三画

葛蘭西, 安·(Gramsci, A.)
 路易, 保·(Louis, P.)
 路德, 馬·(Luther, M.)
 瑙威爾克, 卡·(Nauwerk, K.)
 奧本海, 達·(Oppenheim, D.)
 奧哲爾, 喬·(Odger, G.)
 奧本海麥, 弗·(Oppenheimer, F.)

奧斯瓦尔德, 弗·(Oswald, F.)(見弗·恩格斯)

奧斯特瓦尔德, 威·(Ostwald, W.)

奧斯特罗維季揚諾夫, 康·瓦·(Ostrovitianov, K. V.)

塞佛, 路·(Sève, L.)

塞尔森, 霍·(Selsam, H.)

塔迪奇, 柳·(Tadić, Lj.)

塔尔海麦, 奥·(Thalheimer, A.)

十四画

福米娜, 伏·阿·(Fomina, V. A.)

福格特, 卡·(Vogt, K.)

福尔马尔, 格·(Vollmar, G.)

福加腊西, 貝·(Fogarasi, B.)

歌德, 約·沃·(Goethe, J. W.)

赫斯, 莫·(Hess, M.)

赫尔岑, 亞·(Hercen, A.)

赫伯尔, 弗·(Hebbel, F.)

赫罗德, 魯·(Herold, R.)

赫普内, 伊·(Höppner, I.)

赫希柏格, 卡·(Höchberg, K.)

赫魯曉夫, 尼·(Hruščov, N.)

赫拉克利特(Heraklit)

蒙特, 泰·(Mundt, Th.)

蒲魯东, 約·(Proudhon, J.)

維伯, 比·(Webb, B.)

維伯, 悉·(Webb, S.)

維舍, 弗·泰·(Vischer, F. Th.)

維斯, 弗·(Weiss, F.)

維尔斯, 赫·格·(Wells, H. G.)

維利希, 奧·(Willich, A.)

維貝尔, 耳·(Weber, L.)

維貝尔, 麦·(Weber, M.)

維亚特尔, 伊·(Viatr, J.)

維維安尼(Viviani)

維特福格尔, 卡·阿·(Wittfogel, K. A.)

維尔霍夫斯基, 亞·伊·(Verhovski A. I.)

蔣介石(Čang Kaj-šek)

十五画

德曼, 亨·(Man, de H.)

德里施, 汉·(Driesch, H.)

德波林, 阿·莫·(阿·莫·越飞)(Deborin, A. M. (A. M. Joffe))

德拉佩(Draper)

德罗克, 昂·(Desroches, H.)

德桑蒂, 让·特·(Desanti, J. T.)

德梅茨, 彼·(Demetz, P.)

德維勒, 日·(Deville, G.)

德热拉斯, 米·(Đilas, M.)

德雷福斯, 阿·(Dreyfus, A.)

德勒克吕兹, 沙·(Delecluze, Ch.)

德腊戈維奇, 腊·(Dragović, R.)

德謨克利特(Demokrit)

德腊吉切維奇, 阿·(Dragičević, A.)

魯宾, 伊·伊·(Rubin, I. I.)

魯波尔, 伊·克·(Luppol, I. K.)

魯基奇, 腊·(Lukić, R.)

魯滕堡, 阿·(Rutenberg, A.)

魯波里尼, 克·(Luporini, C.)

魯克拉夫特, 本·(Lukraft, B.)

摩尔根, 托·(Morgan, Th.)

摩尔根, 路·(Morgan, L.)

墨索里尼, 本·(Mussolini, B.)

潘涅庫克, 安·(Pannekoek, A.)

蔡特金, 克·(Zetkin, C.)

十六画

鮑威尔, 布·(Bauer, B.)

鮑威尔, 亨 · (Bauer, H.)
 鮑威尔, 埃 · (Bauer, E.)
 鮑威尔, 奥 · (Bauer, O.)
 鮑亨斯基, 伊 · 姆 · (Bochenski, J. M.)
 霍恩, 约 · 海 · (Horn, J. H.)
 霍布斯, 托 · (Hobbes, Th.)
 霍布森, 约 · 阿 · (Hobson, J. A.)
 霍姆斯, 雅 · (Homes, J.)
 霍尔巴赫, 保 · (Holbach, P.)
 霍尔瓦廷, 克 · (Horvatin, K.)
 霍尔克海姆, 麦 · (Horkheimer, M.)
 穆任, 昂 · (Mougin, H.)
 穆勒, 约 · 斯 · (Mill, J. St.)
 穆尼埃, 厄 · (Mounier, E.)
 诺特金, 亚 · (Notkin, A.)
 诺斯克, 古 · (Noske, G.)
 萧伯纳 (Shaw, B.)
 萧洛霍夫, 米 · (Šolohov, M.)

十七画

韩德尔, 哥 · (Handel, G.)
 缪塞, 阿 · (Musset, A.)
 谢林, 弗 · 威 · (Schelling, F. W.)
 谢勒, 麦 · (Scheler, M.)

谢德曼, 菲 · (Scheidemann, F.)
 谢列克托尔, 姆 · (Selektor, M.)
 谢格赫尔斯, 阿 · (Seghers, A.)
 谢烈布利雅柯夫, 勒 · 普 · (Serebriakov, L. P.)
 赛德尔, 亨 · (Seidel, H.)

十八画

萨特, 让 · 保 · (Satre, J. P.)
 萨尼厄, 耳 · (Sanial, L.)
 萨宁娜, 阿 · (Sanina, A.)
 萨乌尔兰德, 库 · (Sauerland, K.)
 萨拉比扬诺夫, 弗 · (Sarabjanov, V.)
 魏斯, 格 · (Weiss, G.)
 魏迪希, 弗 · (Weidig, F.)
 魏特林, 威 · (Weitling, W.)
 魏德迈, 约 · (Weydemeyer, J.)

二十一画

饶勒斯, 让 · (Jaurès, J.)

二十二画

鬲普洛维奇, 路 · (Gumplovitz, L.)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